

陈独秀著作选编

1926－1931

第四卷

主编　任建树

副主编　李银德　邵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独秀著作选编

1926—1931

第四卷

主编 任建树

副主编 李银德 邵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录



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

(一)赤是什么？ (二)各国反赤的是谁？ (三)中国反赤的是谁？ (四)他们在中国所反的赤是什么？ (五)反赤运动因何在中国民族运动高潮中发生？ (六)反赤运动影响到中国民族运动是怎样？

在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中，突起所谓反赤运动，其意义与影响如何，凡是关心中国民族运动的人，都应该加意研究这一问题。

这问题劈头所要研究的就是什么是赤。此时所谓赤化、所谓反赤这些名词，在社会上很流行，几乎演剧上广告上都要用做材料以惹人注意；可是究竟什么是赤，大半还不甚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无意识的随声附和，或有意识的拿做攻击敌人之武器罢了。赤之名起于苏俄十月革命，以赤色为旗帜，创立赤卫军以保障俄罗斯无产阶级及农民对于资产阶级、地主及西欧帝国主义争斗之胜利，赤之内容如此，其后世人称十月革命为赤色革命称苏俄为赤俄以此。

其次，我们要知道的，各国中主张反赤的是那种人。各国中主张反赤的，只有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与政党这班少数人，不但工农大群众是表同情于赤俄的，即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如英国的萧伯讷、罗素等，他们的根本思想虽不是赤的(他们若在中国，孙传芳当然要觉得赤得应该杀头，罗素屡屡发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的言论，指斥英国，中国的国家主义派也当然要加上他一个新式卖国贼的头衔)，然而绝对不主张反赤，并且有时感觉得帝国主义的国家之过分横暴，宁表同情于赤俄。

再其次，我们便须检查中国主张反赤的是那种人。此时中国主张反赤的有两种人：一是军阀中之反动派，如奉系之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直系之吴佩孚、孙传芳，粤系之陈炯明、魏邦平等；一是知识者及政

客中之反动派，如国家主义派、研究系、安福派、中和党及老民党分子章太炎、冯自由、马素等。张作霖和日本之关系，是人人所知道的；在五卅运动中，从奉天到上海，奉系军阀整个的替英、日帝国主义者扑灭中国的爱国运动，这也是人人所知道的；李景林、张宗昌在直隶、山东当官胡子，吴佩孚讨贼通电中很骂得痛切；吴佩孚至今还要拥护曹锟的宪法，他此次联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作合，英国助他一万五千枝快枪，如果不被孙传芳中途夺去，马上便会到手，最近还派代表到日本勾结俄国白党土匪谢米诺夫，招集俄白党五万人南下攻打国民军；受上海领事团面谕暗杀刘华的孙传芳，他的反动程度也不让吴佩孚；陈炯明、魏邦平受香港政府的庇护帮助而扰乱广东，乃是很明显的事实；国家主义派的首领自称师承墨索里利，他们《醒狮》报和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所办的《独立报》，有明显的关系，把他们列在反动派当不冤枉；研究系中为许多人头脑并不甚反动，然而他们的行动，从前清到现在，却都站在反动派方面，最近仍然力助吴佩孚，他们的大将马不停蹄奔走奉天、杭州、南京、长沙、衡州，为吴佩孚效力；亲日卖国的安福派，不用我们再说了；还在秘密酝酿中的中和党，他的创始者是尤烈（致公堂即三合会的首领）和徐绍桢父子，孙传芳攻南京时，他们曾想召集一些失职军人与帮匪组织中华救国军，做奉军袭取上海之内应，嗣即随着张宗昌战败而失败了，这个党，和老民党的反动派陈炯明派及什么反赤大联盟，几乎是一个东西，若再加上国家主义派，有产生一个貌似的中国法西斯特党之可能，这个党的反动性，较之研究系、安福派，还要后来居上；章太炎始终是个反革命的东西，辛亥革命时，指斥孙、黄为小丑，首先通电主张统治中国非袁项城不可的就是他；冯自由以南京临时政府的稽勋局长投降袁世凯当侦探，因此曾在上海会审公堂控告吴稚晖先生；马素曾为杨希闵、刘震寰乞援于香港致府攻打广东，近又上书吴佩孚请讨冯玉祥。原来中国主张反赤的就是这班先生们，并且这班先生们的背后，大半都有帝国主义者发踪指使，所以稳健的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右派大部分还未加入他们这个运动。

再其次，我们便要研究他们所反的赤是些什么人是些什么事。他们所反的赤如下：

苏俄；

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及广东国民政府；

冯玉祥及国民军；

郭松龄；

贾内阁①；

上海总商会会长虞和德。

我们把这些分子列在一个表上，可谓不伦不类极滑稽之至了，然而他们都一概被指为赤化，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这些分子当中实有一共同点，即他们或是有反帝国主义之决心，或是他们现时的举动在客观上是于帝国主义者不利的，所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一概加以赤化之名。

赤俄的内政，似乎用不着别国人反对，中国人反对赤俄，当然是反对赤俄对于中国之关系：一、在中俄外交关系上说起来，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在中国把持海关，驻扎海陆军，据有租界及租借地，施行领事裁判权，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反对赤俄之必要？蒙古问题中俄协定已明白规定了，我们自己无暇把中蒙的关系弄好，难道承认赤俄有将蒙古交给中国之权利吗？中东路诚然还在中俄共管的状态中，诚然我们不应该主张永远用这样办法，可是现在要责赤俄把中东路管理权完全归还中国，我们有何方法可以保证该路不至由张作霖转入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者之手？二、在赤俄援助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上说起来，赤俄援助中国革命，诚然是事实；但现在所援助的决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民族革命。一年前法国《晨报》即极力鼓吹“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赤俄在亚洲势力膨涨，否则莫斯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这便是赤俄援助中国革命之正确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支部，向来不曾和苏俄发生过直接关系，他和苏俄的共产党同属于共产国际，他们根本的政治理想固然是同的，但是因为政治的经济的环境之不同，而革命之步骤便也不同，所以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纲与行动，乃是要完成中国民族革命的要求，即反对国

① 1925年12月30日，段祺瑞组织所谓责任内阁，吸收了一些国民党人，但他们不受段的拉拢，也不敢就职。内阁总理由陆军总长贾德耀代任，故称贾内阁。

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到底。

中国国民党，在过去的历史上，在现在的政纲上，都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党，这是人人所知道的。国民党的右派不用说了，即他的左派，在理想上在行动上，都只是一个民族革命者，实无所谓赤。左派执政的广东国民政府，他所努力而有点成绩的只是两件事：一是对外援助民众抵抗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之压迫，一是对内解散了许多不法军队，统一了全广东的军政财政，免除了一些苛捐杂税，禁止了赌，给了人民一点生命、财产、集会、结社之自由，这都是赤化吗？

说冯玉祥及国民军赤化了，那更是冤枉。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军第一军，的确是很有纪律的军队，全中国现有的军队，算是冯玉祥及蒋介石所统率的军队最有纪律不扰害人民，若说这两种军队是赤化军，我们敢代表全国人民欢迎这赤化军，并哀求全国军队都变成这样的赤化军。冯玉祥根本的政治理想，只是封建时代的旧套"勤俭爱民"四个大字，他治军甚严，对于部下任何级军官，决不容许他们违反他这个政治理想；他并且要把他的理想推行到全国，无论何派，凡是违反或超过他这个政治理想的，他都很难与之合作，与其说他主张赤化，不如说他主张冯玉祥化。然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为什么加冯玉祥以赤化之名呢？正是因为他和反冯玉祥化而做帝国主义走狗的张作霖、吴佩孚作对，及他多少接受了孙中山反帝国主义的主张这两个缘故。

郭松龄倒戈时的通电，不过主张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整顿金融，兴办矿山，便利交通这几件事，并且还主张严防激党，照道理实在说不上什么赤化；然而张作霖、杨宇霆及奉天商会竟异口同声指责郭松龄赤化了。可是郭军倒戈攻奉，几乎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失去有力的工具，这便是郭松龄应得之罪。

说贾内阁是赤化内阁，那更是可怜了。贾内阁开罪于帝国主义者的，只是通过讨吴令这一件事；贾阁阁员有赤化嫌疑的，只是王正廷、易培基二人，王氏本是一个耶教徒而兼新官僚，只因为他经手成立了中俄协定的草案，又主张不平等条约应该修改，便犯了滔天大罪——赤化。易氏不过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教育家，只因为他反对亲日卖国的段祺瑞，也犯了赤化的罪。

至于说虞和德也赤化了，那益发滑稽之至。上海的工贼曾散发传单说虞和德是共产党党员，现在穆藕初也指责虞和德赤化了；可是虞氏虽未赤氏，他却主张关税自主，又主张设立海关公库，并且胆敢批评上海纱厂待遇工人不好，开罪安格联[①]、穆藕初一班人，也算是咎由自取。

综观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中国所反的赤，其人除苏俄及共产党外，实无所谓赤，其事除实际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或有参加民族运动的嫌疑外，亦无所谓赤。不过帝国主义的走狗可以说联合被压迫民族以反对帝国主义，本是赤俄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即是赤化运动。如果是这样，赤化运动就是民族运动，反赤运动也就是反民族运动了。

再其次，我们应该知道反赤运动因何在中国民族运动高潮中发生。我们既然认识反赤运动就是反民族运动，我们便已经知道为什么反赤运动是当然随着中国民族运动高潮而发生的了。据上面所述法国《晨报》的说话，帝国主义在一年前已经决定了以反赤运动扑灭中国民族运动的计划。五卅运动起，帝国主义者知道中国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单纯的炮舰政策所可扑灭的了，势必动用宣传力量；可是宣传的方法又不便直接反对中国民族运动，于是乃用反赤口号来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从伦敦到上海，从北京使团到各地的东西各报，一致宣传五卅运动是赤俄煽动的，是中国赤党主持的；可是他们东西文的宣传品，不能使中国民众普遍的了解，于是他们乃雇用一些中国人，在上海印发《诚言》报，每期数十万份，广布于市民，一面为帝国主义的工部局辩护，一面攻击赤俄与中国共产党；可是那时中国民族运动潮犹在高涨中，并且民众都知道《诚言》报是帝国主义的工部局直接发出的，不但不发生效力，而且代印《诚言》的商务印书馆和转载《诚言》的新、申两报，都受了民众的惩罚，于是帝国主义改变其对中国民族运动的政策，一面以退让的态度欺骗中国的资产阶级使之妥协，一面向各方面收买中国人，使他们自己出

---

① 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1869—1932)，英国人。1888 年起在中国海关任职。1911 年 10 月，继赫德出任总税务司。1918 年，又从北洋政府处取得对全国常关税的保管权，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大权。1927 年 1 月，在中国人民要求关税自主的浪潮中，因坚持不平等条约反对征收二点五附加税，被免职。

来做反赤宣传。帝国主义者这两个政策,给中国民族运动很大的打击,其效力竟在炮舰政策以上。五卅运动因为资产阶级妥协及反赤宣传这两个打击,运动的高潮遂渐渐低落下去;帝国主义者遂乘此高潮低落的时候,转向中国民族运动开始反攻。其反攻的策略,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的计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嗾使他们的走狗奉、直两系军阀,以反赤的口号封闭全国的爱国机关,禁止全国的爱国运动;第二是嗾使他们的走狗扩大反赤宣传之范围,由攻击苏俄及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扩大到攻击国民军冯玉祥、郭松龄以至贾内阁、虞会长等,凡稍有一点参加民族运动嫌疑的人,都加以赤化之名;第三步是帝国主义者亲自公开的向中国进攻,在北方以武力援助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吴佩孚、靳云鹗,向有赤化嫌疑的郭松龄及冯玉祥等国民军进攻,在南方则命令英籍税务司借故封锁广东海口,在上海则逮捕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首领刘华交孙传芳枪杀了,并且在租界内禁止中国商民使用"五卅"这个名词;第四步是由反赤的宣传,更进一步到反赤的组织,将由这些组织,来根本肃清所谓赤化势力即一切参加中国民族运动的势力。他们这项组织,计有两种,一是国际的,一是中国的。国际的组织,据三月十三日的《时事新报》译载上海《字林西报》说:"本埠各国人士,组织一护宪会,以抵制过激主义,十二日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在夏令配克影戏院开第一次英语大会,演说者有霍华德、琼斯裴德等,同时并在日本人俱乐部开日语大会,在法国总会开法语大会。按护宪会系一国际团体,其总部设于上海,于中国各大都会均设分会,四月间将在上海开全中国大会,香港、广州、汕头、天津、汉口等处,均将派代表出席,其目的在使公众咸知过激主义之危险,计加入此会者已有十五国,上海总委员会之组织,系每国各推代表二人,内分十股云。"各国帝国主义者若说过激主义于他们自身有危险,那诚然是事实;他们若说恐怕过激于中国人有危险,忙着出来做反赤的组织宣传活动,那便未免爱护中国人太过了,我们哀求他们少欺压点中国就算是深仁厚泽了,到不必这样过分的爱护中国人!各国帝国主义者特于三月十二日开第一次护宪大会,和他们所指为赤化的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对峙,这也是他们很有意义的示威运动。中国的组织,就是所谓反赤大联盟;这个大联盟的总机关在上海法租界铭

德里一号，他的领袖，据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章太炎、尤烈、徐绍桢、魏邦平、冯自由、居正这班人，除魏邦平外都是所谓老民党，他们的目标就是反对苏俄、中国共产党、南方的国民政府、北方的冯玉祥及国民军。此外还有一个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成立在反赤大联盟之前，在中国可算是反赤团体之前辈；他们所反对的目标，完全和反赤大联盟一样，他们以为危害中国国家的只有苏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国民军，而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张、吴等反动军阀，自五卅运动以来，他们对于每次反英、反日、反奉、反吴的民众运动，一概不肯参加，只孤独的在他们的机关报《醒狮》上，大声疾呼的向反帝国主义的苏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进攻，为帝国主义者出了不少的气。好了，他们现在却不孤独了，他们有了姊妹团体反赤大联盟了，他们的《醒狮报》，和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所办的《中国报》及《独立报》，也算是姊妹报。

他们这些反赤的组织和宣传经费是从何处来的呢？二月廿日的上海《字林西报》伦敦通信告诉我们说："已由英伦国家银行汇英金六十万镑到上海汇丰银行，作为反对中国民族运动及苏俄宣传之费用。"在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中，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特殊而且不法的权利已有开始动摇的征象，如果真能由此区区英金六十万镑，扑灭了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所谓赤化运动即中国民族运动，使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利益与威权，得以重新巩固起来，岂不是本小而利大么！？

最后，我们应该研究反赤运动影响到中国民族运动是怎样了。现时中国的政治争斗，已经分成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民族运动的反赤运动两大联合战线的营垒了，孰胜孰败，乃是中国盛衰存亡紧急关头！反赤运动实际上就是反民族运动，然而他们表面上不但不说反对民族运动，并且还要说赤化足以亡国，反赤正是救国。可是他们所反的赤，依据他们反赤之对象，当然不是指赤俄的社会革命运动，并且事实上中国也还没有这个运动，正不必无的放矢；他们所指的赤，只是指民族运动中反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因为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是赤俄喊出来的。五卅运动初起时，上海总商会的领袖对上海总工会的代表说："外间已经喧传你们赤化了，你们的宣传品上万不可再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呀！"国家主义派也向来不主张打倒帝国主

义，因为这是赤党的口号。仅此两件事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在中国所谓赤化乃指反帝国主义运动，所谓反赤就是反对这个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是赤不是赤，我们不须研究，所须研究的乃是反帝国主义在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中有何意义。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中国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外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帝国主义工具——国内军阀的扰乱，不打倒帝国主义，试问中国民族如何能够得着自由？现在国民党右派中有人说："我们民族主义者所谓打倒帝国主义，乃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而言，至于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乃是赤党世界革命的主张，和我们是不同的。"这种见解非常糊涂。在理论上，现代立国于世界，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离开国际关系闭关自守之可能；在事实上，俄罗斯与土耳其，都已经打倒了帝国主义在他们国内的势力，然而各帝国主义的国家仍然包围着俄罗斯与土耳其，想乘机夺去他们的自由；所以被压迫的民族，非到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完全倾覆，是不可停止反帝国主义运动而高枕无忧的。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如果反帝国主义运动是赤化，这种赤化，在民族自由运动上是最有意义的；如此，反赤运动不是破坏民族运动是什么？如此，究竟是赤化运动足以亡国呢，还是反赤运动足以亡国？这都是理论问题，再就事实上说起来：究竟是反赤的军阀政客可以救中国呢，还是他们所指为赤化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可以救中国？现在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的奉、直军阀结成了联合战线想来宰制中国，他们若能得到胜利，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将是怎样？我们环顾国外，能实力援助中国民族运动的，除赤俄外还有谁？我们环顾国内，能实力为民族自由奋斗而反抗帝国主义者及奉、直军阀这一联合战线的，除了被指为赤化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之外还有谁？若依反赤运动扑灭了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的势力，胜利的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奉、直军阀又是谁？他们的胜利，不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失败又是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得着一个结论：中国反赤运动和中国民族运动之消长，是要成反比例的，这是关心中国民族运动者所不可忽视的一重要问题。

1926年3月17日　《向导》周报第一四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孙文主义的信徒呢，还是冯自由主义的信徒？

国民党右派常常说：我们并不像反动派根本反对共产党，我们只是反对他们的分子留在国民党内。可是在事实上，南京和湖北的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开会时，右派党员却大声疾呼打共产党，并指令警察逮捕共产党人，警察从中调解，他们还责问警察说："我们替你们捉共产党，你们自己为什么不动手！"请问所谓纯粹的国民党党员，所谓孙文主义的信徒，是不是应该如此！

红派势力与外人势力及曹锟势力之消长

有些人说：张吴是军阀，冯也是军阀，他们的胜败和我们人民无关。可是现在冯军方撤退，而北京便有了释放曹锟撤销检查贿选议员案的运动；同时，字林西报北京电公然说："外人皆信换一批人物，销除红派势力，政府财力又须更加资助，则新人为主者，对于外交将出以合乎情理的态度。"我们对此作何感想？

安格联为什么要听张作霖的电令？

帝国主义者屡次藉口尊重中国中央政府援助中国统一，反对广东政府干涉粤海关，可是现在安格联竟遵照张作霖的电令，通知北

京政府的财政总长，取消发行十五年新公债的提议，请问这是何种意义？

1926 年 3 月 27 日　《向导》周报第一四七期　署名：实

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

此次反奉战争之失败，其根本原因固然是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力助奉、直军阀，而中国革命势力不统一也是一个很大原因。中国的反动军队如奉张如直吴如李景林如张宗昌，都在日本帝国主义指导强迫之下统一起来，向国民军进攻；而在反奉方面，国民军与广州国民政府至少在军事方面未能联合作战，国民军内部，一、二、三军又未能切实合作，甚至于长江方面反吴的军事势力也未能联合一致，如此反奉战争安得不失败。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反动的军阀——还很强大，今后所有中国的革命势力非统一起来，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各部分都很难存在。可是不幸最近广州的事变恰恰和这个"革命势力统一政策"相反！

国民党内的一般右派及国民党外的一般右派，一向号召反俄反赤反共，这是实行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革命势力的根本政策；广州事变之根本原因，仍旧是这个政策之应用。他们宣传此次事变是由于共产党阴谋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他们：第一，照全中国的政治环境，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第二，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第三，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李济琛、程潜都不是疯子，共产党如果忽然发疯想建设工农政府，单单推倒蒋介石是不够的。共产党的政策，恰恰和右派所宣传的相反，不但主张广东革命的势力不可分裂，并且希望全中国的革命势力都要统一，不然无对敌作战之可能。在此时中国政治、军事的环境，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我们的政策是统一，右派的政策是分裂，他们在广东想分裂革命势力，同时

在北京在上海想分裂学生会。右派说共产党有倒蒋阴谋，然而事实上，两星期前上海右派最高党部某领袖，即预言广州将有大的政变，试问这是谁的阴谋？这阴谋若继续发展下去，广东的革命势力，必然由分裂而全部倾覆，胜利的只有香港帝国主义者（此时香港及上海的英文各报对广州现在的事变已经表示异常高兴），右派所得恐怕很少，甚至一点也得不着，试想当年进步党是如何拼命为袁世凯反对国民党，袁世凯胜利后，进步党所得着的是些什么？

我们鉴于北方国民军之失败及南方广州事变，凡是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一齐高声喊出"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扑灭分裂革命势力的一切阴谋！

1926年4月3日 《向导》周报第一四八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中国历史所需要的国民党，乃是适合于世界革命大潮中中国民族革命要求之整个的革命党，不但非革命的普通政党不合这个需要，即革命的国民党中夹杂一派游移的右倾分子，亦是中国革命进行之极大的障碍。

中国国民党之前身——中国革命同盟会，他的政纲，他的行动，都是一个革命的组织；辛亥革命后改称国民党时，遂丧失其革命性，其唯一原因，乃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开始厌弃革命，遂反映到国民党中，发生了背叛革命的右派，他们的声势非常之大，几乎使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左派失掉领袖的地位。这时国民党的总理，名义上虽然是孙中山，实际上乃是右派领袖宋教仁；中山先生看见这班右派，在组织上已附和官僚派"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口号，在政纲上已抛弃三民主义的要求，便发愤不过问党务，几乎不把国民党当作他自己的党。袁世凯得势，革命完全失散，中山先生乃决心排除那些右派，另组中华革命党；及袁氏死，广州南方政府再成立，复称中国国民党。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这期间的全党党员，在形式上都服从中山先生而听其指挥。其后因欧战中中国工业发展及俄国革命的影响，中国民族运动潮流不但高涨起来，而且新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生力军，使中国民族运动增加了新的意义：不但反对国内军阀，而且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且反对为帝国主义作走狗的奸商买办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主张要贯彻民族解放的完全目的，革命到底。这一民族运动的新趋势遂反映到国民党中，使国民党分为彻底革命和背叛革命之左右两派。这次右派声势之大，较过去宋教仁所领导的右派有过之无不及，其与左派之冲突决裂也更剧烈，其所表现之阶级的背景也更明显。此次右派分子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是一致的，所以右派也不是整个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

(一九二四年正月)前后，冯自由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六年正月)前后，戴季陶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前一个右派，他们不但口头上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事实上勾结香港政府及段祺瑞，援助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魏邦平，以反对共产党为名，攻打广州国民政府，又请求吴佩孚出兵讨伐赤化的国民军，又纠合所有的反动分子组织反赤大联合，目的在借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力量，扑灭他们的仇敌——全中国各种革命的势力；这班人已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反革命派，不应称为国民党右派，因为国民党无论左派右派，都不能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后一个右派，即新右派，他们不但要反对军阀，并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可是他们以为左派联俄联共政策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而要加以修正，这是他们和左派不同的地方；不过他们对于联俄联共政策只要求加以修正，并不主张根本上反俄反共，这是他们和反革命派不同的地方；他们这种中间的态度，有时是革命的，有时在客观上是帮助了反革命，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了革命。他们这种态度与思想，如果在一切实际行动上果然坚守得住，也还有一半令人可敬；可是在事实上，这一新右派只算是少数人一种理想，还未能形成独立的一派，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在组织上在行动上，并未能坚守他们的态度与思想和前一个右派即反革命派分开，虽然他们的领袖屡次表示不赞成左派同时也不赞成反革命派。现在我们可以略举新右派和反革命派未能分开的几件事实：第一，在组织上，他们的领袖季陶、孙科、伍朝枢虽然加入了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山东、江西、广州、徐州的右派党员及北京的一部分右派虽然和左派在一个组织；而西山会议及由此会议产生的上海中央总部，以至现在他们所召集的第二次大会，都是和反革命派合作的，在重庆、安庆、芜湖、南京、上海等市及江苏、浙江两省，他们都联合反革命派，另立和左派分离的组织。在行动上，这一新右派之发端，谁也知道是利用戴季陶的理论来号召的，照常情应该奉戴季陶为指导者，然而一开幕他们即勾结反革命派毒打戴季陶，捆绑戴季陶，幽囚戴季陶，使之狼狈南归，不敢出席西山会议，并至今不愿参加他们的工作，只这一件事，已经充分说明戴季陶等少数人所理想的新右派并未形成事实，大部

分还是反革命派因利乘便在当中冒名作祟，所以现在这一新右派的领袖，不但戴季陶睡在湖州潜园叹气，即叶楚伧、邵元仲也不得不取了消极态度；有全国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也是他们由戴季陶理论的暗示而发生，实际上他们并不研究孙文主义，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都被反革命派占据了当做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左派之工具；居正参加上海的反赤大联合，覃振派人联络赵恒惕谋倒长沙的左派党部，南京及武汉的右派党员们，都在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狂呼打共产党，并指令警察捕拿共产党，象这些行动，更是出乎右派领袖们屡次所宣布的态度与思想之外，完全是反革命。

因此，我们所以敢说现在所谓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还未能离开反革命派而独立自成一派。将来或者竟能自成一派，或者一部分变成左派一部分老实回到反革命派，此时虽不可知，而和反革命派混合的现状，大概是不能持久的。如果他们自成一派，而且很有力量，无论和左派在同一个组织与否，都是中国民族革命之障碍；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是他的阶级性，不独中国如此，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中国民族革命所需要的国民党，以富有这个阶级性的成分越少越好。

1926年4月3日　《向导》周报第一四八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这就是戴季陶所谓"仁爱"之言

重庆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散布一个小小传单如下：

孙中山先生弥留时之遗言：

和平！！奋斗！！救中国！！

和平！是望于帝国主义和军阀们的。

奋斗！是望于世界弱小民族和国民的。

救中国！是希望军阀自动与人民协同来打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同胞们！！军阀们！！速起！速起！

如果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们的仁爱性不至为阶级差别所消灭象戴季陶所想像，则右派先生们的希望，便别有方法可以达到，何必一定要革命呢？

国民党右派之光荣

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下的上海租界，任何小小政治集会都不自由，何况是国民党的会议。可是国民党右派的所谓第二次全国大会，公然大吹大擂的在上海法租界召集开会了，未受帝国主义者丝毫压迫，这是何等光荣！

帝国主义者悬出重赏了

上海《新闻报》北京电："二十五日使团会议，辛丑签约各国列席，讨

论中国时局，以为目下中国各当局如能完全合作，成立一巩固政府，限制赤化，则关会即可结束，以满华人希望，届时中央政府不患无钱办理善后各事。”这些说话的意义就是：帝国主义的使团，忧虑他们的走狗奉张、直吴以及段祺瑞、李景林、张宗昌辈之间的利益冲突很厉害，特悬重赏，迫张、吴等完全合作，好巩固为帝国主义的御用政府，为他们限制有害于帝国主义之所谓赤化。

1926年4月3日 《向导》周报第一四八期 署名：实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

在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的民族运动中，究竟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我们必须有明了正确的解释，方能认清我们的真正敌人，不至为敌所欺。譬如捕贼，必须首先要认清谁是贼，方不至为贼人也喊捉贼之呼声所欺，误认助我捉贼的邻人也是贼，甚至于怀疑到自家人，真正的贼反乘此逃脱了。

误解帝国主义而最可笑的，莫如以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就是有帝王的国家。其实现在帝国主义的国家若英吉利若日本，固然是都有帝王，若法兰西若美国，则都是所谓民主国家。其次则以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就是侵略别国的强大国家。这个见解也不完全正确，因为现时帝国主义的国家若荷兰，若比利时，并不强大。侵略别国固然是帝国主义的特性，可是古代罗马及西汉时代的中国，虽然都是侵略别国的国家，然而这种开疆辟土之封建的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帝国主义不同。又有人以为帝国主义乃由国家主义扩大而成，可称之为"大国家主义"。这个见解，在帝国主义发展之形式上是对的，却未能明瞭正确的指出帝国主义的性质。

现代所谓帝国主义乃指资本帝国主义，其存在须有下列二个特性：(一)凡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二)凡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国内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财政资本主义向国外掠夺压迫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依据帝国主义这两个特性，我们便可以判断苏俄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为抵制苏俄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这一政策，遂效贼人也大喊捉贼的故智，造出"赤色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以图离间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苏俄间的联合。其实"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苏俄之所以赤，乃

因为十月革命是工农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革命，一切资本帝国主义者正因此而仇视他；如果他现在也变成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那还何赤之有？如果他仍旧是赤的，那便绝对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而正是帝国主义之仇敌了。

*　　　　*　　　　*

一般人对于军阀解释之错误，更是普遍的。错误之主要原因，是军人和军阀不分，把一切担任军职的军人都当做军阀；因此，遂说张作霖、吴佩孚是军阀，冯玉祥、蒋介石也是军阀。我们反对的是军阀不是任何军人，尤其不应该反对敌视军阀的军人。我们反对军阀，同时又反对敌视军阀的军人，并且反对一切军人，连拿起武器反对军阀的自己也在内，如果是这样，非做到赤手空拳来反对军阀无办法，这岂不是一场笑话！因此，我们要打倒军阀，首先要认识军阀是什么，不可把一切军人都当做军阀，一律反对。军阀的特性有二：（一）凡军阀必然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已占住了中国最重要的财政机关交通机关，中国的军阀必尽力勾结帝国主义者，保护其在中国利益，始能得其援助，始能使其拥护军阀的政权，并且军阀不能独在国内找出尽量扩充军备之饷械的供给，也不得不仰求于帝国主义者，同时帝国主义者侵略半殖民地，亦不得不利用旧统治阶级做工具；（二）凡军阀必然摧残民众的自由，这是因为军阀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冲突（最重要的如苛捐杂税），非摧残民众的自由，便不能维持其统治权，同时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和被压迫国内民众的利益冲突（最重要的如把持海关、工业品竞争、利用贱价劳动等），军阀非摧残民众自由，不能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这两个军阀的特性，乃是半殖民地旧统治阶级的特性，不但现在的军阀如此，清室若存在至今，也必然是如此。王恒君在《军阀问题之研究》一文中（见三月三日的上海《商报》），把军阀的性质看做与周代诸侯、唐代藩镇相同，这是非常错误，这是因为他不懂得现代半殖民地旧统治阶级的特性和古代封建诸侯的特性不同之故。他因为不懂得现代半殖民地旧统治阶级的特性，遂至以据土、练兵、自由行动这三件事为军阀的特性，凡行此三者都是军阀，因此遂产出蒋介石、孙中山都是军阀这种荒谬的结论。一切民主主义革命者社会主义革命者，无一不须据土、练兵、自由行动，若

以此三者为军阀特性，则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革命者无一不是军阀，我们不解王君何以竟有此种妙想！

又如蒋介石辞去一切军职之虞电，也是不懂得半殖民地军阀的特性是什么，遂至请求开除一切军职以免步军阀之后尘，这和一般见解军人和军阀不分是同样的错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自然绝不可有军阀，但不可无担任军职之军人，蒋君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若以身任军职便是军阀，若以此生不受军职便不是军阀；那么，此时国民党中有许多身任军职的人，国民政府中更有许多人担任军职，则国民党岂不是一个军阀党，国民政府岂不是一个军阀政府？若国民党中军人党员，国民政府中担任军职的军人，都效法蒋君因不甘为军阀而辞去军职，并守此生不复受军职之信誓，试问广东将变成何种局面，国民党又将有何人担任革命的军事工作？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军事行动的工作是要居很重要地位。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国内军阀，都是武装的，民众没有武装，如何能够得着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民众除武装自己以外，所有国内的军事势力，凡是不曾勾结帝国主义及摧残民众自由的部分，都应该计算在民族革命的力量之内，并且要将民众的力量影响他们，使他们实际参加革命运动，而不可笼统的看做军阀加以破坏。凡是这种军事势力和军阀的军事势力冲突之时，民众应该起来积极的援助前者，破坏后者，断不可把他们的战争当做军阀间自己的冲突，而袖着手站在旁观地位。这种军事政策在我们半殖民地革命运动中，非常重要，是每个实际政治家，每个真正革命者，都不应该忽视的。

* * *

我们半殖民地的中国人，对于认清为害于半殖民地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特性是什么，当然是必要的。认清了他们的特性，然后再联合国外非帝国主义的国家与国内非军阀的军事势力，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作战，这才是我们民族自由运动之唯一的出路。若不认清他们的特性，误以为凡外国都是帝国主义者，凡军人都是军阀，遂至说苏俄和英、美、法、日同是帝国主义者，蒋介石、冯玉祥（依据军阀的两个特性，不但蒋介石

绝对不是军阀，即冯玉祥目前也还不能说是军阀）和张作霖、吴佩孚同是军阀，一概加以反对，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若照这样不分是非皂白的糊涂乱打一阵，其结果只有打着自己，而打不倒敌人，这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乐意的事，我们这种错误观念一天不改正，中国革命是一天没有希望的呵！

1926年4月13日 《向导》周报第一四九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绅士们请看北京血案的司法调查!

中国的绅士们相信所谓司法调查,仿佛是一种迷信。五卅事件,他们本主张用司法调查来解决,可是调查过了仍然没有解决。到了北京血案发生,他们仍旧摆出绅士的态度,仿佛以为血案之是非真相未明(或者他们还不知道是段祺瑞杀了学生或是学生杀了段祺瑞),仍旧主张司法调查,似乎案情调查清楚,是非大明,他们自有办法;可是现在已经司法调查明白了。据京师地方检察厅致陆军部的信上说:"计共验死尸四十三具,生伤四十五名,函称负伤而未受验者七十三人。……内左四区巡长王文绍供称……在卫队开枪以前,学生仅喊口号,没有别的动作;保安队副分队长郎葆贤供称,学生都拿着旗子传单,没有别的东西,凶器及放火的东西,都没有看见……卫队放了两次枪,大约放了有一千多子弹……开枪时刻均在群众奔逃之际……距国务院大门颇远……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当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照这样看起来,段执政的皇皇命令所谓"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都明明是捏造谣言,反而段执政的卫队犯了杀人的罪是实,我们要问问绅士们,你们现在怎样说?又怎样办?

你们代表谁?

凡是一个称为代表的,必以有他所代表的人为条件,不然便是冒充

代表，或是自称代表。国民党右派在各地还没有什么党部之组织，现在居然在上海召集所谓全国代表大会，东指一个姓张的代表江苏，西指一个姓王的代表四川，南指一个姓李的代表广东，北指一个姓赵的代表直隶，这班未曾经过党员选举的代表，请问是代表谁？

一个不行动的党

北京血案发生，全国震怒，上海学生会派人到所谓国家主义的青年党那里，请他们参加市民反段大会，他们回答说："我们只是宣传，不去行动，我们不象共产党瞎闹。"象这样一个不行动的党，似乎用不着别人再去批评他了！

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往往抬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的金字招牌来反对阶级争斗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全民"是怎样解释。若说是抽象的指为全民利益而革命，建设全民利益的政治，则和我们民族解放国民革命之意义相类。若说是具体的指由全民出来革命，由全民管理政治；那么，我们便要问：卖国贼、军阀、官僚及一切作奸犯科的人，是否也包含在全民之内？若除开这一大批人，还算得什么全民？

反赤　苛政

中国军阀中宣传反赤最力的莫如李景林、张宗昌，而搜括人民最惨的也莫如他两人，这明明是告诉人民：可见反赤原来如此，可见赤不是如此。

《独立报》对谁独立？

上海的《独立报》，满纸都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却不曾反对过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且盛称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辈是爱国者。

他们所谓独立，想必不是拥护中国民族利益对外独立的意思，而是拥护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利益，对中国人民宣告独立！

1926 年 4 月 13 日 《向导》周报第一四九期 署名：实



国民军与北方政局

国民军（专指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一军，下同）关系北方政局之重大，这是人人所感觉得到的。国民军在军事上之成败及其政治主张之良否，关系北方政局甚至于关系全中国政治之隆污都很重大，这也应该是懂得实际政治的人所不能否认的。

中国最固定的军阀只有奉、直、皖三系，其他都还未完全形成军阀。国民军乃是由直系军阀中蜕化出来的一部分较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而在今日以前也还未曾形成军阀。何以称他是较进步的军事势力？这是因为国民军比奉、直、皖及其他北方任何军队都有训练，有纪律，不扰害人民；无论李景林如何宣传国民军共产赤化，而天津市民都亲身感受得奉军或国民军孰为可怕。何以称他是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这是因为国民军无论在张家口，在北京，在天津，都相当的尊重人民之自由，和奉、直、皖等军阀对待人民之态度显然不同。何以说国民军未曾形成军阀？这是因为他不像奉、直、皖各系军阀和英、日帝国主义结了深固的关系，也不象他们那样压迫民众运动。

在奉、直、皖三系军阀循环统治的中国，帝国主义利用这班军阀做工具，无忌惮的剥削中国民众，压迫中国民众，现今在军阀中居然蜕化出一部分较进步较接近民众而不接近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使军阀势力之自身显露出最后崩溃的征兆，使帝国主义者发生恐怖的心理，国民军这种在客观上的破坏作用，在中国政治进化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可是这种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也只能认他是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而不能认为民众的军事势力。这种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不但在实力上还很幼稚，在政治观念上更是幼稚模糊而且动摇，若没有民众的鞭策与援助迫之左倾，时时都有向右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甚至退回老家之可能。

反奉战争之初起，国民军即感觉自己一派之实力不足以敌奉、直二派，广州国民政府之势力尚未即能达到北方，于是遂采取了向右联段政策，置北京市民驱逐段祺瑞建设人民政府之要求而不顾；及郭松龄败亡，□日奉吴联合成，四方反赤声起，差不多是全世界反动势力联合向国民军进攻，国民军更感孤危，遂致冯玉祥下野，更向右一步，采取了联吴政策，改造贾内阁，容纳吴派颜惠庆、卢信等入阁；及至天津撤兵，奉、直军仍向北京进攻，逼得国民军一直向右，采取了逐段释曹迎吴的政策（此次国民军逐段，虽然在客观上是民众所赞成的；而在国民军的主观上，是为曹、吴的要求而逐段，不是为民众的要求而逐段，所以他此次逐段是右倾政策不是左倾）。释曹已经不妥，何况更公然布告大称其"总统曹公"！幸而吴佩孚拒绝与国民军合作，国民军不得不退出北京，否则他如果更进一步拥护贿选的总统复位，拥护贿选的议员复职，那末，不但不是接近民众的，而且是背叛民众的，他的政治生命也就从此寿终正寝了！因为全国民众对于贿选的总统与贿选的议员，始终是深恶痛绝的。

国民军孤立无援的受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军阀之联合进攻，他退出天津，又退出北京，这都不算失败；他因为避免失败，采取日益右倾的政策，丧失民众的同情，这才真是失败！

国民军退回了南口以北，其经济上虽然很难支持，在实力上仍大部分保存着，他若不再向右完全投降吴佩孚，在北方仍旧是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未来的隐患。在北京方面，段祺瑞毫无实力，当然不能在"军党政治"时代保持政权，此时争夺北京中央政权的只是奉、直两党。奉党在北京已占绝对优势，这不但表现奉、直两党的势力失了均衡，同时就是在他们背后英、日两帝国主义的势力失了均衡，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奉党这种破坏均势的得意举动，便是□来第四次奉、直冲突之种子；可是在国民军未完全消灭或未与奉、直某一方切实合作以前，帝国主义者是要努力使奉、直两党在北京暂时合作的。日本虽然使其工具在北京占优势，而亦不敢完全排除直党，英国虽未能使其工具拿到北京，他也有方法使奉党不得不和直党暂时合作，所以国民军一退出北京，上海《字林报》北京电即说："有数国公使均以为张、吴若非如旧结合，俾产生新政府，能履行义务订立约章，则不与承认。"

张、吴结合之新政府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法统问题。法统有两个：

一是宪法，一是约法。吴佩孚若坚持拥护宪法，不得不因而拥护制宪的贿选国会和布宪的贿选总统，则必为其第二次失败之张本。□护约法吗？在法律的根据上，已无法解决由约法相因而至的国会问题。若认贿选议员为无罪，则有何理由废弃他们所议决公布的宪法？若认贿选议员为有罪，则大多数除名，国会如何能开会？若召集新国会，则除躬自违法外，试问由何人依据何法解散旧国会？现时全国民众所要的是能代表各阶级各职业各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而不是代表军阀官僚的国会；在事实上，也只有召集国民会议一法，才可救国会问题的法律之穷。可是国民会议之实现，只有广州国民政府或国民军得了胜利才有可能，也才有意义。国民军如果将来能够恢复在北方的势力，他对于此问题，是向左站在民众方面，宁可与军阀决裂，而不能不坚持自己独立的政策，主张国民会议呢；还是仍旧向右站在附属军阀的地位，主张护法？这是全国民众将来对于国民军之最后试题。

1926年4月23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〇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右派大会①

一个党内发生左右倾的争论或派别，这本是各国政党中恒有之事，用不着大惊小怪。中国国民党本早已有了左右倾的事实，而许多老党员抵死不肯承认，以为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故意造出这个名词以图离间国民党的，至少也是由于共产党之神经过敏；及至现在右派公然有了和左派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组织，仍然要说："他们（指共产党）一方面尽量的宣传左右派别，使国民党分子自相歧视（此之所谓左右是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只许自己做，不许别人说，真是一件怪事！

至于左右派之分别究竟是什么，右派之内容究竟是怎样，我们都曾经讨论过，或者他们以为这都是我们的推论或误会，不足为据；现在右派的上海大会，已将他们的理论具体的负责任的在大会宣言上公表出来，我们把他们的宣言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所通过的孙总理提出之宣言，对照一读，便能够明白：所谓左右派，真是我们"以和共产派的主张同异而区别"，还是他们（右派）的主张，和孙总理生前亲身领导的国民党所决定的主张实有不同。明白了这些，便知道国民党中实有左右派的事实存在，并不是由于共产党故意造谣或神经过敏；而且可以知道年来国民党内的纠纷，不尽是因为右派排斥共产派，而实有左右派因主张不同而冲突的事实存在。

孙总理所决定的联合苏俄及容纳共产分子这两大革命政策，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到第二次全国大会，都未曾变更或加以修正。右派的西山会议，即以变更联俄联共这两大政策为目的；由西山会议而产

---

① 1926年4月1日，谢持、邹鲁、沈定一等在上海召集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于13日选举谢、邹、沈为常务委员。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特发通告揭露，"伪大会不特在纪律上为背叛本党，即在集会手续上亦甚欺骗党员，亵渎总理蒙蔽国人"。

生的此次上海大会，也是同样的目的。此次大会宣言上关于联俄之主张，表面上虽然说："吾人于此，绝不贸然将苏俄列于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一反联俄政策。"同时，实际上历数苏俄对中国侵占领土，把持中东路，侵略外蒙，指勒庚子赔款等罪，和张作霖及其他反革命派对于苏俄之宣传论调，完全一致，事实如果是这样，其结论安得不"一反联俄政策"？且在事实上，他们的重要分子如孙镜亚、何世桢，竟在反赤大联合之化身所谓国民外交协会担任文书主任、宣传主任之职，如此而还非一反联俄政策，什么才是一反联俄政策？他们根本不了解苏俄，遂因而不瞭解以苏俄共产党为一重要成分的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是各国共产主义的党派结合，即戴季陶所谓横断国际；国际联盟是各资本主义的国家结合，即戴季陶所谓纵断国际；他两个的性质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和第三国际对抗的是第二国际不是国际联盟。然而右派的宣言上，竟说："国际联盟与第三国际，此世人所视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在吾人视之，则确有程度之相差，吾人若代表弱小民族视此两个国际，则便无所短长，盖皆基于战胜民族之组织也。"他们称第三国际与国际联盟为两不相下之对抗壁垒，大概是不曾看清季陶的文章。他们视此两个国际无所短长，都是战胜民族之组织，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一个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组织，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组织，更不是一个什么战胜民族之组织，战胜民族中之英、法、美、日、意、比等国的共产党固然在第三国际，战败民族中之奥、匈、土等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被压迫民族中之印度、埃及、爪哇、朝鲜、中国的共产党也在第三国际；他们更不曾知道第三国际是遵守列宁"扶助被压迫阶级"、"扶助被压迫民族"这两大革命遗教而奋斗的，在另一方面，国际联盟完全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所把持的压迫弱小民族之总机关。在事实上，第三国际所号召的"不侵犯中国（Hands off China）"，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在苏俄已成了很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另一方面，中国历年来在外交上对于国际联盟的呼吁，得着过什么应声？他们（国民党右派）不知道这些有所短长的事实，因此不能瞭解孙总理联俄联共的政策之真实意义，因以在实际上取了反俄反共的态度，他们口头上说绝不一反联俄政策，不过藉此掩饰他们显然违反孙总理的政策之痕迹罢了。他们对于共产党之态度也是这

样。此次宣言上，一面说："吾人当认为友军两不相迕"，"或有分则相求之可能"；一面：中国共产党"中饱五卅惨案捐款至四十七万之多"，"甚至起反动于本党之政治策源地"（按此句殆指三月二十日广州事变）。他们所指责的这两件事如果是事实，则中国共产党的罪恶，更加于研究系、政学会、安福部之上，人人得而诛之，国民党为什么还当认为友军，还有什么和他相求？民国元二年间，国民、进步两党，在报上相互造谣攻击，已经不是正当的态度，况且在一个党正式负责的宣言上，任意造谣诬蔑他所自认的友军，这是何等太不自重！至于广州事变，其中心问题之中山舰调动阴谋，现已水落石出，究竟是谁起反动于国民党之政治策源地——广州？他们的宣言上，又说共产党"广设济难会为猎资及宣传其主义之工具"。按"济难会"本是不分党派的社会团体，其经费出入照例是公开的，任何党派都不应据为宣传其主义之机关；照右派宣言上那样说法，是不是公开的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告密，破坏这一个救济政治牺牲者的社会团体？

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之三民主义的内容，可以说是国民党的根本政纲；并且这宣言是孙总理向大会提出的，当然不能说是汪精卫所伪造，更不能说是共产党的主张，所以当时右派的首领冯自由，不但反对共产派，并且反对孙总理。可是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的内容，显然和第一次大会宣言相抵触，其要点如下：

（一）在民族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第二方面……辛亥以后……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视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而此次右派的大会宣言则说："而民族间之生存竞争，至今犹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由生存竞争而形成的两个壁垒：其一为战胜民族，其一为被征服民族；……是以本党之民族主义，主张融合此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以与战胜民族抗。"他们（右

派)把人类分为战胜民族与战败民族两个壁垒,而不把他分为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者两个壁垒,又指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是主张与战胜民族抗,而不说是与帝国主义抗,这和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族主义之第一方面显然不同。土耳其对于协约国是战败者,对于希腊是战胜者,他究竟是战败民族呢,还是战胜民族?右派的民族主义若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战胜民族,若丢开主义而以战胜战败定反对或同情之标准,则反对英、法、日、美,同时也要反对苏俄,或者也要反对土耳其,甚至中华民国若对帝国主义者战胜了,也应在反对之列;更进而应用到国内问题,固应反对战胜的奉、直军阀而同情于战败的国民军,同时也应反对战胜的国民政府而同情于战败的陈、林、刘、杨了。我们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帝国主义者则可,若希望中华民国永远不变为战胜民族则似乎不可。丢开主义,不问是非,专与战胜民族抗,我们真不懂得国民党右派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是什么一种逻辑?我们固甚希望蒙古将来能为中华民国联邦之一,然亦必须军阀政府推翻全国的国民政府成立,始有资格始有余暇和蒙古民族商谈此一问题;而此次右派宣言上,竟将"叛国"、"僭窃"等徽号加诸蒙古政府,视蒙古民族的独立宣言与宪法如无物,这是明明违反了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自决权之宣言。

(二)在民权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民国之民权……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群言之,则凡真心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而此次右派宣言极力号召全民政治,虽然与第一次大会宣言所解释的民权主义相违。

(三)在民生主义方面,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的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竟轻轻的将这两个口号去掉了,"平均地权"是中国国民党最初期同盟会时代的党纲,宋教仁改同盟会为国民党时,新党纲上,轻轻的把"注重民生"代替了"民生主义与平均地权";不幸的平均地权这一

口号，现在又第二次被右派抛弃了！第一次大会宣言说："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己而奋斗也。而此次右派大会宣言忽说："今不患农人之无知，而患地主之不悟，地主若觉悟……则农人之困苦当立即减轻以至于无所困苦，俾农人于团结组织之中，不致发生阶级斗争之惨祸。"又说："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雇主，而间接使工人得较善生活者社会，盖此种担负，实社会消费者所共任，此社会上大多数之经济利益所以常相调和也。"两相对照起来，前者是主张为农夫、工人之解放反对特殊阶级而奋斗，实质上是不反对阶级斗争；后者则是希望地主觉悟以免除农人之困苦，希望雇主施恩使工人得较美生活，实质上是主张阶级调和，是反对阶级斗争，且明言"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吾人为统一国民革命阵线之故，势必截断其主张"(季陶先生闻此言否?)。

国民党右派，不但有了和左派分离的组织，现在又有了和左派不同的政治主张(这个不同，是右派大会宣言的主张和孙总理所领导的左派主张不同，而不是和共产党主张不同)。有了这些不能否认的事实，所谓国民党左右派，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了罢！如果右派能够仍旧接受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而取消他们的此次大会宣言；如果能够取消他们自己的各级党部，而回到广州中央党部统辖之下；我们就甘心承认造谣离间或神经过敏之罪。

可是事实上我们已不能奢望右派向左回到广州中央，只得竭诚奉劝他们不要再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因为右派中有些较右的分子，已经和反革命派章太炎、黄大伟、邓家彦、徐绍桢、童理璋等所组织的什么国民外交协会合作；这个国民外交协会，和陈炯明派章太炎、黄大伟、马育航等所主持英政府及张作霖所资助之反赤大联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团体。蒙他们不弃认我们为友军，现在敢以友军资格，希望他们和我们在相同的口号"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上合作；并敢以友军资格，奉劝他们勿跑到反革命派那边，宁可使我们受神经过敏之咎，不可使我们不幸而言中！

1926年4月23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〇期　署名：独秀

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

中国之有劳动运动，其历史还很短，中国的工业犹未发展，工人的数量在全国人口比例上还很小；可是中国劳动运动的特色，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和革命的，这是因为中国自身是半殖民地，他的幼稚工业没有别的殖民地供他剥削，以养成劳工贵族，以造成改良运动。并且中国的产业大部分在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军阀管辖之下（如轮船、铁路、纱厂、香烟厂、矿山等），所以中国劳动运动之对象，大部分便是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同时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就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对象，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就成了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之共同的政纲，而且这两个运动也只有共同力求实现这政纲，才有出路。

第一次和第二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其主要的是反对军阀之“二七运动”；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主要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之“五卅运动”。这两个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后者却有伟大的成绩与影响。

在五卅运动前，已经有了国民党改组，国民军发生，铁路总工会成立，胶济路罢工，上海及青岛纱厂罢工，这些事实；第二次劳动大会开会时，已到了中国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爆发的焦点，大会一闭幕，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便发生了。

五卅运动固然是各阶级联合的民族斗争，然而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直接抗争的，乃是上海、香港、汉口、九江、南京、青岛、天津、焦作等处的罢工工人，其他各界人士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声援罢了。真能使帝国主义在华权利发生根本动摇的，也只有这些罢工。

五卅运动虽然因为英、日帝国主义利用奉军的高压而失败了，然而他在民族运动上在劳动运动上的成绩与影响，我们是不能忽略的。

香港的大罢工，在香港及广州的工会统一运动上收了很大效果，此次罢工固然有赖于国民政府之胜利始克实现，同时这次罢工也巩固了国民政府，使国民政府在对外抵抗香港政府势力上，在对内镇压反动势力上，都得着有力的援助。

上海的大罢工，唤醒了全国的民族觉悟，尤其在上海本地，资产阶级至今犹继续他们和平的民族平等运动，如关税自主，设立关税公库，收回会审公堂，工部局增加华董，公园开放，修改洋泾浜章程等。在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上，五卅以前只有很少数散漫组织或空招牌的工会；五卅以后虽然未能继续维持当时二十万罢工工人大群众的组织，而全上海三十六万余产业工人中，已经有约四分之一的工人有了群众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纱厂工会（五万余人）、印刷工会（五千余人）、海员工会（二千余人）、码头工会（二千余人），都在他们的总机关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公开的或半公开的进行工作。五卅政治罢工失败，又接之以经济罢工，当时几乎全上海无一工厂没有经济的罢工，即五卅运动中未举行政治罢工的，此时也举行了经济罢工。即在最近数月，此次经济罢工犹未停止，略如下表（自一月一日起至四月一日止）：

产　　业	次　数	参加人数	罢工期时间
纱　　厂	一四	一二八〇〇	五五七二五〇
邮　　务		六〇〇	（未罢成）
金 银 业	一	四〇〇	二四〇〇〇
商务印书馆	一	四〇〇	四〇〇
麻　　袋	一	一五〇〇	四五〇〇
袜　　厂	一	七〇〇	
共　　计	一八	一六四〇〇	五八六一五〇

“有了组织便要罢工”，这是上海工人的特性，这因为上海的物价不断的增高，而工资不增，便等于不断的减少工资；尤其是码头工人，他们的工资并且比去年平均减少了一半以上，这困苦不堪的五万苦力，是眼前上海劳动运动一个最紧急的问题。

除了香港、上海，从青岛到济南沿胶济路一带，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工人区域。这里的十余万纱厂、路矿、市政工人，在五卅前后可悲可敬的争斗与流血，比任何地方都剧烈；无论经过若何惨的失败，都没有

反动的变相发生。他们现在虽在张宗昌铁蹄蹂躏之下，犹念念不忘阶级的组织与政治的争斗；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理想，虽然还很幼稚，而他们的本质，我们敢说是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

沿京奉路即唐山与天津，是北方唯一的工业区，在国民军失败之前，天津已有五万纱厂及城市工人组织起来，并有了他们的公开的天津总工会；唐山除原有路工外，六万矿工亦已开始组织。国民军退后，天津、唐山都入了奉军的范围，工会绝对不能公开，在发展上受了很大的打击。

北京本是一个没有烟囱的地方，然而五卅运动后，也居然有了数千工人组织起来的北京总工会，并且热烈的参加政治争斗，在群众的示威运动中，几乎代替了“五四”以来的学生地位。现在奉军入京，他不免也要受点挫折。

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本居全国工人运动中首要地位；可是“二七”的伤痕犹未全愈，十余万路工，有组织的尚不及三分之一，现在京奉、胶济二路及津浦路之大部分，又都在奉军高压之下，京汉路工又与旧敌吴佩孚重逢，眼前在组织上在行动上，都有很严重的障碍。

汉口本是中国工业中心之一，在“二七”前，工会运动本甚发达，其后因“二七”以来的政治压迫，农民因灾失业、劳力过剩及工贼活动这三个原因，所以在五卅运动中，汉口工人未能和上海、香港工人携手并进；即五卅后，工会运动仍然没有若何发展。

湖南的矿工运动虽然有两处新的发展，而两处旧的组织——水口山与安源却都破坏了（安源虽在江西省境内，而在工人运动的历史关系上，则属于湖南）；一万多人的安源矿工组织，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假手于中国公司所破坏，并且公司为日本资本压迫而濒于破产，在山工作的工人已减少一半以上。长沙的城市工人，大部分都有了组织，且能够参加地方的政治争斗。

依过去一年的经验，尤其是五卅运动中的经验，我们对于中国的劳动运动，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一）我们固然不能夸大的说中国工人已是现时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势力，而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种重要的可靠的力量。

（二）中国的劳动运动之胜败，和中国民族运动之胜败，是在相互影响之下进行的。

（三）在民族运动得到相当胜利的地方，不但工会，即革命的组织亦能相当的存在；反之在反动的军阀势力之下，任何工人的组织都不能存在，虽改良派的工会亦不能发生。

（四）崩溃中的中国军阀势力，断难长期巩固其统一政权，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这两种势力结合起来，随时随地都有冲破军阀势力之可能。

（五）中国工人不但要扩大及巩固自己阶级的联合战线，且急需工农联合之成立，并且要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成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联合战线，如此才能够得工人阶级在政治争斗上和经济争斗上的初步胜利。

1926 年 5 月 1 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唐生智也赤了吗？

吴佩孚讨冯，分明是报复倒戈之仇，然而他不说是复仇，说是讨赤。现在吴佩孚又利用叶开鑫向湖南扩张地盘，也说是讨赤。并指唐生智已宣言共产。从前陈炯明派屡次说广州政府将于某月某日宣布共产，现在叶开鑫又说唐生智已宣言共产，何中国赤之多而共产又到处能够这样任便宣布！

讨赤大元帅

从前还有些人不知道“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见各报京电：“某方推曹锟为讨赤大元帅，张作霖、吴佩孚副之。”才知道所謂“赤”就是不利于曹锟、张作霖、吴佩孚，而为他们所要讨的一件东西。

反赤的滋味

奉军一入天津，天津商人便因强兑军用票罢市，奉军一入北京，北京又因军用票问题，逼得商铺歇业，市面萧条，国民军在京津时从来无此现象，此时京津的商民应该饱尝了反赤的滋味！

这是以党治国吗？

广州国民党党政府之下的公安局，居然派员检查国民党中央党部

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等，这是以党治国呢，还是以警察治党？

捷足射利的上海

上海为中国第一大市，好像美国的纽约；上海的上下三等流氓工于捷足射利，也和纽约相象。新戏馆可射利，大舞台、新舞台、新新舞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等遂络绎出现。游戏场可射利，楼外楼、天外天、绣云天、新世界、大世界、小世界、神仙世界等遂络绎出现。电影可射利，神州影片公司、新大陆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国光影片公司、朗华影片公司、大明影片公司、好友影片公司、开心影片公司、新人影片公司、非非影片公司等遂络绎出现。自《字林西报》登载英国国家银行汇英金六十万镑到东方做反赤宣传的费用，反赤大联合、国民制赤会、国民外交协会、反赤同盟会等遂络绎出现。

国民外交原来如此！

顾维钧命杨春绿在上海办一个什么"国民外交协会"，其目的有三：一是为英国人宣传反赤，以抵制迫在目前的五卅纪念运动；二是为吴佩孚做联英反赤机关；三是为顾维钧自己再入外交部之后援会。所谓国民外交原来如此！

可怜的租界华人立宪运动

上海商民主张修改洋泾浜章程，这种和平的立宪运动，在革命派看起来，已经是对大英帝国主义者十分妥协了；然而帝国主义的使团，对于此次洋泾浜章程修改运动，认为华人心理已趋极端，想必他们以为租

界华人必须照旧俯首帖耳受帝国主义的统治才不是极端！不过他们还未说修改洋泾浜章程是过激运动，已经算是客气了。

白俄不是外力吗？

赤俄帮助一点中国革命运动，便有人起来大喊拒绝外力；现在奉军攻取北京，首先派白俄骑兵四百余人，从安定门入城，任意拘役行人铺户，为之牧马操作（见四月二十五日上海《新闻报》北京通信），何以大家一声不响？

1926 年 5 月 1 日　《向导》第一五一期　署名：实

最近政局之观察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唯一重要的政象就是奉、吴发生暗潮。此暗潮之特点，就是护法、护宪之争执及助长此争执之关系奉、吴两方实际利害的内阁问题。奉张知道护宪必复颜阁必复旧国会，颜属吴派，旧国会大部分贿选议员都不啻是曹、吴家之养卒，这些都于奉不利，他又知道曹宪与贿选国会大不理于众口，乐得在此方面与吴一争。吴亦知道他在北方之军事实力远不及奉张，非从政治上进攻，非藉护宪以恢复颜阁与旧国会，无由分得北京若干政权，因为北京的精华——京师警察厅及崇文门税关，都已落于奉派之手。内阁问题，此时尚非阁员分配之争，而是内阁总理属于直派或奉派之争，此争仍将取决于护法或护宪。若护宪，当然要恢复直派之颜阁，奉张所争则在财、交两部；若护法，则奉张及其背后之主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必不甘心放弃政府领袖地位之权利，此时直吴及其背后之主人——英国帝国主义者，为顾维钧所预定之外交坐位，亦决不至为他人所夺。

在北方军事上，直吴远逊于奉张，然直吴多政客奔走人材，即在民间的政治空气上，奉张更不及直吴，且国民军尚近在京北，随时有联直之可能，此亦迫得奉张不得不对直吴让步之隐情。因此，直、奉军阀及其背后英、日帝国主义者实际利害之冲突始终不能免，然以政治的环境，又不利于即时决裂，于是他们不得不别谋暂时弥缝之一策，以和缓其急冲。

其策为何，即继续军事行动，分讨南北二赤，使奉、吴势力得分途发展，不至两力汇集于北方，随时皆可发生冲突。此策见之实行者，就是直鲁联军向南口进发及吴佩孚进攻湖南。吴之进攻湖南，不用说其目的地乃是广州，此策实行将来的效果又是怎样呢？

奉、吴若真能分向南北发展，虽不能完全免除他们在北方之冲突，

当能和缓其目前冲突之危机。奉军若得阎锡山之助，国民军又不能于最短时间消灭阎军，则诚难以一军敌热河、南口、大同三面之进攻；国民军消灭，奉张对直吴态度当更强硬，同时若直吴向南亦得相当发展，则奉、直关系，自必重入危机。吴佩孚向南图粤，在地利上当然没有一直由湖南进兵广州之可能，势必由湖南、江西、福建及广东内部（陈炯明、魏邦平之余孽）四面包围，再加以香港方面之封锁及示威，才能收效。不过唐生智若不降吴，湖南方面即能牵制吴佩孚一大部分兵力；江西方面，方本仁虽然尚未表示反吴，而其遗留在江西之旧部如唐、蒋、二杨，实不易为吴佩孚驱为攻湘攻粤之用；闽周本只能自保，非至吴军进入广东，彼未必肯出兵；孙传芳时虑吴佩孚勾结苏、皖、浙各军将领向之倒戈，其自身地位且日在危险状态中，更不会为吴攻粤；袁、杨都意在据川，那能为吴远征；河南之红枪会及豫军已开始豫人治豫运动，且为吴佩孚之后患；以这样的环境，只要广州国民政府对于内外各方面的政策应付得宜，则吴佩孚向南发展之希望本是很少。吴佩孚若不能向南发展，势必至一面忍气联奉以自固，一面勾结夏超、陈仪、陈调元、王普等推倒孙传芳，收苏、浙、皖三省于自己势力之下，以统一长江，以备与奉张一战。广州国民政府在此期间若有充分准备，甚至国民军尚能在北方保存若干实力，奉、直战争再开时，中国政局又必有一次新的大变动。

1926年5月8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二期　署名：独秀

我们要认清敌与友

在中国国家的利益上观察中俄协定，无论何人都不能否认是于中国有利的。英、美、法、日等国，不但不肯允许我们收回租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在租界增加几个华董都很不容易实现，要和纳税外人有平等参政权，那就更难了；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把所有的租界租借地都放弃了。英、美、法、日等国，不但不肯放弃领事裁判权，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今不能收回比领判权更不法的会审公堂；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经把领事裁判权放弃了。英、美、法、日等国，把持中国的海关，以协定税制制我工商业之死命，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过五卅惨案和全国商会关税自主之要求，其结果关税会议，仍旧是在协定制下增加二五，自主不过是一句空话；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协定关税制而改用相互平等的原则了。英、美、法、日等国，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欺压中国，尤其是根据辛丑条约，驻兵京、津、沽等处，东交民巷简直是国中之国；可是依中俄协定，苏俄已放弃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已实行退出辛丑条约国，不在中国境内驻兵，连保卫北京大使馆的兵都没有。

苏俄并不像德、奥是欧战中之战败国，他对中国放弃了各帝国主义不肯放弃的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等处驻兵这些侵犯中国国权压服中国之工具，除了他以平等的友谊对待中国外，试问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各帝国主义者看见苏俄悍然退出辛丑条约国，对中国放弃了这些权利，使他们相形见绌，还恐怕因此引起中国人对他们发生怨愤；如此，他们恨苏俄，攻击苏俄，本是情理之常。若中国人也因此恨苏俄，攻击苏俄，那便出乎情理之外了！难道我们中国人真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所讥诮的“只服强权不服公理的民族”吗？

杜洛斯基曾在五卅被害之工人与学生追悼大会上说："中国的房子属于中国人，要进去须先敲门，主人有权利放朋友进去而驱逐他所认为敌人的出来。"

日本帝国主义者帮助张作霖打败了郭松龄，又帮他夺取了大沽口与天津，英国帝国主义者帮助吴佩孚打败了河南①；于是吴佩孚、张作霖遂带了英日的势力到了北京，于是张作霖、吴佩孚遂出来要求苏俄撤回办理中俄协定之加大使。这便是张作霖、吴佩孚放进他们的朋友英、日帝国主义者，驱逐他们的敌人苏俄。他们认英、日为朋友，所以要亲英派的颜惠庆、顾维钧出来组织政府担任外交；他们认苏俄为敌人，所以连办理中俄协定的王正廷都算是赤化党，而加以排斥。这原来是中国军阀的意见，他们这种意见，当然不能够代表中国的主人——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大多数民众之意见，也是认保有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英、日帝国主义者为朋友而要放他们进来，也是认放弃这些权利的苏俄为敌人而要驱逐他出去吗？当然不是这样，不但张作霖、吴佩孚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即一般反赤的政客、流氓也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意见，固然有一部分人对于赤化不无怀疑，而对于帝国主义者保有租界、租借地(如旅顺、大连、威海卫等)、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却是一致愤恨；对于苏俄放弃这些权利的中俄协定，断不至因为赤化之故而加以拒绝。此时中国民众尤其是上海民众所奔走运动的，是租界华董、收回会审公堂、反对越界筑路捕人、关税自主、设立关税公库、修改洋泾浜章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运动之对象，都是反赤的英、美、法、日等国，而不是赤俄，因为中国民众所要收回的这些权利，赤俄都已经根本放弃了。中国民众正在向反赤的帝国主义者要求收回这些权利；同时，张作霖、吴佩孚便主张驱逐办理中俄协定放弃这些权利的赤俄大使；不但中国的军阀的意见和民众不同，并且是针锋相对。

不过中国民众现时的态度还是不够，因为民众对于张作霖、吴佩孚

① 奉直夹击国民军。1926年1月中旬，吴佩孚部由鄂出师入豫，攻打国民军岳维峻部，3月2日占领郑州，岳部败退。

的反俄政策若不加以纠正，足以破坏中俄协定，足以使各国的民众怀疑中国人对于外国放弃在华权利是欢迎还是反对，足以使别国不敢效法苏俄退出辛丑条约的关系，以为一退出辛丑条约，不能驻兵北京保卫使馆，便要受中国人的侮辱。

中国的主人即大多数民众，应该更进一步明白表示其意见和军阀不同，应该简单明了的告诉一切外国人：凡是来敲我们门的，无论强弱赤白，只要声明放弃租界、租借地、领判权、协定关税、京津沽沪汉等处驻兵及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认为朋友请进来，否则一概认为敌人请出去。如此才能够一洗"只服强权不服公理的民族"之耻辱！我们不从头脑中把这个耻辱洗净，别的一切国耻是不会洗去的啊！

1926年5月8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二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章炳麟与镇威孚威

反赤军的残暴，不独京津市民受不了，不独王士珍通电说："妇孺逃徙十室九空。"即吴佩孚亦通电说："近日连接各方电告京畿附近发生官兵奸抢诸案。"张作霖也自觉不及"赤贼"秩序井然；独有一章炳麟致颜惠庆电说："方今居庸逋寇犹未肃清，粤中赤化直搏湘楚……居庸之寇则请镇威主之，衡岭之寇则请孚威主之，待南北二赤次第荡定，然后徐议他事。"大约章炳麟觉得京津市民所受反赤军的灾难还不痛快，再要镇威光顾张家口一下，孚威光顾湖南一下，并且一直光顾到广州，才算称心！

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

我们对于赤化有所怀疑吗？我们应该赞成反赤吗？现在事实先生告诉我们说：赤俄已经把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驻兵中国及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倒是反赤的英、美、日、法等，不肯放弃这些不法的特权；称为赤化的国民党党军，无论在省城在东江都秋毫无犯，倒是反赤的陈炯明军在闽粤边焚杀不堪；称为赤化的冯玉祥军，无论在张家口在北京在天津都"秩序井然，一尘不染"，倒是反赤的奉直鲁联军"颇有奸淫抢劫之事"；这些事实就是指示我们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

奉军胜利之教训

你们常说：奉、直和国民军战争是军阀的战争，谁胜谁败都和人民

无关。可是国民军开到北京、天津，退出北京、天津，从未惊扰人民，奉联军一到天津、北京，军用票便吓破了商民的胆，一直闹到"妇孺逃徙十室九空"，他们的胜败，果和人民无关吗？你们又主张学生只应读书求学，不应与闻政治，可是现在奉军一入京，各校都停课了，教员大部分逃走了，女学生更惊骇的几乎连逃走都来不及，政治如此，请问如何读书求学？此次奉军胜利之教训，能否稍稍改变你们的旧观念呢？

1926 年 5 月 8 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二期　署名：实



南方形势与国民党

吴佩孚不能以武力在北方夺取完全政权，遂转而向南方发展。他向南发展之步骤，第一步是以实力援助湖南所有的反唐军队，驱逐唐生智出湖南，把湖南放在他的势力支配之下；第二步便是联合湘、鄂、川、滇、黔、豫、赣、闽八省军队围攻两广。他的目的是否可以完全达到呢？

他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一半，恐怕终久只能一半，因为唐生智的军队并未受损失，何况还有两广的援助，并且郴永地势易守而难攻，吴佩孚欲得全湖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第二步办法正在开始进行，他叫袁祖铭把四川让给杨森，一面杨森得到四川便可出兵攻粤，一面袁祖铭回黔联唐，便可联合滇、黔军队攻粤，他这种如意算盘，至少一半是幻想；河南方面，只有寇英杰原有的三旅现已扩充为三师可以作战，但须留守河南，其余收编的豫毅等军都毫无战斗力，并且豫军尚有勾结红枪会反吴的趋势；江西方面，方本仁旧部和鄂军对抗的暗潮，还未完全消灭；福建因与孙传芳的关系，能否出兵攻粤，也尚成问题；此时吴佩孚真可用作攻粤的，只有湖北全省军队及河南、湖南、江西一部分军队，云南唐继尧也有乘机攻粤之可能，其中最热心作战的，要算马济之对广西，陈林旧部谢文炳、刘志陆之对广东。不过吴佩孚以八省兵力攻取两广的计划虽然有点幻想，而指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这四省兵力并且利用唐继尧向粤围攻，这是可能的，因此南方的形势，此时十分严重！

国民政府所在的两广，不但是南方的革命根据地，而且是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据地，全国的革命民众应该出其全力，拥护这根据地。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适于此时在广州召集全体会议，在此次会议之重大的职任，即是为国民政府决定各种方略，以抗此次吴佩孚之进攻。因为此次吴佩孚向粤进攻，是有大的计划，我们不可过于轻敌。他此次进攻之胜败，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生死关头，所以在此次国民党

之中央全体委员会议中，这是唯一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之方略，不但是要两广迅速出兵援湘，并且对邻省若江西若福建，都要有适当的策略，并且对北方的国民军，河南、湖北、四川以及山东、江苏间的军事政治变化，都应充分注意，尤其要果决迅速的肃清广东内部反动的右派势力，使他们不至乘广东出兵后发生阴谋。因为由三月二十日事变，我们不能不承认广东内部尚有反动的右派势力之存在。

反动的右派，在广东因环境的关系，貌为拥护国民政府，貌为和北京、上海的右派不合作；实际上，他们不但反对共产派，并且在军队中禁止阅看汪精卫、蒋介石的演说词，他们在党军始终要团结自己一致的势力。

反动的右派现在在上海及其他各处宣传说：此次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共同的是要重新讨论联俄联共政策的问题。我们敢说这完全是谣言。修正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政策，是右派自西山会议到上海大会一贯的主张，广州中央的中央委员最大多数是革命左倾的分子，那会和西山会议以来被国民政府命令称为“叛徒”的右派走到一条路上去？

况且，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正在和吴佩孚势力进攻决斗之生死关头，惟有加紧结合全国革命的势力，以当大敌，凡是一个中山主义的革命党员，岂有反而对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革命政策怀疑而要重新讨论之理！

1926年5月15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三期 署名：独秀



宪法与贿选

反对贿选案，始终是全国普遍的舆论。中国社会的公是公非只有这一点了，我们万分不应该连这一点都要把他毁去，毁去这个，比毁去任何法律，损失都大！

舆论反对贿选，当然对于一买一卖的贿选总统和贿选国会议员，同样反对。舆论既然反对贿选的国会议员，他们是猪仔，怎能够承认猪仔们有代表人民制定宪法之权。

舆论现在反对护宪，其理由很简单明白，就是：根本反对贿选，根本反对贿选的猪仔议员所制定的宪法；并不是因为宪法的内容好或不好，也不单是因为宪法为曹锟所宣布说他是曹宪，更不是为张作霖或黎元洪而反对护宪，至于不是受了赤党的煽动，那更不用说了。

舆论反对护宪，固然是因为贿选之故；直系护宪，也正是想使贿选议员所制定的宪法有效，依宪法贿选的总统也有效，贿选的总统虽辞职，贿选总统任命的颜阁仍然有效，如此则贿选一案遂无形宣告无罪了。直系这种想头，直是本末倒置，他们若无充足理由宣告没有贿选这件事或认贿选为无罪，则无论如何依法定程序而选举的总统，无论如何依法定程序而制定的宪法，都是国民所不能承认的呵！最近吴佩孚致电张作霖申述护宪的五个理由，便是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

该电所举第一个理由是宪法根据约法而产生，故护约即当护宪。他忘记了当时宪法产生情形，除了根据约法而外，还有贿选一段事实；他更忘记了制定约法者是革命政府的临时参议院，制定宪法者是贿选议员的宪法会议。

他第二个理由是说："宪法经宪法会议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自行宣布，议录事实俱在，众目昭彰……大总统并无宣布宪法之权，强谓宪法为曹宪，与事实不合，于法理尤谬。"不错，十三年宪法是经宪法会议

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的，可惜这班宪法会议议员所犯贿选的罪，也是“事实俱在众目昭彰”！从前袁世凯想做皇帝不成，仍想保全总统地位，遂宣传说：谋复帝制的是袁世凯个人，不是袁总统，不可并为一谈；现在直系想保全他们的贿选总统不成，仍想保全他们的贿选议员所制定之宪法，遂宣传说：贿选是贿选，宪法是宪法，不可并为一谈，殊不知袁世凯总统即当时谋叛民国的袁世凯，他如何能够继续为民国之元首；制定宪法的国会议员即当时贿选总统的国会议员，他们如何能够代表人民制定国家根本大法！

该电所举第三个理由是说：“约法上只有临时大总统，而宪法上之大总统选举法，系民国二年十月四日所宣布，袁世凯由约法上临时总统被选为正式大总统，适用此法，黎、冯、曹选出，亦均由此法，实无约宪之分。”他忘记了袁、黎、冯、曹虽同是依据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所选出，而却有贿选与非贿选之分；他又忘记了二年之总统选举法和十三年全部宪法之制定者，亦有贿选议员与非贿选议员之分。

该电所举第四个理由是说：“黎、曹去位系政治问题，非法律问题，皆不复位，故不违法，现只宜恢复段氏所毁之法，确系为法而非为人。”一般舆论固然反对段氏，并且有一部分人反对段氏毁法，不过反对段氏毁法的人，除直系及其贿选议员外，大都是指约法而不是指宪法，因为宪法乃贿宪议员所制定，段氏毁之，舆论不但不反对，并且称快。现在直系要恢复段氏所毁之宪法，为人固丑，为法又何尝不丑！

他所举第五个理由是说：“大总统已缺位，自应依据民国二年十月四日宣布大总统选举法之第五条，即今宪法之第七十六条，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第一、我们不能承认民国十三年之贿选宪法和民国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有何等效力；第二、我们不能因为贿选宪法一部分含有民国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遂承认其全部有效；第三、我们不能承认贿选总统有效，无论他是依据贿选宪法或二年之大总统选举法所产生的，同时也不能承认贿选总统所任命的国务总理摄政资格，无论是依据贿选宪法之第七十六，或是依据二年大总统选举法之第五条。

总之：直系军人及政客，若不顾忌舆论而惟武力是逞，那就罢了；若

向人民高谈法律，人民便坚决的回答道：我们根本主张贿选的国会议员所制宪所举总统及贿选总统所任命之国务总理，一切无效！至于宪法会议及大总统选举会之出席法定人数足不足，还是第二问。

1926 年 5 月 15 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三期 署名：独秀

英国大罢工与东方民族运动

前世纪之末本世纪之初，世界资本制度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随之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成了整个的，全世界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工农阶级及弱小民族——对于统治者压迫者之反抗，也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解放运动也应该是整个的，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农解放运动，都是整个的世界解放运动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影响，决不是国家主义者所想像各国关起门来独力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国家主义者关门革命的方法，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他们忘记了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之第念〔廿〕六年，已经由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造成的革命对象是整个的世界革命时代，而已经不是十八世纪各国各自对于本国统治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这还是理论一方面，事实上的证据又是怎样呢？去年的五卅运动，在国家主义者看来，这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似乎和欧美及日本的解放运动无关了；然而事实先生告诉我们：欧、美、日本各国的工人及其政党，都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五卅运动，曾予以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援助。五卅运动所反抗的对象，为首的是英、日两国，而英、日两国的工人竟援助中国人的五卅运动，在国家主义者的理论，未免要责备英、日两国工人太不爱国了。

现在英国的大罢工，在国家主义者看来，这是英国的阶级解放运动，似乎也和中国无关，更和中国知识阶级无关；然而中国的国民党及学生会都奋起援助。上海学联会致英国工党电说："贵国此次总罢工，予资本主义以莫大打击，本会谨以十二万分之诚意，表示无限同情。敝国今日正处于各资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而尤以贵国所加于我者

为剧，苦痛之余，切盼贵国各工友一致奋起，到底不懈，与吾东方弱小民族共同携手，而人类真正和平亦得早以实现。”此电中“苦痛之余”四字，是表示被压迫的中国学生之泪已和被压迫的英国工人之泪汇合在一处了！

全国学生总会通告全国学生说：“英国工潮奋发，全世界工人均起而予以同情及实力援助；吾等被压迫国家之中国人，亦未便漠视，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内之工人运动，影响于东方民族运动者甚大，尤其是英国工人，例如去年五卅运动，各国对中国民族表示同情的，只有工党；其后英国拟以武力侵犯广东，也因为运输工人反对而止。今后英国运输工人若不为英政府任对华出兵之运输工作，英人将永无输送军队欺压中国之可能，吾等为自己的民族生存计，势不得不起而努力，与此时英国罢工的矿工及一切运输工人以声援。”远离英国数万里之中国学生，若没有自己民族要求之冲动，若不认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工人运动之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帝国主义，他们为什么要援助英国的罢工工人！

国民党右派的理论，一向只主张联合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未曾主张联合世界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然而现在对英国工党领袖迈朗氏也说：“如外国之被压迫阶级如英国工党，善意的帮助中国，自当乐受。”这句话的意义，是事实逼迫着他们不能不认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的而不是国家的了。

国家主义者或者又要说：照国家主义的理论与策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即中国对外国之独立运动，应该是国家的，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独力来干，用不着联合什么世界弱小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把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联成反帝国主义之整个的世界革命，这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是国家主义的运动，用不着赤化的理论与策略。

不错，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看做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诚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并且目前在中国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运动，也只是这一理论与策略的运动，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决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并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

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不过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全世界的实际状况和中国的实际状况，我们若真心要做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应该采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联合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来共同革命呢？还是应该采用国家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关起门来独力革命？

若采用国家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去年各国工人援助中国的五卅运动，今年中国工人、学生援助英国的大罢工，都是多事了！

1926年5月15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三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不怪外人都是中国人自己不好

虞洽卿说："查上海之有租界，本无不平待遇，自前清上海道屡次放弃，以致不平等之办法，逐渐发现……自有租界以来，前四十年中外极为融洽，后四十年则以中国官民之放弃，不平之状渐显。"照虞会长的意思，上海租界以至于全中国所受列强不平待遇，都是中国人自己不对，不是帝国主义者有意欺压我们。诚然，诚然，总商会不首先向外人妥协，五卅运动何至失败的那样快；戒严司令部不杀刘华，工部局怎好直接杀他。诚然是中国官民自己不好呵！

外交界是以平等的好感对谁？

优待酋长，利用酋长压服平民，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制驭殖民地的老法子。孙传芳此次到上海，租界外人稍稍优待他，他便很得意的说："所快慰者，不在乎酬酢联欢，乃在乎外交界方面一洗昔日轻视华人之积习，能以平等的好感对我。"殊不知帝国主义者优待孙传芳，以平等的（？）好感对孙传芳，正是利用孙传芳帮助他们轻视华人，帮助他们以不平等的恶感对中国平民呵！华界军警帮同租界一致严禁"五一"、"五四"、"五九"、"五卅"的集会示威运动，这便是孙传芳对于外交界以平等好感待他的报答！

1926年5月15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三期　署名：实

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应取的态度

自吴佩孚通电护法讨赤到国民军退出北京，这四个月间是英日、吴张合作支配北方向中国民众进攻时期。自国民军退出吴、张势力进了北京，因为互争政权，吴、张间及其背后之英、日间便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日益发展，到现在已由暗斗而进于明争。他们的暗斗明争，表面上虽然是护宪与反护宪，实际上乃是内阁与总统之争。

依据宪法恢复颜阁①，已为张作霖所不悦；此次阁员分配，除奉派一个半员外内郑陆张②，几乎是清一色的直系内阁，此为奉张所不能容忍，因此有电京反对颜氏摄政之说；张学良、张宗昌遂于十二日相继出京，石老娘胡同办公处完全结束。内阁问题即或能以易人及重新分配而消弭争端，恢复国会选举总统之争即代之而起。贿选国会议员，直系占大多数，事前直方对于总统选举问题若无对奉屈服之协定，奉方岂甘心屈服于直方承认国会之恢复？张作霖即碍于前此协定而不便公然反对颜阁与国会，其消极抵制亦足使颜阁及国会均不能实际存在，如此酝酿日久，又加安福派之活动，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终必破裂。

此联合战线破裂时，民众对之应取何态度呢？民众对英日、吴张，始终是一致反对，同时也注意他们的联合战线之破裂，是有利于民众的一个事实；民众因不必援助何方，即对于拥护贿选国会之直吴，比对奉张更加反对，对于盘据中国腹地为害中国更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之英、吴，比对日、张更加反对。

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对于吴、张冲突，将取何种行动呢？不用说国

---

① 段祺瑞下台以后，吴佩孚要恢复贿选总统曹锟当政时期所颁布的“宪法”，以便由1924年9月曹所任命的国务总理颜惠庆再出组阁。1926年5月12日，颜内阁宣布“依法复职”。

② 内郑——内务总长郑谦，陆张——陆军总长张景惠。

民政府对吴、张两派军阀是一致反对的；又是其北伐的军事行动，一开始便与直吴触接，不倒吴莫由讨张，况且眼前进攻湖南同时又正在准备援助马济进攻广西的，是直吴不是奉张："先讨吴后讨张"，这是国民政府不易的军略。国民军若联直攻奉，则所得的除热河外将一无所有，所失的是为直吴利用，助其恢复全国唾弃的贿选国会，断送国民军的政治生命，因此国民军也只有和国民政府取一致的态度，采同样的军略，才能得民众的同情，才能由山西一直向南发展和国民政府北伐讨吴的军事势力相连接。

以上只是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反军阀战争的目前一部分军事工作，这一部分工作如果成功，其意义就是为中国革命的军事势力立下一个比现在稳固的基础，可是全国的民众，尤其是受奉系军阀蹂躏最甚的直隶、山东、奉天民众，应同时奋起反抗当地的军阀，引导所有倾向革命的军事势力，使此次战争成为普遍全国的反军阀战争，一直到摧毁一切军阀的政权，建立革命的人民政府。

1926 年 5 月 22 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四期 署名：独秀

孙传芳最近的主张

孙传芳平日的态度，仿佛是注重实行，不屑多说空话，即是不肯发表主张；可是最近他却也发表主张了，且正式的发表主张了，他所发表的主张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三件：(一)是江日两通电；(二)是五日在总商会关于淞沪商埠市政之演说；(三)是六日在交涉署招待外宾之演说。

江日两个通电，一是主张颜惠庆摄阁，一是声明保境息民政策。孙氏向来表示护法而不护宪法，现在江电说："依曹公通电恢复十三年十月之颜惠庆摄政内阁"，则分明是拥护宪法了。孙氏主张何以有此变化？不用说是反对奉天和迎合吴佩孚两个动机凑合而成的。因为反对奉天，遂不惜牺牲自己的主张而附和吴佩孚，如此——他还是从前不发表主张的态度好。孙氏向抱江、浙、皖、赣、闽五省门罗主义，现在保境息民的江电又说："窃愿划境以自安；数月以来，迭电声明：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皆本息事宁人之旨，为保境息民之故……如贪婪窃发，抉我藩篱，随我农桑，扰我商贾，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而已。"这电为何方面而发，对山东奉军，对吴佩孚，对广州国民政府，或兼对上述各方面，我们都不必深究这些；我们所要质问孙传芳的是：唐生智并未曾犯江西，而江西竟出兵攻湖南，这是否划境自安，是否息事宁人，是否保境安民？或者有人特别原谅孙传芳，以为他在名义上虽是五省联军总司令，而事实上无权过问江西之事；如果是这样，将来国民政府北伐军开到江西的时候，则孙氏便应该免开尊口，说什么"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这一派的官话了！又孙氏在总商会演说也说："前日广东代表至鄙人处接洽，鄙人告以南征北伐均属无益，鄙人敢担保五省以内，决不愿举兵南侵。"可是事实上江西确已举兵帮助吴佩孚南征了，孙氏的担保怎么样？并且孙氏又能够担保，福建不受吴佩孚命令举兵攻粤吗？在实际上孙氏既然不能支配五省，便不应轻于开口，说什么担保

五省以内怎样怎样像煞有介事的话。如此，他还是从前不发表主张的态度好。

*　　　　*　　　　*

孙传芳对于上海市政的主张，我们可以在他的演说中指出几个要点。他说："现在上海设一个机关，把地方的行政集中在一处。"又说："为大上海做一个牢固的根基，当局的人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实力，换而言之，按现在的情形，非官厅先来试办不可。"又说："对于地方人士的首领，我们不能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不能不使他们知道商埠督办公署的内容，所以设一个参议会，代表各区的人民。"又说："暂时以淞沪警察厅所管辖的区域，加上浦东淞沪警察厅第三区第一分区与第四分区中间原属上海县管辖的地方，为淞沪商埠的区域。"又说："模范市的市民，是要预备将来做一等国的国民的，不是容易当的，是要出钱买来的。单就南市闸北两处讲，一百万块钱一年，是万不能够用的。……所以商埠督办公署成立以后，原来有市政的地方，旧税要积极的整顿，旧税以外，还要筹办捐税，原来没有市政的地方，得照闸北、南市的办法，一律纳税。"这就是他对于上海市政之具体的主张，其余若筑路卫生，改良市政，收回租界的预备，以至所谓"真正的自治邦"、"理想的大上海"，我们只好看做菩萨庙的签，灵验与否，不须留意。在这些具体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几个要点是：(一)淞沪商埠的区域，是北至吴淞，南至龙华，东包浦东，西画沪西，除了中间的租界，都在他管辖之下；(二)交涉署道尹署警厅虽仍属省行政而非商埠公署之直辖机关，但同时两署厅的长官都兼任商埠公署处长，事实上已将所有地方的行政权都集中在离埠公署，已渐渐形成一个半独立的上海市政府了；(三)在这半独立的上海政府之下，据他说：闸北、浦东、吴淞、沪西四区的市政，暂时官办民督，南市一区则民办官督，总而言之，都"非官厅先来试办不可"；(四)所谓参议会，只是地方人士首领对于商埠公署顾问的机关；(五)就是要整顿旧税，筹办新税。

就这几个要点看来，如果他真心欢迎人民批评，我们便不妨批评一下。我们现在的批评，并不是故意拿高调来反对孙传芳或丁文江，乃是批评他的主张是否如他所说："实际上是参酌目前的政局，上海的情形，比较的最可实行的一种办法。"第一，他把大上海的根基，不建筑在市民

的权力上面，而建筑在当局者政治上的实力上面，主张非官办不可；殊不知参酌目前的政局，所谓政治上的实力，能保三五年甚至三五个月不发生变动吗？市民的权力，现在固然还很弱，而他的寿命却比官厅政治上的实力长得多；想拿这种短命的实力来为大上海做一个牢固的根基，这根基实在太不牢固了！第二，公共租界工部局之岁入，其主要税收，在一九二三年已超过五百万两（内计：地税一五〇五〇〇〇两，市政捐三一四二〇〇〇两，码头捐四二七〇〇〇两）；上海市闸北、南市、吴淞、浦东、沪西五区，比公共租界，地面至少要大四倍，人口至少要多一倍半，而岁入只有其十分之一；其所以如此，乃因为上海租界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输出原料输入制品之最大市场，亦即他们掠夺四万万中国人之中心枢纽。所以上海租界有如此物力，直接上虽是租界居民所负担，其实间接上乃是帝国主义者掠去全中国四万万人血汗之余沥所造成；这种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关系若不改变，照现在上海的情形，而想在租界以外的上海市，诛求和租界同样的税收，办理和租界同样的市政，并由此法而收回租界，这岂非和封神榜、西游记是同等的幻想！第三，即让一万步，承认他是比较的最可实行的一种办法；可是他一面要整顿旧税筹备新税，一面只主张非官办不可，而不肯赏给纳税人一点参政权，这种最可实行的办法，将来实行起来，不无小小困难罢！最近纸烟捐的风潮，就是一例。在这半独立的上海市政府之下，不说普选的市民议会了，就是现有之少数绅士的市议会，他也似乎不屑齿及，他所要的参议会，只有地方人士首领能够参加；闸北、南市、吴淞、浦东、沪西纳税出捐的人，小商人工人占最大多数，那地方人士首领是些什么人，又能够代表什么人的意见呢？我们并不否认市民纳税义务，可是，“不得参政权不纳税”，不能说这是赤化过激的口号罢！并且现在租界上的外国政府连纳税华人的参政权都不肯承认；同时，本国的上海市政府也是这样对待市民，大约中外官厅的贵人们，都一致觉得中国人是“只应纳税不能参政”的贱民！

*　　*　　*

孙氏在交涉署招待外宾所说的话，有一部分是我们所懂得的，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够懂得的。他说：“我更可以老实的对诸君说，我们

中国人(他忘记了刘华也是中国人!)自然不能忘记租界是中国的领土。"他说:"推广租界,始终不能得到中国人的同意,我并且敢说,将来永远不会得到中国人的同意。"他说:"外国人保护是要保护的,但是一切的市税,到今不曾担任分文,这种情形,是公道的吗?是可以长久的吗?"这些说话,我们都懂得。我们所不懂得的,是他说:"凡有条约上外国人的权利,我们在条约没有废除以前,当然要尊重的。"这便是段祺瑞"外崇国信"的主张!他说:"以友谊的态度来交涉,希望在最短期时间以内,想法子把多年的悬案,逐一来解决了。诸君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们设商埠督办公署,不但不是来反对外国人的,而且是要尽量的同外国人合作。……商埠督办公署成立了以后,也要尽力来想法子,用坦白的手段,友谊的态度,来同诸君切实的磋商。"孙氏大概忘了中国官厅以友谊的(或者还是奴谊的)态度对外交涉,已经八十余年,并非梁启超、丁文江等在五卅运动中之新发明;并且外国人都早已知道以友谊的态度尽量的与外人合作来对付中国人民,本是中国官之特长,似乎不用孙氏再向外国人郑重声明了。况且外人也一向是以友谊的态度与中国合作,例如他们替我们掌管海关、盐税,替我们驻兵京、津、沽、沪、汉,替我们司法裁判,尤其是上海的会审公堂,是中外官厅模范的友谊合作!他说:"近许多年来,租界里面的人口,逐日的增加,于是外国人方面有扩充租界的提议,由外国人方面看起来,这种要求,原可以说有相当的理由的。……公共租界的当局,却用越界筑路的办法,来解决人满为患的问题了。"他竟这样承认外人扩充租界和越界筑路是为了解决人满问题,而不是帝国主义者侵略的野心,这和戴季陶承认帝国主义是"人口的增加,使各国人民感觉土地缺乏,为安置增加的人口,便非扩张领土不可"的见地,是一样了。关于此问题之复杂的理论,此地不必多说,现在且举出几个事实问题,答覆他们的见地:近代帝国主义的法兰西,人口日渐减少,俄皇治下之西伯利亚一向地旷人稀,为什么他们也要扩充领土?上海法租界居民并不多,法新租界是因何理由扩充的?公共租界居民之密并无过于香港;静安寺路、戈登路、爱文义路中外居民住宅尚多系平房,并不像伦敦、纽约有无数层楼大厦,况且华界近年已有不少外人的住宅与工厂,当真有越界筑路和扩充租界以解决人满问题之

必要吗？他们在上海把持会审公堂，难道也是因为解决人满为患的问题吗？总之：你们若说帝国主义的势力太强大，无论他们如何不说道理，此时我们都反抗不了，这话到算老实爽快；若强词曲说的附和他们，从没有道理之中说出道理来，这就大可不必！

1926 年 5 月 22 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四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民党败类中之先知先觉

有人见马素致电吴佩孚、张作霖等，竟说出："赤祸蔓延，国脉不绝如缕，反赤军声罪致讨，不期年而歼除国贼，清绥北都，斯固忠勇善战所致，然亦人心归往，正气犹存。"这样肉麻的话，觉得他真是民党之败类。我以为所有民党分子，非革命即反革命，很少有中立之余地；他们当中所有的反赤分子(内分反俄反共及反对联俄联共两派)，即令他现在还骂马素是反革命，可是迟早是要和马素走上一条道路的，马素可算是这班败类中之先知先觉。谓余不信，请看将来！

过激主义也是国粹了！

国粹派往往说西洋一切思想科学制度，都是中国数千年前已有的故物；现在孙传芳也说："现在社会有什么过激主义和工会，其实这名词已发现三千年前了，秦、汉时匈奴及最近七十年前之洪、杨，均是过激行动。"如此说来，过激主义也是国粹了！

1926年5月22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四期　署名：实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

有许多人，尤其是国家主义派，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不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爱他的祖国——中国，为他的祖国——中国奋斗的，他是极力劝中国同胞要恢复民族主义来救国的，他是极力指责现在提倡世界大同主义未免过早的；然而因此便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那就未免对于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之研究过于浅薄了。

孙中山先生是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这一问题，关于中国民族运动，尤其是关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有重大的影响；这也就是国民党中及国民运动中左右派之根本争点，应该有一个明白确定的解答。

要解答这一问题，第一须分析历史上各时代民族运动的特性，第二须检查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属于那一时代的特性。

因各时代的经济关系日渐复杂，民族运动在历史上乃有三个时代不同的特性：(一)宗法社会时代之封建贵族的民族运动；(二)军国社会时代之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三)帝国主义时代之殖民地的民族运动。

宗法社会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前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富于血统及宗教的色彩，实际上乃是由于民族的封建贵族争夺疆土，因为宗法社会的经济生活完全是农业的，如日耳曼人对于蒙古民族西侵之反抗，中国汉人对于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之反抗，回民对于十字军之战争，回、凖等族对于汉人之争斗，皆属此类。

军国社会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资本主义前半期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乃是十八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运动，此期运动已渐渐脱离前时代血统及宗教的色彩，而立脚在国家主义上面，因为这时

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已不限于农业，已需要商业的发展更进的工业的发展，已非宗法社会制度血统宗教等所能支配，并且在经济的需要上，已有了血统不同或宗教不同之民族所合成的国家；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正需要一个军国制度的国家机关，即超越民族血统及宗教信仰之上的国家权力，以供其资本主义发展之用。这种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亦即民族的国家主义运动，由日耳曼、意大利渐渐蔓延到全欧洲，民族运动渐渐成了国家主义的工具；由日耳曼、意大利之成功，渐渐由自卫的国家主义变成侵略的国家主义——资本帝国主义。这些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即国家主义者，对外则利用“民族统一”的口号，扩张本国的领土与主权（如俄国之大斯拉夫主义，德国之大日耳曼主义，日本之大亚细亚主义等），对内则利用“民族同化”的口号，征服境内的少数民族（如俄国之大俄罗斯主义，土耳其之大土耳其主义，中国之大中华主义，外蒙之大蒙古主义等），复利用“民族生存”及“保卫祖国”等口号，欺骗国内的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国家牺牲。在这时代，不但民族运动是国家主义之工具，并且国家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之工具。

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运动，即是现代资本主义末期的民族运动；这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乃是二十世纪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压迫国家之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联合反抗他们的压迫者——资本帝国主义，不象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单纯的资产阶级运动。因为资本帝国主义有国际性，反抗他们之民族运动也不得不含有国际性，和前时代民族运动之对象及作战策略遂至不同，这也是此时代民族运动和前时代民族运动特性不同之一。若埃及之独立运动，若土耳其之国民革命，若印度之不合作运动及农民暴动，若加哇工农之反抗荷兰，若菲律宾之独立要求，若摩洛哥及叙利亚之反抗法国，若里夫民族之反抗西班牙与法兰西，若波斯、亚喇伯及阿富汗之反英运动，若高丽、安南之独立运动，若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是紧接着苏俄十月革命兴盛起来的，都有无产阶级的力量参加运动，使这些运动渐渐减少了前时代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增加了新的色彩——反资本帝国主义之世界革命的色彩。国家主义派说这些运动都是国家主义的运动，这显然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这是因为他们不曾懂得此时代的民族运动之特性和

前时代完全不同。前时代的民族运动是：纯资产阶级的，没有国际性的，造成资本帝国主义的；此时代的民族运动是：各阶级联合的，含有国际性的，反资本帝国主义的。

我们既已看清了历史上民族运动之三时代各有不同的特性，更进而检查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是属于那一时代的特性，便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了。

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族主义讲演》上说：

> 但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界限的，我们要把他来分别清楚，有甚么方法呢？最适当的方法，是民族和国家根本上是用甚么力造成的。简单的分别，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所以一个团体，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这便是国家和民族的分别。
>
> 但自俄国新变动发生之后，就我个人观察已往的大势，逆[预]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
>
> 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或委曲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今日德国是欧洲受压迫的国家，亚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强暴的压制，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暴的国家，那些被压迫的国家联合、一定去和那些强暴的国家拼命一战。
>
> 现在欧洲列强正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来压迫中国。……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故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第二方面的人数虽然很少，但是他们占了世界上顶强盛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都很大，总是用这两种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但是天不从人愿，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的一万万五千万人，去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列强所以诋毁列宁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世界多数的民族十二万万五千万人，

为少数的民族二万万五千万人所压迫。列宁不但说出这种话，并且还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列强之所以攻击列宁，是要消灭人类的先知先觉，为他们自己求安全；但是现在人类都觉悟了，知道列强所造的谣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们欺骗，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进步到光明地位的情况。"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甚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

在以上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理论之几个要点：第一，他把民族和国家分得很清楚，他又一向是赞成王道而反对霸道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根本不同。第二，他观察未来的国际战争，是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对二万万五千万横暴者的战争，是超越种族和国家之多数弱小民族反对少数民族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山先生这种代表"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显是国际的，决不是国家的。第三，他明白中国是帝国主义之殖民地，他并且力说这殖民地之我们不但要反抗帝国主义以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自己不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中山先生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明明是属于现代殖民地国际民族运动之特性；而不是属于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之特性。我们明白了这些要点，便不能诬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也不能说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十八世纪欧洲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之产物，是资本帝国主义之前身及其工具，若在现代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国际民族运动时代提倡国家主义，不〔仅〕有时代的错误，并且有药不对症使病加剧的危险。第一，我们要懂得国家是什么。清朝皇帝常说："我国家二百年深仁厚泽"，如此清室就是国家；袁世凯曾印布一个小册子叫做"国贼孙黄"，如此反对袁世凯就是反对国家；段祺瑞、吴佩孚都自以为"北洋正统武力统一"是救国政策，如此北洋派就是国家；最近奉军亦称反

奉的民众有害于国家，如此奉天军阀就是国家；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打破那些朕的国家，取得了那些国家的统治权，便造成了那些资产阶级的国家。这都是他们的僭窃吗？不是的。国家这一个抽象名词，本来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此，则所谓国家主义也就是"统治阶级主义"。第二，我们要懂得国家主义是什么？欧洲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推翻封建阶级夺得统治权后，都已变成反动的势力，所谓国家主义，正是这班反动势力（尤其是法西斯派）用做对外扩张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对内压迫平民或欺骗平民为资产阶级牺牲之工具，即资本帝国主义之工具。第三，我们要懂得国家主义若应用在殖民地是怎样？殖民地不会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便不会有纯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他的民族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参加合作才会成功；殖民地民族运动之对象不仅是近邻某一民族；因此，若应用纯资产阶级性的非国际性的国家主义在殖民地做民族运动，则对内失去无产阶级参加的力量，对外失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的力量。

中国是一个被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压迫的国家，我们决不向帝国主义者讲什么世界大同主义，我们自然急于要救中国爱中国，然而我们不是什么国家主义者。无产阶级本来无祖国，然而他们在救祖国的实际工作上，比任何阶级都出力：在普法战争之巴黎围城中，法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投降了，只有无产阶级尚力奋其最后决死战；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的政策是要仍旧和协约国妥协的，只有无产阶级急起没收了欧美各帝国主义在俄权利，使俄国脱离了外国的羁绊而完全独立；德国的资产阶级一致接受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奴隶德国之道威斯计划，只有德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始终反对；这些法国、俄国、德国为祖国奋斗的无产阶级，都不曾向帝国主义者讲什么世界大同主义，然而他们决不是什么国家主义者。孙中山先生一生爱他的祖国，一生为他的祖国奋斗，然而他也决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纯资产阶级性的非国际性的国家主义，是前时代欧洲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口号，这一口号，已属过去的而且是反动的了；在现代各阶

级联合的含有国际性的殖民地民族运动中，他已经是分散此运动在内外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障碍物，凡是一个忠于民族革命运动的人，都应该起来埋葬这一过去的反动的障碍物——国家主义！

1926年5月25日 《新青年》(季刊)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狱”

法国赫里欧氏有言:“目下一般专务私利之投机者,已造成一种资本的巴士的狱,朘削法国政治界之心脏,而政府与之狼狈为奸,报界亦复同一腐败,一般报纸尚自称崇信共和主义,但实则已为资本家之奴隶。”

现在我倒可以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已在中国造成一种“民族的巴士的狱”,朘削中国人之心脏,而中国军阀与之狼狈为奸,教育界、商界中所谓高等华人亦复同一腐败,一般高等华人尚自以为崇信民族主义,但实则已为帝国主义者之奴隶。

五卅运动,就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开幕,就是要打破八十年来这“民族的巴士的狱”。

从前代表法王威权的巴士的狱,摧折了无数革命志士无罪平民,“打破巴士的狱”为法国革命之开幕,至今传为美谈,垂为纪念。现在资本帝国主义在西方造成之无形的资本巴士的狱,朘削了无数平民膏血,并牢笼了报界学者一辈精神的奴隶,为之歌功颂德;在东方造成之无形的民族巴士的狱,朘削了全中国人的无量膏血,并禁锢了高等华人的民族精神不能发展或不敢发展。

我们现在如果真心纪念五卅运动,便应该继续此一运动,而完成其工作——彻底打破这民族的巴士的狱,把中国民族从这狱中解放出来!

我们要打破此狱,不用说首先要毁灭此狱之墙壁——资本侵略制度,驱除为资本帝国主义者看守此狱之狱卒——军阀官僚;一般鼓吹反赤的失意政客及所谓老民党,也在狱卒的伙伴助手之列。尤其重要的是打破狱中人之精神上的镣锁,使之愿意牺牲一切,死里逃生的打出此狱。

最不幸的是狱中人尤其是狱中的所谓高等华人,因精神上的长期

镣锁，已麻木其感觉性，自以为身在狱外；并且习于狱中生活，已与狱吏（帝国主义者）、狱卒（军阀官僚）取了友谊的合作态度，反指斥主张打破此狱之人是捣乱，是唱高调，是多事，是惹祸，是破坏和平秩序，是别有用心，是过激赤化。取这样态度的高等华人，乃是打破此民族的巴士的狱之重要阻碍物。

在此次上海各界筹备五卅纪念的联席会议席上，教育界代表有人主张学生不加入此次运动，更不主张各界共同发表宣言，这分明是表示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他们没有什么需要。商界某首领忽然说到什么"军阀帮助帝国主义而共产党也帮助赤色帝国主义的苏俄"这类话，似乎这两方面都应该反对，可惜他们一向只勇于反对共产党与赤俄，而怯于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他们甚至于因为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威吓，怕犯了纪念五卅运动的嫌疑，主张把五卅烈士墓奠基礼改在二十九日举行。更可惜他们竟忘记了扣用火车妨害商业者，是军阀而不是共产党；以苛税杂捐强用军用票等形式没收商民财产者，也是反赤的军阀而不是赤的共产党；把持中国海关抑制中国工商业发展者，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赤俄；他们向之哀求交还会审公堂及租界增加华董而不得者，也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赤俄；他们更忘记了应该全中国人永世惨痛不忘的五卅事件，在日本纱厂，在南京路上，在宁波会馆前，流中国人血的，也是帝国主义者而不是赤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也主张中国民族独立，可是他们都以为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只应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干，不应接受外力即赤俄的援助，甚至于马素拿外国帝国主义的钱办的《独立报》也这样说；他们尤其反对赤俄以军械接济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大概他们觉得中国人所受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践踏并不甚厉害，尽可从容以自力解放，不需急急求助于邻人；他们更或以为只有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应该有武装，该死的中国人民，理应赤手空拳的让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恣意屠杀，不但民众不应该寻求武装来反抗，即接近民众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军，也应该由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来铲除、赤俄不应该接济军械使他们存在，以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患。国民党右派口中虽说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同时却用反对赤俄与共产党以相消；并且大登其广告直指什么什么人是共产党员，公开的向帝国主义者军阀告密。报界宁开

罪于民众，而不开罪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封锁民众运动的消息，乃是常事。

这班人的思想主张，其阻碍民族的巴士的狱之打破，也不在所谓高等华人之下，也因为帝国主义者给他们以精神上的镣锁、禁锢了他们的自由思想，使他们不甚感觉狱中痛苦，不急于求解放，不需要邻人之助，甚至于不认识邻人与仇敌。

所以我们如果要纪念五卅运动，如果要继续五卅运动，必须打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精神上的镣锁，一致起来打破八十年来这“民族的巴士的狱”，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才算完成了五卅运动的工作！如此，则将来中国的“五卅运动”，方能和法国的“打破巴士的狱”成为同样光荣而严肃的纪念——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之胜利的纪念！

1926年5月30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五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全中国人都过激了吗？

吴佩孚向《密勒评论》主笔鲍威尔说："中国有过激主义，始于孙文，而汪精卫、蒋介石等承之，北方则有蔡元培、林长民等。"《泰晤士报》说："鲍威尔尝闻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间，吴佩孚曾力助京汉路工会，今吴言如此，颇以为异。"如此，在鲍威尔眼中，吴佩孚也不免有点过激嫌疑！

到底要怎样才不是过激？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提议限制过激派在国民党中工作，并禁止国民党加入过激党，然而吴佩孚却说蒋介石相信过激主义。吴佩孚分明对鲍威尔说："现在主旨，在与过激主义抗争，过激主义既完全灭除，则中国可安；……当立意与之为难，将过激党一齐杀却，或驱之出国。"然而鲍威尔却觉得吴佩孚也有点过激嫌疑。到底我们要怎样才不是过激？

亚细亚民族大会与谢米诺夫

一向侵略朝鲜、中国等亚细亚各民族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近年复号召什么"大亚细亚主义"，以图遂其吞并亚细亚各国之野心。将于本年八月在日本长崎召集的什么"亚细亚民族大会"，正是这个野心之开始

表现。现据五月二十一日上海各报载:“俄国帝制派谢米诺夫日前化名由长崎来沪……因谋完成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完结,来劝中国人入会云云。”所谓亚细亚民族大会,又添上一个谢米诺夫的色彩,那是更加好看了!在日本未取消廿一条件未交还旅大及南满铁路以前,且看十年来大叫“毋忘国耻”的中国人,有何颜面去参加仇人所召集的亚细亚民族大会!

1926年5月30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五期 署名:实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都以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做，不应该接受外力即苏俄的援助；他们的理论仿佛是一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中若夹杂了外力，便失了独立性，所谓独立便名不称实了。

他们这种形式的逻辑，这种关门革命的方法，表面上好像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更高调些，他们的独立运动更彻底些；可是实际上，若是用他们这样独立的方法，想达到独立之目的，真算是缘木求鱼！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闭关主义，他们不是独立运动而是孤立运动。照他们的方法，关起门来做中国一民族的独立运动，拒绝全世界的同情援助，使中国一民族完全站在孤立无助的地位，此诚为我们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之所喜，而陷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于更孤危更险阻的困境中。

法国《巴黎晨报》曾说："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赤俄在亚洲势力澎涨，否则莫斯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可见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的计划有国际的联合，而中国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却反对中国民族运动有国际的援助；又可见帝国主义者早已虑到外力援助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对于他们的危险，而中国的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却正是专门拼命反对中国民族运动接受莫斯科的援助。这真巧极了，帝国主义者应该如何感谢他们(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

他们以为接受外力援助有损独立精神，他们忘记了美国独立战争中接受了不少的法国援助；他们更忘记了现代国际帝国主义所造成之整个的世界革命状况，和前代各国各自革命状况更大不相同。

现代资本制度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国际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

间接在这整个的经济影响支配之下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成了整个的，全世界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工农阶级及弱小民族）对于统治者压迫者之反抗，也汇合起来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各处弱小民族及被压迫国家的解放运动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农阶级解放运动，都是这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之一部分，而有相互的密切关系；因为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之第二十六年，已经是对于资本主义造成的革命对象——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革命时代，而不是十八世纪各国各自对于本国统治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在此整个的世界革命时代，任何国家的革命运动，任何属性的革命运动——阶级的或民族的，都不是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所想像之一国家一民族关起门来独立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

这还是理论一方面，现在再说事实。俄国十月革命总算是最成功的了，然而革命的军事终了后仍然要对小资产阶级让步，仍然要受帝国主义不断的威吓。英国屡欲用兵力压迫苏俄，都因为英国工人反对及各殖民地革命运动之兴起而作罢；最近洛迦诺会议中进攻苏俄之密谋方定，而英国大罢工突起，势不得不暂时停顿。土耳其民族革命之成功，不用说是因为有苏俄很大的援助。土耳其的民族革命总算成功了，基玛尔居然趾高气扬的杀戮共产党了，并且想离开苏俄了；殊不知英法两帝国主义还未倒，他们仍旧向土耳其夹攻，尤其是最近英国抢夺莫塞尔，于是基玛尔再回向苏俄。中国及波斯在俄皇时代所失各种权利，若不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如何能够收回？去年中国五卅运动初起，英、法、德、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其政府，一致宣传中国五卅运动是义和团一类的排外运动，嗣因英、法、德、美、俄、日本的工人及其政党纷起援助，才不便这样宣传。中国的五卅运动，因为有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同情援助，使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提出他们久已忘记了的关税会议来敷衍中国人；并且英国帝国主义者因为恐怕中国五卅运动引起印度人的觉悟，也拿出一点小小让步和缓印度资产阶级的感情。现今弥漫全世界之民族独立运动，如欧洲之墨西托尼亚、皮沙拉比亚、布哥维那、西里西亚、克洛西亚等，如亚洲之波斯、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阿富汗、爪哇、中国、印度、高丽等，如非洲之摩洛哥、埃及、阿尔及利

亚等，莫不有苏俄之后援。最近摩洛哥中悲壮震动全球的里夫民族之失败，《巴黎晨报》说："阿白杜尔克林之降，可使俄、德不复抱法国必败于摩洛哥之梦想，法国虽死一百七十万人，然终能一再表示其自卫之能力，阿白杜尔克林固可依恃法国之恩慈，但宽恕非忘却前事之解，阿氏与布尔希维克及日耳曼之接洽，法人不能忘也。"小小的里夫民族，为数不及一百万，军队只六万五千，前曾击破西班牙十万大兵，继又和法国苦战一年有余，今虽不幸失败，其所加于法国之损失如此之大，此固由于摩洛哥人勇敢善战，而俄、德、法各国共产党人援助之力亦不小，《巴黎晨报》只说法国不能忘阿氏与俄、德之接洽，却不肯说出阿氏更与他自己国中"不爱国"的法国共产党接洽也。

依据这些事实，现代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中各部分相互关系之密切，已非常明显。

现在，我们再研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和世界革命之关系是怎样。

中国是英、美、法、日、意、比等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掠夺的市场，而不是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所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第一个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而不仅仅是那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第二个对象是国内军阀，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用做掠夺中国利益压制中国民众之工具。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是由集中民众的组织，民众取得武装，解除军阀的武装，一直到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之胜利，才能够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中国现有的直、奉两系军阀，只要有一系存在，都是民众的大敌，都是束缚民族解放运动之万钧锁链；国内军阀比起英、美、法、日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却只是九牛之一毛，何况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那更是大莫与京。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但高等华人之友谊的磋商和资产阶级之和平要求，等于痴人说梦；即令有困苦的革命争斗，这种争斗，若不得到苏俄及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力的援助，使这争斗能成为长期的一直到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完成整个的世界革命，也是不会完全成功的。

那么，或者有人以为反正中国的民族解放，非到世界革命实现不会

成功，待到世界革命实现了，国际帝国主义覆灭了，中国问题也自然解决了，现在中国民族便无须努力做这不必要的革命争斗。这种见解非常之错。

不但在主观上，世界革命是世界各民族中革命民众之共同义务，任何革命民众，都不能取这种机会主义的可耻态度；并且在客观上，被压迫国家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二者汇合起来，才能根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才能成就整个的世界革命，譬如一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我们若坐待世界革命机会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争斗，使帝国主义者得集其全力以镇压其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我们所坐待之机会，或至永远不会到来。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不应如国家主义者所主张，关起门来独立革命；也不应如机会主义者主张我们自己不必努力，只坐待世界革命之到来。在实际的历史现象上，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高潮，也是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在相互影响中平流并进。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所共同征服的国家，自然不能幻想马上就会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的胜利之可能；但我们在这世界革命高潮中之可能的责任，是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争斗，不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不断的和帝国主义者争夺中国现有的武装——尚未为帝国主义者所有的武装如冯玉祥、唐生智等军队，甚至于已为帝国主义者所有的武装如直、奉两系军队——不断的扩张民众的武装，如民团、商团、红枪会、农民自卫团、工人自卫团、工人纠察队、学生军等；经过这样的长期努力与争斗，才能够解除军阀的武装，才有联合别的被压迫国家如苏俄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之可能。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摇动一分，他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潮即高涨一分；中国民众的武装及接近民众的武装扩张一分，军阀的势力即削弱一分，亦即中国民众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之期接近一分；如此长期争斗之结果，再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汇合起来，才能够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才能够实现世界革命，才能够使中国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

在政治上，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征服的国家，在经济上，中国

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掠夺的市场，不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中国民族不会有完全解放之可能；因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背景及其必然的途径，可称为一切民族解放和世界革命关系之模范的说明。

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关门革命的方法，固然不合实际；有些国民党左派，自以为赞成世界革命表示特别急进，其实这并不算什么特别急进。中国民族革命，只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赞成世界革命的人无有不赞成中国民族革命，尽力中国民族革命的人也应该尽力世界革命；尽力世界革命即是尽力中国民族革命，这两件事是很难分开的，因为这两个革命的对象只是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的民族革命者，不但要尽力世界革命，并且要努力研究世界革命的现状及其趋势；换句话说，就是：不但要懂得本国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并且要懂得世界的真实状况即其历史发展到了甚么阶段，更要懂得本国和所处的世界之革命的关系是什么一种形势。懂得了这些，然后所定革命的策略及行动，才适合实际，才不至于落后或空想。

现在已经不是闭关时代了，世界各部分的革命运动，因为相互影响之关系日渐密切，已成为整个的不能分开了，凡是一个民族革命者，头脑中若没有一个世界革命形势之具体的图画，并且时常检查这图画中有无错误而加以改正，则口中虽说赞成世界革命，实际上仍旧是关门革命。

一九二六·五·三〇

1926年7月25日 《新青年》(季刊)第五号 署名：陈独秀

对于上海五卅纪念运动之感想

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意义，一面是纪念去年今日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众之大屠杀，一面是纪念去年今日中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者大屠杀及其历来侵略高压政策之反抗运动。他们的大屠杀，我们固然应该纪念以志不忘；我们的反抗运动，我们更应该纪念！尤其应该有纪念运动，应该以五卅运动的精神，以五卅运动的方法，继续此伟大的反抗运动，一直达到五卅运动之目的，这才算完成了五卅纪念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但要纪念敌人的屠杀，并且要纪念我们的反抗；不但要纪念我们的反抗，并且要继续我们的反抗；不但要有五卅纪念，并且要有五卅纪念运动。若只是有纪念而无运动，即纪念十年乃至百年千年，我们的纪念尽管纪念，他们的屠杀、侵略、高压仍〔旧〕是屠杀、侵略、高压，这样滑稽的纪念，只是增加五卅运动中已死者的悲伤与未死者的耻辱！

今年五卅纪念中，是不是有运动？毕竟有了一点运动。全国的运动是怎样，现在还未能详细知道，且说一说上海的五卅纪念运动。

上海是五卅运动发难地，若只有纪念而无运动，那更是可耻了，幸而还有了一点小小运动，勉强可以遮羞！五月二十九日之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礼，参加的有工、学、商一千余团体，代表有五千余人，散会后整队游行，沿街高呼口号，分发传单。卅日工、学、商一致罢工、罢课、罢市。上午参加市民纪念大会的，有一千余团体，计五六万人，为近数月来未有之盛会，散会后亦分队游行，沿路高呼口号，分发传单。下午参加大马路一带演讲队的工人、学生约三千余人，商店伙友们多自动的出来参加，一时群众占领了大马路，阻止电车开行，毁坏了好些电车。这一点为上海市民遮羞的小小运动，总算照我们预期的做到了。

在这一小小运动中，我们的感想是：(一)一班大学教授及商会领袖

们，他们向帝国主义者所哀求的，一点也没有赏脸，因此在五卅周年纪念若一点不表示，则未免难堪，而一有表示，又恐怕上过激派的大当，一见工、学界要参加五卅纪念运动，他们便异常惊慌，恍如大祸临头，所以硬要把烈士公墓奠基礼改在二十九日举行。其实，我们固然不肯完全采用尾巴主义，跟着和平的民众后面跑，同时我们也不肯一意孤行，吓破了大教授和大老板们贵重的胆，未免罪过，我们在事前的计划，曾如吴稚晖先生所言斟酌尽善，丝毫不肯冒昧；至于一切无意义的破坏，更理不应有，所谓到处放火，自然是侦探造谣。现在廿九、卅的运动，业已如商总联会会长邬志豪所言“平安度过”，在一般和平的新闻记者与商界领袖们，如庆更生，大出意外，固然要大大称赞此次运动“有精神又有秩序”，而在一班热烈的民族主义者，或者却要骂“过激派太不过激！”（二）大学教授和商界领袖，都主张不参加群众示威运动，教职员、学生只在各校内开会纪念，做“静默”、茹素、敲哀钟这类把戏，商界则只商总联会全体议董在宁波会馆开追悼会，各店伙友在店“默思”，不准出门；他们采取了这样分离群众的办法，这样滑稽的消极纪念——“静默”与“默思”，因此市民大会中学生比工人少，商人比学生更少，使有超过十万群众可能的市民纪念大会，变成了五六万人的大会。（三）商界领袖们，忘记了去年今日发令屠杀我们同胞的仇人是谁，竟仰面向工部局请领执照，以便佩带起来，向群众劝导！（四）学生固然不能都听从教授的主张，即商人群众也很热烈的出来参加群众的示威及演讲，并不一概听从他们领袖的命令，闭门默思。（五）国民党右派竟不参加公共体育场之群众的市民纪念大会，而和一些招牌工会及反动派，另在斜桥徽宁会馆开追悼会，孙文主义学会竟和新社会民主党、反赤联合会，混在一起！（六）总商会不但不参加运动，并且他们的领袖，竟在此时亲到五卅运动所反对的主要仇敌日本去参观，大开其宴会，大讲其亲善！（七）一向只敢反对苏俄的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素以“外抗强权”自命，在此次全上海市民对强权表示反抗运动中，他们到那里去了？

我为什么要细说这些感想，因为要指出各阶级民众的弱点，希望大家痛改以前的观念与态度，无论过激派、和平派都是自家人，不是仇敌，我们的仇敌乃是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我们要认清仇敌与自家人，为反对

仇敌，自家人应该合作，万万不可与仇敌合作来反对自家人；更希望大家今后一致起来巩固我们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继续五卅运动的精神和方法一致向帝国主义持久作战，以期达到五卅运动之目的，我们中国人才有生路！

六月一日

1926年6月3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六期 署名：独秀

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介石先生：

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内中所载，倘都和先生所口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印刷上的错误，则我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会有几句声明的说话。并且在声明的说话之前，还要总声明一句：我们的声明只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别方面的事一概不管。

在这个印刷物上，有两个要义：前一段是先生声述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之苦衷，后一段是先生改正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态度之意见。

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说："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我因为全部经过的事情，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的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这只有我个人知道。"先生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和中国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先生说出的权利；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因为先生说出后，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应该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

先生说："当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但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想诬陷你想拆散军校的一派人是谁，有阴谋的一二人是谁，运动倒蒋者又是谁，先生都未明言，我们当然不能冒猜；不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因此上海各报都一致说三月二十

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一个事实是："有人对各军官长说是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之中，说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么？'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的心思，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何以见得呢？对各军官说共产分子如何如何，当然不像共产党自己的口气，说土耳其杀共产党这段话，我未曾听见共产党人说过，只传闻孙文主义学会中人向汪精卫先生攻击共产分子时，精卫先生说过这样话，其实否尚不可知，即令精卫先生有这段话，只足以证明孙会中人是何等反对共产分子，而绝对不能证明共产分子拟如何倒蒋；并且精卫先生是说要杀共产党，不是说要杀孙会中人，照情理只有共产分子听了精卫先生这话而恐怖不

安，为什么反是孙会的军官听了这些话引起恐怖与自卫的心思，并要监视共产分子全部退出呢？并且先生还说："如果当时我校长不在的时候，当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剧烈，也未可知的。"这话诚然，如果先生当时不在广州，孙会中人会当真大杀共产党；而且我们还听说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欧阳格、吴铁城辈还要彻底干下去，这些事实正足证明精卫先生即令有那样的话，却非神经过敏，更不是有意"激动风潮"。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二个事实是："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两军，广东是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离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来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无论何人有这样的主张我们都以为要不得。不过只有国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决定这种军队的编制与名称，政府委员及军委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分子，无论此事内幕如何，当然和我们无关。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点关系，我现在索性老实告诉先生，当第二师长王懋功免职时，我们以为右派又有什么反动发生，所以政府有此处置，但报载内情甚复杂，我们便函询广州同志，他们的回信说："王懋功被逐后，右派颇不满，孙会则乘机大造其谣言，说王懋功是 C. P. ，此次蒋之处置王氏，就是对 C. P. 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 C. P. ，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闻王氏之被逐是因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彰明较著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们早已闻有此说，曾函询广东的同志，他们回信说："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也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误会。"语罕来此，我亦当面诘责过，他亦力辩无此事，我曾告

诉他，如果无此事，你应详细向介石先生说明，以免误会。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关于这一问题，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们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两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恶意，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

总之：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做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中国革命的力量还是很弱，我们敌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们的革命工作，好像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舵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较进步分子，只要他们不赞成以区区一万一千万元出卖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于英国，我们都不拒绝和他们合作，何况蒋介石！

先生在后一段中说："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础的。"又说："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这两句话没有人能够反对，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能反对。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党中有个领袖，且必须有个领袖；可是在中国国民党自孙总理去世后，不但无名义上的总理，也并未产出能够使全党公认之事实上的领袖，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领袖，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国

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若说国民党中共产分子有污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党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并不是不受制裁的黄带子。国民党往往因共产分子个人的错误,便发生两党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问题,这真是一个极大危险的习惯。中山先生在世时不许党员讨论这政策的根本问题,就是反对这习惯;今后纠正这个习惯,是要将分子制裁和党的合作政策这两个问题,严格的分开。譬如国民党中有些人发行许多印刷物,污蔑抹杀得共产党简直不成话说,然而共产党从未因此发生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问题。

中国国民党和别国的国民党不同,因为它有具体的三民主义之历史与特性,任何党员(共产分子当然在内)都要信仰三民主义,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先生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反对季陶的意见,已详见给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阅此信,现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又如吴稚晖、李石曾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无政府主义。凡属国民党党员,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至于先生说:"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会时,先生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我不明白这句话是指那种事实?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

有多少纯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产分子曾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招牌做过些什么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会、农会的运动吗？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也说要帮助工人、农民发展组织，共产分子是在国民党工人部、农民部之下，公开的做这些工作，并非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于三民主义工作外，复到共产党党部的集会及兼做发展共产党的工作吗？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一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之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又说："所以我说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不尽欲言，诸希赐教！

六月四日

1926年6月9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七期 署名：独秀



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

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国，我们或者可以说农民暴动是中国历史之骨干。远者如陈涉辇掇耕而叹，如赤眉、黄巾、黄巢等役，如闯献之乱，都是官逼农变；近者如洪杨、义和团及红枪会这三件事，更是很明显的农民暴动。

无论士大夫怎样诅咒农民暴动，而由陈涉一直到红枪会这二千年一贯的农民暴动历史，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任何民族中封建社会时代的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不免有顽旧迷信的色彩；他们的行动往往遍于破坏而不免于野蛮，这本是落后的农民原始暴动之本色。士大夫固然有理由诅咒他们的思想与行动，然而没有理由诅咒他们对于统治阶级之反抗暴动。因为中国最大部分生产者是农民，同时却是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压迫农民的不但是统治阶级（从前的朝廷现在的军阀）及其官吏，士大夫表面上好像是站在统治阶级与农民之间，而实际上是接近城市政权，附属于统治阶级，也要压迫农民的；所以分利的统治阶级之暴政一到了某种程度，生产的被统治阶级即起而反抗暴动，即农民对于政府官吏及士大夫之反抗暴动。这本是中国历史的惯例。

现在的红枪会运动，就是这历史的惯例之一。有广大农民群众的红枪会，已普遍了河南、山东全省和直隶之南部、安徽、江苏、江西之北部，黑枪会、黄枪会、白枪会都是他的姊妹团体。河南、山东的军阀，把他们当做土匪，整千整万一连几数十个村庄的屠杀，然而他们实是武装自卫的农民，而不是土匪。他们的大多数不但不是土匪，而且仇视土匪，因此土匪时常勾引官兵来屠杀他们。

红枪会的政纲是：反抗军阀，反抗贪官污吏，反抗苛税杂捐，反抗土匪。他们的思想顽旧迷信，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的反抗暴动之性质，

也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当中也许杂有少数土匪，而大部分是农民，且许多是小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的首领也有腐化为军阀利用之可能，而群众是要反抗军阀苛税到底的。

《新闻报》五月二十五日开封通信说："豫东杞县、通许一带之红枪会，自经李鸿翥用大炮轰击后，村庄被焚者已百里内无人烟，人民死者数以万计。……通许知事至乡间，合集绅民劝导，绅民质问知事曰，'不教我们信红枪会极易，只要先教地方不见土匪，不再派苛税，不再派恶军队骚扰，完粮纳税一律收用纸洋。'知事语塞，狼狈而遁；会众中之妇孺争以瓦砾追击知事之轿。知事回报后，寇(英杰)知不可以理喻，遂电李速剿，而大祸作矣。"

人民要求地方不见土匪、不派苛税、军队不骚扰、官厅收用自己所发行的纸币，便是不可以理喻，便应该用大炮轰击，便应该焚杀得百里内无人烟，我们要问诅咒农民暴动的士大夫，这是什么理由？

士大夫或者以为农民暴动扩大起来，会造成洪杨时代恐怖的局面。他们这个远虑是有理由的。洪杨时代农民革命的一段历史，被士大夫宣传得十分恐怖；可是实际上究竟怎样呢？此事且不暇博征，姑举最近一点材料，作为参考。

本月六日上海美国侨民团到松江瞻拜华尔将军之墓(美人华尔于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率长胜军助清军与洪杨军战死于松江)，福开森演说中有言：

> 是时居华之美名士前同文馆总教授丁韪良博士，曾再上书于美检事长库兴，力言承认南京革军政府之必要。英牧师杨格非、莫维廉、艾约瑟等，皆以革军功成，将为中国莫大之利；杨格非于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中有云："彼较之皇党，实有数百年之进步。"……驻沪英麦领事，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上英首相报告书中，亦谓革军领区内，"人民皆安居乐业"，而皇党辖境，则"贼盗横行"。……当时革军所宣传之宗旨，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一日大陆记录中记其简要如下：
>
> (一) 治理中国者应为中国人，非满人；
>
> (二) 专制政府之闭关政策，应即废除，俾中国亦为国际中之一份子；

（三）应采用外国之美术品及制造品；

（四）应与外国定友善之国交，中国物产亦应与外国交易，以辟富源；

（五）采用外国工商业上之新发明。

依据这些材料，洪杨之太平军，未必像当时倾向皇党的士大夫所宣传的那样令人恐怖。况且现在离洪杨时代又有六十余年，中国农民已不无多少之进步，现在比那时又有了革命的政党与军队，倘与农民力量结合起来，当然可以减少前代农民暴动中顽旧迷信、野蛮破坏的成分。

总之，在北洋军阀统治蹂躏下之北方十余省农民，想他们不反抗和暴动，这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任其自然暴动好呢，还是引导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旗帜之下好，这是中国目前一个紧要问题。士大夫盲目诅咒农民暴动，是一件无效的事。

1926年6月16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八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威林顿眼中的华人价值

英国因五卅运动的影响，特派威林顿爵士拿庚子赔款来收买高等华人，以和缓反英空气；此事外报已公开的说过，许多高等华人，还装着未听见，高唱与外人合作。现在威林顿氏在北京英美协会演说，公然说："此次来华，备受各界优待，余囊中携有一万万元巨资，故华人皆愿与英人合作。"稍有廉耻的中国人闻此言作何感想？

请看反赤军阀之卫国救民！

直隶省商会联合会最近通电说："各路车辆尽为军队所扣留，弃置无用，不令开行；由是所有商货，或堆积站旁，或遗弃中路，总其损失，难以量计。商民坐视亏折，已属不赀，加以军队所在，纪律毫无。……又复军队复杂，号令难一，甲站贿通，乙站横阻，层层敲剥，种种留难，扰害情形，实难言喻，路局莫敢谁何。……养兵本所以卫国，兴师率皆曰救民，综观以上种种扰害实情，以此卫国，国何不亡，以此救民，民无噍类！"这些现象，本是军阀统治之下，尤其是反赤军阀统治之下，所必不能免的。一般商人仍希望军阀维持和平，并且希望军阀反赤好维持和平，现在这种希望怎样？

平民之不平

上海闸北商学界曾经反对保卫团，现据大华通信社消息："上海南

市市民，佥以保卫团为保护富绅巨商而设，而充当团长团总者，又多系有财产之人，何不输助私产，而欲征诸平民，故于昨日（六月六日）起，各家门首均贴有'反对带征房捐充作保卫团经费'等白纸字条，其表示颇为激昂。"平民出钱养军阀不算，还要出钱保卫财阀。难怪他们不平呵！

1926年6月16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八期 署名：实

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

民国十五年之政治史，只是皖、奉、直三个军阀党循环胜败起伏之历史。现在皖党倒了，或者是永远倒了，即令再起，也不过是奉党的附庸，决不能够恢复从前一个独立的军阀党之势力了。此时乃是奉、直两军阀党对峙的局面，前者的靠山是日本，后者的奥援是英国。

奉党首领张作霖，虽然承日本意旨想控制北京政局；然而内因旧派吴俊升之迫令联吴，外因国民党尚存在，遂不得不与吴佩孚表示合作。直党首领吴佩孚，虽然想依据奉、直宿约，独揽关内政权，恢复十三年奉、直战前局面，再进而以武力统一中国；然而内因靳云鹗、田维勤、孙传芳之新结合，外因国民军尚存在，又加以英国之劝告，也不得不暂时求助于奉张。在这种利害冲突，实际不能合作而又不能不表示合作的状态中，亦即不能合作又不能决裂的状态中，遂形成了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

护宪问题，颜阁问题，总统问题，阁员分配问题，直隶地盘问题，将来二五关税及大借款分配问题，不但现在的天津代表会议没有解决，即将来任何会议，都不能解决，只有奉、直再战才能够解决。然而奉、直两方都有内外种种牵制，一时却没有因无法解决而再战之可能！因此，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或有相当时期的继续，以至于相持日久，一方面因内部的或外部的变化而自溃，他方面得着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形成一个较明瞭的新局面。

在现时对峙的混沌政局中，两方虽有种种利害不同的冲突，而都有两个共得目的：一是消灭国民军，一是获得二五关税及大借款以救济财政的恐慌。后者较前者尤为急迫，然二五关税及大借款，都必须内阁成立才有办法，而内阁问题，又必须护宪问题与阁员分配问题有了解决才能成立，因此这一目的，一时还不易达到。消灭国民军更非易事，国民

一军，至少还有八万乃至十万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有持久坚守之可能；奉军利在国、直互斗，而自己不愿多牺牲实力，吴俊升虽愿牺牲而无多实力，吴佩孚更愿牺牲而实力也有限，靳田军和孙传芳之新结合虽失败，一变而积极的为吴牺牲，当然是个问题，李景林、王怀庆收编之二三万国民二军，时时都有反戈之可能，张宗昌当然要自保山东，不暇他求，魏益三至今还徘徊观望于国民一军与吴佩孚之间，阎锡山兵虽多而无战斗力，在这样状态之下，吴佩孚将用何种力量可以消灭国民军？

再由相反的方面观察，在北直隶一隅之地，聚集这多饷源无着的饥军，人人都须自寻出路，时时都可发生异动；在河南全部，充满了红枪会及豫军独立的运动；在湖南，粤桂军北伐日有发展；这三方面有一显著的成功，即令国民军不冲出，都足陷吴佩孚于更困难的境遇，倘四方面同时发展，吴佩孚只有退走天津。

吴佩孚失败了，现时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才能解决，否则他自身决不能解决，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期望的由奉张控制北京政局是不可能的，因为奉张一时不便和直吴开战；至于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期望的由奉、直两党组织联立政府，使军阀政权得到一个稳定而巩固时期，以便做他们宰制中国更有力的工具，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吴、张实际不能合作。

吴佩孚如果失败了，恐怕也和段祺瑞一样是最后的失败；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必然力助奉张，或更用段，以与国民军及国民政府对抗，英国或与日本合作，或另寻出路。此时国民军及国民政府对奉党军阀及帝国主义之争斗，必更加复杂而剧烈，或至另外形成一种争斗形式，都不可知。所可知者，一方面，此时民众运动必然得着较大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军阀党又淘汰了一个，只剩下一个奉张，这是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于中国人民有利的，所以人民应该努力促成此种变化。

可是现时一般商人及新闻记者，还未看见这种变化之可能性及其有利于人民，反而希望吴、张诚意合作，好形成一个苟安的局面。可惜他们至今还不懂得军阀间永远没有诚意合作之可能，希望军阀间的和平，完全是梦想，即现时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已经是非常之苟安的苟

安局面，而且不能持久，再进一步的苟安更是不可能的。可惜他们更不懂得军阀间果然诚意合作，则军阀政权较今日更为集中巩固，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也较今日更加规模扩大，他们借款卖国助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人民也必然较今日更加肆无忌惮。只有军阀间因自相冲突而崩溃，或由人民及接近人民的军队之努力使军阀崩溃，人民才有生路；只有军阀崩溃，在接近人民的军事势力统治之下，强用军票，官绑票，毁坏交通，妨害商业，勒派公债，卖国借款，苛税，扰民等等，象此时反赤军所加于商民的苦痛，才能够免除，号为南北二赤的国民政府、国民军统治下的现状就是一个榜样。无论在反赤军阀对峙的混沌政局之下或反赤军阀诚意合作的政局之下，商民这些苦痛，都是必然不可免的事；所以商民希望军阀诚意合作巩固他们的政权；便等于希望埋葬自己的坟墓更加挖深，希望杀自己的刀更加磨快！

1926年6月23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九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平民的中日亲善

虞洽卿说:“鄙人此行,深觉日本人民及中等资本家均已有彻底觉悟,知中日亲善之必要,至尚未能完全明瞭者,则日本政府与大资本家。”我们不是国家主义的排外者,中日平民的亲善,本应十二分欢迎;可是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与大资产阶级不倒,中日亲善终是一个欺骗政策不会实现的。我们所反对的正是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与大资产阶级,而不是日本平民;我们只应对日本平民讲中日亲善,不应对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与大资产阶级讲中日亲善。因为对帝国主义者讲亲善,直是“与虎谋皮”!

“友谊的态度来交涉”之结果!

北四川路的电车路,是上海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之最著者,他们越界筑路筑到何处,警察权便随着越界行使到何处,这是何等不法的横暴行为,即依据不平等条约试问何约何条有此等横暴不法的特权之规定!最近上海警察厅派巡警到北四川路站岗,工部局赫然震怒,十六日领袖领事克银汉,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交涉员许沅会商之结果,十七日遂将北四川路岗警撤退了,这就是孙传芳、丁文江所称“友谊的态度来交涉”之结果!

工人活命问题

近来上海米价贵至每担十七元五角有奇,还有将涨到二十元以上

的消息，其他日用必需品势不得不随之日见昂贵，工人每月工资平均不过十二三元，教他们如何养家活命？为活命而要求加资而罢工，总算不得什么过激罢！有一班人以为工人因生活艰难要求加资，固属情理之常，而疲敝的工商业实受不起罢工加资的损失；殊不知穷苦工人除向厂主要求加资外，别无生路可寻，而厂主则可向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争斗，以救中国工商业之疲敝，不当专向穷苦的工人身上括取。括尽工人膏血，也抵不了所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之扰害之损失万分之一呵！

1926年6月23日　《向导》周报第一五九期　署名：实



革命的上海

人口超过二百万的上海，为全国工商业之中心，革命运动之客观的条件，他在全中国各大都市中是第一具足的了。所缺乏的是主观上的革命思想与意志。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与意志之故，第一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之资本势力，已经使上海市民“洋奴化”了数十年，尤其是上层阶级，如买办、洋货商、工部局海关职员、基督教青年会，以至于英美留学生出身之大学教授及教会大学之学生等：他们的民族观念，差不多被外国金钱势力毁灭完了；即至下层平民，都免不了崇拜洋人势力和买办地位的心理，不过他们比上层阶级的人们和外人较少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原始排外观念，有时还能够在外人过分的欺压中表现出来。上海纯粹是个商场，从前除教会的奴隶教育外，很少本国的学校自己的文化（所谓自己的文化，是指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美术、文学的教育而言，不是指什么东方文化与国粹），这乃是上海市民缺乏革命思想之第二原因。

欧战中，中国工商业得了一点发展的机会，于是上海在买办和洋货商以外，新生了一些纱业家、丝业家、航业家及国货商，和外国资本有了一些小小冲突；同时，德国、俄国的革命，使全中国人的心理起了一个大变化，上海市民自然也非例外，一时革新的潮流弥漫了全中国，革新的青年集中了上海，更集中到文化运动与平民运动。因此，上海市民，在客观上在主观上，都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自“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上海市民遂由洋奴化，渐渐行向革命化了。

现时上海市民之革命化的现象是怎样呢？二十多万产业工人不但站起来要求生活改善和阶级的组织（工会），并且大规模的参加政治争斗。有很大数量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业职工，也渐渐起来做经济的罢工，组织职工会，加入国民党，且不满意于国民党中的右派，他们参加五卅

周年纪念运动，其热烈并不在产业工人和学生之下。学生大部分是革命的，虽然有少数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从中消极的怠工或积极的捣乱，终以学生群众倾向革命，他们尚无法破坏学生的战斗总机关——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小商人因外国帝国主义、本国的苛税杂捐及大商企业这三种压迫，也渐渐倾向革命：如不满意于总商会的妥协态度，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牺牲关会与五卅案交涉借款卖国，反对北京军阀政府以烟捐向英美烟公司抵借巨款，反对卷烟税，反对军阀破坏闸北自治，反对宅地税，反对省政府停止土布免税，反对闵库增设烟酒令卡，反对省政府增加米捐，反对房捐带征保卫团经费等，都充满了怨愤不平的呼声。至于反对中外官厅护庇烟土，反对增加房租，要求抑平米价，更成了一般平民普遍的运动。最近浦东塘桥乡，竟因巡警征收门牌费，惹起了数千人的暴动。

以上各阶级的民众，即是上海市最大多数的民众，都已经脱离洋奴化，而有了政治的觉悟了。

大商阶级是怎样呢？他们的大部分还留在买办阶级的领域，代表他们的是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商会和代表上海教育界贵族的江苏省教育会，是上海市两个反动势力的总机关。大商阶级中，近来虽然有了少数反对派倾向，如虞和德、霍守华等，然而他们当中的不同，只是多数派乃纯粹买办阶级性，无条件的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合作，少数派稍带一点民族资产阶级色彩，须有条件的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合作。他们对于工人运动也有不同的态度，多数派绝对仇视工人运动，少数派想拿一点改良政策利用工人，以爱国名义为他们对帝国主义要求利益而牺牲，并且主张工人不必有自己的组织。此次总商会选举，多数派得了完全胜利，他们今后和帝国主义者比虞和德时代更要亲密的合作。

大商阶级，在上海民众中虽是少数，而实力却颇雄厚，可以做帝国主义及军阀有力的工具，因为他们掌握着财政金融机关和舆论机关，并且有武装队（保卫团）。因此，在上海市民的民族运动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或者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一直行向革命，以至完成全中国的民族解放；或者由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影响一切民众，渐渐回复到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凡是一个革命家，固然不应因抱悲观而至于看不清革命的环境，然亦不应过于乐观而至忽视革命环境中每个危险，更不应由乐观而至于夸大自欺，陷于超过实际可能之推测。大商阶级之妥协，有意的或无意的背叛民众出卖民族利益，这是革命的上海之最大暗礁，在民族运动之长期争斗中，此暗礁时时都会发生危险。

上海是全中国工商业之中心，亦即一切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中心，同时更是中国中部长江流域精华所萃聚，亦即英国帝国主义者势力范围之根据地；从前太平革命势力一达上海，英国即举全力与之决死斗，今后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争斗，在上海也须比任何地方有更长期的争斗。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失败，乃是他们在中国之最后失败；中国民族在上海的胜利，也是我们对帝国主义之最后胜利。在这困难的长期争斗中，妥协的大商阶级势力有更多更大发展之机会，可是我们也并非幻想能够马上一举而获得最后胜利，不妨得寸思尺的逐渐获得胜利，逐渐革命化，逐渐摇动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之基础；惟必力避大商阶级之危险的暗礁，即“中外合作”之幻想，方不至由现在革命的上海，行向从前洋奴化的上海！

孙传芳、丁文江要的是“大上海”，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上海”，因为洋奴化的上海越大越糟。

1926 年 6 月 30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六〇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国民党右派与赵恒惕

上海《新闻报》二十二日长沙电："国民党部已启封，二十一日又升旗，覃振随赵回湘，右派国民党部亦重整旗鼓。"这一短电使我们有两个感想：一是国民党中真有右派这一个事实，已是社会所公认的了；二是右派国民党竟和吴佩孚的爪牙赵恒惕合作了！

刘芦隐与张君劢

据大华通讯社消息："上海工业委员会，鉴于迩来上海工潮，起伏无常，特函邀热心工业人士张君劢……刘芦隐……等，订于本月二十五日假座福州路中央西菜社讨论消弭工潮方法。"这或者是右派国民党和其多年敌党研究系，共同进攻工人的联合战线之初幕。这些民党和研究系的老爷们，他们讨论消弭工潮时大吃其西菜，他们忘记了工人连饭也没得吃啊！

国民党右派与陈炯明

国民政府讨伐陈炯明，得了东江农民不少的帮助，农民在战争中牺牲了五百多人；现在国民党右派却在中央委员会议席上攻击农会是土匪，陈炯明闻之当大称快！

美术家再往何处遁?

中国自古就有一班人,一方面不肯同流合污,一方面又不肯奋斗,于是逃禅或隐遁是他们的出路。现在生活艰难,连逃禅隐遁都非易事,于是这班人便想逃遁于科学、美术,以为如此一遁,强权当无如我何了。不料强权仍找着了他们!上海县知事禁止美术专门学校不良科学(人体模特儿),孙传芳斥刘海粟校长:"不顾清议罔识礼教"。且看大美术家刘海粟再往何处遁?

崇拜曾左罗江的国家主义者

从前听说曾琦、左舜生自比曾左,我以为是别人轻薄他们的话,他们何至如此下流!不料曾琦现在竟用曾国藩家书给学生做国文教科书;他又说:"予则深信罗泽南、江忠源之遗风,必犹有存而未泯者,湘士多才,幸共勉之!"(见《醒狮》第八七号)他们真是这样崇拜背叛民族的满清奴才,他们便有勾结现在的戈登、华尔破灭中国民族革命之可能,他们还谈什么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的政纲

反赤派首领章炳麟尝电请吴、张讨平南北二赤,北赤是冯玉祥,南赤就是蒋介石。现在反赤派的小卒李璜卿(李是醒狮派,该派曾加入反赤大联合,曾琦在反赤大联合开会时,发言之多,不亚于章炳麟),却来劝南赤蒋介石"一刀两断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人"(见《醒狮》八七号),可见他们的计划是:用南赤铲除共产党人,再用军阀铲除南北二赤,把中国所有革命势力铲除净尽,好让英、日、吴、张长治久安的宰割中国。这就是他们国家主义的政纲!

可以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

我们以为中国民族运动绝对拒绝外力援助,是个错误;然而想靠外力直接出头替我们打战,那更是个错误。因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究竟要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干,外人援助我们则可,外人代替我们来干则不可。可是醒狮派一面反对苏俄援助中国革命,一面又说:苏俄"海军无实力,航空不见佳,陆军不可靠,我们要想靠苏俄去打英、美、法、意、日五大强国,真是梦想!"如果苏俄有实力,我们便可以靠他替我们去打战么?他们真是两个错误同时并犯了!张溥泉责备苏俄不肯出兵由蒙古攻打北京是无诚意援助中国革命,这和醒狮派是同样的错误。

1926 年 6 月 30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六〇期 署名:实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在此时北伐声中,我们若不懂得这个意义,便会发生许多错误的观念及行动。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

现在广州国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样呢?在第一点,他自然还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在第二点,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确有坐待北伐军到来之幻想。在第三点,我们敢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于革命力量澎涨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卫。在第四点,国民政府之北伐战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现时唐生智在湘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国民政府对农民致策总不应该比唐生智不如。国民二军之溃败,对农民

致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若再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若更进而剥夺广东革命的民众从护法政府以来所获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给予反革命的买办、土豪、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则我们在野党应该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帝国主义者早已定下了吴、张分途讨灭南北二赤的计划，如此英吴日张分据南北，才能和缓他们当中的冲突；现在英吴对日张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让步，则吴佩孚南下进攻广东，无论对国民军作战胜败，都必得张作霖之援助而实行。吴佩孚一回汉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进攻广西，届时动摇不定的小军阀如赣邓闽周，都必然决定态度，奉吴令一致向广东进攻；不但如此，还有香港帝国主义者封锁于外，陈林魏邦平旧部，勾结土匪、土豪、官僚、买办，扰乱于内；如果竟至如此，国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神经过敏，这样危险的局势，实已迫在目前，丝毫不容我们忽视。

所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将陷于四面围攻的国民政府，他的领袖们，应该和衷共济，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革命军正为此和军阀战争，也就是革命军和军阀不同之一点）。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和国民政府合作，以战胜此困难，使此困难不但不能覆灭国民政府，转而能够锻炼国民政府领袖及其军队和一切民众的革命意志与战斗力，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国民革命。

1926 年 7 月 7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赤化过激都是国粹

孙传芳前曾说:“现在社会有什么过激主义和工会,其实这名词已发现三千年前了。”现在吴佩孚在怀仁堂宴会又说:“赤化之源,为黄帝时之蚩尤,以蚩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祖。”好一个国学大家吴佩孚以高邮派考古方法,发明了赤化即蚩尤的后裔,如此赤化也算是国粹,而与新名词所谓红党无涉了。直系军阀不但有两次战功,八省地盘,新近又加了一次战功,发明了两个国粹,他们真是文武全才!

丁文江第二次“友谊的磋商”之结果

熊希龄于赴拒毒会欢迎途中,被会审公廨美国会审官派西探拘去,当时丁文江钟可托向西探说:“今日拒毒会开会欢迎,有事可待会后商量。”西探回答说:“我必须现在逮捕他。”这是丁文江在上海第二次“友谊的磋商”之结果!

1926 年 7 月 7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　署名:实

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之暴行

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除了经济的政治的侵略之外，还有一种侮辱的强暴行为，也使中国人十分不能忍受。别地方的事，从前的事，且都不论，那最大暴行五卅惨案如“五卅凶手供伏”中美国人所自述者也都不论，现在只就最近在上海所发生的几件事看来，件件都足使每个中国人发指眦裂，只要他不是毫无心肝的洋奴！

第一件事，是六月廿三日上午四时，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炉子间夜班工人闻宝章，因工作疲乏出而饮茶，事为西监工斯考毕(Scabie)撞见，当即在背后怒掌其颊，并痛击其背，该工人惊惶之余，且避且退，比及梯畔，适被追及，复又拳足交加，卒至重跌于高及四丈余之梯下棚格中(即储煤之坑)；斯氏见其已不能伸动，乃令俄工拽之以出，用自来水激射历四小时之久，始稍苏醒。当时有日班工人徐梅元、沈兰东、王阿阳三名目击出而作证，以鸣不平。讵知厂长非特不归咎于斯考毕氏，反谓该工人等之言俱属诬枉，且指责该班头目孙恒足谓其不能管理工人，当场一并开除。按斯考毕平日对待工人稍有不合即施毒殴，被殴者莫不负伤垂毙，如闻宝章前已被殴过一次卧床十三日，即可证明。第以势力薄弱之工人从不与较，怎奈让者愈让，而彼之残酷手段，屡施无忌。近更益逞其凶暴野蛮之行为，竟置工人之性命于不顾，以致演成此次之惨剧。全厂工人因此大愤，群起向厂方提出下列之要求：

(一) 开除凶手斯考毕；

(二) 抚恤被伤者医药费；

(三) 恢复四证人工作；

(四) 以后不准英人毒打工人；

(五) 以后不准借故开除工人。

全上海各报无一家敢登载此事，连关于此事的广告都一律拒绝登

载。上海总工会拟于二十七日，在该会会所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讨论此事，帝国主义者便命令中国官厅将总工会封闭了！此事不但表示帝国主义者之暴行，而中国官厅仰承外人意旨漠视民命，及中国新闻界之怯懦畏事，均足令外国人笑，令中国人愤！

第二件事，是荷属南洋巴达维亚华侨温庆贤，于去年回国，近由上海会审公廨于六月二十一日，从南京将其提到上海，并且荷兰总领事还要引渡归彼审理。查温庆贤生长中国，父母均是中国人，虽在巴达维亚经商多年，而并未入荷籍，去年回国系用中国护照，回国后也未曾在荷兰领署注册，即现在上海荷领因受巴达维亚荷官之托，使会审公廨出票移提，票内亦注明系拘捕中国人民温庆贤，因被告若非中国人，便不属公廨管辖。因此，此案当然归公廨审问，断无引渡于荷官之理。荷属华侨受荷官虐待，真是苦不尽言，现在更进一步，来到中国领土之内拘捕中国人了！横暴的荷领事，竟要在中国境内拘捕中国人！糊涂的公廨中国会审官，竟不向荷领抗议引渡审理中国人民！

第三件事，是熊希龄之被捕。湖南华昌矿务公司董事熊希龄，曾经辞去一切董事名义，并登报声明过；公司闭歇后，尚欠美国工程师怀德薪金若干，现在熊氏来到上海，公廨中美国会审官派克思，竟据怀德之请求发出拘票，于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将熊氏在赴拒毒会欢迎会途中拘至公廨，要求熊氏交出保证金三十万两。熊氏被迫登车时，当由丁文江告西探：今日拒毒会开会欢迎，有事可待会后商量；该西探坚称立须逮捕，丁文江等遂陪熊氏同往公廨，直至晚九时，始由江海关监督以一万两保证金保出。公廨受理此案及出票拘捕手续，不用说理由都不充足，分明是美国会审官滥用职权，有意为他们的工程师来侮辱中国绅士一下。绅士尚如此被侮辱，中国平民又当如何？丁文江是华界最高行政长官，对此案不立刻依据职权向美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竟取“友谊的磋商”之故智，忘了自己的身分，陪熊氏同到公廨，形同被捕，以取侮辱。被此侮辱的不是丁文江个人，而是淞沪商埠总办呵！

第四件事，是沪商协会于本月一日，在岭南楼菜馆开筹备会议，正将开会时，西捕蜂拥而入，一面喊问你们在此做什么？有多少广东人？一面大挥拳棍打人，将会打散了。各报纪载此事，只说“派捕禁止”，而

不敢说被捕打散。租界禁止华人集会已经是横暴了，正经商人集会竟被西捕打散，这乃是第一次！并闻捕房此次加于沪商协会之暴行，乃由于新改选的总商会中人所嗾使，因为他们疑心协会是粤商霍守华主动，所以西捕问有多少广东人。

在此小小四件事中，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是如何横暴侮辱，中国代表买办阶级的总商会是如何卖国自残同类，官僚是如何昏聩误国，新闻界是如何畏怯不能代表舆论，都一一充分的表现出来了！

1926 年 7 月 14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六二期 署名：独秀



答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

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诸先生：

诸先生对于鄙人前作《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有所辩难，以抱病久未奉答，歉仄之至。诸先生意见大致略同，所以现在一并奉答；病后体弱，恕不能详。在答复诸先生示教之先，谨将鄙人前文要旨略重述一下。第一个要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统治以外的民众，第二个要旨是警告国民政府的当局。警告民众的是：不可专门依赖国民政府北伐得到解放，各地民众应该自己努力做推倒军阀统治的运动，至少也要摇动当地军阀的统治地位；各地民众若不自起奋斗，专门坐待北伐军之到来，便是极大的错误。警告国民政府的又有二义：一是不可把北伐看得太神圣了，因为他是神圣事业，遂不惜牺牲民众利益，民众若自愿为北伐而牺牲利益，那是可以的，若政府当局拿神圣北伐的大帽子来压住民众，硬要牺牲他们利益，这便大大的失了北伐之真实的意义了(至于北伐名义不妥当如本报读者于枫冷先生所云，还不是重要问题)；二是不可主观的把此次北伐看得太夸张太奢望了，现时民众的组织势力上，在国民党指挥政治、军事之党的权威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事的内容及实力上，这些客观的状况看起来，此次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的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第三或第四次北伐，不看清客观上的实际情形，专凭主观妄自夸大，或希望速成徼幸图功，这决不是意志坚强的革命党人所应取的态度，而且会愤事。这些实际情形，这些革命北伐的意义，在革命的责任上，我们不得不公开的普遍的告诉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派的同志，免致误入迷途，决非对于一二人"函电相绳"可以济事的(像诸先生都不了解，竟来函辩难，恐怕除诸先生之外，不甚了解的还有多人，即此更足证明非公开的普遍的讨论不可了)，更不是什么"翘此以

为报章快心之谈”，因为民众的力量还未充实，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本身又还有许多缺点，使国民革命一时不能急切成功，正是我们痛心的事，不应该是我们快心的事！

你们说：“出师北伐，廓清军阀，虽非国民革命之全部工作，实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也，凡在革命旗帜之下，同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对此惟一先著，应无异议，足下更何忍加以攻击乎。”我前文曾说过：“北伐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在此等军事行动之先，应该以充分的民众宣传与组织为先著，现在你们仍旧以出师北伐为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你们这种军事行动万能的老观念仍然丝毫未改，怎不令人失望！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当然主张要打倒军阀；但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对于怎样出师北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

你们说：“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平日之训练，当为足下所素知，尊著乃对于北伐军出师，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使民众而尽闻足下之言，且以足下之言为可信，其影响所及，足下曾一计之乎？”你们当知：现在所有的北伐军之性质程度及训练，是不是同等的，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你们倘不要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你们又当知：民众只认识事实，当看北伐军的实施政策为向背，任何人空口说好话都是无用的；并且我们固然应该引导民众赞助北伐军，然而一概蒙蔽民众欺骗民众，每个革命党人都不应如此。

你们说：“至于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足下固诏此次出师为防御之战者，则寇盗在门，岂容偃息，塞井夷灶，尚非苛政。政府以不忍人之心，筹不得已之款，兢兢业业，未尝稍弛，足下如能来此一游，必知真相。乃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且施攻击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实此间同志所惶惑不解者。”既然出兵，自必要筹款；然不筹之于殷富，不筹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并且你们自己公然说：“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又说：“广东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既然是事实，又何以

说是远道传闻呢？总之，你们的责任是在力求与贼不同，并不是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力拒任何忠告！

你们说："尊著中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且因此否认此次出师之为革命，尤近于臆断。"在一般意义上，不但现在的国民政府和现在的出师北伐是革命的，就是以前杨、刘讨伐沈鸿英，讨伐商团，在客观上都是革命的；有许多人以为此次北伐的内容虽然有些缺点，而北伐军所占的地方，总比吴佩孚要好些，这个事实，除了帝国主义及军阀，无人能够否认。然而我们以为这样观察批评国民政府及其北伐军，与其说是恭维，不如说是轻蔑；因为凡是尊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是无形取消了，北伐期中限制人民自由的什么条例几乎颁布出来了，什么"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什么"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事实"，竟成了政府党人口中革命的理论，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

你们不相信"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军全部意义"，又不相信"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这两层上文已经答过，兹不重赘。

我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这是泛论北伐这一名词之本身的定义。我又说："再论到北伐军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这是特论北伐军这一行动必须合乎北伐的定义。这并无所谓冲突处，难道这样浅显的文义你们都看不懂吗？

你们又不相信"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之说，广东之五华、中山、花县，广西之东兰、平南、怀集等处农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人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

你们要问北伐时期成熟的标准吗？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非有充分的准备不可，何况

国民政府的北伐是有一定领土的政府正式出兵?

你们以为我说讨伐军阀还不是直接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这是我没有把帝国主义与军阀关系弄清楚;我们知识浅陋,一向不曾把军阀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弄清楚,只知道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还不懂得军阀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承教至为感谢!

你们既然承认北伐将领有打避疫针的必要,却又提议用别种方法。用别种什么方法呢?或者是讳疾忌医,不肯打针,还是去烧香打醮罢!

你们不以我说"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的话为然,而主张"革命政府下的人民应该尽一点义务"、"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既然如此,便不必责我"乃据远道传闻"了!

你们断定在军阀统治下的民众不能起来造成革命的势力,又感觉得"稍一动作即遭通缉捕杀的祸患",如此诚然是危险呀,大家坐等着候北伐军打来罢!

你们对于我这个答复,如果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尚望再赐教言,我们是不拒绝异议的。　　　　　　　　　　独秀　九月十三日

1926年9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一期

附: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惠鉴:

顷读第一百六十一期《向导》中尊著《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篇,窃愿致其肫诚,以助足下将来提笔论事之参考。深悉足下识见卓远,言必有因,一文之出,影响甚大,若人杰知而不言,或足下置而不听,皆非忠于党国之道,故不辞烦渎,唯亮察是幸。

国民政府此次出师,为实现总理主张之第一步,今日国中,外而为帝国主义者之爪牙,内而逞其武力,使人民无法生存,国家无由建设者,无一非军阀为之首恶。故出师北伐,廓清军阀,虽非国民革命之全部工作,实为国民革命之惟一先著也。凡在革命旗帜之下,同抱打倒帝国主义目的者,对此惟一先著,应无异义,足下更何忍加以攻击乎?夫北伐

军之性质程度及平日之训练，当为足下所素知，尊著乃对于北伐军出师，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使民众而尽闻足下之言，且以足下之言为可信，其影响所及，足下曾一计之乎！至于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足下固认此次出师为防御之战者，则寇盗在门，岂容偃息，塞井夷灶，尚非苛政。政府以不忍人之心，筹不得已之款，兢兢业业，未尝稍弛，足下如能来此一游，必知真相。乃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且施攻击于北伐中与贼相持之时，实此间同志所惶惑不解者，切望足下之一注意于北伐前途合作意义者也。最后尊著中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且因此否认此次出师之为革命，尤近于臆断。此种臆断，出诸敌方，则为当然，出诸足下，实为意外！

以上所言，全出至诚，足下明达，当不悻悻。总之，北伐之失败，乃一切革命者之失败，一切革命者在此革命急迫期间中，能合作则存，不能合作则亡，相扶助则存，相猜忌则亡，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势也。足下领袖群彦，动关众听，惟望以后明辨事理，郑重立言，此间如确有不善处，不妨函电相绳，资为药石。若翘此以为报章快心之谈，则甚非所望也。忠切之言，诸希亮察。借祝努力！

弟张人杰顿首　八月十三日

独秀先生：

我读了你在《向导》一百六十一期上《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一篇大作，我心里很不自在！因为我对你的大作中发生了许多的疑问，这许多的疑问，在我脑海里悬了有三四礼拜之久，还是莫明其妙，所以才写信问你。想你不以为讨厌。

先生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照这句话说来，可见先生承认：北伐是革命势力实行打倒军阀的意义。这种革命势力，谁都要说，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势力。中国国民革命，是各阶级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求他们的民族、政治、经济独立的一种革命。况在这种革命过程中，免不了要消除军阀这种障碍，要消除这种障碍，非有一种军事行动不可（即孙总理所说

的军政时期)。而先生为什么要说:"……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然则中国的民族革命的国民革命的政府出师北伐,是代表少数人利益而奋斗的吗?先生说:"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请问先生唯一无二的方法是什么?先生说:"再论到北伐军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先生在大作起始不是说:"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这层意思与那层意思,岂不是冲突了吗?然则还是一个人的军事行动吗?先生说:"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这怀疑之点,请先生告知我。

以上这几点疑问,我希望先生来函教责!

符琇鞠躬　八月四日于黄埔

独秀先生:

我向来很欢喜看《向导》,更喜欢读先生的论文,因为先生是一个中国《新青年》的领袖,尤其是提倡革命的一个健将,鼓吹革命潮流的角色,所以一般幼稚的革命青年,都承认先生是我们的良牧〔师〕,是我们的指南针,愿意服从先生的指挥,甘心领受先生的教训,以达到中国革命成功,世界革命成功的目的。

在一百六十一期的《向导》上,读了一篇先生的《论国民政府北伐》之后,我突然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想!翻来覆去,读了又读,到底不能使我明瞭先生的用意,最初我以为是反动分子冒先生的名,来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像〔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吗?后来我想都不是的,继而我又向善意方面想想先生恐北伐失败,摇动革命根据地,而反对北伐吗?何以不在北伐军未动员以前反对,而现在才发表这篇论文?先生恐怕农、工、平民,因筹备军饷而怀疑国民政府,或甚至……而进的忠告吗?我想这是国民政府乐于接受的;但就革命观点上,两党联合战线上,严重的北伐时期上看,先生何以不直接忠告,而偏偏要在北伐紧急,后方需

要绝对的安宁时公开的忠告呢？先生想变北伐为防御战争，以巩固革命根据地吗？先生何以不直接与北伐当局者商量，而要公开肆口攻击国民政府的政治状况上、实力上……如何的不配北伐，他的领袖们如何如何，对人民又如何如何呢？所以我始终想不到先生这篇文章的用意？

另外还有几个疑点撮出，均望先生指教！免得幼稚的革命的我起怀疑，因为革命的人，对任何事都要站在革命观点上去看，不是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的，更不是别人说"好"，就喊"好"，说"歹"，就叫"歹"的。如果有这种脑子简单的人在革命路上，是站不牢的，很容易做人家的傀儡；不然他就是一个投机主义，想升官发财，双方讨好的蝙蝠派。我说这种话，并非故意出口伤人，好出风头，实在是我眼光中所得来的。究竟这个眼光对不对，还要请先生赐教！

现在将我对先生《论国民政府北伐》中的疑点，写在下面：

（一）"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这一段含有国民政府北伐，并非因求北方民众解放而北伐，不是革命的军事行动，像军阀扩张地盘的北伐。先生你的论文，恐怕大错而特错了，简直没有认清国民政府北伐的意义，太冤枉北伐前线为民众而牺牲的将士们，太忽视在水深火热的北方民众的呼声了。先生！照你的眼光看起来，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北伐？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整个的国民政府的实力上，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战斗力和革命意识上要如何的北伐时期才算成熟？有什么标准？革命的经验与历史告诉我们，革命运动的力量，常常是不完备的，换句话说，即力量完备后才发生的革命运动，在历史上还没有看见过，只看见革命运动一起，民众响应，然后革命的力量，才渐渐的增大。先生这样空空洞洞的说革命下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鄙意不敢苟同，你说"四面围攻的国民政府"是不错的，国民政府既然站在危险的地位，如果不向外发展，那末连广东小部分，也要被人夺去了，国民政府比方是一堆火，四面的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是水，倘若火不蔓延、燃烧，势所必然的要被水扑灭了，先生是不是呢？

（二）"在第一点，他自然还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这一点，先生好像还没有把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关系弄清楚，军阀是帝国

主义的走狗，好像是帝国主义者用以杀我们的刀一样，我们现在努力消灭他杀我们的刀，还不算同他直接武装冲突吗？那末就好像说"杀人者非我也兵也"，一样的可笑！

（三）"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这一段原是先生的诚意，用一种打避疫针的预防法，激励与警告北伐将领，仅防瘟疫的传染，做一个纯粹革命的运动者。然而先生好像不应该在北伐期中发展这种容易使人误会的言论，并且容易给那反动派造谣惑众的机会。如果先生是好意，何以不用别种方法，勉励将士们呢？

（四）"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又"国民政府北伐之战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征钱粮，和抽收重捐"，又"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这一层意思很好，不过先生你要明白革命是牺牲少数人而谋多数被压迫民众利益的；当革命向外发展的时候，革命政府下的人民，应该尽一点义务，并不是长此下去的一种横征暴敛，不然何以使火坑里的同胞脱离此境呢？譬如有人淹在水中，如果不舍身去救，怎么捞得起呢？并且因增筹战费而及于平民，是事实上的要求，不得已而出此的。国民政府是为民众谋利益的，难道它还不愿意北伐与民众利益兼顾吗？先生已是唯物论者，何不设身处地的替国民政府想一想，而去学闭户读书的先生们，坐在书桌上唱高调，说风凉话，以骗民众欢心的惯技呢？

（五）"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又："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成国民革命。"这一种的策略是很对的，不过既在军阀统治下的民众，如何可以起来造成革命的势力，不但党部不能公开，而且稍一动作，即遭通缉捕杀的祸患，假

使北伐军不作他们的先锋，革命工作怎么能发达？所以就依先生的说法，此次北伐亦是民众急需的，何以先生说“现在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

以上五点，我终有些怀疑，更不明先生的用意何在。或者我思想不广，眼光不远，所以请先生赐教，祝你努力！

黄埔军校学生黄世见上

记者先生：

我是《向导》的一个爱读者，只要我在报上看见《向导》的出版要目，我就飞也似的跑去买一本；回来坐在书室里细读。不但细读，并且还和朋友们在一块共同讨论。有时也妄胆的下一两句批评！因为我认定《向导》是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独一无二的刊物，所以我们这些需要革命的青年，对它是当万分注意的！

在贵周刊一百六十一期上有独秀先生《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浅见的我看了之后，以为是深中肯綮的，可是我的朋友（他是国民党员）大不以我意为然！他说独秀此文含有挑拨性质，是来分散革命势力的。据他的理由是：

一、国民政府北伐，纯粹是要达到“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完成国民革命，在此一举！而独秀仅说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这是太小看了北伐的意义，而且蔑视我们国民党！二、独秀说国民政府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连唐生智也不如；这是等于向北方军阀告国民党监视下的国民政府的密，与陈炯明之反革命没有什么差异。三、从这篇文章里，看出共产党的领袖——独秀——好像认定蒋介石为一个变相的军阀，国民党的革命指导者，不过是些饭桶！

除此以外，他还说：“共产党是倚赖国民党才得发展的，独秀不满意国民党，实是自杀政策。”又说：“国民党是代表全民的，不能单独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广东农民困苦，负担太重，这是革命过程中，不能避免事实，若北伐成功，自然可以减轻他们的赋税。现在独秀如此的渺视北伐，简直是不愿意民众得到解放，尚谈什么革命！”

他的这些理论，我是很不满意的，而为了学识薄浅又不在党的原故，所以没法判断他的错否，只好写出来，请贵周刊记者，为我解释一下。此祝撰安！

冥飞九月五日于广州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

民国十五年，几乎年年有战争，大家厌恶战争，希望和平，这是当然的事。可是战争决不是仅仅由厌恶而可去的，和平也决不是仅仅由希望而可来的；必须经过几次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来去掉那无主义无社会目的之战争的源泉，然后战争可止而和平可期，否则终于混战而已。

现在的战争，是不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呢？我们可以坚决的肯定他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自从吴佩孚出兵讨赤护宪到国民政府北伐，这八个月以来的战争，不但国民政府、国民军方面有主义有社会目的，就是奉、直军方面在客观上也有他们的主义他们的社会目的，和以前个人的一党一系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确是不同。

这八个月以来的战争，在表面上固然也可以说是赤与反赤之战争，但更科学些即更实际些观察起来，乃是中国半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之战争。不但两方直接战争者其性质如此，即关系两方之社会势力，亦显然分成两大营寨如下表：

半封建派（反赤的）：	民主派（赤的）：
奉直军阀	国民党及国民政府
官僚	国民军
洋行买办	农民
大学教授	工人
地主土豪	学生
交通系	有政治觉悟的工商业家
安福系	中小商人
研究系	共产党
联治派	共产主义青年团
国家主义派	语丝派创造派等文学家
复辟派及新社会民主党	
老民党	
各种宗教徒	

这两派的营寨旗帜都很鲜明，其争斗亦日趋剧烈，很少有中立之余地；只有研究系一派人，还常常装出中立的态度，最近他们的张君劢，于吴淞政治大学开学日演说："目下时局，不论谁胜谁败，吾人殊无过问之必要。"其实，他们一向站在清室、袁世凯、段祺瑞、曹吴那边，拼命和民主派作对，吴佩孚、齐燮元之盛时，他们却大过问而特过问，张君劢曾亲身出力拥护曹宪，丁文江也做了孙家的官，他们的大将蒋方震，从去年为吴、孙奔走，一直到现在不曾停蹄。他们的机关报说："吴之力不足自救，东南以力分又不足以剪灭当前之大敌，虽有强援焉，而不可以为吾用……若其不幸而有所挫败……"（见九月二十日《时事新报》时论）曰"吾"曰"不幸"，这分明是站在吴、孙那边说话。他们的机关报又说："我并不相信，什么国民革命，而且我更不能承认国民革命可以完成。"（见九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时论，这篇论文起首却说："现在国民革命正举行之时，我们若是发国民革命没有成功的可能的话，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唆使，亦是反革命者的鬼蜮。"这几句自相矛盾的话，分明是痛骂他们自己。）

国民革命包含着民族革命民主革命两个意义，也就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这两个意义。他们既不相信有什么国民革命，更不能承认国民革命可以完成，那么他们主张怎样呢？难道他们主张向前社会革命，当然不会，当然他们是主张向后仍旧由帝国主义扶助中国的半封建势力统治中国。因此，我们把研究系也列在半封建派之内，总不至于不符事实罢！

现在分明是半封建和民主这两派势力的战争，所以能够肯定他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而不是无主义的个人的或一党一系的目的之战争。因为此次战争若仍旧是奉、直军阀的胜利，不用说中国仍旧脱不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之统治；胜利若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至少我们能够渐渐走上对外民族独立对内建设民主政治的道路，再至少我们总可以大大的发展走上这条道路的运动。一切半封建势力，都是中国民族走上这条道路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不搬开，中国永世不会有进步，所以我们坚决的毫不游移的现在要为这个目的而争斗，即一切民主派为实现民主政治对于半封建势力之争斗；这个争斗也就是此次八个月以来国民军、国民政府对奉、直战争之社会目的。

这个争斗在中国是一定需要的，本来不成问题，虽研究系的人也不

便公然否认；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争斗中，有没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和向右不及民主主义的倾向。

在前一问题，大半是不懂得共产党革命理论与政策的人之怀疑，或是有意造谣。最近研究系的机关报（九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时论）说国民革命成功必然发生两个问题：（一）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赤俄必定帮助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他的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业。研究系这班人，一向是替帝国主义军阀信口造谣来攻击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现在眼见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气昏了，更要失神的无端狂吠了！列宁党应该信奉列宁主义，主张彻底的民族自治，反对强大民族压制弱小民族，本是列宁主义要素之一，中国共产党若希图中国归苏俄统治，这简直是卖国党，而不是什么列宁党了。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最懂得历史各时代之革命的理论与政策的：他们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状况，现在还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我们敢说：在国民革命的争斗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分子一时浪漫的说话还右一点也难说。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他的发展影响到全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研究系这类人所要的资本主义——“不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只由半封建势力下之军阀官僚买办，结托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道威斯式的资本主

义”——相差甚大。

在后一问题，前表所列民主派的各社会成分，民主化的程度虽不齐一，而根本上都是站在民主的战线上和半封建势力争斗的。我们为稳固充实民主战线起见，不得不向正站在民主主义旗下和军阀血战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军，要求他们更高度的民主主义化：第一，他们应该在思想上抛弃仁爱、爱民、保民、救民这类论调；仁爱、爱民、保民、救民，这都是封建时代圣君贤相的所谓仁政，真正民主主义者，应该走到人民中去，引导人民自己奋斗，不应该高居人民之上、来爱他们保他们救他们！第二，他们应该在行动上抛弃封建时代军事专政的万恶制度，他们政权所及之地，务须使该地方政治尽可能的民主化；而且在事实上，贪官污吏是中国政治之致命伤，只有政治民主化可望救济，军事专政正是贪官污吏藏身之所。第三，他们政权所及之地，应该和农民合作，惩治贪官污吏、劣绅、地主、土豪，而不应放任贪官污吏及驻军勾结劣绅、地主、土豪蹂躏农民；因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中主要的广大民众，劣绅、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势力之真实基础。只有他们自身这样更高度的民主化，才能肃清民主派内部的封建余毒，才能稳固充实民主的战线，才能保证民主派的胜利。

研究系这班人，在表面上或不敢公然反对民主政治，实际是反对的。他们否认国民革命可以成功，否认国民会议可以召集，否认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学生会可以代表人民，一切都否认干净了，不看见他们于这些消极的否认之外，有什么积极的主张。他们积极的主张，不用说就是照旧由半封建的军阀统治中国，更好是由有两次战功、八省地盘的直系统治中国，最好是袁世凯复活来统治中国，好用他们来组织所谓“第一流内阁”。我们现在为打倒半封建势力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不但要用枪炮和半封建的军阀争斗，还要用笔舌和反民主主义的研究系这类政客争斗！

1926 年 9 月 25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二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丑哉和平运动！

和平是人人所希望的，真正的和平运动更是不应该反对的；可是奉直联军急攻国民军之时，吴佩孚对湘、粤大张挞伐之时，都无人出来运动和平，独当北伐军急攻武汉之时，南北巨绅都应时而出，主张和平，仿佛和平运动也算是北洋军阀一种武器，危急时也用得着。孙传芳只想保境安民时，上海和平运动之声大起，孙传芳想进兵攻取湘、鄂时，上海和平运动便沉寂，现在孙传芳军事失利，上海和平声浪又高起来了。月薪千元之孙传芳的高等顾问蒋伯器出来号召和平，几扎蹩脚绅商跟着他跑腿，这种和平运动，岂不丑哉！张一麐君老矣，何苦也出来跟着献丑！？

好一个有弊而却公道的治外法权！

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近在上海美国人招待会说："治外法权乃一种苟且之计，但此时实属必要之物，明知其弊，而实不能去之……因此权一去，公道被危。"平心而论，治外法权在中国人自然恶其有弊，在外国人自然觉得是必要之物而且公道，倘一旦这种"公道"被危，英国领事便不能在青岛护庇杀害德国人的凶犯，日本领事也不能在上海护庇打死陈阿堂的凶犯了。这种公道在帝国主义者欺凌中国人的作用上诚属必要之物，可恨赤俄竟不感觉其必要，竟在中国把这种"公道"抛弃不要，所以有些人痛恨苏俄起来反赤！

张宗昌的亲口供状

张宗昌对济南各界代表说："并闻党军实行共产共妻主义，不论公私房地，执行没收，各地稍有财产者，党军概强迫勒捐，或将全部财产，全数没收，归公之产，作三三四三股分派，以三成充党费，三成充战费，其余四成则入私囊，沿线所掳之妇女，悉遭奸淫，惨不忍闻；又其出兵之际，即印就中央银行钞币二万万张，强迫地方行使；现湖南至汉口一带，均强迫行使此项纸币，贻害人民，凡此种种惨无人道之罪恶，罄竹难书。"张宗昌这一篇谈话，若将其中"党军"改为"奉联军"，"中央银行钞币"改为"军用票"，湖南至汉口一带改为济南至张家口一带，再加枪杀新闻记者一项，便是张宗昌的亲口供状。

国家主义者那里去了？

万县最大屠杀事件出来以后，全国悲愤，无论新旧党派，都一致奔走号召，反对英帝国主义之横暴，独有一向自称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者，不知道那里去了？国家主义者的大首领多半是四川人，现在强权屠杀到他们的家乡了，他们再不出来抗一抗，他们的血也未免太冷了！

1926年9月25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二期 署名：实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历来是把中国人当做未开化的蛮族看待，动辄开炮轰击，以快其意，以遂其欲求，以为无论有理无理先打死他们几个再说，他们最怕的是大炮，大炮打死了他们，我们便有了理了，他们的酋长也就屈服了。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这样的态度，简直与对待非洲和南洋各处未开化的蛮人生番一样，对待半开化民族都不至如此。

自鸦片战争到万县屠杀，英国这种炮舰政策，便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代表态度。

万县屠杀之起因，是由于最近英轮在川江一连任意撞沉了中国官船七只，淹死的军官、兵士前后共计七十七人，杨森派兵一队向英轮交涉，反被英轮缴械，杨森遂将英轮二只扣留。英国帝国主义者是怎样办法呢？他是不曾和杨森交涉，而马上采用炮舰政策，开炮轰击万县城。其结果怎样呢？英国人自己的机关报《字林报》说："维勤号专击华军之炮及沿江兵士，考克却菲号则以大炮轰城。……第一弹即将其司令部完全击毁，闻共发弹三十九枚，或云五十六枚，全城起火……城中火光烛天，终夜不熄。……万县民兵共死五千……该城大部分已破坏。"这是何等无理由的大屠杀！

即依据帝国主义者所视为神圣不许侵犯的不平等条约，试问何约何条，载明英国兵舰在非宣战时亦得有任意开炮轰击中国军民之特权呢？英国人这样横暴不法的炮舰政策，不是对待蛮族生番的态度是什么？

路透社九月二十八日伦敦电："保守党洛克问在华英国兵力足以充分保护英人利益否？首相答称，刻已在途之接应兵力，计飞机、运送舰一艘及驱逐舰九艘，连同现已在华之兵力，可视为舰队力充足。"以此可

见英国人对华炮舰政策，现在仍是有进无已。

同时，英国人在上海号召的什么“自由保障会”，在各报上大登其启事说：“本会专事联合各国人民反对第三国际之学理及共产政策之宣传，增进各国各阶级之合作心，维护原有良好之教化思想言论之自由。”他们正在宣传这些德意，万县大屠杀，却好把他们这些德意证实了；考克却菲号准对着万县市民所发的大炮炮弹五十六枚，才真是自由之保障哩！难道杨森及万县市民也和第三国际学理共产政策有什么关系么？

英国帝国主义者既然始终以炮舰政策对待我们“未开化”的中国人，我们未开化的人，只有自己尽可能的力量，用“未开化”的手段回答他们，切勿希望什么政府交涉可以解决这样的血腥问题；因为无论北京政府或四川政府，都是在英国奴才、直隶军阀势力支配之下啊！

1926 年 10 月 10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三、一七四期合刊　署名：独秀



我们现在怎样争斗？

醉梦他自己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吴佩孚，已由武汉而败退到郑州，只落得奉张击掌称快和孙传芳乘机出头。现时在吴佩孚名义之下的部队，虽号称尚有十万，然不独战斗力薄弱，而且各自欲觅得地盘，不能为吴佩孚反攻武汉而战了。其中由国民二军由靖国军改编的部分，还要乘机倒吴，吴佩孚的势力是要根本消灭的了。

继起的孙传芳是否能以成功，全看他在鄂、赣边界和北伐军战争之胜败和奉军是否乘机南下夺取苏、皖。

奉军尤其是张宗昌军，急欲以援吴名义扩张地盘，以安插其有功将领；然为吴佩孚、孙传芳阳求援助阴拒其派兵南下所阻，现时只得且用全力经营直、鲁及热、察二特区，将来再观变而动。

孙传芳若在鄂、赣得到胜利，则奉据北方，孙占长江，国民政府仅保有南方，直系军阀势力倒了一个吴佩孚，又起来一个孙传芳，中国政治将更陷入混沌局面。孙传芳军若在鄂、赣失败，则直系势力全灭（靳云鹗在河南，四面受敌，非依奉必依国，即表面上勉强存在，亦不能自成一派独立的军阀势力），奉鲁军迟早必南窥苏、皖，这时便会形成国、奉南北对峙的局面。

如果到了国、奉南北对峙的局面，中国的政局，将由混沌而转入活泼，或者由军事争斗暂时转入政治争斗；然而是否真能如陶孟和先生所希望“由战争到政治”呢？当然还不能。要真能由战争到政治，至少必待奉军退出关外。因为军阀势力未消灭，在民主派统一政权代替军阀的军事专政以前，国内战争是不会停止的。

因此，我们要真能由战争到政治，要真能得到和平，便应该懂得现在及最近的将来要怎样争斗了，怎样为到政治到和平而争斗：

第一步是要消灭孙传芳势力；

第二步是要消灭奉张势力。

这两个军阀势力是目前中国半封建势力之代表,消灭了他们,才能够停止内战,才能够使战争到政治,才能够得到和平,才能够走上民主政治的路,才能够使中国历史由半封建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全国革命的民众及接近民众的军队,应该一致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广东、湖南、湖北这些省分的民众,应该努力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权,努力助北伐军击破孙传芳侵入湖北、江西的军队。东南各省民众,应该尽可能的力量驱走孙传芳的驻防军,为实现地方自治政府而争斗,至少农民、商民不应该再以纳税出捐形式帮助孙传芳做扩张地盘的军饷了;知识界、言论界不应该再以中立态度助长孙传芳的野心,更应该起来揭破奉、直军阀以讨赤来欺骗人民的假面具。尤其是东三省的民众,应该尽可能的力量阻止奉军南下援助吴佩孚与孙传芳,更进而在军事上在财政上,摇动奉系军阀统治的基础,一直到武装响应国民政府和国民军讨奉战争。西北各省民众,应该与国民军合作,肃清吴佩孚在陕、甘的残余势力,更进而援助国民军向奉军反攻。

国民政府眼前的紧急争斗,自然是击退孙传芳之进攻,非此不能保持此次北伐已得的胜利。同时,对孙传芳战争一有结束,国民政府对于所统治的省分尤其是广东,即须尽可能的力图民主政治之建设,力助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尽力来肃清境内的半封建势力,如贪官污吏、劣绅、地主、土豪、工贼等,如此才能充实南方民主派的实力,继续北伐,完成民主革命的争斗。

国民军欲图向奉军反攻,必先尽力与民众尤其是农民合作,以巩固其在陕、甘的政权。特别是对于西北各省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碍其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的民主革命争斗,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妨害此争斗。

现时中国的政治争斗,是民主主义胜利呢,还是半封建的军阀胜利,这要看我们是怎样争斗和争斗的努力至何程度了。现在确是中国历史之一重大时期!

1926 年 10 月 12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五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孙传芳章炳麟的双簧

章炳麟劝孙传芳讨蒋的支电，不但高叫“迫切陈词，为国呼吁，为民请命”。并且责备孙传芳不应“宴安江左，偷引岁时”。其实这道将近一千字的电报，乃是孙传芳特别拿出一千块大龙洋，叫章炳麟如此这般的。这岂不是他俩在那里唱演双簧吗？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

章炳麟今夏在苏州什么平旦学社讲学说：“文学当重气节，明末清初顾亭林先生之文学，为后世所推崇，亦以其气节耳，后人文章成〔诚〕能及之，而节操品概，往往不逮远甚。即如古人扬雄、韩愈，其文章虽好，而一则崇拜王莽，为当时帝王所雇用，志气消沉，一则重视富贵利禄，乞怜求援，廉耻丧失，气节皆不高超也。”我想听了他这段话的人，不浑身肉麻，便误以为是他自己痛责自己。以一个同盟会会员，首先向张之洞乞怜求援，乞怜不成，又派何震(刘申叔之妻)到端方处运动投降，首先通电说统治中国非项城不可，称孙、黄为小丑，章炳麟的气节安在？王莽比袁世凯总算略识诗书，而且扬雄在王莽朝，也并未曾象章炳麟荣任筹边使大摆勋章那样出丑：韩愈固然上书宰相不忘利禄，然而当时的宰相，也还不象现在的什么镇威孚威这样作恶，韩愈更未曾象章炳麟为区区一千元替孙传芳摇旗呐喊，且称孙传芳为神武这样的“廉耻丧失”！

以党治国与军事专政

现在治英国的是保守党，治意大利的是法西斯党，治美国的是共和党，凡非以君治国的国家，都是以党治国，本来一点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说以党治国是孙中山先生的新发明，或以此非难他，都算缺乏常识。现是〔在〕的中国，既非以君治国，又非以党治国，乃是以军治国；中山先生以为这样不好，所以主张也要和别国一样以党治国，换句话说，就是以政党政治来代替军事专政。我们以为凡是反对军事专政的人，便应该赞成以党治国；同时，主张以党治国的人，也不应该仍旧留恋军事专政！

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在反赤军势力下之北京国立各大学，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学希望；同时，胡适之由赤俄写信给北京一班主张“仇赤友白”的朋友说：“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如此看来，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章炳麟和康有为的财运不齐

章炳麟辛辛苦苦为孙传芳做了一篇洋洋千言的讨蒋电报，只到手一千块钱；同时，康有为到山东、天津、奉天走了一趟，“南返程仪万金五千不等”(见《时事新报》九月念九日北京电)。章炳麟得毋羡煞妒煞！

好个中国和平之奥秘！

教会办的《时兆月报》上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凡掌权

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段话非常智慧，乃由伟大的上帝所说。中国和平之奥秘包括其中。今中国若遵行此话，国中就有和平，倘轻视之，就必兴起骚乱纷争。”（见该报本年七月号斐以文做的《中国可享和平么》一文中）青年们注意呵！照基督教的教义，中国若要享和平，只有遵行上帝的话，服顺所有中外掌权的人，惧怕他，恭敬他，切不可再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了！

“反国民革命者”的民权呼声

民权是我们应该主张的，摧残言论是我们应该反对的，可是我们却不赞成反革命者可以拿民权与言论自由做护身盾牌。研究系一班人对于民权与言论自由的观念，完全和我们相反：反动的北京《晨报》被毁时，他们大叫民权与言论自由被损害了，到了奉、直蹂躏北京报界，他们却一声不响，还仍旧附和奉军反赤；最近孙传芳封闭上海国民通信社，逮捕记者，他们是不响一声，同时对于国民政府禁售反对革命的报纸，则大呼民权与言论自由：照他们这样的态度，仿佛民权与言论自由仅仅只有给反革命运动做盾牌的单纯意义，似乎不甚妥当吧！

所以我们对于此次广州禁售报纸的态度是：不根本责备他们这是摧残民权与言论自由，而是希望他们将所禁的报纸再审查一下，那些是反对革命的（如“宁愿为反国民革命者”的《时事新报》之类），那些不是反对革命的（如《独立青年》之类），应该分别看待。像《新申报》分明是孙传芳的机关报，《新闻报》一向为陈炯明鼓吹，现在又在为吴佩孚出力，《顺天时报》更不用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上海的《独立报》、《正论报》和香港的《讨赤报》，都是英帝国主义出钱办的，都天天大捧其张雨帅、吴玉帅、孙馨帅，民权与言论自由若为此等报纸而设，试问民权与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价值？

1926 年 10 月 12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五期 署名：实

给各级党部的信[①]

——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

各级党部负责同志们：

我们现在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够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质量上的增加。我们必须懂得"数量上的增加可以改变质量"这一原理；我们更须懂得质量上的增加，大部分是靠在群众的实际活动中学习与训练，不是单靠书本上和党校中可以收效的。我们万分不应该把许多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关在门外，使这些革命分子没有机会得到党的直接训练，而徘徊歧路，以致走到别的党里去。并且这些革命的工人农民党员之增加，正是使党革命化，正是增加质量之一种方法，一种重要的方法。

尤其是北伐军和国民军所到的地方，一般民众的革命潮流更高涨起来，我们党的各级党部若仍然被研究小团体的旧观念所拘囚，而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

因此我提议：我们的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C. Y.应该照此数目加一倍)。我并且以为在事实上各地党员发展到下列数目(新旧党员全数)，或者不是空想：

地　　域	党员数目	社会成分
江浙区	七〇〇〇	工人及智识者
粤区(两广)	一〇〇〇〇	农民及工人
湘区	七〇〇〇	农民及工人
鄂区	四〇〇〇	农民及工人
北方(直晋三特区)	三〇〇〇	工人农民及智识者

① 原标题为《独秀同志给各级党部的信》。

山东	一〇〇〇	工人农民
河南	一〇〇〇	农民工人
陕甘[①]	二〇〇〇	农民及智识者
四川	二五〇〇	农民及手工工人
江西	二〇〇〇	农民及手工工人
安徽	五〇〇	智识者及农民
福建	五〇〇	农民及智识者
东三省	五〇〇	工人农民
云贵	二〇〇	智识者及农民

我们的党，自然以工农党员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汉、津唐、香港四个工业区及山东、湖南矿工各省路工外，别处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产业工人实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陕西、江西这些省份，都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去！"

以上我的提议，希望各地各级党部负责同志都能够经过很诚意的考虑而采纳，切勿冷淡的嘲笑我这是一个空想！

请接受革命的敬礼！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选自《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

---

① 《中学校刊》第十五期刊载的这个文件中"陕甘"为"陕西"。

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

在辛亥革命军发难之日，民党军队第二次占领辛亥革命发难地的武昌，同时在江西方面，也有击败孙传芳之可能，不久国民政府北伐军事或者能有一小结束。刚在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和各省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这会议是有重要意义的。

以前有许多人看广东不过是一些乱党或者是一些赤化党在那里胡闹，好在远在化外的大岭以南，无关大局；现在却不然了，不但吴佩孚的势力被他打碎了，孙传芳若从九江败退，则福建、四川、云南都绝了北向之路，如此则国民政府已占有半个中国，他的战后设施，全中国人甚至于全世界人都不得不改变以前的态度加以注意了。

据我们所得的消息，此次国民党会议的重要议程是：（一）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地点；（二）召集国民会议；（三）省政府之组织，省民县民会议，省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四）省政府与省党部之关系；（五）新的政纲。

此次国民党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来讨论，已经可以证明国民党有异常的进步。国民党前此两次全国大会，虽然议决了一些政治原则，此次的议程更具体化了。此次会议将如何决定这些具体问题，这是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人们，都急欲知道的。

我们一向是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此时期中的希望更为迫切，因为现在是全国人开始认识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时期。

此次国民党会议议程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五）议题"新的政纲"，因为第一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政纲还抽象一点，其性质似乎是党纲，现在应该根据前定的政纲，更具体的规定出来对于各方面目前的实施政策。例如，根据民族平等及经济发展的原则，决定关税政策和对那几国的外交态度，对于国内战争及和平与夫对于其他军队之态度，对于财政应如何将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中那些急需而且可能的办法决定实施，如

何完成粤汉铁路及建筑海港以发展工商业，确定教育经费及优待小学教员的具体办法，这些都是此次新的政纲中所必须注意的。关于民众利益之保障，尤其是此次新的政纲之生命，第二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商民运动决议案中之具体办法各条，都应该尽量采入此新政纲；并且关于工人最低工资之利益，应该更具体的指明由政府和工会合组一委员会于一定期限内制定，关于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应该更具体的指明由国民政府通令所属各省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关于农民政治的丙项，应改为解散压迫农民之"军队及民团"，经济的甲项，应改为严禁对于农民之高利贷超过若干以上；关于商民应增加二项：一是以海陆军保护水陆商业、交通及禁止各铁路因军事阻碍商业运输，一是修正商会法，使各业真正商人无限期的都能参加商会组织，而不为少数洋行买办所把持。此次新政纲更应该珍重声明：国民政府的基础是建筑在民众势力之上，而非建筑在军事势力之上；因为这是中国由半封建的军事专政到革命的民主政治之唯一标识。

(二)(三)两议题，算是新的政纲问题：召集国民会议之地点与时间，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最重要的是计划如何即刻在各地发展国民会议的民众运动，免得将来成一空洞会议；其次便是决定国民会议之目的，应该是民众尽量发表怎样减轻十五年来的痛苦，怎样改正关税制度，怎样解除筹还外债，以解除全民族的枷锁；至于全国政治组织和宪法问题，还不是军阀未完全倾覆以前第一次国民会议所急需讨论的议题，所可决定的只是国民会议本身代替国会制度的问题；以省民会议代替省议会，县民会议代替县议会，也应该有同样的决定。省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应该根据第一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政纲对内政策第一条，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军政财政，都应该划分权限，不可采用割据的联省自治，也不可采用无限制的中央集权制。

全国人都开始重视国民党、国民政府了，此次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应该产生一个适合目前中国初步改造所需要的政纲，而且马上就能够实施这一新政纲，使全国各阶级的民众都认识国民党、国民政府究竟是什么！

1926年10月19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讨赤特捐

上海《新闻报》十月九日济南电："讨赤特捐已开征，丁银一两征四元二角，漕米一石征八元。"可怜被苛捐杂税逼得难以活命的山东人民，尤其是农民，现在又加上这种特捐，他们不得不感谢反赤运动了！

高叫拥护国旗的是些什么人？

中华民国果然由辛亥革命而成立了吗？实质上当然没有这么一回事，自孙中山辞总统职一直到现在，只有中华袁国、中华段国、中华直奉国，而没有中华民国。既然还没有中华民国，那里还有什么中华民国国旗？议决什么中华民国国旗的什么国会，自从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一直到贿选，只是北洋军阀的御用机关，那里是什么中华民国国会？因此盲目的拥护什么中华民国国旗，而忘记了中华民国，已经是买椟还珠；而高叫拥护国旗的人们，又是一班从前拥护龙旗的保皇党后身研究系和孙传芳国都里的几个顺民，怎不令人齿冷！

丁文江与爱国行动

以丁文江博士统治之理想的大上海，竟因为讨论万县惨案逮捕各团体代表、封闭学生总会，还行文来法租界拿人！丁博士的代表詹科长对学生会代表说："此次被捕代表，实系纯粹爱国行动，惟值兹地方多事

之秋，自当特别从轻办理。”然而警察厅厅长却对商人表示对被捕各代表，他本愿意轻办，只以丁总办主张严办，故一时未便释放。哈哈！好一个鼎鼎大名的丁博士，对外人则主张“友谊的磋商”，对爱国行动则主张“严办”！“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呜呼博士做官！

傅筱庵的和平运动

孙传芳的子民傅筱庵，一面拿招商局轮船替孙传芳运兵，一面拿上海总商会名义通电主张和平，像他这样的和平运动还有什么意义？然而有一个重要意义：总商会发一次主张和平电，便是声明孙传芳打了一次败战。

国家主义者曾琦与万县惨案

对于万县惨案，有些军阀都表示愤恨，独有所谓国家主义者置之不闻不问。上海学生会邀请国家主义者大首领曾琦，参加各团体讨论万县惨案会议，曾琦回答道：“这是共产党的运动，我们不参加。”因此，上海四川同乡会大不满意，宣布削除曾琦的四川省籍，大概这位曾琦先生是主张国家主义而反对乡土主义吧！

那里有中华民国？

张一麐说现在国民党革命北伐是革民国之命，试问现在是不是民国？本来自袁世凯以来，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已被北洋军阀负之而趋，现在国民党起兵讨伐这班北洋军阀，所以袁世凯的幕客张一麐便大呼是革民国之命，所以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也站起来大呼拥护北洋派的国旗。孙传芳复孙洪伊的信也说：“民国既已告成，已无再谈革命之

理。”那里有民国？北洋军阀就是民国，孙传芳也是北洋军阀之一，他当然要反革命，我想张一麐还可以帮孙传芳解释说：你们革我北洋派之命，就是革民国之命。

避开革命的新方法

《时事新报》上张水淇先生论中国人口问题，说人口过多是“盗贼繁多内乱频仍之根本原因”。这种见解乃似是而实非。中国的经济命脉倘不操诸外国帝国主义之手，内部倘没有军阀扰乱摧残农、工、商业，以中国的土地产业养中国人，一时那里会有什么人口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中国人口问题，不是什么人口过多，乃是人口和生产力不相称；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之中国，生产力实无由发展，所以中国盗贼繁多内乱频仍之根本原因，乃是军阀扰乱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人口过多。欲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道路；然而一班愚懦的人总想避开这道路，主张什么不合作主义，什么教育救国，什么重农救国，什么道德救国，什么基督教救国等等；现在又有人想出什么解决人口的法子来了，这班先生们想避开革命的方法真多哩！

1926年10月19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六期 署名：实



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①

关于 K. M. T. 问题，第一要提出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是不是过去了？有些外国同志颇有此见解，中国同志中亦有人以为中国国民革命已经成功或快要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快就到来了。这种见解明明不对。因为中国三分之二地方还是在直系奉系军阀统治之下。从国际关系说，还是半殖民地；在政治上，连广东国民政府亦不得不带些半殖民地的妥协性；在经济上，全国金融财政海关交通机关及大的工业（尤其是煤铁），都还在帝国主义宰制之下；所以说中国国民革命已过去或快完了，那是不对的，只能说是才开始。假定我们见解是对的，中国还需要民族革命，可是第二个问题便是〈是〉否需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有些同志以为这个民族革命也可以由 C. P. 来做，不一定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说这样话的人，表面上虽然很左，但实际上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一是因为若没有个民族革命的党，我们便不能直接拿住城市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并且不能够完全拿住农民；二是因为 C. P. 的政权在现时世界政况上不能够站得住（最近日本清浦子爵即曾经问北京民党政委广东是否 C. P. 政府）。所以现时还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再有一种见解是承认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但是否要在 K. M. T. 之外另造一个民族党？本党许多同志在过去都有此意见。现在看起来，这个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须懂得全中国社会情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能力，都在一条水平线上下相差无几，不要这个 K. M. T. 再造一个 K. M. T.，仍旧是半斤等于八两，并且还没有现在的 K. M. T. 有很长的革命历史。在实际经验上，我们看见许多人有此另〈组〉新党的企图，但皆不能成功。如新中国

---

① 本文原标题为《C 同志关于 K. M. T. 问题报告》。根据 1926 年 12 月 5 日中央局报告在引用该文一段话时的说明判断，这是 1926 年 11 月 4 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党及国家主义派，均有企图在 K. M. T. 之外组织一个民族党的野心，然一已完全失败，一已渐渐衰落下去。所以从理论上与事实上观察，要另组一民族革命的党皆不可能。

现时中国社会情形，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党不容易有第二个，连大资产阶级的党亦不易发生。因买办阶级的力量还很大而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 K. M. T. 来。尤其是北伐军胜利后，资产阶级更倾向 K. M. T.，只有买办阶级仍旧留在研究和交通系内。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民族革命只要一个民族党，因为 C. P. 参加现在的民族革命是显然的事实，我们也不是说除 K. M. T. 外不应有第二个民族党，我们是说现在中国只有 K. M. T. 是个民族革命的党，并且事实上很难发生第二个民族党。

照以上的分柝〔析〕，我们可以肯定说：现时中国还是民族革命时代，在这时代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和我们合作，K. M. T. 乃是现时中国的唯一民族党。K. M. T. 的内容是怎样呢？其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在第一次大会改组时，分开左右两派，当时之右派冯自由、马素等，代表地主买办军阀，反对共产分子加入，反对 K. M. T. 改组，现时这部份右派已出了 K. M. T.。第二次大会前后，发生了新的右派，即戴蒋等。此右派与左派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若资产阶级加入 K. M. T.，则右派将更强壮起来。惟现时他的力量，并不及老右派大，仅恃蒋的武力强握党权与政权。此新右派确是反对老右派的，这一右派势将日愈向前发展（中国资产阶级要发展，代表他的 K. M. T. 右派也要发展），即或他的领袖将来不是戴或蒋。

左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现时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已出去的右派代表买办地主军阀，大致我们可以这样说，并非我们附会。在此状况下我党很明白的还应该留在 K. M. T. 中，与左派结密切联盟，才能够帮助左派阻止老右派思想及势力之侵入，并阻止新右派右倾妥协。去年今年两次扩大会的政策，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对的。

自三月二十事变以来，因由左派分出戴蒋形成新右派，汪又走了，其余左派领袖都表现十分摇动。于是粤区有些同志遂怀疑K. M. T.，怀疑 K. M. T. 能不能革命？K. M. T. 是否站得住？我党对K. M. T. 的

政策是不是对的?

不仅广东,北方区有些同志也有此思想。竟有人以为 K. M. T. 不革命了,还是要 C. P. 来。事实上有许多也足以使我们怀疑。三月二十日后,左派几乎粉碎了,无论何事,左派均先问 C. P. 意见,C. P. 不表示,便不敢做。就是此次 K. M. T. 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还几乎是 C. P. 包办,C. P. 不包他们便无法办。以上是广东情形。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 C. P. 包办,左派领袖柳亚子,我们费了多少气力去助他,他仍不肯出来负责,一切工作皆是 C. P. 办。这种现象,使得上海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 C. P. 支配的上总合作,而觉 K. M. T. 没有什么用;广东的资产阶级,也有时对 C. P. 比 K. M. T. 更为重视。在北京方面,K. M. T. 工作,无论左派右派均极消沉,所有工作皆守常同志在那里提调,几乎 K. M. T. 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会,C. P. 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左倾者百分之十余,中立者百分之二十余,右派百分之十余,湘区初取放任态度,一切议案,都让左派自己起草,一是免得说我们包办,二是借以考察左派的能力与理论。但开会一星期后,议论纷纭,无一点成绩,C. P. 分子不得不出而〔面〕包办,其结果,议决案及选举均依照我们的意见通过。当大会初开时,我们同志很少说话,对于小问题,同志间发表的意见故有出入,右派以为 C. P. 也不一致,但到最后议案通过及选举结果完全照我们的预计实现,于是各派都对 C. P. 的组织一面惊赞,一面发生恐怖。

戴季陶近来的意见是,K. M. T. 不行了,革命还是 C. P. ;谭延闿及其部下说 K. M. T. 没有力量,还是 C. P. 力量大;唐生智也有同样的意见。

我举出这些事实,并非是证明 K. M. T. 已无用而须 C. P. 单独来革命;这些事实只可证明两件事:(1)C. P. 与左派联盟是可以的;(2)左派虽不愿意我们包办,还是需要我们帮助与领导,这个责任,还是我们一时不能放弃的。我们若是放弃这个责任,甚至于退出 K. M. T. ,便是完全让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结合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来领导革命。

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 K. M. T. 中究竟有没有左派存在可

以做和我们联盟的对象？我们可以肯定说是有的。不但 K. M. T. 中和 K. M. T. 外，都有左派的极大群众，并且左派的组织已在日益发展之途中。单看广州的事实：(一)黄埔军校中，自我们同志一百六十余人退出后，左派学生在我们指导之下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发展到广大①中去，又企图扩大到全国；他的政纲是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二)民中农民部长甘乃光，已着手做广东及全国农运，常找左派青年秘密开会，又著一小册子，企图造成左派的理论，说 K. M. T. 当以农民为基础，其书闻已销行至五万部。粤区同志已注意这许多事实，已来信说："我们相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一定有一个左派领导这个运动。"已承认中〈央〉指示"我们不要包办革命，要帮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住。"这个原则是对的。惟粤区同志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实际问题，即是：我们怎样帮助左派及我们帮助怎样的一个左派？粤区同志的答复是要有一个左派的政纲，依据这个政纲，发展各地方群众的左派党部和群众的人民联合会，使 C. P. 和左派群众间有一正确关系，以推进革命，而不在帮助几个左派领袖。粤区同志说："我们用不着多说领袖，因为我们对付领袖，帮助他们，没有多大困难。"这个意见一半是不对的。我们帮助左派，不用说第一重要是要拿左派群众充实其党部；可是如果忽视了左派领袖问题，丢开了领袖，使领袖仍旧和群众隔离着，也是一个错误。无群众的领袖固然无用，无领袖的群众又何能成为有组织的争斗？群众的趋向固然能够影响领袖，而领袖的趋向影响全党也非常之大，任何阶级的政党都是这样。K. M. T. 左派领袖还很复杂与动摇，我们对付他们帮助他〈们〉还时时感觉困难，我们对付他们帮助他们的策略不适当，致促成三月二十日事变，便是很明显的一例。现时 K. M. T. 左派有三个缺点：第一是左派没有具体的政纲；第二是左派领袖无中心人物；第三是左派领袖与群众隔离。我们要帮助左派的就是这三件事：使左派有政纲；使左派领袖有中心人物；使左派领袖有群众。粤区同志何以这样只注意左派群众而忽视左派领袖？在他们的历年报告

---

① 广大指广东大学，1926 年 10 月，为纪念孙中山改称中山大学。

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他们以为若说 K. M. T. 有左派，那么只有左派群众，而没有左派领袖，那左派领袖的思想与行动时常动摇，很少靠得住，实无所谓左派。粤区同志听见汪精卫曾说："农民若只顾阶级争斗，我们便不要他们。"又听见廖仲恺曾说："广宁事件是农会的人受了老鲍及 C. P. 影响。"又看见戴季陶蒋介石丁惟汾都变成了新右派，连顾孟余也说农民协会里有土匪，连甘乃光对花县惨案也不曾在政治会议为花县农民说句话。这些事实使粤区同志怀疑 K. M. T. 真有什么左派，他们说："K. M. T. 左派还是知道自己利益紧要些。"又说："K. M. T. 左派利用农民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已经达到目的，所以自然而然要忽视农运了。"我们若因此忽视了 K. M. T. 左派领袖，说他们不是真正左派，这个见解非常危险。粤区同志主张"我们 C. P. 与左派的群众间应当有怎样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对的，然不可因此遂怀疑除群众外真没有所谓左派领袖。新的左派领袖未产出以前，在我们和 K. M. T. 合作的关系上，对于现在的左派领袖是不可忽视的。粤区同志怀疑 K. M. T. 左派领袖，其错误是在对左派估价太高，几与 C. P. 无甚分别。K. M. T. 左派和右派及 C. P. 之不同，是右派摧残农工利益，C. P. 为工农的利益奋斗；而左派则利用工农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奋斗。我们若以C. P. 的观点视 K. M. T. 左派，责他们也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则中国便不必有 C. P. 存在，同时 K. M. T. 左派也只好变成一个工农党，无法吸收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只能在革命联合的需要上赞助工农而决不能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

我们也知道中国国民革命有相当的成功，政权若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对于工人的要求如减时加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他们和我们的政纲或者没有多大冲突；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因为我们不能因为维持和左派联盟而失去农民。这时候世界的革命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新时期，中国的政党也许有新的阶级分化。这个也许是较远将来的事，在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在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困斗中，我们和 K. M. T. 左派联盟关系愈持久

些，便于中国革命愈有利些。因此，我们和K. M. T.左派关系，不是降低我们的农民政纲以图维持此联盟，而是要确定我们的农民政纲，在主观上尤其是在客观上努力影响推进K. M. T.左派，使此联盟不至〔致〕因彼此农民政纲相差太远，而促成过早的分裂，虽然彼此在农运的立脚地不能相同。

现在我的结论是：据最近的经验，我们现在对K. M. T.政策，和上二次扩大会议所决定的并不须有什么改变；惟足唤起我们的注意者，乃是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我们须有一适合农民需要的农民政纲；我们并须拿我们的农民政纲影响K. M. T.左派，尤其要拿广大的农民群众充实左派的力量，推进左派，使他们的领袖也不得不采用有利于农民的政纲，以避免我们和K. M. T.左派联盟因农民问题而分裂。

1926年11月4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

“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只要不是希望吴佩孚、张作霖长久统治中国的人，都应该表同情于这件事。因为这件事至少可以使张作霖不能够专力对付南方的北伐军。

研究系一派人，他们虽然现在还不曾公然逢迎张作霖，他们传统的思想，总以为中国应该永远归北洋派统治，由袁而段而徐而曹、吴，他们都继续拥戴，曹、吴败了，他们便来拥戴孙传芳，孙传芳若再失败，不知他们将于北洋派中拥出谁来？或者也只得去就合张作霖。冯玉祥虽然也是北洋派中分裂出来的，可是他忽然亲近了孙中山，并且亲近了苏俄，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当然要咒骂冯玉祥。

不懂得军阀定义的人们(如国家主义派)，竟把冯玉祥、蒋介石看做和张作霖、吴佩孚同样是军阀，象这样故意混乱是非，真是暗中帮助了张作霖、吴佩孚。

军阀们大喊冯玉祥倒戈是破坏道德信义；有些无聊的小新闻记者，也附和军阀，以倒戈团团长、倒戈学校校长嘲笑冯玉祥。其实，民国倒戈之作俑者是段祺瑞等向清室倒戈和吴佩孚向段祺瑞倒戈，冯玉祥算不得是倒戈团团长或倒戈学校校长；并且这几次倒戈只是破坏了封建社会的道德信义，在民主政治之过程上都有很大的意义。胡适之说：“冯玉祥之对曹、吴倒戈，放开眼界通观前后二十年全部历史，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此见实不同凡俗。

京津一带商民对冯军是怎样感想呢？有一部分接近奉、直军阀的商人说：冯军是有纪律不扰害人民，只可惜要共产公妻不好。一般商民并未看见共产公妻的事实，他们只看见赤军不曾扰民而反赤军却是烧杀淫掳这些事实，遂不禁发生希望赤军再来的心理。本年七月四日上海《申报》所载北京归客谈，有一段话可以代表当时人民对于赤军与反

赤之感想，兹照录于下：

试从西直门至清华学校，吾人常往来之路，举目四顾，只见有兵，不见一老百姓，自校入城，在西四牌楼以西，尚无开门之店铺，其在前门一带，则十家内至少有七家停市闭门。初时瑞蚨祥等，恃与八太爷多为乡亲，开门敷衍，数日而后，亦停市矣。凡绸缎店、金银店、粮食店，以及出售贵重品日用品者，莫不首先停市。一日余往前门买夏布，店夥答称对不住，铁路不通，来货没有，请改日光顾。余初信之，余妻住京久，恃与熟识，明日往买，则慨然出售，诘之，则称实不相瞒，八太爷手持军用票，决不敢请教也。八太爷程度日高，往往另串一人入店，选货既毕，则八太爷昂然直入，非纳军用票不可；有时串得一大家装束之妇女入店，必以为与八太爷无关系矣，选货既毕，而八太爷忽入，诈为护兵，口称：太太，货选好没有，强纳军用票于柜，挟此大家妇女，携货以去。又有一次，确是一大家妇女，选货既毕，出现金，将交柜，八太爷直入，谓此间无须现金，吾代汝纳军用票足矣，即取该妇手中现金，昂然遂去，如此行径，店铺非不欲营业，实觉少做一笔生意，少蚀一笔本钱。

军用票有数量之限制乎？曰无有也。苟有限制，商会等机关尚可为之设法，今则无底之橐，谁肯填之？初时尚有电车、电话、电灯等公共机关可以使用，今则肯收者日少，尤可恨者，崇文门税关，明为搭用，实则提高税率，使等于军用票短折之数，如军用票对折，则税率提高一倍，诘以何以与天津税单定额不同，则称吾那里管得。过天津，则租界以外商民之苦痛，一如北京，更强向屋户或铺户，加征房捐三个月，不足更加收房租两个月，其系自有之屋，则为之估价，令人痛恨上海何丰林之作俑于前，遂成军阀搜括民财之惯例也。纳房租房捐于官，却不许还搭军用票，某商人语余，简直是要我们性命。京、津老百姓，莫不想念国民第一军之纪律，虽在退兵时，从未强索一钱，掠取一物，以为其领袖人物如何，又当别论，若其兵士，真当起爱民不扰民数字，甚至谓如此好兵，若竟不能生活，未免无天道矣。

现在有纪律的好兵又起来了，京、津老百姓当然要欢迎：可是研究

系一班人听见冯玉祥回来，并且回来还是要反抗张、吴而革命，他们便大叫冯玉祥抗张、吴，是苏俄乱华计划。到底是有纪律的好兵乱华，还是反赤的奉、直军乱华，老百姓只看事实，不会把白党（奉直军阀、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的宣传看得比事实更为可靠吧！山东的农民本来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更还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可是张宗昌反对共产党的告示贴遍了山东全省各乡村，农民见了窃窃私议道：张宗昌这样深恨共产党，想是共产党反对张宗昌，看来这个党或许不错，现在研究系大声疾呼冯玉祥抗张、吴是苏俄乱华计划；老百姓也许因此更觉得冯玉祥和苏俄都不错，因为老百姓目前切身感觉得乱华的人正是张、吴，不是别人。

奉、直两系军阀之为害中国，无人能够否认；不用武力而可以打倒他们，非童昏当不至作此奇想。将用武力打倒奉、直军阀之国民政府及国民军，是否也和军阀一样呢？不独工人、农民、学生相信他们是革命的；即一般稍稍进步的商人，现在也知道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比奉、直军阀好，暗中盼望他们得到胜利；连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白党的肚子里，又何尝不晓得国民政府和国民军好过奉、直军阀，不过在他们的利害和感情上，不愿意这样说罢了。

现在不独国民政府的势力达到了长江，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陕、甘、绥、晋渐渐归入国民军掌握，由包头到广州新的革命势力和由满洲里到福州旧的军阀势力，已成对抗之局，人民对此对抗之局应该有个选择了，似乎很难中立。站在军阀那边的人们，称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为乱党为赤化党为赤贼，只好听他们自便；若是有人满肚皮不愿意站在军阀那边，同时又满肚皮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怀疑，试问他们有什么别的出路？不但站在军阀那边的白党若研究系、国家主义者及章炳麟等，显然是反革命，那对军阀与革命间取了中立态度的人，实际上减少了革命的力量，也算是帮助了军阀。所以现在人民单是消极的不反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军还是不够，应该起来帮助他们的军队进攻。因为在事实上已证明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军的确是中国推翻军阀的尖兵。

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人民所得自由，比在奉、直军阀统治下的人民如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消说得。冯军的纪律比奉、直军如何，不但

京、津老百姓知道，即张作霖也知道，并且他自己也承认过；冯玉祥此次回国，在他固有的治军谨严治己勤俭外，更鲜明了他的政治态度，确定了他的革命方针，在他的回国宣言上（宣言附录于后），都明明白白的告诉了国人。我敢说他这个宣言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由这个宣言所产生结果，将来必非常之大。我还敢说：今日的冯玉祥，我们不能当做从前的冯玉祥看待了！

我们肯定了"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在中国革命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固然应该说明这个意义，我们更应该对冯君及全体国民军表示几件具体的希望：

第一，国民一军"有纪律不扰民"的荣誉，应该极力保存勿失，并须将他荣誉普及到二三五军去，尤其是二军更需要。

第二，一二三五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对内整理，对外作战，万不可妄想各自树立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尤其不利于作战，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便是前车。

第三，国民军并不是简单的军事势力，乃是一种政治势力，他的势力应该很深固的建设在民众势力之上，尤其是农民。应该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国民军所到的地方，都应该帮助农民（佃农与自耕农）反抗地主过分的剥削，反抗土豪、劣绅、讼棍的鱼肉，剿办扰害农民的土匪，严惩贪官污吏更不待言；应该唤起农民对国民军的同情心，由农民自动的供给国民军以食粮，不应该以赋税的形式强迫农民增加负担；应该尽力帮助农民的组织、教育与武装；应该使农民群众成为国民军的后备军。同时国民军也就是保卫农民利益的军队。

第四，国民军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在要整理内部，充实其战斗力，使奉张不敢轻于尝试。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尤其重要，不仅要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能够打战，更要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懂得为什么打战。总司令一个人决定要革命是不够的，必须在下层的政治训练工作上充分努力，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认识自己是一个革命党，都有为民族自由而战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自由与生命之决心。

第五，对于蒙、回少数民族，应该尊重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

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争斗，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妨害此争斗。我们不可一面反抗国外的帝国主义者，一面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自己也成了帝国主义者。

第六，尽可能的（只要不损失主权，虽借用外债亦可）完成陇海路，在商业上文化上，都非常必要。

1926 年 11 月 4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七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到底是谁没收人民财产？

在前清末年，山东全省岁入为一千一百二十余万两，民国八年度预算，只有一千万两有奇，张宗昌初到山东时，全省岁入为一千五百余万元，和民国八年差不多；张宗昌到山东不久，便增加到五千余万元，人民负担陡然加了两倍半。现在又要就丁漕两项征收什么“讨赤特捐”，总额一千六百十四万七千元，本年十月一日开始，至十二月廿八日截数，限各县于此三个月内缴齐，并须一律现洋，不知道山东农民怎样能够活命？同时饱受兵灾的直隶，也正在摊派善后公债一千万元。然而张宗昌、褚玉璞却天天在那里大叫反赤，大叫广东赤党没收人民财产！

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

张继曾问蒋介石：此次是国民党北伐还是共产党北伐？我们现在却要问：此次是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为什么发此奇问？因为段祺瑞针对孙中山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发的“外崇国信”这一口号，现在刘文岛也公然在北伐军中叫出来了！段祺瑞一叫“外崇国信”，把活的孙中山气死过去；刘文岛又叫“外崇国信”，或者可以把死的孙中山气活转来。现在可是要请问张人杰君：是否我们“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

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的是谁？

招商局江永轮船，为孙传芳由南京运子弹到九江，突然炸裂，船身

完全炸毁。该局董事会因此开会讨论，他们都以为现留九江供作孙传芳军运之轮，还有八艘，每艘代价平均在三四十万元，关系重大，决再电请放还，至江永轮之被毁损失在廿万元以上，届时亦须要求赔偿云。我要问问招商局董事们：你们向谁要求赔偿？孙传芳的子民傅筱庵，私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招商局董事会，是否应该严惩这样私卖招商局的总办？

此路不通的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者陈启天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一面主张要收回各国在华一切权利，而一面却反对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不知道他们打算怎样收回？真是“此路不通”！

国家主义者与研究系

国家主义者一向不赞成国民党，并且很轻鄙国民党，曾讥诮共产党不应该加入国民党；可是他们现在却附和研究系，向创造中华民国之孙中山的青天白日旗攻击，又在研究系的机关报上大做其文章，想必他们以为研究系比国民党要高明些。这真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1926 年 11 月 4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七期 署名：实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陈独秀同志论农民问题

（摘自1926年11月5至6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联席会议的材料）

我打算谈四个问题，即（1）中国土地集中的过程；（2）农民运动的形式；（3）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政治纲领；（4）在开展农民运动基础上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

我们发现**中国的大土地占有**有三种形式：（1）官僚和军阀手中的土地；（2）各种公司手中的土地；（3）为了开发工业原料而占有的土地。最大的一组大土地占有是第一种形式。第二种比较少。我们可以在黑龙江、安徽看到。至于第三种，它的产生是与对盐矿的占有联系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盐将被采尽，而土地则留在占有者手中，但对土地的耕作方式很简单。在黑龙江，大土地占有是自由土地大量存在的结果。在湖南，大土地占有者手中的土地是湖泊干涸后形成的。在广东，这种土地是由于海面缩退而造成的，这就是所谓的沙质地。第三种土地占有是为了开发工业原料，数量比较小。从中获得棉花。

第一和第二种大土地占有显然不是资本主义式的。虽然它们在组织方面表面上接近于大资本主义企业，但整个生产方法绝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第三种是直接为自己的企业开发原料。所有这三种都没有提高农业强度的因素。

土地集中在这三种占有者手里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造成了农民土地的狭小。但是这种集中过程不是资本主

义式的，而是封建式的。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农民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不会产生矛盾。

第一种大土地占有形式，即土地掌握在官僚和军阀手中，是全国的普遍现象。所有这三种大土地占有形式大约集中了中国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

农民运动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有着各个不同的形式。

在中国北方，即在河南和陕西，有"红枪会"组织，每个省大约有4到5万个。这些组织联合着小私有者农民或破产的农民。它们的宗旨是同各种捐税、土匪、豪绅和贪官污吏作斗争。它们发动的形式是武装暴动这种切合实际的做法。它们的主要愿望是有一个良好的管理机构。

在华中，我们在湖南有40万参加农会的农民、小私有者和佃农。在湖北有4万这种社会成员。在四川，有10万多，他们在土地占有者和小私有者中间，但是这个运动不是在我们的领导下进行的。在华中所有这些省，农民进行斗争的目的是反对各种捐税，反对高额地租，反对民团、土匪。他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农民组织和良好的管理机构。

在南方，我们在广东有一百多万有组织的农民、小私有者和佃农。在这里，斗争是反对各种捐税，反对高额地租，反对民团和豪绅。

由此可见，整个农民运动的共同点是反对各种捐税，反对豪绅，反对军阀。由于运动的觉悟程度不同，也有某种差别。

我们的要求纲领应包括以下几点：

(1) 减少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取消非法的税捐（特别是钱币兑换税）。

(2) 限制借款的利息和禁止收税[①]。

(3) 组织和武装农民。

(4) 禁止转让[②]土地。

(5) 将大地主、豪绅、军阀的土地以及公有土地交给农民。

土地国有化的口号农民不喜欢[③]。农民拥护将土地划归他所有。

---

① 原文如此，看来是指附加的一些地方杂税。——原注

② 原文如此，是指转租。——原注

③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是：不为农民所理解。——原注

(6) 剥夺豪绅的政权并将农村政权交给农民。

应当明确无误地强调指出，这里说的仅仅是**农村政权**，而不是全国政权。现在农村政权掌握在地主和豪绅手里；应当使它掌握在农民手里。

其次必须正确地排列我们的要求：现在提什么，以后提什么，以便不使人感到害怕。

在农民问题上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是很复杂的。现在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应当号召农民加入国民党队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转，并给它以力量来同右派进行斗争。

现在就可以为将来制定三种政治组织关系形式：(1)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在国民党的旗帜下领导农民；(2)改组国民党，保留其名称，但实际上是工农的国民党；最后，(3)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新党，即工农党。所有这三种形式要根据他们左倾的程度来安排，应当根据农民的要求来选择。但是，从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角度来说，越是左，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其斗争中就越是孤立。

中国革命在飞速发展，形势变化日新月异。但是，制定未来的纲领要比制定当前的行动纲领容易得多，因为未来的纲领很可能落后于农民的要求。因此，处理问题不应搞教条主义，要根据斗争的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

应当不急于选择新的组织形式。

彼得罗夫①：在确定前景和选择三种组织形式中的某种形式时，应当考虑到，我们真的不得不进行选择时，形势将会跟现在有所不同。国民党左派将掌权，将不是向左转，而是向右转。资产阶级会向右转，而农民向左转。如果选择第一种关系形式，那么各阶级在统一的国民党内的联盟就会被排除。

许多事情将取决于国际形势。如果国际形势顺利，那时将选择**第三种形式**，即工农党。如果不顺利，那就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结盟，但务须保留左派国民党的名称。

---

① 彭述之。

如果国民革命顺利发展，如果一年间全中国将被北方和南方的军队统一起来，而国际革命没有跟上，那么就应当选择第二种关系形式，即保留国民党的名称，但实际上是工农国民党。

1926年11月5至6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十月革命与东方

我们要懂得十月革命的意义，不可忘记了当时的世界情况。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大战中，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两方面都只以保卫祖国相号召，独有帝国主义的美国威尔逊举起“打倒德意志军国主义”、“民族自决”这两个旗帜出来号召，颇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自由派和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派，都对威尔逊怀了多少幻想。这时只有无产阶级的首领俄国列宁，他看破了威尔逊的虚伪与无能，他坚决的主张非发起各国国内革命不能打倒军国主义，非推翻帝国主义不能实现民族自决。其结果威尔逊的巴黎和会，打倒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德意志，救出了英、法、意、比等许多军国主义的国家，民族自决更成了一句废话；列宁的十月革命，却实实在在以无产阶级的国内革命，打倒了俄皇的和克伦斯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府，实现了芬兰、波兰及其他国内少数民族之民族自决——独立或自治。这种历史的事实，曾经明白的告诉了我们列宁和威尔逊之不同，列宁的见解正确而伟大和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都已经不是还有讨论余地的理想了。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有整整的九年，在这九年中，苏俄仍旧是继续列宁的十月革命工作：援助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推翻全世界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

欧美资本帝国主义者，知道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对于他们的危险，始而武力对付，继而用经济封锁政策，这两样都不曾收效，现在遂改用吊膀子政策，甜言蜜语劝苏俄“回到西方”。

“回到西方”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抛弃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回向欧美各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妥协合作。苏俄内部，近来有一小部分右派分子也主张回到西方，他们以为东方民族中，如中国人并不大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

苦，反以苏俄援助他们革命为多事，有野心，在另一方面，苏俄却以援助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结怨于列强，为苏俄自身利益计，应该改变以前政策，停止援助东方民族运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妥协，以便从这些国家中得到苏俄经济发展之物质的援助。苏俄中大多数左派分子却不赞成右派这种意见，以为是违背了列宁的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

当真中国人都不大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吗？苏俄中右派分子的意见是不对的。中国的革命派不用说，就是一般商人，近来也都感觉得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并且已经起来做反抗帝国主义之行动，如反抗棉花出口，反抗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纸烟捐和商标，主张关税自主，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主张废止领判权，主张收回会审公堂与租界等，已成了全国商人普遍的运动，而却未曾有一次真正商人反对苏俄，因为在他们的经济生活发展上，天天都感觉到帝国主义者当面的压迫，而不曾感觉受苏俄压迫的事实，真正商人不同流氓政客，因此他们不能无病而呻。中国人中反对苏俄而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不是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商人、工人、农民，而是一小部分军阀和无职业的流氓政客如下表：

（一）军阀；

（二）军阀的走狗（如交通系、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复辟派、国家主义派及民党右派冯自由、章炳麟、徐绍桢、黄大伟等）；

（三）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洋行买办、耶教徒及民党右派马素、童理璋等）。

这三种反革命派确是不感觉帝国主义宰制之痛苦，反大叫苏俄援助中国民族革命有野心。然而他们却不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与军阀非中国之患，中国大患只是苏俄所援助的国民革命；他们希望力量还弱的国民革命军得不着国内国外任何援助，好让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奉、直军快快打平。他们都立脚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上面，他们反对苏俄援助中国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军，这也是当然的事。

还有一班人，他们都非立脚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利益上面，也并不反对苏俄，而他们以为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力量来革命，不一定要依赖苏俄的援助。革命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不一定要依赖外援，这个意见并不

错，并且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这样做，这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若因有苏俄援助可以增加我们革命发展之速度，似乎也没有理由应该拒绝，更无理由因此而反对苏俄。

反对苏俄的人，硬说苏俄援助中国革命是有他的野心，而非善意的援助。说这样话的人，他完全不懂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试问苏俄因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军曾经得到些什么没有？苏俄援助中国，若是由于他的野心而不是立脚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上面，他尽可继续旧俄政策，援助奉天或直系以达到他的野心，又何必援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呢？国民革命的势力得胜，能容忍任何国家的侵略野心吗？奉张对俄大使说："奉、俄近邻，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而帮助很远的广东？"吴佩孚对俄领事说："我为中俄协定很尽力，我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你们应该来帮助我，派些顾问到国民军那里有什么用？"奉、直军阀并不是不要苏俄帮助，正因为得不着苏俄的帮助才反赤。苏俄为什么不帮助奉、直军阀而帮助国民革命军，这便可以充分证明苏俄是立脚在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上援助中国，而非由于侵略野心。

苏俄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关系东方被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常重大，可是欧美的资本帝国主义者力劝苏俄回到西方，恰好中国的反革命派也拒绝他来到东方，东方的革命派应该起来怎样对付这个问题呢？

1926年11月15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八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研究系官运不亨通

研究系的前身保皇党，刚刚跪求满清做点立宪运动，却被民党的辛亥革命打翻了；刚刚拍上了袁世凯，组织了什么第一流内阁，却又被北洋派嫡系赶走了；刚刚拍上了段祺瑞，攫得财政、司法几个总长地位，又被民党的护法运动打掉了；刚刚拍上了曹、吴，又被冯玉祥反戈拆散了；最近刚刚拍上了孙传芳，又被北伐军打来，不独蒋方震的江西督办落了空，就是丁文江的淞沪总办也有点靠不住。可怜的研究系，怎么这样官运不亨通！

研究系是只白虎

研究系保清朝，清朝亡；帮袁世凯，袁世凯灭；帮段祺瑞，段祺瑞失败；帮曹吴，曹吴倒霉；帮孙传芳，孙传芳卸甲丢盔。有人说他是只白虎，谁沾染他，谁就晦气。

国家主义者对国民党党旗及北伐

国家主义派，不敢反对国民党，只好说共产党假冒国民党；可是他们所攻击的青天白日旗，总不是共产党假冒的吧？国家主义派说："自蒋介石北伐以来，全国言论界大都为他一时的胜利所惑，莫敢为斩钉削铁的批评，独有我们国家主义者抱定信念，认清真理，尽量的揭发蒋介

石亲俄的自误误国(帝国主义及军阀当多谢国家主义者!)及其所以不能成功的理由,现在事实渐渐证明国家主义者言论是真理,不是客气,是千真万确,不是神经过敏了。”不错,孙传芳又已经到了南京,国家主义者所谓北伐军不能成功,总算千真万确了! 国家主义者大喊其他们是国民党的友人,共产党是国民党的致命敌人;只可惜他们不应该攻击他们友人的青天白日党旗!

国家主义派有了极阔的首领!

国家主义者自夸道:“国人对于国家主义的信用,也一天增加一天了。”又道:“国家主义潜伏在国人心田中的势力,已到了奔腾澎湃莫之能御的时候。”不错,国家主义的信用和势力已经了不得,而且已经有了一个极阔的首领,不是最近前国务总理大人靳云鹏大鼓吹其国家主义吗?或者张雨帅、吴玉帅也会加入国家主义派,因为他们都是反赤的同志。

又是一个为孙传芳保江山者!

孙传芳举兵讨赤之初,置人民和平的呼吁于不闻,到了赣战不利,才串出蒋尊簋、张一麐等出来奔走和平,做他的免战盾牌。现在孙传芳由九江败退到南京,不但怕北伐军东下,并且怕奉、鲁军南下,更用得着和平做盾牌了。于是什么皖、苏、浙三省联合会乃应运而生。该联合会表面上是说三省人民自治,实际是重在三省军事当局停止战争,由人民代表和粤、奉、鲁接洽和平,这本是孙传芳所求之不得的。这种仍旧拥戴三省军事当局的自治运动,与其说是三省自治运动,不如说是为孙传芳保江山的运动! 这班人民代表若当真去广州为孙传芳接洽和平,国民政府或者要问问他们:三省人民自治诚然很好,但是你们所拥戴的三省军事当局是谁?

1926 年 11 月 15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八期 署名:实

革命与武力

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

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势力还未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军事行动更多一点；并且很难从军阀的武力时代马上跳到民众的武力时代，中间会要经过武力与民众合作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那个愿意这样办，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高压政策特别严重，革命的民众不容易得着武装；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民众的革命运动潮流高涨到相当程度，国中军事领袖当中，有些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利害不一致的部分，在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便会走向民众方面，与民众合作。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具体说起来，南方的北伐军和北方的国民军，都确已走上了武力与民众合作的道路。

可是在现时武力与民众合作之中途，我们还未可过于乐观，而忽视了可能的危险。危险是什么呢？就是现时所有与民众合作的武力，都能够合作到底，并且还能够进一步变成民众的武力；或者是合作不能到底，有些仍旧要站到反民众利益的阶级（军阀、买办、地主、士绅）那边去。

要免除这个危险，民众和革命旗帜下的军人，两方面都要注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这是民众方面所应深刻注意的事！

在军人方面，单是口头上说自己是革命的，即或志愿上自己的确是要革命，这样都还是不够，真正革命的军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须懂得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中，革命的军人和反革命的军人在实质上究竟是怎样的不同？（二）须能够服从民众的和党的制裁。

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是怎样呢？一方是被剥削压迫阶级的民众——工人、农民、商人等要求民主政治；一方是剥削压迫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地主、士绅等，要维持封建的军事独裁政治；代表后一阶级利益的军事势力当然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军人应该站在前一阶级利益上面。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买办掌着中国城市政权，做他们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工具，复利用买办勾结乡村的士绅、地主掠夺中国的矿山，吸收中国的贱价原料；军阀利用买办(商会领袖及银行家)在城市剥削工人、商人，利用地主、士绅在乡村剥削农民，以供给他们的军饷；因此，可以说军阀、买办、地主、士绅，同样是帝国主义者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三个工具。革命旗帜下的军人，若只知道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在实际行动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买办之剥削与垄断，不能力助农民反抗地主、士绅之剥削与乡村政权，则不但依然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保护了军阀势力在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这样如何算得是革命的军人？这样如何算得是武力与民众合作？

每个有兵权在手里的人，若不能够受民众的或党的任何制裁，都有变成军阀和形成军事独裁政治之可能，此吴稚晖先生所以有“有军必阀”之叹。我们或者可以承认现时方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点。可是这种较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决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并且在任何军事独裁的局面之下，都有培养贪官污吏之必然性；这是因为军事独裁局面之军事首领，不受民众或党的任何制裁，拥有无上威权，因此以“反对派”三字杜绝一切闻过之路，于是左右一班宵小与夫乡党故旧得乘机以小人之爱捧此军事首领，只需蒙蔽此首领一人之耳目，便不妨放胆的贪赃枉法，无所忌惮，非至激成众怒危害此首领不止。在这样贪官污吏横行无忌和民怨沸腾的局面之下，还说得上什么民主，什么革命!？然而不受民众的或党的制裁之军事独裁，其结果必至如此，这是无可避免的公例!

我们还记得辛亥革命时，有“军人出头”的呼声，并且把军字写作“軍”，许多官厅公文中都是如此，其结果怎样呢？我们又记得国民党在广东驱逐陆荣廷、莫荣新的势力后，洪兆麟在陈炯明宴孙中山、唐绍仪、

伍廷芳席上，乘醉伏在桌旁东倒西歪的说："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其结果又是怎样呢？现在我们虽然未曾听见"湖南是老子打来的，湖北是老子打来的，江西是老子打来的"，这等怪话，却有了"军人革命论"这样的不祥之声！并且有些青年军人时常拿武力万能的观念，干涉一切社会事件，虽然是善意的。这样不祥之声，这种武力万能的观念，都足以促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开展。

真正有觉悟的革命军人，如果想想军事独裁对于民主革命的危险，如果愿意考查已否因此使革命根据地贪官污吏化，便应该放弃军事独裁的野心，诚意的与民众合作，尊重民众的意见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受党的制裁，以免流为个人的军事独裁。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不可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威权在军队的威权之上。如果主张"以党治国"，便不应该主张"以军治党"；因为以军治党，则以党治国便毫无意义，不如直接老实主张"以军治国"了。我们反对以军治党，并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过问党事，也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同时主持党事，乃是说每个军人党员乃至军事首领，都应尊重党的集体意见，服从党的集体制裁，如果挟军事势力，使党的集体意见以军事首领的意见为从违，使党的一切决定都要仰军事首领的鼻息，使党众的意见不敢和军事首领的意见不同，使军事首领即党之化身，使党内党外群众都只知有军事首领而不知有党，则这样的一个党，便等于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镜〔睛〕，则所谓党的威权，党的决定，党的制裁，党的命令，都由"强奸党意"而来，等于无物。这样没有党的制裁之军事势力，要想免于军事独裁的危险，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结论是：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才能够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

1926 年 11 月 25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九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自治呢还是由军阀保境安民?

什么苏民自治协进会,通电要求苏孙本保境安民之初衷,勿以苏省卷入战事漩涡。我们对于这班号召自治的糊涂虫,有三个疑问:第一,向苏孙要求他保境安民,这是什么自治?第二,孙传芳拿苏省的钱,派苏省的兵,和北伐军打得不亦乐乎,何以到现在才想起来勿以苏省卷入战事漩涡?第三,孙传芳去了,张宗昌就要来,你们热心自治的先生们,是否再来电求苏张保境安民呢?

丁文江竟比军警还要反动

前此主张严办为万县案运动的青年的,是丁文江;现在戒严司令部枪毙陶鑫元(即陶静轩)的,也是丁文江,最近向法捕房要求逮捕钮永建的,又是丁文江;甚至于严春阳示意工会,快快将关在法界捕房的海员保出,否则丁文江要求引渡去,必然枪毙。好一个博士做官的丁文江,好一个试验大上海自治的丁文江,他的反动行为竟在军警之上!

国家主义派眼中的爱国军队及其五色旗

国家主义派近来在各处尤其在日本,大反对其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大拥护其五色旗,说五色旗是国旗。可是他们(武昌的国家主义派)

曾派人到岳州的吴大帅的军队宣传，恭维他们是爱国的军队，并且说："凡反赤的军队都是爱国的军队。"他们的机关报说："鄂人对于北方军阀大兴其去后之思，而对党军反有愿与汝偕亡之意。"他们称三民主义为"残民主义"，他们称国民政府为"所谓国民政府"，他们公然大叫"反对擅改国旗的国民党"（以上均见最近《醒狮》周报第一一一期）！国家主义派这样的恭维北洋军阀，这样的反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难怪他们要拼命拥护北洋军阀的五色旗而反对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国家主义者眼中的赤化！

国家主义派拿"满地红表示赤化"为反对青天白日旗的理由之一。哈哈！照他们这样见解，那么，五色旗的第一条便是红色，它不也有赤化嫌疑吗？并且马路工程上大插其小红旗；各国的国旗商旗上，很少没有红色；许多纸烟火柴盒子，都是满地红；婚姻喜事，更是大用红纸帖子，大穿其红色衣裙；难道都是表示赤化吗？若这样杜绝赤化，连药书上的红花、橘红和词典上的赤胆、赤心、红梅、红日都应在删去之例了！如此看来，所谓国家主义派，竟是一班无知识的小孩子。

青天白日旗是共产党的吗？

国家主义者说："主张用青天白日旗者，不问可知为共产党人。"又说："共产党人欲实现其一党专制之目的，绝不顾民意之赞同与否，擅自用彼一党制定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又说："使共产党人而有理性，自当服从多数爱国青年主张，放弃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之谬见，而同立于五色国旗之下。"我们的回答是：国家主义者若尚有丝毫理性，总不应该闭着眼睛否认青天白日旗是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就制定的这一个事实（即曾琦自己也说："同盟会初成立时，孙中山主用青天白日旗。"），而硬把这面旗擅自送给共产党；更不应该诬称多数爱国青年都反对青天白日旗；

似乎也不应该劝我们和他们同立在北洋军阀的五色旗之下！

到底是谁强夺他人的财产妻女为己有？

共产党是主张生产工具（如土地、机器、铁路、矿山等）归社会公有，而不是要强夺他人财产为己有。共产党是主张婚姻自由，而不是要强夺他人妻女为己有。反赤派所指斥的共产公妻，正是强夺他人的财产妻女为己有之意；这样的共产公妻，张宗昌、张学良都已经在京、津、山东实行，如此反赤，正是反对他们自己呵！

1926 年 11 月 25 日 《向导》周报第一七九期 署名：实



孙传芳败后之东南

孙传芳败后，东南三省最重要的现象使我们注意的，乃是上海市以至苏、浙、皖三省的自治运动。

此种自治运动，首先发生于上海市，远在齐卢战争以后，由上海市自治运动，扩大到环太湖区域。闸北自治运动和孙传芳争持最烈，其初发动于闸北自治公所几个董事，渐渐扩大到环上海市所有大小城镇的绅商团体；然而一时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终于被孙传芳用租界帝国主义的援助和丁文江博士大上海的欺骗政策压服下去，上海市终于被孙传芳统治了（丁文江不过是个工具）。孙传芳在江西战争不利，上海市自治运动又重新起来，十月二十三夜的暴动，虽然被孙传芳的铁血政策镇压下去，而暴动中所喊出的"市政归诸市民"这一口号，却并未曾镇压下去，反而日渐流行高涨起来，除傅筱庵等买办分子外，工人、学生、商人都集合在此口号之下。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孙传芳溃退到南京，上海商总联会发表宣言，主张拒绝奉鲁南下，划上海为特别市，市政归诸市民，永不驻兵，全市工、商、学各团体群起响应；并由上海自治运动，扩大到苏、浙、皖三省自治运动，在上海产生了一个苏、浙、皖三省联合会。

这个联合会产生之初，其中有些反动的官僚分子，企图利用这个三省联合会，以自治的名义拒绝北伐军及奉鲁军入境，实际上是为孙传芳保全三省地盘，以便他们得以参加政权；嗣因会中急进分子反对，乃改变参加政治之表示为管理政治、军事之表示；迨十七日孙传芳北遁，张宗昌实行动员南下，三省联合会乃表示其脱离孙传芳拒绝鲁军南下之主张。孙传芳、张宗昌严拿反对直鲁联军南下的董康，江苏绅士乃表示宁欢迎赤化而不欢迎绿化（因奉张、鲁张均出身绿林）；张宗昌准备带军用票一千万元南下，苏、皖商民闻之失色相告。现在苏、浙、皖三省的自治运动，已渐渐和奉、直军阀在东南之统治权短兵相接了。

奉系军阀之内部，奉与鲁有竞争，奉之中新派(张学良、杨宇霆)与旧派(吴俊升、王永江)又有竞争，又加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力阻其向南发展，国民军之再起，晋阎之中主，更足以使奉张的军事计划，对西北更急于对南方；并且对南向河南则先与吴佩孚战，向苏、皖则先与孙传芳残部战，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都于彼不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奉鲁军南下讨赤，乃由于英帝国主义者之怂恿与张宗昌之野心(张宗昌想做直、鲁、豫、苏、皖五省联军总司令)，奉张在实际利害关系上未必如此。在这样情形之下，孙传芳也许有回到南京之可能(本报付印时，孙传芳回到南京了)。孙传芳如果回到南京，至少必让津浦南段于鲁张以结后援，固然不能完成其保全三省地盘之初梦，然他还有二万(孟昭月旅、冯绍闵旅、李宝章旅、王雅之团及卢香亭、彭德铨残部)可用之兵，以之继续对北伐军作战固不足，以之镇守江苏则有余，浙、皖二陈战斗力并未损失，孙如能占住南京，彼等势必联孙以自保，北伐军如不取浙、皖，则孙传芳尚有赫然自称苏、浙、皖三省联军总司令之余地。因此，三省自治运动，目前尚未至如何拒绝直鲁联军，而是如何对付这个僵尸的孙总司令及其走狗丁文江、陈陶遗等。去了孙传芳，还要拒绝奉鲁军，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若不于开会通电之外，有更大的努力更大的牺牲，此次自治运动之成败正自难言。

然而东南三省，尤其是上海市的自治运动，无论其目前能否成功，无论其急进或是缓进，必有一个长期的争斗，只要有争斗，他的性质，他的价值，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是我们不应轻轻看过的一件事。

依我们现在的经验，中国民主运动，有三种形式的可能：一是革命的军事行动，由辛亥革命到此次北伐，属于此种形式；二是资产阶级的自治运动，此次上海及东南三省自治运动，即属此种形式；三是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这三种形式不同的运动，都有一共同性质，即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或者有神经过敏的人，以为农民暴动是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的错误。现时中国还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农业，因此佃农、地主间的土地关系，和地主对于佃农剥削方法，还是半封建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即工银制度；农民运动的成分主要的是佃

农与自耕农等小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所以现时中国农民在乡村推翻地主乡绅政权的自治运动，和商人在城市推翻军阀官僚政权的自治运动，同样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同样是资产阶级推翻半封建势力的运动，决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虽然城市自治运动中有工人参加，乡村自治运动中有雇农参加。

此次上海及东南三省的自治运动，很明显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他比湘、鄂、闽、赣的军事行动，革命性要少些，而民主性或者还要多些；因为他是由人民自己起来要求脱离军事统治而自治，比北伐军更有社会基础。东南各省尤其是上海市，是中国产业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城市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从这些地方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事。

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一件事！中国的资产阶级犹甚幼稚，致军阀死命之金融权尚操在买办官僚之手而不在资产阶级之手，因此他们的民主运动，往往归于畏怯退缩。上海的运动，因有工人群众参加，比别处要急进一点。三省联合会中，夹杂着许多官僚政客，这是东南自治运动的一个内伤，因为他们很容易和军阀妥协；尤其是研究系、江苏省教育会和张君劢、张一麐、张孝若这班直系党羽，到了孙传芳当真不能在东南三省存在的时候，必然也要伸出尖头，戴上自治民主等面具，大摇大摆的走出来偷点什么去，尤其要藉此反对国民党。因此，东南自治运动要真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不但须彻底力抗军阀，并且须谨防内部的扒手——反民主的官僚政客、买办教棍等直系党羽！

1926 年 12 月 5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〇期 署名：独秀

政治报告

此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主要点还是关于国民党问题。因为自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国民党问题不是很简单的，是牵连许多别的政治问题的，所以国民党问题，可说就是全般政治问题。国民党问题之要点乃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也就是一个整个的民族革命问题。我们先说这个问题的历史方面：

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是一九二二年国际第四次大会讨论东方问题时决定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后，至一九二五年“五卅”才广大的实际应用出来，此时民族的联合战线，亦即所谓“赤的联合战线”。五卅运动之成功，就是民族联合战线之成功。当时这个战线非常扩大，自工人以至军阀莫不加入这个战线（当时张学良、孙传芳等都通电响应，捐款援助），一时民众势力非常发展。但同时反赤的联合战线即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也随着形成起来。他们的目标便是讨灭南赤、北赤，结果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失败，如北方国民军之失败，北方的“三一八”大屠杀，南方的“三月二十”，就是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破裂之表现。

自三月二十至七月四日为反赤运动最盛时期。自七月四日国民军退出南口，反赤的联合战线开始分裂，不能继续。奉系军阀在北方得势，不但奉、直发生利害冲突，英、日两帝国主义亦因此在北方失了势力之均衡。并且奉系内部直系内部也有冲突，如奉系新旧派之争，直系吴、靳之争等，这都是不可调解的利害冲突。军阀内部帝国主义间都如此冲突，反赤联合战线遂完全破裂。同时赤的联合战线，自北伐以来又渐渐恢复以至扩大，自工农以至资产阶级绅士，甚至一些小军阀，均有联合于此战线之势。如江苏绅士说：“赤化并不可怕，只有绿化真可怕

（指绿林的奉系军而言）。”上海大商人主张联合工商界以解决上海问题；苏、浙、皖的绅士商人组织三省联合会；上海的工商学各团体组织市民公会，共同反抗奉鲁军南下。但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后，这个赤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一因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因帝国主义改用新的分离政策；四因我们之失策。兹分述如下：

（一）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军事的胜利和民众运动的高潮，使帝国主义者不能不认识南方的革命势力已不可以强力去消灭，惟有用软的方法去和缓。即最顽强的英国在天津会议后，亦不得不暂时停止以前“打”的政策，代以“拉”的政策。即是帝国主义者开始对国民政府表示让步，将来或可提出比“五卅”更多的让步，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条件：(1)保留大部分不平等条约；(2)离开苏俄；(3)禁止工潮等。用这些条件拉着国民政府向右走。同时帝国主义者在另一方面，复想拉着大商买办阶级为他压服工潮的工具，公开的在汉口英文报□报上劝中国商人应与外国资本家合作对付工潮。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一个危险倾向。

（二）国民党之右倾——国民党中的一般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之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尤其是在武汉工潮中，他们以为武汉、江西取得之后，行动便当和平些，不然已得的胜利恐怕就会保不住；同时又以为北伐的胜利，民众势力都握在 C. P. 手里，如果民众势力太发展了，这是 C. P. 势力的发展，因此更加以限制。他们这种右倾的表现，不是现在始，在十月联席会议前就如此。联席会议的结果，表面是左派胜利，实际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维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所顾忌。现在大部分政治军事势力握在右派手里，在后方李济琛日事压迫工农运动，甚至纵容部下杀戮农民运动者，他不但主张限制工农运动，即对工农商学联合会的运动他也反对。至于前方的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表示很右，最近表示“乡村农运可做，城市工运则当停止”。右派对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虽尚未公开的阻止，但实际上急欲缓和工农运动以取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国民政府。他们不想以革命的争斗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而想由帝国主义的承认以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这本是国民党

的传统政策。丁维汾说:“现在北伐要紧,我们应该停止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柏烈武说:“列强有承认国民政府的意思了,我们应该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免生阻力。”这是赤的联合战线之第二个危险倾向。

(三)商人的恐慌——北伐胜利后工人组织勃起,经济罢工遂一发而不可遏止,尤其是久受压迫〈的〉武汉工人,这样不但引起大商人的恐慌,尤其是一般中小商人因手工业工人店员之罢工,更是无法应付。中小商人素来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大商人三层剥削,现在更加上工人店员罢工,经济濒于破产,因此他们自然很容易站到大商买办那边也反对工人,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三个危险倾向。

(四)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我们同志中“左”稚的现象约有数种:(1)看不起国民党。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思想,尤以粤区同志为甚,有人曾说:“国民党自三月二十以后,已经死了,五月十五以后,已经臭了,我们还把这臭死尸抱在怀里做什么?”可是北阀军事的胜利所给北方军阀及民众运动勃兴之影响,仍然证明国民党还不是一个臭死尸。(2)包办国民党。许多好的国民党分子说:“我们不反对 C. P. 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 C. P. 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同志包办的反响。这种包办不一定是有意的,但包办的结果,一方面没有国民党,一方面也没有 C. P. 了。(3)包办民众运动。我们不但要包办国民党,并且要包办一切民众运动,三月二十、五月十五以前在国民党内包办,现在更在国民党外包办。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派领袖隔离了,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没有一个有力的左派和我们合作向右派争斗,其结果自然只有我们单独的领导群众和右派的军事政治势力直接冲突,在形式上直是 C. P. 和 K. M. T. 冲突。在现时,这种冲突正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而非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所需要的。(4)否认左派存在。这种完全否认左派的思想,特别粤区的同志最厉害,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至于左派呢,亦没有这回事”。还有鲍同志以为真能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说:“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否认左派的结果,我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一是退出国民党而领导群众和国民党冲突。这两条出路都要不得,我们

的出路只有留在国民党中联合左派和右派争斗。鲍同志这种错误见解的原因：一是所定左派的标准太高；二是忽略了中国目前争斗的问题。中国目前的争斗是要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军阀土〔地〕主劣绅土豪的民主运动。在国民党中谁完全赞成这两个运动的就是左派，否则便是右派。因为国民党的左派必须是民主主义者，若只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而不赞成反对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的人，便是封建主义者，当然是右派，这种右派分子，在国民党重要人物中还非常之多。解决土地问题，当然是对地主土豪最后的打击。可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宣传上自然可以由目前争斗的这些问题，引申到根本的土地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争斗口号，便是停止争斗；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自然是没有左派。减租减息等目前的争斗，在农民群众中，比解决土地问题更是迫切的要求，赞助这些要求的国民党左派之已经存在，比希望有一个赞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出现，更合于事实。因为想像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5)误解党的独立。我们的党之独立，是指独立的政治宣传和党的组织，而不是说在现时一切实际政治争斗都应该独立行动，不与国民党合作。有些同志这样解释党之独立，所以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而不必与国民党合作。北京、湖北的同志都有这种思想，尤其是在广东的同志，他们更加上否认左派之存在，自然会发生“我们当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与政府对抗……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C. P. 与国民党的冲突”这种错误观念。这种离开国民党的左倾错〈误〉，和以前不想发展党的组织，几乎沉没在国民党中的右倾错误，对于党是同样的危险。(6)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在长沙，在武汉，我们都没有经过国民党把手工业工人店员和中小商人的关系弄好。尤其在武汉，有些手工业工人店员的过高要求，逼得中小商人和总商会合作反对工会。至于未能制止纠察队对于商人之胁迫和侮辱，更是万分

不应该继续的现象。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四个危险倾向。

以上四个危险倾向汇合起来，随地随时都会使联合战线破裂。此时破裂之可能性已异常严重，我们急应努力进行以下各项挽救的策略：

（一）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帝国主义之新政策和商人之恐慌还在其次。我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之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

（二）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对内继续民主的统一争斗，即推翻都市中封建的军阀政权，推翻乡村中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政权之争斗；对外继续独立平等的争斗。在过去的经验，国民党每次得到一点军事胜利，便马上向敌人妥协而右倾，而失败，现在的右倾大部分也是为了要与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封建势力）谋妥协。要挽救其现在的右倾，惟有继续争斗，惟有督促其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继续向敌人争斗，才能挽救民众日益向左，武力政权日益向右之危险的现状。

（三）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有些同志主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应该集中，这是一个幻想。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与反动局面之促进必成为正比例，军事势力越集中，反动越大；集中越快，反动来的也越快；集中在谁手中，谁就先反动。这乃是国民党之党的威权不能制裁军事首领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民主主义不发达的国家的必然运命。

（四）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以前的宣传都集中在民族主义一方面，这种简单的宣传运动，每会为军事独裁者所利用。现在为抑制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向前进展及向右反动，必须开始作民主政治的宣传和运动。抽象的宣传民主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指出必须实现国民会议，省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城乡政权归人民，才是民主主义的政治之具体的表现。更须切实说明凡是民主主义的政府，必须向左站在民众方面，给民众以充分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之自由，而不能向右站在帝国主义、大商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方面压迫工农运动。尤须珍重说明，此时的农民运动，正是帮着民主主义的政府向封建的地

主、土豪劣绅进攻，正是为〈民〉主主义的政府扫除其敌人，巩固政府的基础，而不是加害于政府。民主主义的政府不应该援助他自己的敌人(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压迫他自己的帮手(农民)。

(五) 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的和国民党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的势力发展，使左派领袖获得群众，努力在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工人、店员、学生、小商人)的群众中发展左派的国民党组织，竭力援助左派达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胜利。这一政策我们从今天起即须开始工作。右派早已着手活动，派人到各地集合他们的势力，甚至于拉拢西山会议的分子、工贼及一切反动分子入党做他们的群众，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与左派竞争。第三次全国大会如果胜利从于右派，则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及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必更有大的变动，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

(六) 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军事首领不任政府的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须在政府管理之下，以减少国民政府之军事独裁的性质与形式。

(七) 确定我们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我们此时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非常困难，因为各地手工业工人及店员对于厂主店东之罢工，乃是小资产阶级当中的利益冲突，两方面都是民族的联合战线中所需要的，我们势不能偏袒那一方面，而又不能中立，我们只得采取下列政策：在消极方面，努力向店员工人解释，不便向厂主店东提出他们经济力限制以上的过高要求，更不可轻取罢工手段，尤其在日常生活品的商店(如米店，柴炭店，油盐杂货店等)；在积极方面，加紧联合战线的必要之宣传，工人援助商人对于苛税苛捐及市民自治的争斗，谋全市面的经济枯竭和金融恐慌之救济。只有这些方法，才多少可以和缓小资产阶级间的冲突，以巩固联合战线。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①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选自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① 根据 1926 年 12 月 13 日中央特别会议《政治报告议决案》中“仲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之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各种危险倾向”等语判定，《政治报告》是陈独秀作的。

各国承认国民政府问题

国民政府与经纪政府

赤的政府与反赤政府

人民选择那一个?

自国民政府势力发展到长江以后，帝国主义的各国，遂不得不改变其以前武力的高压政策而为外交的和缓政策，以前是讨论如何用武力干涉中国的革命运动，现在是讨论在何时将怎样承认南方的革命政府即国民政府，他们的舆论固然有人大声疾呼的主张承认国民政府，即他们的外交当局也不能不把向来不置一顾的南方政府承认问题当做重要的问题来详加考虑了。

现在已经不是闭关时代，我们并不拒绝和任何国家通商往来，代表人民权力与利益的国民政府取得政权以后，当然还需要取得国际地位；因此，我们对于各国承认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任何国家能够承认国民政府，我们都一律欢迎，当然没有拒绝帝国主义的国家之承认这种蠢思想。并且，我们是革命党，便应该爽直的说老实话：我们的敌人，虽然昨天还把刀放在我们的颈脖上，他们如果今天放下刀来，拿笑脸或苦笑的脸同我们说和，我们仍然是欢迎的，就是报以不是致中国死命的让步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需要得到和平发展的机会。

不过我们对于各国承认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断然不可忘记了几个必要的原则：

（一）我们要决心由争斗得到各国承认，不可希望由妥协让步得到承认。

（二）我们要懂得各国承认只是获得政权的结果，万不可想靠各国承认来做获得政权的原因。

（三）我们固然希望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地位，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是

获得独立的平等的国际地位，而不是获得和封建军阀政府同样的国际地位。

（四）我们要懂得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比各国承认更为重要。

只有由争斗才能得到让步，决不会由让步得到让步，我们让步了，已经没有争斗了，敌人还为什么要让步？各国为什么要考虑承认仍旧是赤色的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是因为民众反英运动普遍了南方，国民政府的力量又到了长江。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承认的决心呢？是因为北伐军还未到北京。这是"只有由争斗才能得到让步"一个注释。英国有好几个报都一致主张只有承认国民政府才能够和缓中英间的关系恶化，这是"只有由争斗才能得到让步"又一注释。若希望由妥协让步得到各国承认，不但毁坏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生命，并且在事实上是一个幻想，因为帝国主义者不相信国民政府将来能够比张作霖更听话。

有些革命性薄弱的党人，还抱着谬误的传统思想，以为各国一承认南方的革命政府，北方的军阀政府便自然倒了，所以不妨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以取得他们的承认，以取得中国的统一政权。这种不靠自己争斗而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取得政权的下流思想，在事实上固然是一个幻想，即令不是幻想，能够由他们这样的下流思想而成为事实，则南方革命政府所获得的国际地位，和北方军阀政府的国际地位还有什么不同？曹锟以应允临城案要求换得他的贿选政府之承认，段祺瑞以宣言"外崇国信"(即遵守不平等条约之意)换得他的执政政府之承认，革命的国民政府又何能走这条路！因为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便不能收回税权、法权及撤退驻华海陆军，我们决不能拿这个致我们死命的让步，即出卖国家的让步，去换得国民政府之承认。幸而国民政府的领袖们并未预备走这条路，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即决定对外方针，以不放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不损失国家独立平等地位为和蓝浦生谈判的原则(大意如此，惜议决案原文不在手边，未能具录)；蒋总司令对外宣言及和西报记者谈话，也是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态度和坚持收回税权、法权，将继续革命的争斗，以期获得中国之独立的平等的国际地位。《申报》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电："英方要人消息，……将关税附加二点五，所有原来本税仍交存外国银

行，缴付中央，此二点五附税作为各省政费，俾南北两方无偏枯，此事闻由蓝浦生吐露于陈友仁之前；陈谓南方立脚点重在主权，不重利益，苟自定关税，即收入不到二点五，亦所欣慰。蓝氏以南方口号与维持条约权利之列国见解，无论如何似不能相容，故在汉未能得谈判结果。现在陈友仁正与佐分别（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谈判中，预料南方决不肯抛弃关税、法权、废约等口号，故与日谈判亦必无结果等语。”

依据以上的事实，国民政府虽然被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称为赤色的政府，然而他的确是一个爱国政府，因为他不肯出卖国家换得各国承认。

我们再看反赤政府的对外态度是怎样呢？东方社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电：“张作霖拟令安国军吴外交处长向外交团表示下列各项意见：（一）组织巩固之政府；（二）外交取渐进主义；（三）遵守（不平等）条约规定之效力……；（四）承认对外债务；（五）反对赤化；（六）禁止反帝国主义运动及罢工宣传；（七）知赤化为全世界之公敌，请列国援助对赤之安国军。”张作霖这种对外露骨的表示，本是自从石敬塘〔瑭〕、张邦昌、吴三桂一直到曹锟、段祺瑞这一系卖国贼卖国求援的传统政策，与其说他是军阀政府、安国政府或反赤政府，不如说他是“经纪政府”，他的任务是出卖国家于帝国主义者之经纪。

把两个政府比较一下，人民选择那一个？承认赤的国民政府呢，还是承认反赤的经纪政府？国民政府虽然是赤的，然而他不肯因为要取得各国承认而抛弃收回关税、法权和废约等口号而卖国；经纪政府虽然是反赤的，然而他公然请求列国援助他的安国军，他遂不惜公然向东交民巷摇尾乞怜的包办保护不平等条约，包办禁止人民反帝国主义运动，这分明是卖国，绝对不是安国。人民选择那一个政府呢？

英、日两帝国主义者此时对中国的政策，乃是日本人所谓“两刀政策”，即是一面和缓南方政府，一面援助北方军阀。他们这种两刀政策中所包含的南北分裂意义，我们当然要反对。可是他们这种和缓南方政府的政策，已因南方政府不肯抛弃关税、法权、废约等口号而无结果；同时北方经纪政府高高挂起承揽包庇不平等条约和包办禁止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老招牌，正和蓝浦生所谓“维持条约权利之列国见解”的货色

相投合；如此一来，帝国主义者也许要抛弃其两刀政策，仍旧采用一刀政策，仍旧极力援助北方的经纪政府向国民政府进攻。他们这种一刀政策也许成功，也许和以前援助柯尔恰克，援助但尼金，援助乌兰格尔，援助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同样的失败。

国民政府若因帝国主义者援助北方的经纪政府之进攻而失败，人民应该懂得这并不是国民政府对外政策之错误；人民应该感激国民政府是因为不肯学经纪政府出卖国家主权人民利益以换得各国之承认与援助而失败。

不平等条约不废除，关税不能自主，法权不收回，各国驻华海陆军不撤退，中国还成个什么国家，一切政治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那里会有一点希望?！爱国的国民政府，正因为不忍拿这些足致中国死命的让步而失去各国之承认与援助，中国人民便应该起来承认国民政府，援助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如果失败，全国统一在经纪政府之下，这不仅仅是什么国民政府自身的失败或国民党的失败，乃是中国全民族的失败！在军事上，在财政上，国民政府都正在很困难的境地，爱国的国民政府既不忍负人民，人民便不应该负国民政府呵！

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援助国民政府，并不是空口说白话，急须与以军事的财政的援助。军事的援助应该：(一)青年们喊出“到革命军中去”的口号；(二)城市及乡村人民都尽可能武装起来，铲除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以绝革命军后顾之忧；(三)有组织农民、工人、商人、学生群众发起大规模的“革命兵士慰劳捐”，募集大宗的金钱与用品，分配给革命的兵士，以助军需而壮士气。财政的援助应该：(一)在克服张作霖打倒经纪政府的战争中，我们不要拿地方利益来摇动国民政府中央的财政计划，我们要尽可能的为供给军事需要而牺牲(政府方面尤其是军事当局，当然不应说这样违反民主主义的横话)；(二)关于赋税之负担，不应该拿对待军阀政府的旧观念对待国民政府，即是只宜积极的监察用途，反对政府滥费，反对贪官污吏之中饱，而不宜消极的根本反对增加负担，尤其在克服反革命的战争中，更不能不忍痛增加负担。只广东一省人民已为北伐负担了五千万元，然而吴佩孚的兵队若到了广东，人民的负担与痛苦当然和十室十空的河南一样；张宗昌一到江苏，便要人民负担一千万元

的军用票,每月由孙传芳付他的六十万元还在外;所以为革命战争而增加负担,乃是一般人民特别是资产阶级所必须忍受的痛苦。

人民如果认识国民政府和张作霖的经纪政府有所不同,即应起而承认国民政府,援助国民政府。拥兵五十余万的柯尔恰克,拥兵百万的但尼金,都曾得到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的援助,然而苏俄政府终以获得人民的承认与援助而战胜,张作霖的力量还远不及柯尔恰克与但尼金,国民政府若能努力获得人民的承认与援助,当然可以打倒张作霖及其经纪政府,到那时,各国承认不承认,便不成什么问题。我所以说"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比各国承认更为重要"。可是国民政府要想获得人民的承认与援助,也不是空口说白话可以办到的,必须尊重人民的权利,必须使人民知道不是为政府或个人挥霍而增加人民负担,然后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承认与援助。

1927 年 1 月 11 日《向导》周报第一八二期　署名:独秀



谁 杀 了 谁?

英国兵在中国杀人已成了家常便饭！前年在上海杀人，在广州杀人，去年在万县杀人，今年才开始又在汉口杀人，在九江杀人了！并且他们杀人，不是由于群众的暴动与误杀，乃是由他们国家的巡捕头司令官故意下令开放枪炮轰杀的！即依据他们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平等条约，不知何约载有“即非两国开战时英国的军警长官有任意下令开放枪炮轰杀中国市民的权利”这样的条文?

汉口的英租界“一三”事变，九江英租界“一六”事变，都分明是英国兵杀了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杀了英国兵，英国兵在九江杀中国人的时候，英国兵舰还从旁发炮示威，这是何等横暴的事变，然而伦敦的英国报纸竟称赞英国水兵能够忍耐，上海、天津的英国报纸竟大叫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受了危险，英国政府竟大派其炮舰来中国示威，英国驻华参赞竟到汉口拟向国民政府要求英国人生命财产的保障，反了反了，这竟和寻常刑事冤案一样：杀人凶犯无罪而尸主反来有罪了，真是反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需造一句谣言，上海的《时事新报》向来是不赞助国民政府与民众暴动的，现在只要看十一日该报的汉口通信和九江通信，便知道此次事变的真相了。兹照录该报通信于下：

“汉口事件”之原原本本

汉口英国水兵以刺刀刺杀华人多名一案，略情已见本报，现已成中英间之轩然大波，兹再纪其详情于下：

▲肇祸之真相　十六年一月一日二日三日，为武汉各界庆祝国民

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之期，党部及中央政治学校宣传员，为使各界明瞭庆祝意义，特组织演讲队到各重要地方演讲。前日（三日）下午三时，有宣传数人在一码头江汉关前面中英交界之空场演讲，听众颇多，宣传队派有专人照顾，秩序井然，不料英租界当局认此为挑衅机会，急调大批武装水兵登岸，挖掘战壕，架机关枪十余架，俨然向赤手空拳之听讲民众，取作战之形势。听讲民众，训练有素，不为所动，英兵乃蜂拥上前，实行驱逐。群众知其有意挑衅，乃向华界退却，英兵复大队冲入华界，将刺刀向人群中乱戳，当将海员工会会员某腹部洞穿，立时毙命，又有码头工会会员李大生腹被刺，大肠随刀拖出，血流遍地，命在旦夕，市民方汉山，腰部刺入甚深，亦有性命危险，其余商工各界听众被刺刀枪托杀伤打伤手足及面部者，总计在三十人以上。群众睹此惨状，异常愤激，无不愿以赤手空拳与英水兵决一死战，其时幸经国民政府代表徐谦、蒋作宾，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李国暄、宛希俨，汉口市公安局长张笃伦等赶到，向民众宣示对付办法，力劝民众暂忍一时之气，免受更大牺牲，群众深为谅解，渐次散去，一幕惨剧，始告终局云。

▲公安局之报告　为呈报事，昨日下午二时，据职局警察第六署长戴维夏电话报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一码头中英交界地方演讲，民众聚集静听，秩序井然，乃英人无故调多数水兵登陆，密排武器示威，并干涉演讲，听讲民众，置之不理，讵英兵胆敢以刺刀杀伤数人，徒手民众，因无力抵抗，请派警保护等语。局长比即派督察长饶仁华率领保安队驰往救护，并由电话通知武汉卫戍司令部及前敌总指挥部，速派队前往，协同维护。旋据第六署署长戴维夏呈报，英兵以刺刀刺伤民众祝香山、方汉山、李大生等，并呈缴英兵马枪一枝，上冠刺刀，血迹甚多，随带同王庚书及受伤人祝香山到局；询据王庚书供称，适才经过该地一见英兵持枪刺伤数人，经众将枪夺下等语；复据保安队队长段海山侦缉队队长李清澄报称，英兵又刺伤张义贵、明宿生等前来；局长并亲履该地与英人交涉，撤退英兵，令勿开枪激变，并劝导民众，静候政府处理，幸双方允可，局长以事关外交，即亲赴南洋公司联席会议，报告经过情形；去后，接据督察长饶仁华报称，局长离开该地后，英兵又刺伤一人，不知姓名各等情；据此查此次英兵无故登陆，刺杀民众，幸未酿成巨

变，嗣经局长交涉妥后，复以刺刀伤人，实属野蛮已极，除将枪刀存局待缴外，理合将英兵肇事情形，及已查明之受伤民众姓名，缮单呈祈鉴核，恳向英领严重交涉，以重国权，而张公道。谨呈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

▲各界紧急会议　惨案发生之后，武汉各界民众，悲愤异常，当晚即各分途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付，汉口特别市党部为集中各方意见，更于前晚发出十万火急通告，召集武汉农、工、商、学各团体代表，于昨午十一时在汉口总商会开紧急会议，讨论办法，于是各界代表到者极为踊跃，计有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全省商联会，汉口武昌总商会，汉口商民协会，全省总工会，全省农民协会，全省学联会，全省妇女协会，汉口学联会，汉口妇女协会等二百余团体，代表五百余人，十一时三十分开会，由市党部代表李国暄主席，秦君侠记录。兹将其议决之重要事项，条列如下：(一)向政府之具体要求，代表大会一致议决，对于此次惨案，决要求政府向英领事提出八个条件，限英领事于七十二小时以内答复。一、立即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二、英政府须负赔偿此次同胞死伤之损失。三、英政府须立将肇祸凶手交中央政府依法惩办。四、英政府须立即撤退驻汉英舰及英界之沙包电网等作战物。五、英政府须向国民政府道歉。六、英租界内华人须有集会、结社、游行、演讲之绝对自由。七、英界巡捕及义勇队须一律解除武装。八、英租界须由中政府派军警管理。以上八条件，如英领事在七十二小时内无圆满答复，则请玫府正式通知英领事，以后如再有何种不幸之事发生，应由英国政府完全负责，同时代表大会为求避免以后再有此类惨案发生，更须要求政府自动办理下列各项：(一)立即收回英国租界。(二)立即收回海关。(三)立即取消英轮在中国之内地航行权。(四)立即撤销英人在华领事裁判权。(五)如英领事对于国民政府所提之条件不能接受时，民众决自动封锁英租界，实行对英总罢工。(六)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由总商会通告，严禁买卖英货。(七)五日下午二时在济生三马路，召集市民示威大会，追悼死难同胞，讨论对英办法。(八)通电全国全世界宣布惨案真相。(九)组织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当推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总工会，全省商联会，汉口总商会，武昌总商会，省农协会，省学联

会，省妇女协会，汉商协会，汉阳商会各团联合会，律师公会，新闻界联合会，农工商学联合会等十五团体代表为委员，并即推此十五团体代表，立刻将联席会向政府所提出之条件，口头向政府陈述，以备采纳，旋即散会。

▲当局之办法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自接得各方关于此次惨案之报告后，异常愤激，当于前晚发出紧急公告，宣示民众，原文如下：

>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闻英水兵行凶之事，我同胞一人被杀，数人被伤，政府同人，不胜愤激，政府必当采取适当方法，保护人民，在二十四小时内，当可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惨剧发生，及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希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政府一经决定办法，立即通知人民，于一月四日下午后七时在新市场正式宣布，特此公告。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

昨日下午七时，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蒋作宾等复在新市场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宣布政府对于此次惨案之态度和办法，大致略谓，中央临时联席会议昨晚开会时，对于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所提出之八项条件，决定全部接收，且有先已由外交部分别进行者，故此次之对英交涉，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同时昨晚会议中决定令卫戍司令部派精良军队入驻英界，维持秩序，保护安全，此项命令，已于昨晚实行，最后并勉励民众整齐步骤，维持秩序，共争最后之胜利云云。

新市场大会散后，政府委员又召集各团体代表在南洋大楼开联席会，徐谦主席，由外交部秘书吴之椿，中央党部代表陈群，先后报告交涉经过及派兵驻防英界情形，大致可分二点：（一）外交部对于此案，前晚即已提出口头抗议，限其立刻撤退水兵及义勇队，英领旋于今晨答复，完全照办，并允许中国军警入驻英界。（二）昨日政府已派军队三连入英界，驻英巡捕房后堆栈内，今日决再加派一连前往，营长一人，党代表（陈群）一人，驻英捕房办公。所有在英界之中国兵士，均受党代表之指挥，党代表则受外交部之指挥云。（一月五日）

九江工人与英兵冲突记

枪伤工人一名

外舰发炮示威

国闻社九江通信云：记者本日由南昌赴九江，至九江已钟鸣四下，街市商店，完全关闭，行人往来，如怒潮汹涌，兵士皆荷枪实弹，巡逡綦严。记者睹此情况，甚为惊讶，及过租界，见栅栏门已封锁，门外军警密布，断绝交通，心知系与租界发生交涉。在旅馆安顿行李后，特出外访询，得悉在一小时前，有一工人，为外人用手枪击伤，工人群起救护，遂与外兵冲突，外舰从旁发炮示威，共发二响，因未实弹，尚未演成若何惨剧。驻浔军警，闻风一齐出队弹压，商民亦大动公愤，相与罢市，以谋应付。九江军政当局，除向外领提出抗议外，并电南昌国民军总司令部，严重交涉。（一月六日）

七日九江续信云：九江工人，被外兵击伤，兹经确实调查受伤工人，为伍宜山，已送医院医治，因当时情形混乱究竟此外有无死伤，尚无从明晰。”

又十一日上海《商报》载国闻社汉口通信云：查一三案之受伤者之姓名籍贯伤情如下：李大生，鄂城人，年三十二岁，现充吉田洋行打包工，腹伤甚重，因肠出，已经天主堂剖诊；明宿庭，住济生堂后，肠出，入医院，苦力；祝香山，孝感人，住三新街，头伤；张义贵，黄冈人，住三新街，头伤；方汉三，黄陂人，年十岁，头伤。

此次汉口九江事变中，被英国兵杀伤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明明白白的有：

海员某

李大生

方汉山（即方汉三）

张义贵

明宿生（即明宿庭）

祝香山

不知姓名一人

伍宜山

等八人,而英人被杀伤的是谁?究竟是谁杀了谁?究竟是谁人的生命受了危险?中国人因杀了两个外国教师而失去胶州湾、青岛,现在英国人因杀伤了八个中国市民而退还本应该退还的汉口、九江英租界,丝毫不足为奇。若是中国人在汉口、九江杀伤了八个英国人,试问英国是怎样的态度?或者英国人要说:你们中国人是贱种,杀伤几个不算什么。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

我们再看英国在此次事变前后对中国的态度是怎样。在事变前,驻北京英代办的提案,表面上似乎是采取和缓政策,其实是一面以二五附加税根本拒绝中国收回海关,一面以二五附加税的百分之八十供给张、孙两军阀对南战争。我们复不能忘记在一三惨杀案一周前的"团风事件",即是英国亚细亚商轮"福光号"在团风地方故意撞沉华轮"神电号",淹死四百多人;此案交涉尚无结果,又故意在武汉市民庆祝国民政府迁移的盛典中,施行屠杀,这就是英国承认国民政府之表示。

"一三"惨案以后英国的态度是:(一)运动法、美、日本各帝国主义者一致对待中国;(二)大调军舰到汉口示威(见前文摘录《大陆报》所载消息);(三)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布告,禁止一切含有政治性质之集会游行讲演。

帝国主义者一向把租界当做他们的领土,是不轻易放弃的,他们在租界内剥夺中国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戕害中国人的生命,一向任意行之;租界一天不收回,驻华海陆军一天不撤退,中国人被屠杀的事是不能免的。

上海五卅惨案,不是上海人一部分的事;广州沙基惨杀案,不是广东人一部分的事;万县惨案,不是四川人一部分的事,现在的汉口、九江惨杀案,也不是汉口人九江人一部分的事;从前年"五卅"到今年"一三",都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全民族的暴行与侮辱,全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对英反抗,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男女老幼一律不为英人服役做工,非到收回英租界,永远撤退英国驻华海陆军,收回海关不止!

1927 年 1 月 17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三期 署名:独秀

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
中国革命运动

今天(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是列宁逝世之第三周年,在这第三周年纪念中,令我们回想到"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这句话。这句话是列宁所作一篇短文的题目,在现在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中看起来,非常有意义;列宁自己也曾说:"在这题目的几个字里却含有苦的真理"。

列宁在这篇短文里说:"在文明的先进的欧洲,有极发展的技术,有极丰富的各方面的文化及宪法;现在却到了一种历史的时期,使资产阶级因惧怕那渐渐增长和巩固的无产阶级,不得不拥护一切落后的死了的中世纪遗物,停滞不前进的资产阶级与一切停滞不前进的势力联合起来,以保存那动摇不定的雇佣奴隶制度。在先进的欧洲,是拥护一切落后的东西的资产阶级在那里横行。……也许还可以举一个比较显著的例来证明欧洲资产阶级之腐败,如为了财政的分割及资本家利益的关系,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亚洲各处现在都发生了德谟克拉西运动,并且日见扩大,日见巩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与人民携手去反抗黑暗势力。"

列宁的意思是说欧洲本来是先进的,欧洲的资产阶级在以前反抗封建贵族做德谟克拉西运动的时候也是革命的,可是现在他们因为对内要压迫无产阶级之兴起,对外要剥削殖民地,便不惜联合国内外封建的黑暗势力而反革命,而落后了;亚洲本来是落后的,可是现在他们居然能够起来做德谟克拉西运动,而反抗封建的黑暗势力,而革命,而先进了。

列宁这篇短文,做在去今十四年,即一九一三年五月,正是民国二年三月宋教仁被刺,四月二千五百万镑英金大借款成立之后,列宁此文中所称"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正是指英、俄、德、

法、日五个帝国主义的银行团借款给袁世凯压迫国民党这件事。

列宁若到现在还活着，眼见法西斯的组织遍于欧洲各国，而且在好几个国家取得了政权，眼见欧洲各国的人在中国收买或暗示一切反动分子做反赤运动，眼见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力助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黑暗势力向国民政府国民军进攻，眼见英国兵在上海、在广州、在万县、在汉口、在九江继续不断的屠杀中国市民；同时也眼见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及革命的军队均百折不回的向黑暗势力反抗，全国中德谟克拉西运动的高潮，比之十四年前，更是扩大而巩固，列宁不但更要自信“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这句话是对的，而且要喊出“黑暗的欧洲与革命的中国”了。

“革命的中国!”“革命的中国!”列宁若到现在还活着，必然这样欢呼。可是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在革命的中国，是否也会走到一种历史的时期，使革命势力中一班有落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意识者，一方面因惧怕工农阶级及其政党的势力渐渐增长，一方面为帝国主义和国内黑暗势力投机分子和平空气所诱惑，遂至回头和国内外黑暗、反动、右倾、一切不前进的势力联合起来，向前进的工农群众进攻，在赤的营垒内响应外面的反赤运动，以回复到不革命的中国，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国？

这一问题，我们现在还很难回答，因为两方面都有可能。中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已经显现出两个不同的趋势：(一)武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结合，打倒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当然说不上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政府)，力图国民经济生活之发展；(二)武力与反革命的大商、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懦弱妥协的资产阶级结合，和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调和，在政治上建立压迫工农群众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在经济上输入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第一个趋势将以完成革命的中国，第二个趋势将以造成反革命的中国。依照国民政府的现状及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前进，则可实现前者；国民政府及国民党若把右派的势力与友谊看得比党纲政纲及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还宝重，若把工农势力看得比右派势力更可虑，若不能断然制止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上海大会一贯到底的右派思想

与政策在党内日渐得势，这些党内的右派势力，会和党外的一切黑暗反动派离散削弱南方革命势力联结起来，危害革命之前进，而实现后者。

冯自由、马素、彭养光等所领导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自始即反对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三个革命政策，安福政府称他们为稳健派，打算牢笼他们以消灭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幸而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很一致的坚决的和这班右派决裂，才保存了国民党的政治生命，虽然中山先生逝世了。从西山会议到上海大会，这些右派在组织上虽然不和同志俱乐部是一事，在思想上却接受了他们的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三个政策。左派领袖们对于西山会议、上海大会的右派行动虽然不赞成，虽然说他们是反革命的，至少也说他们是不革命的，虽然尤其反对他们单另组织是叛党；然而一部分人却已渐渐接受了西山会议、上海大会的思想和政策：以为不联俄也可以革命；以为反共反赤不是反国民党；以为西山会议分子究竟比共派还是真国民党，究竟是一家人，宁可联合他们以反共；限制工农运动的呼声也渐渐到处都听见；因此我们可以说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上海大会这些右派分子在组织的运动上虽然失败了，在思想和政策的运动上却是胜利了。国民党左派或者还未曾感觉着这样，而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却已经感觉着了：帝国主义者说："如果国民党稳健派得势，于我们并无什么危险。"奉系军阀和安福系都说："国民党倘能排除赤的分子，孙文主义可以容纳。"又说："与俄断绝关系，鲍罗庭以下均须放逐，蒋介石倘能接受此警告，当与其妥协提携，商讨对内对外政策。"又说："对党军只反对俄化，此外可商。"上海的买办阶级说："国民党虽讨厌，然可作为反对共产党之用。"国民党领袖们将如何选择？接受国内外黑暗反动派离散削弱南方革命势力的提议呢，还是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

我想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都不忍忘记了中山先生临终之言："我死之后，我们政治的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今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当时段祺瑞对电通社记者说："予与孙先生所统率之国民党，自应努力相为连络，国民党果以真正之直道而行，予无不愿提携从事，但如向共产各说之邪道而趋，则本人宿所反对也。"姚震也对东方社记者说："孙氏既死，彼国民党者，鉴于由来之经

过，即终不免于分裂，然国民党中之稳健派，此时有与吾人握手提携之充分可能矣。”当时日本的报纸也说：“以段氏为中心之和平统一，成功与否，胥视其能否与占多数于国民党之稳健派相提携为断。”现在，国民党很危险的试验时期又到了！所谓稳健派（自有中山先生革命运动以来，稳健派这个佳名，即是反对革命者之称），即是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之右倾分子，是否占多数于国民党，是否不受敌人软化而与之握手提携？这不独是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所关，并且中国革命前途是否会因此中遭顿挫！

或者有人说，我们虽然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我们仍然要革命：我们反俄，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反共，同时也反对黑暗反动势力；我们反工农运动，同时也反对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及万恶的资本家。这本是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者的老调，我们听惯了这一片欺人的鬼话，谁也不能相信。即令他们不是欺人的话而真是这样想，也是一个大笑话，试问有没有不分敌军友军一概用机关枪扫射这样滑稽的革命战术？并且在事实上，反俄即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共即是帮助了黑暗反动势力；反工农运动即是帮助了官僚、买办、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

中国社会，现在只有两种对抗的大势力：一方面是革命的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资产阶级乃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并且他们的力量和政治觉悟都还太弱，只能拉他们倾向革命，不能算在革命的势力之内（即最发展的上海资产阶级，一遇孙传芳的压迫，马上通告各界，声明“其向抱宗旨，除关于商业切身利害外，其他各个言论概不预闻”，并且大登其“不与闻政治”的广告。有人询问蒋梦麟先生：什么是中国革命的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挺身参加革命争取政权？梦麟先生说：“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太弱，任何势力能够统一中国不妨害他们的发展，他们都赞成；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还是君主立宪。”梦麟先生这几句话，描写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深刻）。在这样状况之下，国民党右派若反对工农运动，其结果势必走到官僚、买办、地主、劣绅那边去；若当真对两边一齐反对，他自己便悬在空中，有何出路？

负有中国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是中山先生所留给中国一个至

可宝贵的遗产。中山先生临终致苏俄遗书说:“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我们希望每个国民党同志,都要谨守中山先生的遗训,继续中山先生未竟之业,造成革命的中国,先进的中国;切勿效落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拥护一切落后的死了的中世纪遗物,结合一切黑暗反动势力,使中国仍旧是不革命的中国,落后的中国!

在今天列宁逝世第三周年纪念中,自然令我们联想到中山先生逝世第二周年也快到了;也自然令我们回想到列宁和中山先生对于中国革命之遗言。

1927年1月21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四期 署名:独秀

英国帝国主义最近对中国进攻政策

自前年"五卅"事变以来，英国帝国主义者，他们自己屡屡单独的屠杀中国人，越屠杀越引起中国人的民族运动，他们便感觉着自己单独的屠杀中国人还不够，并且不便，于是极力鼓吹各国一致对华政策。不过屡次事变都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单独屠杀中国人这些太明白的事实，不能够引起各帝国主义对中国一致的愤怒。并且各帝国主义者不愿意专为英国效劳而引起中国民族感情对他们自己的损失，于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地位。到了万县屠杀事起，英海军的举动过于横暴了，帝国主义的英国内部在野党也觉得有点难为情，并且想利用这个机会攻倒敌党内阁，于是陷于孤立地位的英国帝国主义内最反动的保守党内阁，复陷于孤立地位。"一三"汉口屠杀事件发生，孤立的保守党内阁异常恐慌，乃采取很巧妙的策略：一面退让，使国民政府为他们暂时看守租界；一面到处大声呼号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危险，在华各国人的生命财产危险，想藉此造成第二次庚子（一九〇〇年）联军对华的局面，以挽救其孤立地位。

可是，帝国主义的英国反动的保守党政府，这种巧妙的政策，并未十分成功。因为被屠杀的只是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或其他国的人，杀人的仍旧是单独的英国，中国人的愤怒也仍旧集中在对英，美、法、日本虽然共同遣派海军防卫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而一般举动尚是慎重观望的态度，只是各国自保其在华权利，而不肯为英国特别效劳。尤其是日本，为了二五附加税问题，且和英国公然反目。

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极力鼓吹的各国一致对华政策仍然未能十分成功，其最近政策乃是：一面用硬的方法，大派海陆军来中国示威，又以二五附加税助张作霖、孙传芳向南进攻；一面用软的方法，诱惑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向他软化，以阻挠急进派的革命运动。

路透社十八日北京电很高兴的说："奉队兵众械利……奉军自称，如实行进攻，一月内可复汉口。"

上海《新闻报》十九日伦敦电："英政府派遣海陆战兵一千名，乘舰名徐伦特，于一星期内开往中国。"

路透社十八日伦敦电："英公司船基芳斯号与基杜南号两艘，泊于桑浦顿已有数月，现从事布置，以便早日运兵往中国，闻基杜南号定于本月二十六日开行，基芳斯号二十九日出发。"

路透社十八日玛尔太电："第一巡洋舰队，除无畏号外，将由波益尔少将统带驶往上海。"

路透社十八日伦敦电："英国查桑濮莱茅及朴资茅之水兵一千人，已奉训令准备开往远东，大约一星期内可出发。十九日由玛尔太出发赴华之巡视，为佛罗比摄号、德里号、丹尼号、龙号四艘，其任务亦在保护英人在长江之权利。"

路透社十九日玛尔太电："第一巡洋舰队，除无畏号外，今晨开往上海，港内英舰均向欢送，舰中兵士欢呼不已。"

路透社二十日玛尔太电："医院船梅恩号，二十日左右偕炮船阿非斯号、莱台葆特号赴华，将由驱逐舰华特勤号、华尔夫林号护送。"

路透社二十日伦敦电："英船梅根狄克号现泊于利物浦，从事布置，以便改作装运水兵前往中国之运兵船。"

以上是英帝国主义者硬的进攻。

上海《字林报》说："国民党内有温和派与极端派，是公开的事。极端派甚憾温和派掌握政府大权。……国民党中究将何派占胜利，关系于外人对于国民政府之态度，实在不小。"

英国某报说："英人在汉口采行温和政策，此事固丧失可发生恨畏之威严，但也在国民党稳健分子中增进英人之声望。"

伦敦《每日电闻报》说："显明之真相，为南政府已放出非其力量所能制之魔鬼，但可欣幸者，英政府现似已看透此中事矣。"

《晨邮报》说："国民党受莫斯科之操纵……英国在列强中最无侵略中国土地之野心，俄国现驱粤人反抗英国，实欲置中国于其势力管辖之下。"

伦敦《泰晤士报》说："英政府在汉口所取极和婉之态度，当可使粤政府表示其是否果真代表中国人士之思想，抑或别有他种势力为主动。"又说："目下仍切望中国国家主义之代表能善用其智慧，乘机表示其政才，其选择全在彼等之手。"

路透社二十日汉口电说："消息灵通各界既信陈友仁亦知排外风潮所酿成之局面，殊形危险，但无力与急进国民党为抗。陈虽屡图以外交手腕修正条约，而若辈则欲用激烈手段。"

以上是英帝国主义者软的进攻。

我们怎样抵御他的进攻呢？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并未打算现在即与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更不主张加害于任何外国的或个人私人机关（商店、工厂、教堂、医院、学校等），我们所反抗的，只帝国主义对于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制度及行为与其陆海军警察对于我们民众或个人之暴行。但今后无论何时，无论是何国陆海军或英国新派来之水兵，如果以枪炮屠杀吾人，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政府军队固不容袖手旁观，即徒手的民众亦不辞与之血肉相搏，以力争吾人之生存与自由。至于帝国主义的工具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等势力，乃是国民革命初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完全解除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的武装，也就是解决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雇佣的间接武装。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软的进攻，比硬的进攻更加厉害。可是国民党中最稳健最温和的分子如冯自由、马素、马君武等，早已被排除在国民党之外，已成为安国政府中的人物，现时国民党中即有比较稳健温和的分子，亦不出卖祖国于帝国主义者，至少亦不忍受中山先生素所愤恨的英国帝国主义者之软化，即令有少数分子如此，亦必不为党员群众所姑容。软化国民党中稳健温和分子之企图，香港政府对广东曾屡试屡败，我们希望国民党的领袖们和国民党党员群众，现时仍须十分警戒，庶几使英国帝国主义者最近软的进攻仍归失败！

1927 年 1 月 27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五期　署名：独秀

谁践踏了谁?

——斥麦克唐纳

自汉口“一三”屠杀以来,英国帝国主义者反而大做其中国人加害于英人及各国人的生命财产之宣传,怎奈是英国水兵杀伤中国人的事实太明显了,美、法、日本各帝国主义的政府虽然取了共同防卫的态度,尚未完全接受英国的提议,像一九〇〇年一样对中国共同宣战;至于他们的舆论:美国的波拉,英国的孟却斯特派,都仍旧相当的表同情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英国的自由党,亦尚未积极的做反中国的宣传,惟有工人阶级的叛徒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首领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尔,竟露出他的真面目,和保守党取了一致的态度。据路透社十五日伦敦电,工党机关报《前进报》载前相麦克唐纳尔论汉口案一文,略谓:

> 此次外交家与水兵均能自制,得免偾事,令人极深钦佩。夫租界为前中国政府许吾人管理,我民托庇于条约所予之安全,乔寓其地,当局若悄然退出,实无理可原。吾人当结一约,谈判之际,宜取保安之寻常戒备。余意往事应加清理,盖时代已不同也。惟清理若听暴众为之,既无益于中国,亦无益于吾人;果尔,则冲突必难幸免,而吾人不能任咎。国民政府任令群众聚集汉口英租界之边界,难辞厥责、显而易见。余固主张租界应归中政府管理,惟群众激昂,是否即为此故?如为此故,曷为法、日租界皆安然无事?况英人退出租界后,界内墙上所贴之标语,非表示中国国民主义,直为仇英而已。吾人其被许和平清理乎?抑此践踏独施于吾人?余用和平二字,窃余望广州外交总长能善用之也云云。

世界的大工贼麦克唐纳尔,他居然对屠杀中国市民的英国水兵表示极深钦佩!他居然拥护帝国主义者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管理租界!他居然咀〔诅〕咒中国为民族自由而奋斗的民众为暴众!他居然斥

责国民政府任令中国民众在中国地方集会之自由！他以为群众激昂只是仇英，而不是为了租界问题，不然何以日、法租界都安然无事；他装着好像不知道“一三”事件杀伤中国人的只有英国水兵而没有日、法等国人这个事实！他和全英国资产阶级的论调一样，以为租界可归中政府管理，但须用和平方法，这完全是欺骗手段。民国以来的外交那一时那一事不和平，而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怎样？在巴黎和会，在华盛顿会议，在国际联盟，北京政府代表那一次不是和平的提议与哀求，中国得到了什么？五卅运动前，各帝国主义者，对于他们自己在华盛顿会议中关于中国关税问题之(二)(三)两条决定(即是：“于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四个月以内，在上海组织改订委员会，决定实行照现行进口税率实行值百抽五，征收附税百分之二点五及奢侈品百分之五。”)，忘记了没有？五卅后在北京召集的关税会议，是十分和平的，有了丝毫结果没有？前年在上海在广州屠杀中国人的凶手是英国人，去年在万县屠杀中国人的凶手也是英国人，此次“一三”汉口事变以来，也并没有一个英国人被杀伤，而中国人被英国水兵杀伤的，前几天我们知道有：

海员某
李大生
方汉山(即方汉三)
张义贵
明宿生(明宿廷)
祝香山
不知姓名者一人
伍宣山

等八人；现在我们又知道还有：

夏兴发
韩奇生
萧中有
李海山
叶泽昆
许士希

朱太平
等七人；并且十一日晚，又有英舰两只，开足马力，并驾上驶，在武穴浪沉货船数百只，溺毙商民无算。这样看来，到底是谁践踏了谁？

大工贼麦克唐纳尔，一面口头上说他也主张租界应归中政府管理，可是要和平清理，即是主张被压迫的民族不应该对压迫者起反抗；一面却坚决的拥护帝国主义者的条约租界等权利，为拥护这些权利，他却很不和平的主张冲突；这分明是欺骗政策！

这班工人阶级的叛徒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首领，在欧洲一向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现在他们又用同样的欺骗政策，帮助资本帝国主义者欺骗东方被压迫的民族。改良主义者在欧洲对工人说：你们不要革命，只有用和平方法和资产阶级协作，可以达到你们生活改良之目的；其结果，和缓了工人的革命运动，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权，被欺骗的工人阶级所得到的，不是生活改良，而只是加时减资饥寒与失业。同时，改良主义者对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也是说：你们不要革命，只有用和平方法，和统治者协作，他们可以帮助你们得到知识、幸福与自由；其结果，和缓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巩固了资本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权，被欺骗的东方民族所得到的，不是知识、幸福与自由，而只是无产、穷困、侮辱与屠杀。

这班巧于欺骗的改良主义者，常常巧于利用各种不同的口号与理论，以达他们唯一目的——拥护反革命与反对革命。当欧战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府争夺殖民地时，改良主义者便帮着资产阶级大喊其“保卫祖国”、“为民族利益而战”等口号，把国际主义抛在九霄云外；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发生时，例如五卅运动时，中国人要求各国人士援助，德国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却回答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不能赞助你们的民族运动。”

欺骗工人阶级的麦克唐纳尔，他就是这班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用和平这一口号欺骗工人阶级和欺骗东方民族，这本是他们出力报效资产阶级同一作用之二方面。当一九二四年麦克唐纳尔及其党徒掌握英国政权之时，他们的殖民大臣汤姆斯（亦第二国际派首领之一）曾向各殖民地代表演说：“请各销除阶级战争，勿发阶级议论。”同

时，他们拒绝埃及和印度民族解放的要求，他们任令香港政府公然帮助商团背叛广州政府，任令英公使公然训令英领事致哀的美敦书于广州政府，声称如果政府攻击商团时，英军舰就要炮击广州；他们对待工人阶级和东方民族的政策，和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保守党内阁没有两样。

现在，麦克唐纳尔对于汉口"一三"屠杀事件的态度，仍旧和保守党没有两样，这本是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之本色。因此，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党人，都应该懂得反对阶级争斗、主张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是什么东西了；应该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阶级争斗与民族争斗、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关系了；应该懂得民族革命的好友是革命的第三国际而不是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了！

1927 年 1 月 27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五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张宗昌的三不知

山东直隶人都说张宗昌有三不知：一不知他自己的兵有多少；二不知他自己的钱有多少；三不知他自己的小老婆有多少。我以为张宗昌未必这样糊涂，张宗昌的三不知应该是：一不知他的兵只能威逼老百姓而不能打战；二不知他的钱多用在嫖赌而不用在军饷之危险；三不知道他的小老婆那几十个是买来的，那几十个是抢来的。

放屁狗的《甲寅》

章士钊拿黄兴的钱办的《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段祺瑞的钱办的《甲寅》，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张宗昌的钱办的《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狗屁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张宗昌在天津赌赢了二十万元，本拟照例赏给侑酒的妓女，薛大可伸手接去，说是拿去和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甲寅》有这样多的经费，所以能够送人看不卖钱。拿张宗昌赏妓女的钱办《甲寅》，这《甲寅》要比放屁狗还下流！可是，薛、章二人拿这笔赏钱全部用在《甲寅》上面还算好，倘若拿若干给他们的夫人用了，那便如何对得起他们的夫人！？然而张宗昌或者很高兴这样！

优伶也赤化了吗？

上海《新闻报》二十日天津电："沪伶刘汉臣、高三奎自京拘押来津，昨晨枪决，罪状系宣传赤化。"优伶也赤化了吗？赤化势力真是无处不到了！恐怕未必罢？或者是因为优伶们着了红衣，涂了红脸罢！

妙哉圣道会！

以前看见报上载有什么圣道会为奉军报捷通电，我以为是一向反对冯军的天主教所做的；最近才知道这个圣道会乃是奉军所设的宣传机关，并且还知道张作霖有函聘章太炎张天师到天津主持圣道会这件事。妙哉圣道会，若再加上白喇嘛，便是三教同归，毛椎盂钵掌心雷一齐活动起来，真个是不可言妙而妙不可言哩！

国民党的敌人是谁？

奉鲁军耀武扬威的要向国民政府进攻，这是国民党人所应该痛心的事；英国在国民政府迁移庆祝声中屠杀国民党的宣传员，还要大派舰队到汉口向国民政府示威，这更是国民党人所应该痛心的事；国民政府治下往往有劣绅捣毁国民党党部及农民协会的事，国民党人更应该大痛心而特痛心；然而他们不大注意这些事，偏偏大声疾呼还未充分执行整理党务案是他们所痛心的(见《现代青年》第九期)。他们大概以为他们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劣绅，而是中国共产党。这也许是稳健办法！

帝国主义的走狗傅筱庵

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是一桩最明白不过的事实；然而有许多人竟不大相信，说这是赤党的宣传。现在傅筱庵亲自对上海先施公司罢工工人说："你们也要反对帝国主义吗？我就是帝国主义！"

1927年1月27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五期 署名：实

革命与民众

邓演达君说："此时只是军事的胜利，尚未达到政治的胜利。"孙科君说："从前的军队不能够与民众结合，不能够为民众的武力，所以会失败。……革命的势力就是民众，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看来，须要使农工及其他各界的民众完全了解革命的意义，然后国民革命才有成功之望。"这些真是革命领袖的说话！

怎样才是政治的胜利？必须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革命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起而拥护此胜利，帮助革命党革命军推翻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拥护此革命政权，这才是革命党之政治的胜利；并不是单靠军事的胜利，赶走敌人，占住政治机关，革命党做了官，便算政治的胜利。

怎样才能够使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们有利的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决不是什么空口宣传主义可以收效的。民众所认识的是事实，所感觉的是切身问题，离开他们的切身问题，离开事实的主义，不会真能使他们相信；反之不兑现支票式的宣传，会使他们发生反感。只有由革命而给他们以切身的利益，他们才真能了解革命于他们有利益，他们才真能自动的为拥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拥护革命，不是为革命而拥护革命，更不是为革命党而拥护革命。

革命党是革命的民众之最急进的先锋，有时自不得不指导民众，革命的民众也自然有受革命党指导的必要，也自然有为革命而牺牲自身利益的必要；可是如若我们革命党侈然自大的向民众说：尔等民众须受本党的指挥，由本党管理，尔等民众须为我们的革命牺牲你们的利益，则民众将不明白我们想干什么。拿这样的态度对待民众，如何能够得到民众！

至于有一班人，终日坐在书斋里，永远不肯屈尊到民众中去而与民

众为伍，不懂得民众的疾苦是些什么，反而大喊“工会是流氓”、“农会里有土匪”、“我们党人是坐轿的农民是抬轿的”这类怪话。这样的大人先生们如果想得到民众，更是等于想坐火车到日本去。

就是能够屈尊接近民众的人们，若是用得着时便极力拉拢民众，用不着时便说一声再会；或者是以为对民众的态度在朝时应和在野的不同；这种人虽然能欺骗民众于一时，到了他们的真面目显露于民众之前，自然要失去民众，并且永远失去民众，因为民众只能够被欺骗一次。

真正的革命主义者，对于实际所许可的固然不肯轻让一步，同时对于实际所不许可的也不愿意乱进一步，民众若有时超过实际可能的幻想，领导民众的革命党便应该努力向民众解释，领导他们从幻想的迷途与危险阵地到能够实际争斗的战场，民众所需要的是这样知己知彼、知进知退、能争善战的先锋，而不是跟着民众后面乱跑的尾巴主义者。因此，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不分在野在朝，对民众应该取这样真诚的态度，并不是在野时便可以故意向左一点，任意发出些不负责任的支票以取悦民众；一旦在朝便向右转，另摆出一副面孔，以前发出的支票一概不兑现或者大打其折扣。所以革命党应该始终以民众的真实利益为前提，万分不应该以自己在朝在野为前提，致前后易其态度，或者是一个党分在朝在野两样态度，一个党前后两样态度或同时两样态度，无非都是欺骗民众，欺骗民众者终于不能得到民众。

古代帝王欲得民心尚须行点什么仁政，况在现今民主主义时代，想得到民众，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须屈尊到民众中去（不可坐在书斋里骂工会是流氓、骂农民是土匪）；第二须与民众为伍利害与共（不可疑惧民众运动的高潮会危害他的政权）；第三须始终一致为民众利益奋斗（不可取在朝在野不同的态度）。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自然不得不需要现成的武力；可是现成的武力若不与民众结合，不得到民众的拥护，也不能够成功一种革命的武力，并且这种离开民众的武力，很容易走到反革命，不会成就革命，即或勉强一时获得军事的胜利，也终于不能保此胜利。所以，“武力与民众结合”真是中山先生留给我们不可磨灭的革命铁律！

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国民军的军队实力强过北伐军，然而前者因为

是单独的军事行动在北方失败了，后者因有南方广大的民众运动为声援，帝国主义者至今不敢轻于直接压迫。一九一一年(辛亥年)中国的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军事上都算是革命成功，然而俄国的革命给了工人农民的政权，给了工人农民的土地与自由，因此得了工农广大的民众之拥护与援助，克服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不但得了军事的胜利，而且达到了政治的胜利，因此才能够保住了革命的胜利以至于今。反之中国的辛亥革命，固然未曾想到工人农民这群下等人在革命中会有什么作用，即当时全国上等绅商所奔走呼号的权利收回(铁路、矿山等)，革命党人亦以苟安在"不侵犯外人权利以免多自树敌"的理论之下忽视了，中山先生提了一提"平均地权"，右派党人便群起堵住他的嘴，说他发疯了；因此，以袁世凯为中心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看清了孤军独战的革命党没有一点民众的后援，他们才敢于乘虚进攻，一面拿金钱官位软化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党中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一面以"和平"、"统一"等口号束缚了革命党一切活动，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根本取消革命党的组织，其结果革命军队和国民党一概被袁世凯解散了，辛亥革命的军事胜利成了南柯一梦！

现在革命军和民众的关系是怎样？北伐军确是遵守中山先生"武力与民众结合"的教训而获得胜利了。可是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九江、南昌的军事胜利以后，革命军和民众的关系渐渐有了一点危险倾向。

我们还未曾听到革命政府有正式压迫民众的举动，除了广东；我们并且知道革命政府现在还做了些帮助民众运动的事，尤其是在湖南、湖北。可是同时，反工农运动之声，到处都可以听到，尤其是在一些军事当局中和财政当局中。在右派分子中更不用说，因为反工农运动本是他们的三大政纲之一。工农本是最受压迫的民众，现在虽然稍稍动了一动，并未曾翻过身来，更说不上抬起头来，便有人大喊"工农运动太过火了"。并且有人以为现在的工人、农民是强者，资本家、地主是弱者；又说什么工农是压迫阶级，资本家、地主是被压迫阶级。这好像外国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中国人动了外国人一根毫毛，便有人大喊野蛮；又好像满洲皇帝屠杀过无数汉人和革命党，革命党人杀几个满洲人或

者是取消几条优待清室条件，便有人大喊暴民专制；都同样是世上不平的事！

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我们的兵士也要学步了，我们也要代兵士说话了；有人说：工农运动开罪于资本家、地主，我们的财政因此陷于困难；更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民众这样做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使我们外交陷于困难。这都是反革命的倾向！

在广东，民团、劣绅和县长、驻防军勾结起来摧残农会屠杀农民的事，近来更加厉害（参看一八三期本报广州通信）；在解决工商纠纷条例中，居然有了“仲裁委员会之判决绝对有效由政府强制执行”的规定，实质上即是绝对禁止罢工；甚至于农工商学联合会也阴受阻碍，连汉案对英示威大会也被明令制止了！

在湖北，“革命军可敬，革命党可杀”、“工人运动太放任了，非管理不可”这类怪话都放出来了！

同时，在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方面，“可与国民党中的稳健分子温和派合作”的空气，也放出来了！

情形颇和辛亥革命胜利后相似，这是何等的危险倾向！

欲援救此断送革命之右倾的危险，欲保持革命的胜利，欲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只有继续遵守中山先生所留下的革命铁律：“武力与民众结合。”

1927年1月31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六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无耻的九省联合会

反对孙传芳的三省联合会①，被孙传芳压迫而无形停顿，孙传芳所雇用的什么九省联合会伸出头来了！三省联合会虽然还未曾集中三省民众的势力，而他们的目的是三省自治，反对孙传芳，反对奉鲁军南下，这的确能够代表三省民众，并且主持三省联合会的人，大半是三省的正经绅商学者。现在九省联合会的目的是"促讨赤首领迅速出兵，收复被寇各省……速电张宗昌、张学良二将军，速予出兵救国，一面仍由孙总司令由长江进兵反攻……并向孙总司令请愿，克复衢州后，即乘胜向赣前进，一面责令叶开鑫部直进九江……又致书张作霖，毋取杨宇霆主张，以大义为前提。"他们所谓九省代表大半是一向不见经传的人物，惟有两个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是江苏代表韩国钧，一个是两粤代表梁绍文。韩是一个腐败老官僚，梁是孙文主义学会一青年（我们希望不是这个梁绍文）。其余各省代表虽然不甚知名，大家也须牢牢的记下他们的姓名，好防备北伐军一到上海，他们也会钻进国民党，像煞有介事的以纯粹国民党员资格，号召反共。现在右派中这种分子很多！

---

① 三省联合会，由全浙公会、新苏公会和全皖公会联合组成。三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为：蔡元培、褚辅成；杨千里，黄炎培；李次山、许世英等。1926 年 11 月 14 日召开成立大会，通电主张：三省为民治区域；一切军政应由推举委员组织委员会处理。

稳健之孙文主义！

电通社廿七日东京电："中国南北妥协之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常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以稳健之孙文主义，实现大同团结。"帝国主义及奉天军阀，又要抄袭段祺瑞软化国民党稳健派的老调了！孙文主义是不是稳健的呢？大叫"真正孙文主义信徒团结起来！"的人们，现在必须在行动上答复这个问题！

1927年1月31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六期　署名：实

“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

“二七”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和军阀血战之第一幕。四年前的今日，中国铁路工人的赤血洒遍了沿京汉路二千余里；血战四年后的今日，在我们的战士我们的领袖施洋、林祥谦等流血地——汉口，才有了公开的盛大的纪念会。这些艰难困苦在我们工人阶级血战史上，都有重大意义，我们不可忽视了！

京汉工友同志们！我们今年的“二七”纪念会，固然是快慰的纪念，更应该是苦痛的纪念。不但纪念过去的苦痛，并且要纪念现在的苦痛。四年前的今日，沿京汉路的工友，都在流血、被捕、失业、恐怖的惨败中，并且这种惨败的空气笼罩了全国各路的工友们，这种惨败苦痛的历史，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三年前的今日，正是惨杀工人的罪魁曹锟、吴佩孚得意之时，铁路工人更为他们所疾视，更受着严重的压迫。二年前的今日，虽当国民军胜利之后，在郑州召集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而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汉口，当时尚在吴、萧统治之下，京汉全路工会尚不能有统一的组织。去年今日，正当奉、直联合向国民军进攻之时，亦是吴佩孚势力复兴之时，同时也是各路工人起来再和奉、直军阀决斗之时，奉、直军战胜国民军，各路工人又回复到严重的压迫之下，京汉工人被吴佩孚第二次屠杀。今年今日，又是怎样呢？京汉南段、粤汉北段的工友固然得着一点自由，尤其是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汉口，已赶走吴佩孚，工会已得着组织及集会的自由，已能够开大会纪念四年前我们的死者，固然是我们很快慰的事。可是除此以外，吴佩孚仍旧在郑州屠杀工友，其余各路都全部归到奉张、鲁张、苏孙这些军阀严重压迫之下，工友们处在以前所未有的普遍的严重压迫中，又加以交通系种种阴谋破坏，连秘密的工会都不易存在了。可以说铁路工友们现在的苦痛，比过去的苦痛更加沉重了！

铁路工友们！你们占住了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机关，各派军阀军事运输的生命操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在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中有无上威力；可是，军阀们也正因此对于你们的压迫，一刻也不能放松。你们对于军阀的战斗，是最有价值的战斗，而也是最艰苦的战斗。

你们的战斗机关——工会，是不能希望在军阀统治之下可以公开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秘密组织，目前非常必要；因为若无任何组织，便无法集中你们的战斗力，便只有任军阀践踏，你们能忍受吗？

最能够破坏你们秘密组织的，还不是军阀，而是交通系的局长员司。没有局长员司的告密与画策，军阀还不能够知道工人的内容；没有局长员司的勾引与护庇，工贼也不敢公然横行；因此，交通系的局长员司始终是你们最切近的死敌！

反革命的交通系局长员司，他们不但在反动势力之下帮助军阀压迫你们；并且在革命势力之下，即如在国民军、国民政府之下他们也可以利用各种机会，想出各种阴谋，挑拨工人与政府间的感情冲突，无论是工人打击了政府，或是政府打击了工人，都是他们得意的事。

铁路工友们！你们对于最切近的死敌——交通系的局长员司，必须和对军阀同样的战斗，因为他们是军阀们最有力而且是最阴险狠毒的帮手。在国民政府、国民军统治之下，你们更须要求参加铁路管理权，不但要肃清交通系，并且要肃清败坏路政的一切贪官污吏，这是我们铁路工人应有的权利与义务。

全国各路的工友同志们！此时你们最切要的口号是：(一)发起秘密组织；(二)破坏军阀的战斗力；(三)肃清交通系。

1927 年 2 月 7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七期 署名：独秀

赤的运动与中国外交

“民众革命潮高涨起来，便用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来和缓一下；民众运动一低落，口惠马上变成假支票。”这本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付殖民地半殖民地惯用的政策。

欧战后，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者发了一些不平之声，华盛顿会议遂在关税、法权上给了中国一点小小的口惠；然而华盛顿会议刚闭幕，他们便一概忘了。到了五卅运动，帝国主义者才把华盛顿会议所允许的小小口惠想起来了，才重新把这小小的口惠来和缓中国的民气；迨民气被奉、直军阀镇压下去，所谓关税会议，所谓法权调查，都丝毫没有结果。现在又来了！汉口“一三”事变以来，在全中国反英运动高潮中，英国帝国主义者又提出准备交还租界、准备交还海关、准备撤废治外法权等口惠，以和缓中国的民气了。我们敢说现在的民气，若仍旧为北方讨赤的军阀和南方取缔过激运动（东方社五日汉口电已有此消息，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亦大书特书：“党政府严禁反英。”）的稳健派共同镇压下去，英国准备给我们的这些口惠，又必然终于是些口惠。英国人现在大叫中国国民党中稳健派和急进派不一致；又大叫和平的合法要求我们可以商量，若用暴力则我们不能屈服，这正是暗示稳健派出来为他们镇压反英的民气。只要反英的民气有人为他们镇压下去，和平的合法要求他们便易于对付了。

英外长张伯伦于一月二十九日在伯敏汉演说：“英国对华方针，自去岁关会开幕以前，即以改变当时英国惟一之愿望……并已准备抛弃其特权……吾人早经感觉有修约之必要，并希望中国统一政府早日成立，俾能开始修约交涉。……中国对于修约要求之原因有三端：（一）因外人领事裁判权；（二）关税束缚；（三）租界制度。英国对于上举三端，均愿予以变更。……但上述提议，不能使其立生效力，因中国尚在内乱

之中。……吾人准备援助陈友仁及任何派之政治家,以政治家妥协之态度,解决一切悬案。”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张伯伦了:我们早已知道你们英国帝国主义者,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时刻准备抛弃特权,时刻准备修约,只可惜八十年来中国始终不曾有统一政府,年长日久,使你们的惟一愿望不觉忘了,只增加了好几次任意屠杀中国人的特权,更增加了辛丑条约,直到今日中国国民运动高涨起来,才将你们心中多年准备而又忘了的惟一愿望提醒了。可是此时中国尚在内乱之中,还没有统一政府,你们多年准备的好东西,仍然是不便拿出来;你们也知道仍然不便拿出来,所以要派海陆大军护送到中国。你们并且知道你们准备的这些好东西会号召出来许多妥协的政治家和妥协的在野名流,一有了这些妥协的政治家与在野名流,你们准备送来的好东西,又不得不从半路上在印度洋乘原船送回伦敦,只好候梁启超所谓“片面的革命行动”高涨时再准备送来。那时候,在野名流梁启超所预备的“我们愿意用国际惯例上正当手续和双方最友谊最谅解的精神作平和的修改”这一桌欢迎酒席,只落得贵客不赏脸而大为扫兴!

梁启超所谓“聪明的英国人”,当然懂得这个;可是愚蠢的梁启超,至死也不会懂得这个,他实在不愿意懂得这个。

事实先生告诉我们:英国每次口中说:准备要送中国的一些好东西,都是因为中国有了“片面的革命行动”,都不是因为有了正当的手续和友谊的精神;采用正当手续和友谊精神的和平谈判而停止革命行动,反而只有使帝国主义者收回去他们口中所说准备要送我们的东西,去年北京的关税会议就是一例。

我们并不拒绝谈判,可是停止革命行动或减少革命行动,而希望友谊的和平谈判得点什么,便是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其结果必一无所得!国民政府必须懂得这个!必须懂得抑制民众革命行动而以和平面孔取悦于外人,本是北京军阀官僚政府的外交秘诀,我们十分不忍看见真有“党政府严禁反英”!

上海《时事新报》公弼先生历数香港罢工封锁、党军控制长江流域、排英口号几遍域内、南方联俄、共产主义博得若干国人之同情、打倒帝

国主义最鲜明之旗帜，都是英国变更外交政策之由来；这是他懂得梁启超所不曾懂得的。

在赤的运动起来给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以前，中国的外交是怎样？北京政府以前敢涉想废约吗？可是现在居然能够宣告废止此约了。关税会议得着了什么？可是现在居然独断的征收二五附税了。以前他们不是视收回租界运动为过激吗？可是现在也居然提议收回租界了。他们以前不是把安格联当太上老祖看待吗？可是现在也居然下令免他的职了。这不是受了赤的运动之赐是什么？不有赤，他们焉有今日，然而他们不思报德，仍然要勾结帝国主义来讨赤，他们真是“食毛践土没有天良”！

什么是赤的运动之目标，我们敢公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人：以革命行动扫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机关，归诸国有；具体的说，即是：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自主权，取消庚子赔款及不正当的外债，取消外人之铁路、盐务、邮政管理权，没收外资的银行、矿山、铁路、航业、工厂及外人所购土地，归中国国有。必须这样，才算完成了民族革命。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外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与侵略。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建设独立的经济势力与文化。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始和一切平等相待的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合作。

谁不否认他是中国民族一分子，谁就应该拿出十分“赤忱”，加入这个赤的运动！

1927年2月7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七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讲容忍的国家主义者

有人主张民众结合军事势力来革命，国家主义者则反对和一切军事势力结合；有人主张民众起来直接行动，国家主义者则又斥为“群众之盲动”、“与中国以莫大之危险而已”；既不要军事势力，又反对群众运动，那么，国家主义者外抗强权的办法是怎样呢？好！现在他们说出办法来了！他们在《对英问题国人应有之态度》一文里说：“暂时容忍英人对我之横暴，再一面督促政府整顿国防……三年，五年，与英作一破斧〔釜〕沉舟之战。”我们对外容忍已经八十多年，今后三年、五年、十年，政府还未整顿国防，我们只好再继续容忍下去，只要我们能够容忍，什么天大的事都没有了。好极了！这就是国家主义者外抗强权的办法！

究竟是谁无祖国？

马克斯的“工人无祖国”这句话有三个意义：一是说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保护工人的祖国；二是说全世界工人阶级应该不分国界的联合起来；三是说各国工人不应该在“爱祖国”的名义之下为本国政府侵略别国，为本国资本家格外多做点牛马；并不是对强权的帝国主义者讲什么无祖国，讲什么打破国界的大同主义。我们也曾说：“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甚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这也就是不对强权的帝国主义者讲大同讲无祖国的意思。实际上，五卅运动中，最为祖

国牺牲的乃是无祖国的工人，而不是你们有祖国爱祖国的国家主义者，你们以为这是矛盾吗？以为这是自己打自己巴掌吗？如果是矛盾，恰恰和你们的矛盾相反。你们号召工人为本国资本家多做牛马时，你们赞成军阀政府侵略蒙古民族时，都大喊祖国；而在五卅奋斗中，你们便把祖国忘了；这就是你们的矛盾。究竟谁个矛盾是合理的，谁个矛盾是反动的呢？

令人肉麻的国家主义者！

国家主义者大骂我们妄倡无祖国，大骂我们不要国家，骂得雄纠纠的满腔热血几乎要喷将出来，像煞是个爱国的勇敢青年。不料当着英国对华出兵，祖国危急之时，这班满腔热血的勇敢青年，却不敢挺身为祖国奋斗，反而缩进龟头，主张“暂时容忍英人对我之横暴”。龟头既已缩进，一面还自夸是“用头颅和鲜血去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我祖国的爱国青年”！还自夸是“愿为祖国捐躯的国家主义者”！这班下作货，不但过去不曾为祖国流一滴血捐一只躯，即将来也不会有这回事。算了罢！龟头缩进去得了，天怪冷的，不用再说令人肉麻的话了！

怎见得我们不要国家？

绝对不要国家，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而不是共产党的态度。共产党对于国家的态度是：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用做控制被统治阶级之工具，前代封建贵族用他控制奴隶及农民，现代资产阶级用他控制无产阶级，将来无产阶级也要用他控制资产阶级，必须一切阶级消灭，国家这个制度才能够消灭。现在，我们正要建设民主的国家，更进而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国家主义骂我们不要国家，骂我们打破国界未免是无的放矢罢！我们奉劝国家主义者，于争夺教员位置及向官厅告密之余暇，略略读书，免得做文章时，笑话百出，令人齿冷；免得当教员

时误人子弟……！

梁启超也佩服英人之忍耐！

分明是英国水兵在汉口杀伤了十五个中国人，而英国报纸反称赞英国水兵能够忍耐，麦克唐纳尔也钦佩英国水兵能自制，最奇怪，有个中国人(?)梁启超，他也说："我们不能不佩服英人之忍耐镇静。"大概他们都感觉得被杀伤的中国人太少，英人若不自制、忍耐、镇静，还应该多杀些。横暴的中国人，竟逼得忠厚可怜的英人这样忍耐！仅仅只杀伤了十五个中国人，这样忍耐镇静的英国人，真值得梁启超佩服！

好高明的稳健派！

有些稳健派的国民党员以为："此时外面的对英交涉和对奉战争还不算什么迫切重大的事，内部的民众过激和共派活动，到是我们的切身之患，非压服下去不可。"我想别的急进党员可以回答他们说："诚然！不但你们这样想，就是张作霖同志、孙传芳同志、章炳麟同志、蓝浦生同志、张伯伦同志，也是这样想，并且正要我们这样办！"好高明的稳健派！

北洋军阀"安"的成绩！

袁世凯为要做皇帝而办筹"安"会；段祺瑞为要把持政权而办"安"福俱乐部；现在张作霖为要做大总统除组织"安"国军外，还办了一个什么"安"国协会；说也奇怪，北洋军阀无论什么举动都不离一个"安"字！据安国协会成立通电，还要发刊"安"国日报，"以提倡士、农、工、商四'安'主义……借宣传之力……为安国(军)之前驱。"其实奉军在北方各

省所做“安”的成绩很多，似乎不必再借宣传之力了！

国家主义者的国家与中华民国

我们曾说：“自孙中山辞总统职一直到现在，只有中华袁国，中华段国，中华直奉国，而没有中华民国。那里有中华民国?”国家主义者因此说我们不要国家和否认中华民国。有人说这是国家主义者不懂国文之故，其实不然。国家主义者以为五色旗下的袁国、段国、直奉国，就是他们的国家，也就是他们的中华民国，现在忽然听见我们说还没有中华民国，他们自然要既惊且怒，并不是因为不懂国文之故。

1927 年 2 月 7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七期　署名：实



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

国家主义者说:“共产党……以为……帝国主义之国家有其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可以牵制其本国政府之行动……此种思想又何殊于梦呓。……英工党领袖、前相麦克唐纳尔在工党机关报《前进报》论汉口案一文。……共产党人读此言论,不知能醒其迷梦否?”

毫无世界知识的中国国家主义者,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现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已经到了什么状况,他们更不知道麦克唐纳尔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居何地位,一见麦氏反动的言论,他们便大喊其各国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是共产党的梦呓。果然是梦呓么?请看下列事实。

电通社五日东京电:日本之劳动农民党发表对华声明书,将努力于国民政府之承认。

路透社六日伦敦电:英海军大臣白里志曼演说:工党在事不干己之中国内战中,择仇英之领袖而拥护之。

路透社六日伦敦电:英国全国工党联合行政会发起,在爱尔白特厅开要求对华和平之大会,到者甚众。

世界新闻社加拿大电:加拿大劳动党主席杜慕牟亚氏于一月二十六日声明:关于中国问题,加拿大劳动者愿与脱离被英国等榨取之中国为友,排斥英国之对华出兵,英国虽有劝诱加拿大出兵之形迹,而加拿大劳动党极力反对出兵云。本社六日北京电:据伦敦报告,柯克(Cook,英国矿工会书记)提议成立“勿侵犯中国会”,并开会讨论援助中国问题。又奥斯露消息,工人大会在该地举行,一致通过挪威工人与中国民族独立斗争休戚相关。又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生活》提议工人应为反对战争而奋斗,并在各城市成立“勿侵犯中国会”。

世界新闻社墨尔邦电:澳洲海员工会驻维多利亚分会已决定通告

各会员，对于凡载兵或运军火至中国之船，一律罢工，不予驾驶。

国闻社七日汉口电：英工党复陈友仁电，极反对英舰来华。电通社七日北京电：据伦敦电告，苏格兰独立工党机关报《前进》唤起群众反对英国在华政策。又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发起几次大会，决议对英国之武力干涉中国提出严重抗议。路透社七日汉口电：陈友仁续接英国工党反对英国集兵中国之来电两通，一系伦敦全国工党联合行政会所发者，重行声明其已详于前电之态度，一系纽西伦惠灵吞工党发来者，赞同英国工党之地位。

电通社九日北京电：伦敦消息，上周内英伦工人举行百数十次大会，提出"和平对待中国"之口号，兰斯勃利(工党重要首领之一)在伦敦工人大会上宣称："中国向英国无从让步，乃当然事；反之，中国则应向英国要求补赎其历年在华所作之罪案。"

路透社九日伦敦电：工党修正致英皇之答词，明日将由特莱夫良在下院提出，该修正文惋惜政府应付中国形势之迟缓，并指陈派兵远东之失望，谓不仅增在华各处英人之危险，且妨碍以爽直承认中国国家独立为根据与中国人民谋取平等与永久友好的谅解之进行，请下院促成立即之变计，而召回已在途开赴中国之军队。

这些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共产党所认为"帝国主义之国家有其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可以牵制其本国政府之行动"，这件事并非梦呓；反而可以证明国家主义者认为各国工人都应爱其祖国，不能希望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运动，这才是梦呓。

国家主义者见了上述的这些事实，或者要大骂加拿大工人、澳洲工人、纽西伦工人、苏格兰工人、英伦工人、英国工党，尤其是英国共产党不爱祖国！可是他们如果也要爱祖国，便不能同情于被压迫之中国人民了，中国国家主义者到底希望他们怎样？

英国若是一个被压迫的国家像中国这样，我们知道英国工人必不能躲在"工人无祖国"的名义之下，一任外国帝国主义宰制而不起来反抗，必不能像中国国家主义者那样提倡容忍。正因为英国也是一个侵略别人之帝国主义的国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要不分国界的打破整个的帝国主义，所以英国工人遂不能站在"爱祖国"的名义之下，帮助本

国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正因要打破整个的帝国主义，所以自然而然的要同情于任何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因此形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在此世界革命运动中，一边是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边是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因此形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及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当然不能和本国的及世界的无产阶级合作）之间相互的同情与援助；因此形成了每个国家的各种革命都是整个的世界革命运动之一部分。无论何国工人，如果他们不同情于被压迫的民族运动，便是不愿意参加打破帝国主义的世界；无论何国民族主义者，如果他们不同情于工人运动，如果他们反对阶级争斗，便是不愿意成就打破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我这些话是对还在参加民族革命运动的人们说的，不是对国家主义者说的。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已经分明站在帝国主义和军阀那边，已经公然在上海法庭拿出孙传芳密令他们在小沙渡屠杀工人的公文，他们已经是反革命者，我们用不着对反革命者谈什么革命的理论！

1927 年 2 月 16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八期 署名：独秀

张作霖宣言之解剖

张作霖最近也发表了一篇什么宣言，这个宣言中举出了他的政纲，如：

保持国家主权；

恢复秩序；

传播教育；

劳资合作；

扩张交通；

改良司法；

中央地方分权；

整理财政；

裁减冗员限制军额；

巩固内外债。

这十件事。在这十件事以外，他还举出了两个总的政纲：一是发展民治，一是剿灭过激主义。

世界各国反革命者到了濒于破灭之时，或者他的势力不敌革命势力之时，往往发出一些空洞而好听的政治口号，藉以蒙蔽人心，挽救其颓势，和帝国主义者装出让步的态度，欺骗殖民地以和缓其民族革命运动，是同样的政策。现在张作霖的宣言就是这样。

张作霖这个宣言是谁替他做的，我们不必问。这个宣言，张作霖本人曾否躺在鸦片床上略略看过，我们也可以不问。我们只知道，张作霖究竟是个什么人和他的政治罪恶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中国人民人人都明白的，就是帝国主义者也未尝不清楚。

张作霖如何保持国家之主权，不但在过去他忠心服事日本可以证明，现在正当英国出兵威胁国民政府对汉口案谈判之时，张作霖也帮着

出兵由河南向正在力争国家主权的国民政府进攻，这更显然可以证明张作霖保持国家主权之热忱。张作霖所谓恢复秩序，不用说是镇压革命运动。他的传播教育，恐怕越传播北京各国立学校越停闭的爽快。他所谓劳资合作，第一要紧是中国境内的外国各工厂各企业的中国工人不要罢工。他所谓扩张交通，想必就是指多扣火车轮船运兵。他所谓改良司法，想必就是指以军令在北京逮捕枪毙邵飘萍、林白水、刘汉臣、高三奎，在上海逮捕谢复生、王汉良这类事。他所谓中央地方分权，不用说是预备在北京失败了再回到奉天做关外王。他所谓整理财政，免不了要推行奉票与军用票。他所谓裁减冗员限制军额，不用说是裁减奉系以外人员，限制奉系以外的军额。他所谓巩固内外债，内债不过是外债的陪衬罢了。

还亏他厚着脸说出"发展民治"这句话！不然！张作霖不但主张发展民治，他并且在此次宣言里说："自民国肇始以后，国家主权已操诸国民之手！"袁世凯不曾大叫"主权在民"，于是代国民行使主权的元首所赏所罚都是民权民意，于是革命党乃成了侵犯国家主权违反民意之叛徒。国民到今天才知道，自民国元年到民国十六年，国家主权原来都操诸国民之手；自袁世凯到张作霖，都是这样继续发展民治！

张作霖此次宣言，人人都知道这是些废话；然而其中也有两句真心话，就是：巩固外债和剿灭过激主义。

张作霖宣言里说："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剿灭过激主义，舍过激党外，皆有商量之余地。"

张作霖这句话，未免过于恭维过激党而令其他党派太难堪了！照他这句话，中国只有过激党是彻底的革命党，只有过激党和张作霖没有妥协商量之余地。事实未必如此，革命的国民党，除少数稳健分子外，那会和张作霖妥协商量！不但国民党，即其他一切党派以至于不大与闻政治的商人，对于张作霖所最热中的最高问题，都有妥协商量之余地吗？舍过激党外，对张作霖的主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最热中的中国南北统治和中日互惠协定这两个问题，都有妥协商量之余地吗？

在张作霖方面，也并非舍过激党外不仇抗任何党派，就算北冯南蒋都是过激党，吴佩孚总不是过激党罢，为什么也要派重兵夺取河南，吴

军已有两旅被奉军缴械，为什么吴佩孚屡次电阻奉军入豫，也竟无商量之余地呢？或者将来张作霖也会说吴佩孚、靳云鹗等有过激嫌疑，伶人刘汉臣、高三奎尚以赤化被杀，何况吴佩孚、靳云鹗！一切异己者，都不妨以过激党头衔加之！

等于废话的张作霖这篇宣言，他的宣言之目的，将丝毫不能达到。他所可恃的还是武力，若只望以政治宣传取胜，算是错打了主意，因为工人早已认识他，不必再要宣言。若只望拿宣言勾结某一部分人，增加他的声势，这也是枉然的事；因为谁和他勾结，谁就变成了反革命而失败。

1927年2月16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八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

北方军阀，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之经纪，是代表封建势力阻止中国进步之恶魔；南方革命政府的职任，是集合革命的势力，扫除军阀的势力，站在革命的民主的意义上统一全中国，而不是和军阀妥协来谋统一。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名为一致对外，实是一致降外，军阀是永远不会和革命党合作一致对外的。佐分利说："南北两政府……双方均不愿于军事上再将积极行动，其间或能发见妥协点，而形成统一亦未可知。"革命的民众们！留心看着！果有谁人敢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之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

中立呢还是共管？

上海是中国之领土，帝国主义的美国提议以上海为中立区，这是什么意思？试问谁对谁中立？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纷纷派遣海陆大军来上海驻扎，一致主张保持上海租界，决不放弃；一方面由美公使向中国建议："划上海为特别区，超出南北漩涡之外。"这分明是主张"划上海归各国共管"，不是什么中立！上海市民所要的，是撤退各国海陆军及孙传芳军队的市民自治，而不是外国军警和孙传芳统治下的中立！

奉天居然想勾结蒋介石!

英日帝国主义者想勾结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和他们妥协以破坏革命运动,已非一日了!现在,更居然公开的想勾结蒋介石!杨宇霆说:"奉军决入豫,以牵制南军而图武汉,而驱逐靳云鹗及彰明通赤者;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见东方社十一日北京电)据这个说话,则奉天方面不独不仍旧指蒋介石是赤,且料他可以和北方军阀妥协,加入他们的讨赤运动;这是何等污辱蒋介石!我们且看蒋介石怎样在行动上回答杨宇霆这个提议!

日本的如意算盘

日本电通社曾传"中国南北妥协之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尝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以稳健之孙文主义实现大同团结。"佐分利亦宣传南北两政府间或能发见妥协点。日本东方社一面电传杨宇霆谓:"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一面电传"蒋介石及其他干部之取缔过激运动"。日本帝国主义者,想一手抓住北方,一手抓住南方,把整个的中国统一在他的势力之下的这种如意算盘,恐怕不容易实现罢!

1927年2月16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八期 署名:实



寸　　铁

稳健分子悔祸投诚的机会到了！

二月十六日上海《新闻报》北京通信说："故杨氏（杨宇霆）此来，只对全盘计划加以决定……一俟豫省问题解决后，然后第二部〔步〕提到对付武汉；不过将来南方如有悔祸之意，能对于赤化分子驱除，奉方亦不愿过为已甚。"好了！奉方杨大人开恩了！他老人家既然网开一面，恩准我们稳健分子悔祸投诚，我们赶快驱除赤化分子罢！否则他老人家动起怒来，一旦要"过为已甚"，我们岂不要和那些激烈的赤化分子玉石俱焚！

不受抬举的唐生智！

电通社十四日北京电："张作霖为促进南北妥协机运起见……于适当时，对蒋介石提议妥协，其所欲提出之试验的妥协条件，北方由张作霖、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何以没有吴大帅?），南方由蒋介石、唐生智、谭延闿、李济琛、冯玉祥等组织一举国的委员制度总揽全国政务。"恰当此时，却有一个不受抬举的唐生智，大叫什么"政权要归还革命民众"！（见上海《新闻报》十四日长沙电）

果然是共产党的梦呓与造谣吗？

国家主义者，不相信帝国主义国家内有些无产阶级同情于被压迫

之中国人民，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梦呓；偏偏英国工界却有“英国工人拥护中国自由协会”(The British Labour Council for Chinese Freedom)之组织。不独英日帝国主义者不承认他们自己是帝国主义，并且有些中国人也不相信世界上真有什么帝国主义，他们口里说时笔下写时，都只用“列强”这个名词，而不愿意用“帝国主义”，以为“帝国主义”这一名词，好像是中国共产党的造谣；偏偏最近各国名士竟在比京布鲁塞尔大开其“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The International Anti-Inperialism Convention)。这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梦呓与造谣吗?

外看强权内储国贼

主张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者，对于英兵来上海示威不曾起来抗一抗，大概他们是主张外“看”强权罢！他们又曾说要内除国贼，可是大为孙馨帅、张雨帅所赏识，大概他们是内“储”国贼罢！

三民主义信徒的双包案

戴季陶曾大喊“真正国民党”和“三民主义信徒”，现在《江南晚报》(邹鲁、张继、居正等西山会议派的机关报)也自称是“三民主义信徒”和“真正国民党”，而大骂戴季陶是鲍罗庭的走狗，是卖国卖党贼。他们究竟那个是“三民主义信徒”，那个是“真正国民党”呢？这种双包案我们实在断不清！

1927 年 2 月 28 日　《向导》周报第一八九期　署名：实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特委会议上发言(札记)

编者按: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与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鉴于当时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主客观形势,当即决定:停止暴动;由上海总工会发令复工;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新暴动;充实市民公会,宣传市民政权;组织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委员"名单:仲、农、炎、松、尹、述、恩、璋",下设以恩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和以尹为首的宣传委员会(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136、137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现将特委会各成员姓名的全称开列如下:

仲:仲甫,陈独秀的字。同志们私下交谈时,常戏称他为老头子,故在特委会记录里对他常写作一"老"字以代表。

农:罗亦农,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党团书记。

炎:赵世炎,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长。

松:何松林,即汪寿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述:彭述之,中共中央局委员。

尹:尹宽,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长。

恩:周恩来,中共中央军委书记。

璋:王亚璋,中共上海区委委员。

特委会从1927年2月23日至3月30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召开过31次会议(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档案),陈独秀出席30次,且到会必讲话。特委会及时地汇总和研究上海党务、工运、青运、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党务、北伐军进军情况、对敌策反以及上海社会

各界动态等等，然后制定出党的政策和方略。现仅将陈独秀在七次特委会和一次中共上海区委会议、一次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他人的讲话同陈独秀的讲话有着直接关系者，略加注释，札录于下。

特委会议记录

——军事、工运、党务等问题

（一九二七年二月廿四日晚九时）

（会上当谈到工人纠察队时）

老：一、纠察队目标组五千，先组三千。

二、自卫团能用手枪，现有三百，目标五百。

三、特别队分两部分……（第149页）

（会上谈到党务工作时）

老：要尽量发展新同志，不好的淘汰掉。部委与工会方面缺少工作人才，现要重新分配。人才来源：

一、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

二、新的工人领袖之失业者，维持他的生活，利用其能力。

（第151页）

（谈到军事问题时）

老：军事问题，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

……

要造成工人群众中夺取武装的野心，工会也要有活动分子会。

（第153页）

特委会议记录

——政治、军事、总同盟罢工等问题的报告和决议

（一九二七年二月廿六日晚八时）

老：各报告中，同志原〔元〕气稍稍恢复，各方工作非常紧张，我们要

加紧做工,尤其是技术工作。

恩来说我们不要占机关,大致上是对的,因我们无甚实力,但兵工厂关系重要,仍要想法夺取。

我意北伐军不到上海,上海无法解决。在将到时,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至于总的市民大会,无甚关系,最要紧的是真正的群众大会,如果有能力,则组小资产阶级也可以的,可不能要做工人运动者去做。至于夺取武装,可以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夺取,惟兵工厂究竟如何夺取,应研究。 (第191页)

(当讨论市民代表会议时)

老:此种市民代表会议,要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功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力量的。

总同盟罢工问题:要决定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不应回到家去,不要为罢工而罢工①。罢工时间,要在松江失守以后,事先要组织广大的交通队,又要迅速的侦探队,又要组宣传队,以便很快的行动。 (第192页)

特委会议记录

一、党务、军事、工会宣传工作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二月廿八日晚七时)

(当谈到未来政府人选问题时)

仲: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我意在名词上要改为民选市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我们要在北伐军未来前,造成很浓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然后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的政府。如

---

① 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中,当宣布罢工后,有部分罢工工人回到家中。

果，北伐军来后不承认这个民选代表，就第二步可以民众提出，重民选正式政府。此运动胜败不可必，全仗事前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好。

（第227页）

特委会议记录

——群运、宣传及军事消息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1]晚九时）

（这次会议记录最后的发言）

仲：为加紧准备工作起见，应规定六号（礼拜日）为准备罢工期[2]。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

（第265页）

特委会议记录

——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指挥人员及市民会议、市政府名单

（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晚九时）

（会议当讨论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具体时机问题时）

恩来：军事消息，松江鲁军[3]要退军，来电要龙头，四点半已开去二个，足证鲁军确在退走。今晨北站及苏州河孟昭月军队已开南京及出海口。此外，吴淞开二次车，载来鲁〈军〉二千，预备撤回，原因是苏州吃紧，早晨北站只一千兵，下午从吴淞来二千，此兵不知为何停止，关系我们明天动作有关系，也许今晚已开走。南市老营盘的兵、兵工厂的炮，都在往北站运。海军，南京的都已调到吴淞，陆战队电报，今天才打。

---

① 二日为三日之误。

② 因为规定六号，所在以三月五日晚九时，周恩来向特委会汇报“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见该日会议记录）

③ 1926年11月19日，孙传芳在天津与张作霖、张宗昌会谈，决定由张宗昌率直鲁联军15万人，携带军用票一千万元南下援孙。

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分五区，引翔港〈管〉靶子场东，杨树浦管靶子路以上，闸北管五区湖州会馆等，小沙渡管四区警署从麦根路来，随时随地夺取武装，做破坏铁路运动，合起来，如果明天无甚宪兵队，就集中青云路开会，如有兵就在火车站以北开会，使兵参加。南市只做骚扰工作。兵工厂有四机关枪连，有人活动，可响应攻龙华，否则，就逼之投降，同时去攻警察厅。如果上海明天无兵力，就在开市民大会后，自卫团等就去拆断梵皇渡等处铁道，使鲁军不能从松江调回。自卫团已组七百，别动队一百八十，浦东已有接洽，有几县保卫团愿响应。器具今天下午收到一万三千款，明天预备去购买，炸弹也要明晨接头。如果明天发动，只少要预备三千元，尚无着落。此外，指挥人才应分南、北市。

士炎：我提议今天讨论集中市民会议及暴动问题，又明天必要开二种会。明天所有消息集中仲甫。

铁路工作，吴淞罢工情形很好，北车站龙头部工人已骚动起来，但未罢下，破坏工作已出发三处，大概终有几处发生效力。

讨论暴动问题：

仲：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

述：太迟缓，我意苏州下或松江下，必要动。因为苏州一下，他必无力顾后路。

仲：我们武力薄弱，鲁军作兴索性蛮动一下。

恩：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①]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我意要集中在明天鲁军是否集中苏州而放弃松江与上海问题上讨论。

仲：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农：指挥机关要统一。

士：负紧要责任的同志，把工作交给次要的同志，主要的同志经常

---

① 毕庶澄：张宗昌的部下。

聚在一块。

农：中央要有一个马上找得到的地点，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指挥处白天此地，晚上在述家。人数区委负责同志及中局负责同志，定期到的时间为七点、十二点，紧急时亦、恩、松、独。

群众集中地：北火车站后面，罢工命令可以不改，但上总要赶发一详细路线通告。

杨、引、小、曹、北都在闸北：南市、法界〈在〉南市体育场：浦东在浦东胡家厅：余如虹口、店员等都在闸北，店员须绕道北四川路到北车站。

指挥人：闸北：士炎、顺章。南市：恩来①、梅坤，如南市不重要恩来调闸北。梅坤、陆震留南市。浦东：禹夫、中华、良为。

工会与党的人员分配：

士炎：上海工会工作，可调胡禹民或笃实。党的工作应加入，我意一飞为做宣传工作。

仲：胡禹民武笃实可调一人，松林仍参加主席团——松、顺章、泊之、复他、笃实。

党的方面：士炎代理书记，亦农参加政治，同时参加主席团，再加派一飞。

暂时决定如上（看这次行动胜负如何，再作最后决定了）。

市政府问题：

仲：代表人数，只少一千人，工人占一半。

工人名单由上总负责，学生由学联负责，我们的要先选好。临时把名单经群众通过，学生一百人，商人二百人，自由职业者一百人，工人与学生要注意妇女与青年。

发号司（施）令，要市民公会出面，所以要特别在事前拉住市民公会。如果商人太多，工人要增加，可多预备候补的，军人只限于军队。

（第281—283页）

---

① 南市区：重要的军政机关如淞沪督办公署、警察厅、龙华司令部等都在南市。特委会原打算派周恩来指挥这里的武装起义。后因闸北区情况复杂，是毕庶澄部队的主要驻地，便调周恩来去闸北区指挥。

特委会议记录

——转送市政府执委会关于复工、市府职权、委员就职等问题的决议，讨论对付白崇禧要解决工人纠察队武装的办法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五日晚八时）

仲：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

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第389页）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

——政治局势的变化与我们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六日上午九时）

农：现在上海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继续奋斗的问题。……现在中心问题就是上总的武装纠察队的问题，上总要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因此，就要与右派军事力量发生战斗。……（第391页）

仲：一、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害的都是C. P。

二、在南京下关英美打死中国1—2千人。

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

留薛①未见有效，但必须作，因薛尚〔在〕沪附近，将来仍有作用。刘是很软弱的，我们仍要联合兵士，缓和冲突。

宣传方面，只宣传江西事件，不提上海。

明天的市民大会，我们要注意把群众分配，我们要在大会上做工作：

一、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

二、将薛调走，上海治安有影响时，问白是否负责。闸北的群众要到薛处挽留。

此外，我们要找商界有力的领袖，与市党部代表去找蒋说薛在沪很相安，如薛走，出了事怎么办？（代表就是虞洽卿、孟心史）防御战争一定要准备。

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反英工作观在只能：

一、作民众的宣传。

二、英厂罢工。

三、排货。

最好要将反英与反蒋联合一起，暂时对日美不管，减少敌人。

（第392页）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

——对付刘峙破坏、市府就职、内部组织、与蒋接洽等问题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八日）

亦农、刻接老先生来函：

大意：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

① 薛岳：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个师的官兵受革命影响较深，驻在上海闸北，公开保护工会，与闸北工人开会联欢。特委会希望薛师留驻上海。27日，蒋介石下令调离薛师。将刘峙的第二师调进闸北，上海工人仍与二师官兵联欢。4月5日，蒋下令将第一、二师全部调离，上海防务统由新改编的原军阀部队二十六军周凤岐担任。

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

罢工问题，老先生第一先决条件要得民党及老蒋同意……

（第428页）

特委会议记录

——政治形势及对策，与何应钦接洽情形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

仲甫：国际有电[①]来：

一、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

二、注意左右派冲突。

（第438页）

---

① 3月3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来电，进一步指示中共“在群众中开展一次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并开展一次反右派的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匆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隐藏起来。”（《罗易赴华使命》，第58页）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怒地把它摔在地下”（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我们目前的奋斗

我们要懂得目前的奋斗是什么，必须先懂得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怎样。

一方面中国的革命运动日渐高涨起来，工人经济的政治的罢工普遍了各大城市；农民经济的政治的争斗，由珠江流域一直达到了黄河流域（河南、直隶、山东）；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军快要占住扬子江上下游全流域；全国思想界逐渐革命化了，至少也挂起了不反对革命的招牌。另一方面，英国帝国主义者增派一万人以上的兵力来向中国革命运动示威，意大利、美国都是英国的帮手；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付中国革命运动，比他国更是巧妙，他在表面不与英国合作，以和缓中国人对日之历史的恶感，而实际上则企图在经济上得到互惠协定以抵消关税自主，在政治上一手拿住奉天军阀，一手拿住国民党的右派即他们所谓稳健分子（日本帝国主义者拉拢右派的方法有二种：一是派一班浪人在上海和西山会议派的老民党，合办一个《江南晚报》，鼓吹反赤；一是派佐分利等一班官僚奔走广东、江西，勾结右倾的军事领袖，使之离开苏俄，排除急进分子的左派及共派，压迫工农运动），使他们俩见面可结婚，实现南北妥协，以根本消灭中国的革命运动。直系军阀可算是已经完全破灭，其余残余部分不归奉即归国民政府，决不能独立存在了；剩下的奉、鲁军，正在河南、江苏向革命势力作困兽之斗。奉系军阀也感觉得自己危险，于是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指挥之下，一面出兵讨赤，一面由杨宇霆、梁士诒、赵欣伯等放出可以和南方妥协的空气，向国民党右派吊膀子，企图软化右派，使右派帮他们讨赤，以达其对南各个击破之计。

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中国渐次高涨的革命势力，已经到了和帝国主义军阀决死战的时期。在这决死战的时期中，不独反革命分子急得张牙舞爪的乱跳，如西山会议派及其他老民党帮着帝国主义及军阀大喊反赤；即自称革命而实际上不能始终忠于革命的分子，受了

反革命之诱惑，也渐渐暴露他们的真面目，想和反革命妥协。并且将来革命越向前发展，反革命势力越感觉得自身临危，越发要拿出反对急进派的口号勾结国民党右派以及资产阶级知识阶级所有的右倾分子，向革命派进攻，以自救其灭亡。

所以中国革命者目前的奋斗，不但要反抗帝国主义，不但要歼灭军阀，并且要严厉的打击想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的一切右倾势力，必须打击得他们没有力量能够扶起垂危的反革命势力。

“一三”汉口事件，正因为在汉口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民众能够合力坚持，帝国主义勾结妥协分子为己助之阴谋未得着实现的机会，所以得到了相当的胜利。

上海的革命运动将来又是怎样呢？孙传芳的势力，可以说是完了；鲁军自徐州到上海，战线长至一千余里，不但上海不易制胜，并且徐州、南京、苏州、常州，都有受攻的可能，这几处有一处被攻破，鲁军便全体瓦解。最后和中国革命民众作对的，还是帝国主义，尤其是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对付中国革命民众，不但用武力直接压迫，并且还要勾结国民党的右派、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妥协分子及一切反动的绅士，向革命民众进攻，逼迫民众向帝国主义屈服，这是很可能的事。

上海的运动要得到胜利，也须和汉口一样，革命的领袖与革命的民众，始终合力坚持，不但不可受右派的离间与恐吓，而且还要合力打击右派，不妥协的和帝国主义决死战！数十万里夫民族尚能力抗法西两帝国主义大军至一年之久，岂有二百余万上海市民反不能力抗英、日两帝国主义之理！只有决死战能得着胜利，妥协就是失败。从今天起，反抗鲁军拉夫，拒绝鲁军军用票，停纳一切捐税，总同盟罢工罢市，夺取武装，响应国民革命的北伐军，一直到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工商学兵等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这便是我们目前的奋斗！

奋斗胜利的保障，只有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民众合力坚持，而不为右倾分子的妥协政策所动摇所恐吓！

1927年3月6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〇期 署名：独秀

国民党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

革命运动中不可没有革命党，这是稍有常识的人所不能否认的。因为革命党人是革命的群众中革命意志最坚决的分子，革命党就是这些坚决分子代表民众利益而奋斗的集合体；革命运动中，若没有革命意志坚决的党（一个或数个）站在领导地位，领导民众，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则革命运动是不容易获得最后胜利的。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地位，是人人都能够认识的。自兴中会一直到现在，三十余年来的中国革命历史，都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党为主要动力，虽然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党内纠纷，不少变节的领袖，离开了党，违背了革命，而另图结合与活动，而革命分子仍然在新陈代谢的现象之下，团结了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领导革命，发展革命。

此次所谓国民党党内的纠纷，也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党内的纠纷，在各国任何大的革命党中都不能避免。非革命原则上的个人感情利害之纠纷，我们固然应该反对，应该极力避免；而由革命原则上发生的意见纠纷，不但不能避免，且不应避免，有时还是万分需要。我们反对非革命原则上的党内纠纷，同时也反对不顾革命原则的党内和平；不顾革命原则的党内妥协和平之断送革命，和不顾革命原则的党外妥协和平是一样，我们都应该不妥协的加以反对。一个党没有革命行动，党内永远不会有什么纠纷，革命原则上的党内纠纷，几乎和党的发展有同等意义。罗拔斯比为什么反对罗兰夫人，多数派为什么反对少数派，孙中山派为什么反对黄兴派与联治派，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什么连伟大领袖杜洛斯基和季诺维埃夫也要反对？这都是因为站在革命原则上，不能够避免党内纠纷，不能够顾及党内和平，其结果党及革命都由纠纷争斗而发展了。所以此时国民党党内纠纷，在落后分子的眼光看

来，是恐怖的是悲观的；在革命分子的眼光看来，是应有的是乐观的，是进步的现象。

最近我们见到国民党的一种印刷品，题名《党务宣传要点》，①颇足表现党内纠纷在革命原则上的意义，兹录原文于下：

“党的意志是大多数党员的意志。要使党尽其作用，第一，须使这意志随时自由的表现出来；第二，更要拥护党的机关，依照党的意志，能去切实的无障碍的执行。尤其在现在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决斗，党内党外危机四伏的时候，更要防止特殊势力阻碍党的意志的表现与执行。所有党员，更须严重监督，遏抑一切黑暗的党外或党内的违反全党利益的企图，须使个人的意志与活动，完全屈伏于党的意志与活动之下。如此，党的权威，才能树立起来，一切权力，才能归党掌握。所以

（一）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个标语。表现党的意志与执行党的意志的最高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除去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决不可有第二个最高指导机关。如果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再有第二个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权力相等以至于权力冲突的机关，那便是党的莫大的危险，所以

（二）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现在最迫切的要求。党的指导机关不能统一，势必造成多头的政治与派别的对峙，而一切反动势力，必将乘间而起，利用党内的矛盾，勾结操纵；同时，一部份党员的活动，必完全受封建思想的支配。封建思想在党员头脑中潜滋暗长，不即加以纠正，必定演成个人独裁，以亲戚故旧同乡同学等等的关系结党营私的弊害。所以党员离开了党的正式指导机关作个人的政治活动，便可以有反革命的倾向。惟统一党的指导机关，使党内每个人都要绝对服从由本党全国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是

（三）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的保障。复次，欲使党的工作，进行顺利，更须使为全党所信任的领袖们，一齐出来领导。自从去年春

①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于1927年1月15日第9次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全文发表于2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

天，直到现在，海内外各级党部，同声一致的要求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可是汪同志仍是没有回来。我们不能不追问汪同志之不能销假复职，是否因有使其不能销假复职的障碍。如果有这种障碍存在，我们全体党员便不能不大家起来消除这种障碍，以贯彻几个月以来全体党员

（四）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的要求。我们更要知道，几个月以来，军事虽然发展，党务政治，反形退步，旧有的新生的问题，千端百绪，只因党的最高机关，权威不振，所以都没有系统的根本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必须要求

（五）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这是目前不容稍缓的。我们同时要要求中央的全体委员，根据革命的利益，充分的行使代表大会所赋与的职权，不受任何特殊势力的拘束。我们更要求中央全体委员，对于党内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份子，以及相与勾结的官僚市侩，彻底肃清，防止他们乘机作恶危害本党，我们要用

（六）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份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

这一宣传要点里所说："遏抑一切黑暗的党外或党内的违反全党利益的企图。""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的保障。""要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据这些说话，当然已经表现党内的纠纷是有革命原则上意义的，决不是什么个人间的感情利害冲突。可是这些说话还嫌不够，至少也觉得含混了一点，未曾明显的具体的指出目前革命原则上的要点。目前革命原则上的要点：一是党内所谓稳健分子，亦即接受了西山会议理论的分子，有和党外的黑暗势力——奉天军阀及帝国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妥协的倾向；二是反工农运动的事实日渐增长，而一般投机分子甚至于反革命分子却如潮涌入，在国民党内组织他们的小团体，占据地盘，并且有计划的向革命分子或明或暗的进攻。这两件事，只要有一件继续发展而不加以纠正，都足以断送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断送中国的革命运动。国民党是中国革命运动之主要动力，断送了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便是中国革命运动之重大的打击。孙中山先生若避免党内的纠纷，若以妥协的态度保全党内的和平，而不坚决

的反对黄兴派，反对联治派，反对冯自由派，左派领袖们若不坚决的反对勾结段祺瑞的同志俱乐部派和西山会议派，试问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今天是怎样，中国的革命运动今天又是怎样？

所以为中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计，为国民党的政治生命计，国民党内革命分子站在革命原则上和右派冲突，这是必要的；我们不应该取非革命的和事老态度，责以避免党内纠纷，在事实上帮助国民党内反革命的势力之继长增高！

1927年3月6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〇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西山会议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

从前有人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谢持气的了不得,以为这是侮辱国民党。可是现在西山会议派的张继,竟在此次上海总罢工中去访问虞和德,商量合作,而以杀工人杀共产党为合作条件,虞和德大不赞成,张继算是白撞了一头包,可见这班右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

党　皇　帝

从前因为共产分子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右派大呼“亡党”。现在国民党北伐胜利了,右派又大呼“党皇帝”,讥诮党皇帝满街走,斥责党政府太专制(见张继做的《江南晚报》发刊词)。试问党既然亡了,如何还有专制的党皇帝呢?

西山会议派打倒了吗?

国民党《党务宣传要点》上说:“我们要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其实西山会议派何尝打倒,他们不但在国民党外伙同日本人在上海办一个《江南晚报》大骂党皇帝;在国民党内,从前号称左派分子,现在居然接受了西山会议的理论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的人要有多少?

投机商人——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左右

二月二十六日东方社汉口电:“此间国民党要人排斥张静江之声甚高;其理由,因张为蒋介石之左近,诸事多为把持故也。”二十七日电通社汉口电:“汉口民党干部之间,一般反对张静江之声浪,渐高唱入云;其理由,以张在蒋介石左右,多有专制行为也。”张静江以假古董和投机商人,一跃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人们本来莫测高深;不过已经是一位堂堂的全党主席,民党干部为何又说他是蒋介石的左右呢?

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

三月一日上海《商报》十六日北京通信称奉系红人赵欣伯(著名的亲日派)关于南北妥协谈话如下:“现在南北两方并无感情之冲突,除共产主义而外,政见相同之处甚多,如欲合作,确有可能之性质,只须南方放弃共产主义,北方未尝不可与之合作。即在蒋中正方面,亦尝间接示意北方,极力辨明南方确非赤化;并谓近来对于共产运动,抑制甚力,决不令其蔓延,察其语意,似亦愿与北方合作。”中国何处有了共产运动,真是活见鬼!除共产主义而外,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除共产主义而外,张作霖真能赞同孙中山的国民党主义吗?这又都是活见鬼!蒋介石是一个有革命历史的人,他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他那肯忍心忘了中山先生临终之言,为军阀所软化而不继续革命?如果蒋介石肯软化,也只是他自杀,无所谓与北方合作!

西山会议派连安福派还不如!

顷见安福派的机关报天津《大公报》评上海总罢工说:“所堪骇愤者,孙传芳官吏,竟在华界大事杀戮,闻竟有数十人或百人之多,致群情

惶骇，居民纷徙，使上海成为恐怖状态。夫运动罢工，纵认为妨害治安，拘之可已，工人手无寸铁，不犯刑事，奈何以盗匪视之，倒行逆施，于此为极！”照这样看起来，西山会议派对于此次上海总罢工态度，连安福派还不如！

苏俄何尝有什么“党化教育”！

自从胡适之发表了称赞苏俄教育的几封信以后，便有徐志摩和瞿菊农一班人极力反对苏俄的党化教育，又有张象鼎一班人极力赞成党化教育。其实两方面都是闭着眼睛瞎说。苏俄共产党，只有在党内对所有党员的教育与训练，厉行布尔什维克化；对于党外一般教育，并没有什么“党化教育”这样丑陋的计划和这样丑陋的名词。至于党员在学校中，在一切民众中，为党努力宣传，和苏维埃国家教育设施乃是两件事。

工友为什么只反对联军不反对党军？

有些反革命者，往往说帝国主义与军阀固然应该反对，同时也应该反对苏俄与中国共产党；可是他们的宣传内容上，只是长篇大论的反对苏俄与共产党，却从来没有一字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和帝国主义与军阀一样的论调反对苏俄与共产党。最近上海总罢工中，上海《新申报》（孙传芳的机关报）所登载的什么全国工人反赤同志会告上海罢工工友一文，便是一例。在这一文里，不但极口谩骂苏俄与共产党而将帝国主义与军阀轻轻放过，并且说：“工友只反对联军，不反对党军，岂不又受了共产党的利用！”又说：“联军驻兵上海就要攻击，党军进逼上海，也应当攻击呀！”试问这是替谁说话？当真有什么全国工人反赤同志会吗？不过是孙传芳同志所雇用的《新申报》主笔几只同志罢了。哈哈！

1927年3月6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〇期 署名：实

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中之悲愤

中国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逝世已经整整二个周年了，我们横览时局，复回忆中山先生的生平，因此我们现在的悲伤，沉痛的悲伤，比中山先生逝世的尤甚，不但是悲伤，而且是悲愤！

在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第三周年纪念中，已经令我们联想到中山先生逝世之第二周年，联想到中山先生对于中国革命之遗言与政策和中国革命之前途。

不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如"五卅"运动和国民革命军之北伐。可是现在去国民革命之完成，前途还甚辽远，革命运动正需急转直下向前发展，以完成中山先生未竟之业；而有些革命意志薄弱的稳健派，自命为不左不右的革命领袖，竟因恐惧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而抛弃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及遗嘱遗言，而停止革命。这岂不是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中最堪悲愤的一件事?!

国民革命军事发展及胜利之最大原因，基于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国民革命之主力——黄埔军，是怎样产生的呢？若没苏俄之援助与共派努力扶助，焉有今日！在东江南路战争中，在北伐战争中，共派军人力战伤亡者几人，孙文主义学会军人力战伤亡者几人，军事当局应该知道；共派号召民众援助国民政府援助国民革命军之宣传与工作，当局也应该知道。国民革命军自从削平陈、林、刘、杨以至湘、鄂、赣、浙诸战争无一处不因有工农民众之援助而获得胜利，几乎每个国民革命军将领都懂得这个，并且有些军事领袖公开的说：此次北伐全靠农民之帮助才得到胜利；即帝国主义者也懂得这个，日本《报知新闻》《论币原外相之对华方针》，谓："以受多数民

众之援助而论，武昌实优于北京，此际不应故意非难南方，以伤武昌政府之感情。”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及奉、直军阀，他们都懂得这个，都懂得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这样强盛，这样胜利，乃是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结果，因此他们(帝国主义及军阀)要破坏中国南方革命势力以自救其危亡，只有勾结南方的所谓稳健派，劝他们离开苏俄，劝他们驱逐共产党，劝他们抑制工农阶级，以此为南北妥协合作的条件。好聪明的帝国主义与军阀，他们知道南方的稳健派若接受他们的条件，实行抛弃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南方的革命势力便离散了，他们(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中国之地位便重新巩固了。南方的稳健派已经在事实上表示接受这样的条件。那里是什么南北妥协合作，简直是向黑暗势力投降，这样还算什么革命领袖，还算什么中山先生的信徒！

现在不左不右的稳健派，所持反俄理由是：苏俄是强国决不能以平等待我；并且诬蔑中山先生当时联俄不过是暂时利用。他们所持反共理由是：共产党党员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他们反工农运动理由是：工农运动太过火了，工人、农民变成压迫资本家、地主的阶级了。他们不但拿这些绝对不合事实的理由来掩饰他们违背中山先生革命政策之罪，他们当中还有人更坦白的说：中山先生的政策本来不能用。中山先生逝世才两年，便有人暗中取消他的政策或更明白的说他的政策不能用，这怎不令人悲愤?!

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实现国民会议，也是中山先生遗嘱之要点：可是自从中山先生逝世一直到现在，虽然每逢开会必读遗嘱，而遗嘱中之要点却无人记在心中，慢说是实力奉行了，这样的读遗嘱，和牧师诵经祈祷宗教仪式何异？以“绝对保护外人”代替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黄郛、龚德柏等再得势，便会进一步宣传“外崇国信”！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同国民会议是一件事，现在居然有人以为鼓吹国民会议并主张根据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组织法成立省民会议、市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是共产党造反，是侵犯了省党部、县党部的职权，是违背了中山先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的方略。他们忘记了国民会议的组织法是中山先生的主张；他们又忘记了中山先生并未曾以

为国民会议侵犯中央党部的职权;他们更忘记了中山先生军政、训政的主张是方法不是目的。若拘执方法为目的,则三民主义中之民权主义作何解释?

“我死之后,我们政治的敌人,定要设法软化你们。你们如今不受软化还要继续革命,他们一定要杀害你们。”这是中山先生临终最沉痛的最后遗言,应该每个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都不会忘记!可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奉天军阀想勾引稳健派使之软化的呼声非常之高,被勾引的人不但没有一字声明,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且称南北两方时有信使往还,并且具体指出李石曾是被派为与奉方接洽的代表,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奉天军阀不正是此时革命北伐的对象吗?倘若这班稳健分子终于被奉天军阀软化了,中山有知,能毋痛哭!

全中国革命的民众们!全国民党忠于革命的同志们!中国的革命是终于要循着进化的历史向前发展的,全国民众革命的高潮,也必不会因少数人妥协软化而中止而低落的,少数人妥协软化,只是他们自己随着黄兴派、政学会、联治派、西山会议派的覆辙而落伍,真正革命分子是不会跟着他们停止前进的,历史更是不会跟着他们停止前进的。凡是革命分子,都应该坚决的继续遵守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遗嘱与遗言,撇开一切妥协软化分子而勇猛前进。必须是这样,才有脸面来纪念中山先生,才真是纪念中山先生,否则中山先生也未必愿意人们假意纪念他!

1927年3月12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一期 署名:独秀

答符琇(军事行动与民众运动)[①]

我们不是反对北伐,而是指出北伐的真正意义,即是说北伐要建设在民众的势力上面,北伐的军事行动中要兼顾到民众的利益。我们也不是反对军事行动,而是说军事行动要和民众运动结合并进,单纯的军事行动,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你以为军事行动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吗?如果你这样想,便是你的终身疑问,恕不能再为解答了!

独秀　三月二日

1927年3月12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一期

附:符琇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你在《向导》某期所教一切,感谢之至!但我不澈底明了,还有点疑问,再烦来函指教。

革命若要成功,凡是有客观眼光的同志,谁都承认非革命基础——农工……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为他们的利益奋斗不可。不过在前两月时,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南有香港帝国主义,东有闽之周荫人,西有久谋得机取粤之唐继尧,北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及其部下一切小走狗,尤其是叶开鑫节节南下,迫近广东。处在四面楚歌之国民政府实甚危险!若不出师北伐自卫,等待全国革命基础——农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1926年10月26日,符琇给陈独秀信,说:"处在四面楚歌之国民政府实甚危险,若不出师北伐自卫,……恐他人南伐于国民政府之围墙下矣!""因此,对于先生所说'军事行动……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总不免有点疑问。"(同期《向导》)

工……组织完善，起来，恐他人南伐于国民政府之围墙下矣！所以我对于先生所说“……这一种军事行动……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总不免有点疑问。此祝

努力！

符琇鞠躬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答王纯礼(革命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党)[1]

一个革命党要承认事实,创造事实,不可掩蔽事实,事实是不肯被人掩蔽的。你只须细细考察:现在是“以党治军”,还是“以军治党”?现在是“力助工人农民”,还是“力助商人压迫工人,力助地主、民团摧残农民”?你亲身在广东,应该看得清楚这些事实。你如果是一个革命分子,便应努力去掉这些反革命的事实,不应掩蔽这些事实。讳疾忌医,那才真是“有碍革命”哩!

独秀　三月二日

1927 年 3 月 12 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一期

附:王纯礼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我是钦仰你的人中一个,对于你的一切言论,没不尊崇的。惟是对于你一百六十一期中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尤其是一百七十九期中“革命与武力”一文,虽认为是先生出于爱护革命的至诚,亦是一般民众与国民革命军应当领受的正当言论,而不是“快心之谈”,可是读了总是有点不高兴。现在不妨把我的意见写出来。

我们知道铁蹄下的民众现在正是无异“若大旱之望云霓”的盼望着革命军,想法去帮助革命军。在这时候,先生偏倡“革命旗帜下的军人,若只知道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在实际行动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买办之剥削与垄断,不能力助农民反抗地主劣绅之剥削与乡村政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权,则不但依然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且保护了军阀势力在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这样如何算得革命军人,这样如何算得武力与民众合作?”之说,似乎把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意思,不是为求工农等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原无异吴佩孚的北伐了。这样一来,岂不惑乱人心,减少一般民众对于革命军的信仰与帮助么?眼下革命军的行动,并没有“不能力助工人……”“不能力助农民……”与依然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事实吧?先生何必要有这些言论,使一般民众对于革命军失了信仰与帮助?

其次如“真正革命军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须懂得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中,革命军人和反革命的军人在实质上究竟是怎样的不同,二须能够服从民众的和党的裁制”及“如果主张‘以党治国’便不应主张‘以军治党’”等话,事虽如此,亦绝对应如此,可是弦外之音,使前方日夜与贼肉搏的将士们听了,如何的灰心!他们为革命而流了多少热血,奋不顾身的杀贼,并没有违反了如先生所说的话,我们不在战场上的人,应该如何勉励他们,赞扬他们,何苦来说这些话,使他们发生了“我们打仗是盲目的么”?“我们不服从民众和党的制裁么?”“我们治了党么?”的感想,随着灰心与丧气齐来?

余外还有点意见,就是先生如见革命军北伐行动上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还是如静江先生所说,以“函电相绳”好些。如“决非一二人函电相绳可以济事”也要请先生慎重一点,免得生出为革命而反有碍了革命!

王纯礼于虎门营次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寸　　铁

溥泉溥泉，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我的老友张溥泉，当初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活泼少年，加入革命同盟会后，改名张继。参议院议长时代的张继，也还是一个热忱的革命者。再游欧洲回来的张继，还力倡民族革命，并且同情工人运动，他亲自对我说："我们现在不能为中产阶级革命了。"国民党改组后的张继，才开始开倒车；然而还主张联俄革命，并责备苏俄为什么不派遣红军来助中国革命。西山会议后的张继，便正式反动起来了；一直到最近，竟赞成杀工人，竟伙同邹鲁等办《江南晚报》反俄反共。三月五日上海各报载：国民党右派中坚张溥泉，因时局关系于昨日离沪。他自己也登报自称中国无他立足之地，从此出国远游，不问政治；听说是因为和邹鲁、居正又有了冲突。他半生历史变化若此，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当年的革命精神又那里去了？

个人的军事独裁之榜样！

云南军界讨唐继尧的通电说："生杀任免，惟凭喜怒，用人行政，漫无是非，省务会议，虚有其名，傥论忠言，无由上达，令出独裁，势同专制，主权在民，纯饰虚声，当今之世，首领顺应民众，以谋公共幸福，其道必昌，首领操纵民众，以图少数便利，其道必亡。"其实个人独裁的军人都是如此，岂止唐继尧一人！

我即党与朕即国家

凡是一个民主主义党的领袖或民主主义政府的领袖，对民众发表意见，照例都称我们，决不称我，这是表示非个人专政的意思。若说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我”[①]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

日本人诬蔑中国革命领袖一至于此！

三月七日《顺天时报》说：“蒋介石……现已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正积极，已倩人提出条件，惟其内容现尚不能宣布。”蒋介石自称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诬蔑他倩人向北方军阀提出条件携手反赤，如此吴、张、孙、蒋成了一家，还革什么命！

全部党军都能够接受张作霖吴佩孚的提议吗？

三月八日上海各报载：张作霖与人谈时局，谓南征在防赤，南方必有自觉之日，收回主权不应用暴力，党军苟驱逐左派，予将抒诚与图统一。又传吴佩孚与南方合作，以驱逐共产党及恢复陈嘉谟、刘玉春自由为条件。大家不必惊讶张作霖、吴佩孚何以看出党军之非赤，在广东在江西，都确有许多反赤的事实；然而张作霖、吴佩孚也勿轻视全部党军都能够接受他们的提议！

---

① 指 1927 年 2 月 21 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 14 次纪念周演讲。

于中国实际政治有经验者是谁？

东方社东京九日电："今日《报知新闻》论蒋介石与共产党之轹轧，谓于蒋氏北伐之动机及思想的倾向观之，蒋氏与共产党不相容，殆无疑义。蒋氏最近优待黄郛、王正廷等，渐渐听从于中国实际政治有经验者之言……"试问黄郛、王正廷与共产党，谁是革命的呢？所谓于中国实际政治有经验者又是谁呢？

1927年3月12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一期 署名：实



答蒋希曾(救党运动)

手示敬悉。“救党运动”,并不是一个坏名词,不但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不过从事此运动须认清事实,要将党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状况中救出,不可将党从日渐革命化的状况中救回老家!右派先生们目睹党日渐革命化,大感“亡党”之痛,起而做救党运动,这一救却糟了!邹、谢等方在上海为日本帝国主义办《江南晚报》,先生倘见此报,当益增感慨。凡是革命分子,即偶涉迷途,终必省悟,先生即其一例。《美洲评论》尚未见过,能赐寄一读否?恽、于诸君俟见面时再询及先生的意见。国内革命工作需人甚急,先生不必久留海外。

独秀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二期

附:蒋希曾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道鉴:

(前略)曾于民国十四年加入国民党,惟加入以后,对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关系不甚清楚,因而义愤填胸,与邹海滨张溥泉谢慧生先生等从事于救党运动;而今思之,不值一笑,种种前情具述于拙著之美洲评论中。惟一向不识先生之通信处,无法请教,恐盲人瞎马,造孽更多。兹见《向导》所载之通信处,特试写数行,如果此信得达,务望先生拨冗手赐数行,指教一切。恽代英于树德宛希俨王一飞诸位,熟悉愚之已往,二月以前已写信与以上各位,未识曾为先生道及否?匆匆草此,余容后尽。敬颂百福。

蒋希曾手上二月十一日

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

我们对于蒋介石总司令三月七日在南昌总部之演讲，有佩服的地方，也有怀疑的地方。

佩服的地方是：他毅然承认“现在我们国民政府同中央党部已经迁到了武汉。”从此政权统一，民众不至感觉于武汉国民政府之外还另有一国民政府而莫名其妙，军阀亦无法利用革命政权不统一而企图操纵；从此党权统一，所有国民党党员不至于感觉得有武昌、南昌两个中央党部而无所适从了。这两件事，都于国民革命之进行，非常有益。

怀疑的地方是：他此次讲演，虽然对于放弃联俄政策和南北妥协这两个流言有所声辩，可惜他声辩的内容反证明了这些流言至少一半是事实。

“凡是以平等待我的国家，我们都可以和他们联合”，这只是我们一般的外交原则；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却根本不是这样。中山先生联俄政策之根本精神有二：（一）是要效法俄国式的革命，这句话中山先生不但在公开的演讲中说过，给蒋介石私人的信中也说过；（二）是相信“自欧战以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这种新政府，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俄国革命以后，斯拉夫民族生出了甚么思想呢？他们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土耳其在欧战之前，最贫最弱……各国更想把他瓜分，土耳其几乎不能自存，后来俄国出来，打不平，助他赶走希腊，修正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到了现在，土耳其虽然不能成世界上的头等强国，但是已经成了欧洲的二三等国；这是靠甚么力量呢？是全靠俄国人的帮助。由此推论出来，将来的趋势，一定是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的或委曲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

权。”(见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山先生毫无疑义的肯定了俄国已经不是有侵略各国野心的帝国主义者,并且肯定了俄国能够抑强扶助,弱者自强起来也全靠俄国人的帮助。实际上中国革命军得到俄国人的实力帮助,决非一般国际关系上什么平等待遇所能有之事,这件事蒋介石应该比国民党任何军事领袖都知道清楚。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是建筑在上列两个根本精神上面,是以革命同志的精神而联俄,是以革命民族联合的精神而联俄,决不单是建筑在一般国际关系上什么平等待遇上面。

可是蒋介石现在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不仅日本,无论那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末,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个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这些说话,若出诸普通商民之口,不但不算说错,而且很公道;国民党军事领袖说出这样的话,在革命政策的立场看来,分明是把中山先生的联俄精神根本放弃了!因为他这些说话之根本态度是把苏俄看做其他强大国家一样,不曾肯定的把他看做是革命同志,不曾坚决的把他看做是革命民族。

西山会议派之反对联俄,人所共知;然而他们也不是明言放弃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也是说:“吾人尝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又说:“吾人于此绝不贸然将苏俄列诸其他帝国主义之林,一反联俄政策;亦绝非盲目的以苏俄之言动皆善,而违反联俄政策之本义。”(均见西山会议派上海大会宣言)蒋介石的说话,与他们的见解何异?他们同样不认识苏俄是革命同志是革命民族,把他和别的强大国家一样看待,今天说:“只要联俄以平等待我,我们对总理联俄政策无论如何不能更动的。”明天便会附会一二不平等待我之口实而更动了!所以东方社十六日九江电称蒋介石最近在南昌演说,曾明言“俄国如以不平等对付吾人,则我等自有对之之道也。”报载蒋之演讲词中虽未明见此语而奔走撮合南北妥协

之日本帝国主义者自然能够察知其弦外之音。

蒋说："我们联合苏俄，并不是联合苏俄一个代表，我们是联合苏俄全体的人民。"可是张作霖逼走加拉罕，又何尝不是说只是反对加拉罕个人而不是反对苏俄全体的人民。

所谓"全体人民"只是一个抽象名词，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人们往往欺负他不能够具体的站出来说话，可以任意利用他。国家主义派主张全民革命，便等于不革命。英帝国主义派兵到中国，也是说合乎中国全体人民的愿望。苏俄全体人民不能通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革命，除了政府的代表或党的代表，更有何种形式可以表现实际的联合呢？

如果苏俄代表真有压迫国民党领袖或侮辱国民党的行动，不但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会起来反对（何以最近党中央全体会议并未曾提及此事，只有蒋一个人感觉着？）即中国共产党亦应该向代表严重警告，甚至于请求苏俄另换代表。若仅仅是因为苏俄代表主张汪精卫复职，若仅仅是因为苏俄代表在国民党的宴席上劝告勿抑制工农运动，便以为是压迫国民党领袖和侮辱国民党，则压迫国民党领袖侮辱国民党者还有百数十万国民党党员和广大的民众，不只是苏俄代表。

北方的张总司令方宣称因苏俄代表辅助国民党而逮捕其家属，南方的蒋总司令则宣称苏俄代表侮辱国民党而欲加以驱逐，所持理由虽不同，而反对苏俄之事实则同，此或即佐分利所谓"发见南北妥协点"，赵欣伯所谓"南北政策相同"之一！

复次，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自正月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各报一致喧传，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东方社与电通社，几乎每日都有此类消息，东京、北京的日本报纸更是言之凿凿，难道蒋总司令都一向不曾知道，何以对于自身关系之事截至本月十二中山先生纪念日告黄埔学校同志书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及报纸之宣传都无一字声辩？一则曰，"在武汉的党员还要造出这种谣言"，再则曰，"他们在武汉的却天天制造谣言"，其于告黄埔同志书中亦说是"造谣煽惑"、"后方捣乱"，并谓："若中正坚持革命不肯放弃一日，则中伤者之作用亦将一日不止。"又谓："彼挑拨是非之徒，意在破坏国民革命军。"其

实，如果是谣言，如果是中伤，则造谣煽惑、中伤捣乱以图破坏国民革命者，不是在武汉的党员，而正是蒋介石现方表示亲近的奔走牯岭、南昌、北京鼓吹南北妥协之日本政党及东京、北京的日本通信社及报馆。最近日本人的《上海日报》非常得意的大字登载十七日九江电："南昌派高唱亲日政策，否认全体会议之议决，决定解雇鲍罗庭。"不向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及报馆声辩，而只痛骂自己的同志，这是绝对无益的事。

奉、鲁军不是整个的，几等于奉直军不是整个的，这是人所尽知，鲁军即尽失其地盘，亦非奉张所深惜。北伐军东下击破鲁军，自是革命势力更进一步之发展，尤为东南人民所欢迎；然而执此以为东报喧传对奉妥协、南北携手对赤之反证，则殊嫌未足。

有人以为李宝章、毕庶澄等时有与南军谈判之事，靳云鹗、陈调元显已归附南方，所谓南北妥协，不过如此。此言亦太滑稽了。北方将领归附国民政府，吾人自可尽量容纳；而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提出政治上的让步条件如东报所传者，向北方军阀首恶谋妥协，这是与北方将领归附国民政府为同样的革命胜利之荣誉吗？

奉天军阀在人心上，在军纪上，在财政上，已到了旦夕溃败的运命，不但北方革命的民众，即一般商民甚至于官僚，都发出"盼望赤军速至"的呼声；而赤军领袖若忽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诱惑，与垂危的奉天军阀谋妥协，以延其残喘，使肃清军阀的大业功败垂成，这岂非革命史上一大错误，并且是一大污点！所以我们的责任，不是盲目的掩饰此时没有南北妥协的运动，而是诚恳的要求国民革命军的领袖蒋介石总司令，立刻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证明所谓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造谣煽惑、挑拨是非、中伤捣乱以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

1927 年 3 月 18 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二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曾琦与薛大可

国民革命军快到上海，国家主义的曾琦逃到南京去，革命军若再杀到南京，他只有跟随张宗昌逃到山东。曾琦由上海逃到南京，改名王奇，不但斩了头而且分了尸；若再由南京逃到山东或北京，便要再行分尸一下改名王大可，将来可与薛大可齐名！

毕庶澄和西山会议派就这样纪念中山！

毕庶澄也发表宣言纪念孙中山先生；可是他的宣言中说："庶澄是奉张孙两帅命令来的，负有保护地方责任的，手枪炸弹是军中常备之物，必消耗几许，以除此害群之马。"照他这样纪念中山先生，会将中山先生气得活转来！然而毕庶澄还只是说说威吓民众，不象西山会议派的老民党，一面在《江南晚报》及做文章纪念中山，而一面却在环龙路四十四号楼上开枪打伤游行纪念中山先生的群众！

西山会议派和英帝国主义同样的纪念中山！

本月十二日中山先生二周年纪念，几乎全世界都有开会纪念的运动，人们对于伟大革命领袖的纪念都表示非常热烈。然而世界上对于纪念此革命领袖的群众表示热烈反对的也有二处：一是西山会议派在

上海环龙路枪伤游行的群众三人，一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在新加坡对游行纪念的群众开枪两次，死六人，伤十一人。

我们冤枉了西山会议派！

上海的《江南晚报》，名义上是西山会议派的机关报，其实印刷机器是日本人的，经常费也是日本人的，经理及编辑都是日本人，报馆里出入的人，日本人多过中国人，他们毫不掩饰，连广告栏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日本商店的广告。我们说这报是西山会议派的机关报，实在冤枉了他们！

帝国主义者眼中之蒋介石

路透社十日汉口电云："国民党之左右派已起冲突，蒋介石为保守分子所公认之领袖。"蒋介石究竟是保守分子之领袖还是革命的领袖，这应由他的行动来证明，别人的宣传和他自己的宣传，都是无用的。

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想推翻国民党的是谁？

国民政府谭主席在武昌中山先生二周纪念会演说："目前党里暗中有少数人与某帝国主义某军阀妥协，想根本推翻本党，这种事实是多么不幸！"(见上海《时事新报》)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上海日报》十七日九江电则大书特书："南昌派高唱亲日政策，否认全体会议之决议。"大家想想看，谭主席所说的少数人是谁？

1927年3月18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二期　署名：实

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①]

——告两党同志书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前〔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的〔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要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党〔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

① 本篇通常称为《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全文以《民国日报》所载为准。〔〕内的字皆见于其他版本。

据郑超麟回忆：本《宣言》由陈独秀起草，汪精卫过目后，两人签署。

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商协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至〔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陈独秀

十六年四月四日

1927 年 4 月 5 日《民国日报》

寸　铁

谁敢再想做中国之爹亚士?

英国史学家魏尔斯(H. G. Wells)的近作《一个新中国震动全世界》一文中说:“关于目下中国时局,其最可注目之点,即此时局显然非任何一个人物所造成者,申言之,在最近十二个月内进行甚速之中国之巩固与再造,并非在若干如爹亚士或墨索里尼式之枭雄指导之下而进行者。”又说:“欧洲列强……耗废金钱及威望,以助中国之某盗魁或某将军,冀其作中国之爹亚士,使中国安全以供欧洲资本家之投资。”现在某将军某盗魁都倒霉了,帝国主义者还只认识个人吗?他们还想雇用何人作中国之爹亚士呢?在这震动全世界的新中国中,还有何人仍敢以枭雄主居,继续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为帝国主义来作中国之爹亚士呢?

英国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了吗?

路透社廿一日伦敦电:“各报皆评论上海之陷落,每日电闻谓今一切多恃蒋介石之态度与彼所能操之势力。”以前英国帝国主义者视广东赤军首领蒋介石若洪水猛兽,现在为什么说要多恃他的态度与势力呢?

稳健派原来如此!

路透社三月二十三日伦敦电:“《孟却斯德导报》论上海之前途

谓……目前时机尤为相宜，因蒋介石所统率之稳健派，或准备协定，视汉口办法更优惠于外人权利之条件也。”我们现在明白了，所谓稳健派原来就是更优惠于外人权利之意！

青天白日旗下之上海新闻界！

北伐军一到上海，《新申报》自动的停刊了，《民国日报》和《中南晚报》都自动的复刊了。最肉麻的是《新闻报》，他本是著名一家帮军阀反对革命政府、帮陈炯明反对国民党的报，而于北伐军到上海之次日，在论前大登其中山先生的遗像与遗嘱。最识时势的是《时事新报》，他远在孙传芳从九江败退以来，就渐渐改变了论调，我们希望他将来不至于很快的回到他的旧路！

张作霖已说出南北妥协的条件了！

上海《时事新报》三月二十八日北京电：“张作霖昨偕赵欣伯接见日本记者团，证明外传出京说不确………本人始终反对共产，南军苟驱俄人，南北不难妥协。”东方社北京廿七日电亦述张作霖对日本记者说：“至南北妥协问题，倘蒋介石能驱逐南军中之俄人，表示诚意，余决不峻拒。”张作霖已说出南北妥协的条件了，且看南军怎样在行动上回答他！

1927 年 4 月 6 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三期　署名：实

答沈滨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1]

沈滨祈
朱近赤先生：

你两位来信所提出的问题虽然不同，而根本是一个问题，即是中国国民革命之归趋，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及其前途。所以我们对于你两位的来信一并奉答。

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将近崩溃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资本帝国主义之各被压迫阶级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初兴时代之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革命的世界环境不同，革命的国内社会势力又不同，所以革命时革命后之政治的构造和经济的建设，便自然和前两世纪纯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同。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百分之九十九不能脱离买办性质，决不能始终忠于国民革命，决没有由他们之手实现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可能，若由他们代替军阀统治国家，仍旧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之统治。只有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脱离帝国主义之统治，才能够力图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才能够不一定经过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因此，中国国民革命之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之手实现国民革命而行向社会主义；(二)是由资产阶级之手联络一切反动势力，在国民革命的假招牌之下，回复到帝国主义的统治。美国式日本式的第三条路，可惜李鸿章没有走，这时代已经过去了。

以上的说话，已经在根本上答复了你两位所提出的问题。以下再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就来信所举的具体事件，略略申说几句。

国民革命成功后，中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只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其在经济上的性质如何，乃依政治上的构造如何而定，即是依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之国家的构造如何而定。譬如在封建军阀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仅只是官〈僚〉营业，而且更便于官僚卖国，外资独占，而更易消灭本国的工业；在资产阶级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不过是私人资本更集中高度发展之一种形式；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以上是答复沈先生的话。

朱先生的说话，有许多我们不能懂得。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当然不能解决全民的痛苦，因为全民中之军阀、官僚、买办、劣绅、土豪的痛苦，各被压迫剥削阶级似乎没有为他们来解决之必要。先生主张要解决“全民”的痛苦吗？赶快去求上帝，或者是学佛罢！你断定国民党革命成功后必压迫农工群众，我们以为不一定如此，必须国民党完全变成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工贼的集团才会如此。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是方法不是目的，共产党之目的是废除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在世界资本主义将崩溃的现代，在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犹未垄断全产业界资产阶级势力犹未强固的中国，如果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能够建立一个民主独裁的革命国家，如果能够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那便自然没有一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了。如果照先生的主张：“直截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这正是国民党极右派的主张，他们正是恐怕国民革命之前途，由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势力造成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环境；他们因此宁愿意让资产阶级结合买办、官

僚、土豪、劣绅、流氓等，以造成帝国主义能够仍旧统治中国的政治环境；他们以为只有这样，才离开了共产党，才没有一点共产主义的色彩，才没有赤化的嫌疑，才是“真正”国民革命。凡是主张“直截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而来真正做国民革命”的人，必然和他们(国民党极右派)走一条路，他将来必然背叛国民革命，因为他已经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所急须要做的事——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

独秀

1927年4月6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三期

附：沈滨祈、朱近赤致陈独秀

记者先生：

“国民革命之归趋”的问题，据李达先生在他的大著现代社会学里说：“……民族革命而苟能成切，必归着于国家资本主义也。”“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非即社会主义也，列宁已先言之矣。”“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将来可以和平达于社会主义，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则在进化过程中，必更有经历一度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国今日一般人对于产业政策之见解，多主张采用劳资协调主义，期以社会政策，节制资本。”“然社会政策，苟可实行，则国家资本资本主义亦可实行，与其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以引起将来之阶级斗争，不如径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之为愈也。”

李先生的主张，是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直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我是很赞成的，未知在事实上，可以行得去否？谨以一百二十分的敬意请求你很详细的解释！

敬祝努力！

沈滨祈于国大宿舍三月三十一日

独秀先生：

我自始就相信共产主义，我虽不曾加入共产党，然我对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却不曾稍懈。我以为现在中国的革命，国民革命，不过是达到

共产革命的一种过程。固然我们要努力国民革命，以期达到共产革命。我们却不可说中国所需要的便只是国民革命。尤其联合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决不能真正解决了我们全民的痛苦。我相信民主独裁实现后，就是国民党革命成功后，将来压迫我们农工群众，必更高明而且利害。那时，我们不继续共产革命，不实现无产阶级独裁制，能够解除我们大多数工农群众的痛苦吗?！现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民党里许多新兴的军阀，便无时无处不想设法压迫工农运动呵！今日读报载先生与汪先生联名宣言，殊使我疑惑，宣言上一则曰，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要一定死版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再则曰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不会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又曰中国所需要的是建设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而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照先生的说法，中国的革命，并不是需要共产革命，尤其不需要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需要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然则不知道先生为什么要组织共产党，一方面促成国民革命，一方面依然宣传共产主义？直截了当的解散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宣传而来真正做国民革命不好了吗？鄙人不敏，窃有疑焉，愿先生明以教之！

朱近赤　四月五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①]

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报告涉及的时期是两年零三个月。因为很忙，准备得不够，不能做详细报告，因此，首先请大家原谅。我只谈谈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报告共分十一部分。

一　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

中国革命在这两年当中有很大进展。它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 1925 年 1 月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到 1925 年 5 月上海事件和郭松龄倒戈；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国民军第一军退出南口；第三个时期，是从北伐开始到革命军占领上海；第四个时期，是从占领上海后到蒋介石叛变。

1925 年 5 月上海事件，使革命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开始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从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起到上海事件爆发，是革命的胚胎时期。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曹锟失败和冯玉祥政变反对直系的时候召开的。当时反动力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如下：一方面，孙中山到达北京，形成了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另一方面，上海发生了二月罢工，这就掀起了小资产阶

① 这份报告译自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翻译的俄文稿，是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找到的。这次由俄文转译成中文时，曾参照另一份五次大会《中央政治报告》（可能是陈独秀报告的摘要稿）的俄文、英文和德文稿作了校订。但是，有些地方的语意仍不够准确、完整，或前后矛盾，或悖于历史事实，或前后文不相衔接和协调，等等。这些可能是当时译成外文时的误译或因不恰当的省略所致。对这类问题，除译者作了几个脚注和编者加了几条注释外，不再一一列注。——原编者

级(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斗争)和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要求而斗争)运动的高潮。因此,这是运动的转折时刻。

1925 年 5 月的上海事件有它的特点。第一,这个运动公开反对帝国主义。在此以前,虽然也发生过反帝斗争,但是并不具有这样的公开性质。第二,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力量已被全国人民所公认。以前,工人的反帝斗争只是被看作工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上海事件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上海事件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引起的。我们知道,上海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所以,上海的每次罢工都不能不引起工人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上海的运动不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运动,必然要扩大到全中国。因为,首先,正如我们所说的,在上海五卅事件以前发生过总罢工和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而这一运动受到了北方军阀的镇压。人民群众懂得,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召集国民会议,于是更加有力地开展了反对军阀的斗争。因此,上海事件才能这样广泛地扩大到全国。五卅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很多阶级参加了这个运动,不仅有小资产阶级,不仅有资产阶级,而且还有落后的官吏和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这个运动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香港和广州等地的工人。然而,为时不久,各个阶级逐渐脱离联合战线,只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

此外,还应当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革命事件对军队的影响。最早是冯玉祥政变反对曹锟,尽管这也是革命事实,但从主观上看他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五卅运动以后,国民军的官兵有了革命认识。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行动,也是由于受到了革命的影响。旧军阀之一唐生智转向广州政府,并参加了北伐。然而,很难断定他们会变成忠实的革命者或是投机派。但是革命浪潮已开始影响军队,这是事实。因此,军阀的反动统一阵线已经瓦解。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困难就在于:被压迫民族没有武装,而压迫者却拥有大量的武装力量。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人拥有相当多的武装力量,尽管大部分武器掌握在军阀手里,可是我们能够夺取过来。我们能够使军队具有革命意识,并把军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我们能够直接夺取军阀的武器,并用它来

反对军阀。

从上海五卅运动开始到郭松龄倒戈，乃是革命发展时期，即革命高涨时期。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者既然不能用武力镇压中国革命，就只好做出让步。他们召开了关税会议和治外法权会议。这个时期，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分歧。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在威胁无产阶级，并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者和北方军阀实行妥协，其目的是镇压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戴季陶主义起初只是企图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而此刻却打算把这种力量完全消灭干净。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已公然向无产阶级进攻。以前，在革命高涨时期，即上海总罢工时期，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冯玉祥的军队转向革命方面。郭松龄倒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走狗张作霖。因此日本不能不进行公开干涉，以便压倒郭松龄。郭松龄失败后，革命浪潮低落下来。在革命浪潮低落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组成联合战线向革命进攻。国家主义派大力宣传反对赤色危险。国民党右派召集西山会议，将国民党分裂成两派，他们的活动至今仍在继续进行着。

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南口失陷，这是革命运动低落和反革命高涨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七八个月之久。经过这次反赤运动，在帝国主义之间和军阀之间均发生了分裂和冲突，日英两国的冲突和奉直两系军阀的冲突就是例子。这些事实都发生在举行北伐之前。

第三个时期是从北伐开始到占领上海。这个时期的标志是革命运动的高涨。3月20日事件固然是反动时期的因素，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企图利用无产阶级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无产阶级也想与资产阶级合作，依靠他们的力量，所以这两个期望进行北伐的对立阶级实行了合作。在3月20日事件以后，尽管工人阶级的处境困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仍旧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一运动发展到占领上海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已得到加强，因此资产阶级不能再继续与无产阶级合作，而转到了反革命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两个不同的阶

级，以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明显，是潜伏着的，现在这些矛盾已十分明显。

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事件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些事件与过去的事件不同，因为资产阶级已退出革命阵线。尽管革命队伍的数量减少了，但革命群众的质量却提高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得到极大的巩固。

从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来看，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发生明显的阶级分化。应当使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进行加强军队中的左派运动的工作，以便更加提高军队的革命情绪。我们必须完成这两项任务，因为这会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

党在上述各时期的策略

在第一个时期，在五卅事件准备时期，我们举行了经济罢工。那时我们是孤立的，必须利用小资产阶级，让他们与工人一道参加经济斗争，从而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这是五卅事件前的策略。这一时期的策略的第二点是召集国民会议。孙中山北上时，党内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广州的同志和一部分俄国同志认为孙中山北上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反对这一点。广州的同志认为随着孙中山的北上，革命运动可以扩展到广东范围以外。中央的意见是：孙中山留在广东可以巩固广东的革命成果，从而肃清反革命势力。这些观点的差别是，一部分人希望发展革命运动，另一部分人主张巩固革命运动。现在，回想起这些争论，我们觉得，当时中央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孙中山北上，扩大了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这个成果很重要，因为如果孙中山留在广州，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当时广州的军队都是反革命的，任何巩固革命力量的工作也不能进行。

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有两个有利的因素：(一)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已在全国展开；(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工作已扩大到全国。当时党在策略上的错误，不是缺乏积极性，而是不了解孙中山北

上的意义，没有看到他北上对全国革命发展的影响，只是看到孙中山与唐生智会见①的危险性。

党在五卅运动时的策略，起初是吸收各阶级参加这一运动，可是当时党并不相信有进行全民革命的可能。事实上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左派参加这一运动，是想保全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右派也是为了自己才极力利用这一斗争，但并不积极参加斗争。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方面又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必然脱离这一运动。小资产阶级则采取中间态度。结果，只有无产阶级孤军作战，而军阀则有可能镇压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是党的策略错误造成的，而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资产阶级不仅不愿受我们领导，甚至不愿与我们联合。五卅运动中有许多独特现象。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影响了军事工作。当时党已注意到对军队的领导，并决定对军队的先进部分进行工作。决不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把整个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我们的敌人说我们想用这种策略来掩盖我们和军阀的勾结，可是我们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条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必要的策略。过去，由于实行这种策略，我们已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这方面没有任何错误。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

中等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已经自觉地行动了。戴季陶在其小册子里就指出了这些事实。他的小册子不是偶然发表的，也不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他的小册子里写道，资产阶级已成为自觉的阶级。这本小册子必须读一读。

这种理论后来就形成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没有在革命战线里呆很久。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决定同帝国主义者妥协，所以，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很快就背叛了革命。我们当时已经非常坚决地反对了戴季陶的理论。早在 1925 年 7 月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1925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会上，我们确认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五卅事件证实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感觉到无产阶级的危险

---

① 原文如此，可能有误。孙中山北上是会见段祺瑞。——译者。

性，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队伍。戴季陶反对无产阶级的小册子，反映了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恐慌。在全会的决议里，我们指出，一方面，我们应当反对戴季陶的理论，另一方面，应当联合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同时，还应当进行独立的工作，一旦国民党离开我们，我们好有所准备。决议就是根据这个精神起草的。现在当我们考察这个决议时，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不正确的成分。发展和巩固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这点是正确的；而准备退出国民党，这种策略则是不正确的。毫无疑义，我们没有理由退出国民党，我们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做工作。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不明确，只有蔡和森同志非常坚决地反对。由于这个决议，使得我们的策略很不明确。关于准备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决议里没有谈得十分清楚。①问题的这种提法，只是使我们产生思想混乱。这里所说的是为准备而准备的问题。

关于资产阶级走上妥协道路的问题，从上海五卅事件时所发生的

---

① 上文说北京扩大会决议曾提出了“准备退出国民党”，这里又说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谈得十分清楚”。这些说法与扩大会的决议都是不相符的。十月扩大会决议既没有“准备退出国民党”，也不存在论述“不清楚”的问题。十月扩大会有两个决议谈到了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

一、《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的第七节即最后一节“中国共产党之职任”（五）在分析指出了国民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的代表，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促成了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和提出了阶级妥协口号等等之后，明确写道：“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别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所以我们应当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能扩大这一联盟。”

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分析了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的出现和国民党从1924年改组以来内部的分化，指出了戴季陶的小册子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思想政治理论上的形成等等之后说：“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又说：“具体说来，应该：

（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及组织之独立与扩大，尤其是在广东；

（二）工农群众之获得；

（三）非必要时，我们的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四）在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我们应竭诚与之合作，逼迫他们积极的用全力参加民族运动，不可有意的避开他们，让他们立在消极的旁观地方；但同时在一切运动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行动，我们对他们丝毫不能让步。”——原编者

一系列事实中可以看出来。不仅大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联合战线。

我们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已注意到农民问题。农民中的多数不是地主和一般农民，而是贫农和无地的农民。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联盟，就会发生小地主反对无产阶级的危险。小资产阶级甚至可能与小地主联合起来。我们懂得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懂得了进行农民运动的必要性。事实证明，没有农民，无产阶级就要失去活动能力。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以后，不仅在广州，而且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各省，我们都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湖北省，我们的同志注意了农民工作和农民运动。湖南省的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有将近1 000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了①。这个策略没有错误，我们必须继续实行。现在党内农民占18%。中国人口大部分是农民，据我看来，将来党内农民的数量应与工人的数量相等。在不久的将来，农民在党内应占30%左右。我们不仅应继续实行我们对农民的政策，而且应继续把农民吸收到党内来。

在五卅运动中，还有一个香港罢工的问题。香港罢工(抵制)，使香港受到破坏，至今尚未恢复。这次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肃清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方面，积极支持了国民党。罢工持续了一年多。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功绩。关于这一罢工问题，党内有两种意见：一些人主张尽快结束罢工；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者本身也不愿意结束罢工。从原则上说本来应当尽早结束罢工，克服这些困难。幸好，我们同志的工作和国民党左派政权的工作做得好，又有国际的经济援助。由于这三个条件才没有发生危险。如果没有这三个条件，罢工再拖延下去，必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就会失掉工人对我们的信任。现在李济深破坏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这个责任不在我们。

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开始到南口失陷，这是反动时期。

在郭松龄倒戈时，革命似乎仍处于高涨时期。但实际上这时帝国主义已开始进行干涉。当时北京的同志想组织“首都革命”。愿望倒是

---

① 此处的数字，如是指农民协会会员，则可能有误。因为截至1927年6月的统计，湖南农协会员只有450多万人，全国合计才915万多人。

英勇的，然而是错误的。第一，当时对国内政治形势没有作出明确的估计。第二，他们忘记了脱离武装力量的殖民地革命的危险性。他们没有同国民军合作，想独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行动是幼稚的，虽然这也是英勇的，但英勇得太过分了。这个危险的政策，是北方同志没有经过党中央的同意而擅自决定的①。

现在我们对整个五卅时期的政策做一个评价

在广州，一方面，战胜了陈炯明，另一方面，平定了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叛乱。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为了反击封建地主而同资产阶级共同完成的。这些地主不仅仇视无产阶级，而且也仇视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因此，当时曾策划暗杀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和谭平山等人。然而，暗杀这些人的活动未能得逞，只杀了一个廖仲恺。这次暗杀阴谋是封建反动分子在他们军事失败之后干出来的。他们在社会上还保留了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攻的某些力量。这一点从暗杀名单上可以看得出来。廖仲恺被害的过程，暴露了胡汉民、许崇智、熊克武与陈炯明的关系。许崇智以前曾和我们一起进攻过陈炯明，而现在却同他勾结起来了。当时我们并不反对广州政府惩办这三个人，但我们的中央认为，广州政府当时没有公开阐明这一政治罪行，因此社会上对它认识不清楚。右派分子说，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压迫国民党，并把胡汉民遣送到

---

① 上面一段关于“首都革命”的分析应当说是对的。但这句话却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出入。

1925年12月1日的党、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一开始就说：“数月以来，本党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并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及革命的国民党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强调指出并号召：“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在民国十四年军阀混战史上，现出一条政治变动之新的道路。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

12月2日，党中央又发出六十六号通告，认为“目下各地民众的示威运动非常重要。北京的民众示威各地即须响应，吾校[党]各地分校接到本校[党]及少校(即青年团——编者)合发之告民众书(即《为郭松龄倒戈告民众书》——编者)，应即翻印广布；同时即应努力召集群众大会，做打倒段政府的示威运动并即发散各项文电。”之后列举了(一)通电攻击亲日卖国的安福政府应即解散；(二)致电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质问其政治立场，促其推倒段政府；(三)致电郭松龄，促其站在人民方面，勿作日本之傀儡，勿拥护亲日卖国的段政府，……”——原编者

苏联。对此，国民党没有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如果进行了，那至少别人就不会认为这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阴谋，而会认为这是党内的个人冲突。由于没有进行政治宣传工作，所以这件事便失掉了它的政治意义。

在反动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州的3月20日事变。去年的3月20日事变是在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发生的。蒋介石就是武装起来的戴季陶，他的所做所为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戴季陶主义形成以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学会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是为镇压无产阶级而成立的。3月20日事变发生的原因虽然很多，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阶级矛盾。戴季陶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镇压无产阶级，甚至镇压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在这个时期，党的策略并不是一致的。首先，我们党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是，我们当时应采取进攻的策略。他们说："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3月20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3月20日事变。"

然而，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这就是说，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力量留在联合战线里。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而在广东工作的中国工作人员和鲍罗廷却认为，如果我们不去镇压国民党右派，我们就不能巩固同左派的联盟，这个意见也是正确的。但在3月20日事变以前，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国同志都没有向中央谈过我们能够镇压蒋介石和援助左派。

鲍罗廷同志坚持认为，共产党员要退出黄埔军校，甚至今后也不要在军队里进行工作。可他事先也没有就此向中央提出过任何建议。

这就是说，他事先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只是在3月20日事变以后才提出来的。镇压蒋介石，就可巩固同左派的联盟，这在理论上是正

确的，但在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是不够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3月20日事变中的策略问题，而且是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应当如何退出同资产阶级的民族联合战线，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要资产阶级的援助而独立地进行革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公开进攻资产阶级等等的问题。现时，党就面临着所有这些问题。

国民军第一军在南口遭到失败以后，①广州军队的北伐开始了，革命浪潮又重新高涨起来。从占领湖南省后直到占领上海期间，农民运动在某些省得到了发展。在收回汉口的英租界后，中国革命不仅席卷全国，而且还威胁到资本主义世界。

关于北伐问题

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会议决定了关于北伐的问题，但直到5月，北伐军才开始北进。在召开北京会议时，吴佩孚已准备进攻广州。

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来到上海，给我们作了分析中国政治形势的报告。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北京会议的决定，但我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

当时我曾打电报给北京，电报中说：第一，必须解决北伐问题；第二，党中央应当留在北京。

共产国际代表去广州考察那里的形势，适逢3月20日事变。我拍电报给汪精卫和蒋介石说，必须开始北伐。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的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如果军队不北进，内部将要发生冲突。可是为了服从莫斯科的决定，他不得不反对北伐。

---

① 原文如此。——译者

共产国际代表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如果蒋介石利用北伐镇压和剥削人民，那末首先遭受灾难的是广东和广西的人民。因此，党对北伐的策略如下：

（一）支持北伐；

（二）北伐应当具有防御性质；

（三）党的策略应当是反对一切企图利用北伐来剥削人民的人。

现在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策略和我们在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

（一）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二）我们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质的，就是说，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后必须做到，如果原则上做出什么决定，就必须付诸实现，否则，决定与实践之间将永远有矛盾。

对报告作以下的补充：

第一点，我谈的反动时期，中心事件是 3 月 20 日事变，即从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国民党 5 月 15 日决议案这段时间。

第二点，关于党的反帝策略。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我们主要注意了反对英国的斗争。在中国，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英、美、法、日四国，其中最有势力的是英国和日本。但在这两国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在中国，日本在经济上几乎被英国所压倒，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军队可以迅速地调到中国的领土上来。因此，我们的反日斗争就具有较温和的性质。

二　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

资产阶级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作用，在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资产阶级在斗争过程中随时随地都在叛变革命，我们在广州可以看出这一点，从 1925 年的五卅运动和辛亥革命中也都可以看出来。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江亢虎宣传过社会主义，

尽管他本人并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可是这个运动在长江流域却把流氓无产阶级和贫农等广大群众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当然，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运动。

孙中山也宣传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因此，很多人反对他。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①该阶级的代表宋遁初等反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当时的宋遁初就是现在的戴季陶。

虽然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明显地叛变国民革命，但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出来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初参加了五卅运动，但后来又退出联合战线。

现在我们来弄清什么是买办，什么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可以说，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右翼和左翼。资产阶级左翼想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治外法权和海关，他们不满意军阀破坏交通。但如果帝国主义者稍作一些让步，这部分资产阶级就会向他们妥协。资产阶级不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也不会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出某些让步，资产阶级左派就会叛变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应该来领导。资产阶级左派想稍微参加一下革命，稍微表示一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不满，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的。他们甚至还想稍微参加一下工农运动。例如，蒋介石也试图组织工会。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很复杂的。

虽然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但我们要吸收他们参加民族运动，不仅要吸收小资产阶级，而且要吸收大资产阶级。在 3 月 20 日以后，我们已知道蒋介石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自己就说过，他可以走革命道路，或者走反革命道路。我们在 3 月 20 日以后已看出，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革命开始时，资产阶级参加了革命，但过了一些时候，它又转到了反革命方面。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动政变时，资产阶级很高兴。我们不能确切地肯定说，是否整个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但有一点是

① 这种关于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的说法和下面的论述，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也同下面所说的“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明显地叛变国民革命”自相矛盾。——原编者

清楚的,在 4 月 12 日以后,大部分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

三　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在俄国,城市小资产阶级没有参加纯无产阶级的革命,可是在中国,他们不仅参加了革命,甚至还会参与民主专政。但他们毕竟是动摇分子,不能独立行动。他们或者受资产阶级领导,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领导。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城市里可以看到,在乡村里就难以看清楚。暴动时,小资产阶级参加了罢工,对我们很有帮助。在城市里,只有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大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拉到他们那方面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资产阶级转向大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失败。

在去年七月全会上,我们确定了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但执行得不够好。因为:第一,我们的同志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策略;第二,我们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不够密切。在这次全会上,不但确定了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还决定参加马路商界的运动。由于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工作做的不够好,没有很好地把小资产阶级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此,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不多。今后,我们要通过国民党更好地向小资产阶级做工作。

四　土 地 问 题

现在我们专门来谈谈土地问题,即通常所说的农民运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农民运动的主要问题是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这就是从第四次代表大会到去年七月全会这个时期的农民运动问题。从去年下半年起,农民运动已由广东发展到湖南,由提出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进而到提出土地问题。目前,农民运动已经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刻。

现在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革命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毫无疑问，这一运动必然随着总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发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

由于提出土地问题，农村的阶级矛盾加深了。这从根本上粉碎了地主的设想。提出土地问题的农民运动，早在去年就以减租减息这种和平方式出现了。去年的斗争旨在反对大地主，口号是“打倒劣绅”，用这个口号与地主作斗争。当时的斗争只是反对大地主的斗争。

湖南的斗争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当时已产生了平分土地的运动。这里的农民运动不只是反对大地主，还反对土地出租者，甚至反对富裕农民。这个运动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过去，我们党限制了农民运动，而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不过对于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动手没收的。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

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而，尽管我觉得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但是，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是太激进了。在相当时期内，或许是在很短期间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然而在最近一两个月内，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农村的阶级斗争正在发展，但这个斗争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对小地主还不能进行剥夺。我们目前是进攻大地主和中等地主呢，还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仍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来加深，才能巩固基础。

五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革命运动中和政治生活中是有相当影响

的。在实际斗争中，也在显示它的影响。因此，对这个问题不能抱悲观态度。广州罢工委员会几乎就是第二个政府。湖南的工农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无产阶级常常独自行动。在北方，如果工人不行动起来，其他阶级也不会行动起来。在五卅运动中，付出最大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各阶级都在其领导之下。可以说，凡是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方，就没有运动。因此，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

第一，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第二，无产阶级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如果它没有这种力量，那就只好与资产阶级一起行动。

到目前为止，只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还没有武装。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是从资产阶级叛变开始的，这就证明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99%的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本身应当坚决争取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进行革命。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上海。上海事件，这是一个与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海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还必须加强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作。无产阶级积极地进行了斗争，我们的敌人承认这一点，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可是在这一斗争中谁更强大呢，是小资产阶级还是大资产阶级？从数量上看，可以说，二者大体相等，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大资产阶级却十分坚决。为什么上海的无产阶级不是仅仅与小资产阶级一起行动，而是吸收某些大资产阶级分子呢，这个问题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在我看来，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右派和总商会没有参加五卅运动，可是总商会的左派分子和马路商界联合会参加了这个运动。鲍罗廷所持的意见是：上海不能做为革命基地，必须在其他地方建立基地并从那里打击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如果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就得向他们妥协。在他看来，

上海只能争得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和进行争取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斗争。他认为在上海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正确的,因为统治上海的不是孙传芳或李宝章,而是帝国主义。鲍罗廷的宿命论是机械宿命论。可是毕竟不能轻视这一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似乎和鲍罗廷一致。以前,我并不认为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所以没有提出来讨论。上海事件,这不仅是过去的问题,而且也是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尽管我现在并不认为鲍罗廷的意见完全不对,但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地讨论。上海的资产阶级已脱离革命,蒋介石、银行家们和大工业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这里有三点需要讨论:第一,自由资产阶级没有完全脱离革命;第二,上海的失败是否由于资产阶级的参加;第三,鲍罗廷的意见或他的西北理论。

六　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在报告里无法做详细统计。目前,军事力量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队伍。现时我们没有群众的军事力量。现在我们谈的是旧的军事力量。士兵的来源,首先是诚实的农民(国民军里农民很多),其次是城市的失业者。士兵来自不同的阶级,因此,他们的战斗力也各不相同。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们想使军队革命化,那就应减少军队里流氓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地主分子的数量。假如说我们的军队发生动摇,那并不是由于军队里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好,而是由于阶级成分庞杂。军队不能为工农的利益作战。他们易于接受爱国主义等资产阶级的理论。目前军队的动摇是他们的社会成分的反映。因此,今后我们需要大大加强用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

七　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

这个理论是鲍罗廷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东南部是帝国主义的

堡垒。他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论证了他的理论。

他说，太平天国运动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想占领上海。中国革命应向西北方向发展。因为：第一，那里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薄弱；第二，那里可以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应当讨论这个问题。昨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位代表说，我们既不要坚持西北理论，也不要坚持东南理论，哪里存在着国民党政权，我们就可以留在哪里，并在那里加强我们的工作。这是不正确的。结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任何方针了。结果我们就似乎成了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革命是国民党的革命，而不是我们的革命。现在的中国革命是我们的革命。至少我们应当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工作。因此，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

八　国民党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应当提出几个要点。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是国民党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弄不清什么是国民党，我们就不能解释我们所犯的许多错误。起初，我们加入国民党时，很多同志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如果加入国民党，就会背叛工人阶级；现在这些同志又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事实上，国民党是各阶级的党，党内既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又有地主和军阀。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它的理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许多国民党员都根据资产阶级的理论来解释孙中山的三项原则。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全部。实际上，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国民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果国民党是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们就不应该加入。照戴季陶的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外与其合作。因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所以我们应当作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加入国民党。正是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才加入了国民党。现在我们应当提出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是不是各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的问题。我们肯定地回答说，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

革命联盟，尽管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如果这部分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我们就应该将其开除出党。既然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三个革命阶级的联盟，那么，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入国民党，这个联盟又怎么能够存在呢？以前我们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而现在则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公有的党。如果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呆在国民党的队伍里，这个联盟就不能是很巩固的。这个联盟将来会不会巩固，这要取决于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是否愿意让资产阶级呆在自己的队伍里；(二)国民党能否取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能够成为国民党的同盟者，而资产阶级则不可能；(三)如果国民党内没有农民参加，而是由小资产阶级组成，它也不可能巩固。因为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招牌下，剩下的只是一小群小商人，而大部分工农实际上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样的联盟是不可能巩固的。

九　改组军队问题

改组军队，这并不是改编军队，不是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如果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军队就会实现革命化，军官也不会从地主阶级中选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是高喊“世界革命万岁”和“列宁主义万岁”等口号，只限于做政治工作，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我们想要使军队革命化，但又不去改变它的社会成分，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十　建立革命民主政权

很多同志会惊奇地说，现在我们有了革命军队和国民政府，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我们现在距离革命民主政权

还很遥远。不仅是我们这样说，如果问一问国民党左派，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说，国民政府就是军阀政府。在国民政府的领域内必须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如果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和军阀的包围有所减轻，我们就应该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争取建立这样的政权。在军阀统治的领域内，我们要先进行革命，而后才能谈得上革命民主政权问题。现在我们只是开始走向建立这一政权的道路。假如国民政府的情况更好一些，我们是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的。

这就是我们的策略。这个策略能否在实际上贯彻实行，只有对国民政府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估计，才能判定。国民政府最初受到总司令人员的变动的巨大影响。去年，政权由胡汉民之手转到蒋介石手里。刚刚不久以前，才改为实行集体管理。去年，蒋介石独揽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和革命军的大权，甚至还想统治共产党。政府整整一年就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只有汪精卫回国以后，政府才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这个左派政府里有共产党员，如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但是我们不应当认为，这个政府就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如果这样认为，那是错误的。这个政府只是走向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途径。为什么不能把现在的政府叫做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呢，因为在政权中没有工农群众，只有几个工人领袖而已。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机构，以便今后建立起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并进而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民主专政将是最有威望的政权。这种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行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并不像几个领袖参加政府那么容易。

十一　财政经济政策

目前，尽管政府是新的，但财政经济政策仍是旧的，尤其是经济政策执行的还是军阀的那一套制度。现在革命时期，我们必须采用新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来代替封建军阀的制度。现在的经济制度仍旧是

以前的，要改变这种制度，不仅要看国民政府有无决心，而且这也是我们党的任务。在我们党领导革命的整个时期，我们没有自己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国民党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准备夺取政权。如果我们今后还这样下去，政权就会落到反革命手里，像辛亥革命后那样。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帮助了国民党，进行了群众运动工作，并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工作，而没有把政权夺到我们手里来。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夺取政权。第四次代表大会已决定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但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军事、财政和经济情况，不知道如何领导。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在野党，而是真正要领导革命了。现在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只对国民党的工作进行批评。国民政府正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扩大它的政权。这个政权既是我们的，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它工作得不好，这就不仅是国民党的过错，而且也是我们的过错。

帝国主义的干涉，现在比以前有所减轻，可是奉系军阀、蒋介石和四川都在向我们进攻。今后，可能还会遭到各国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就会失掉一切革命中心。我们当前的任务，不仅是发展和扩大群众运动，而且特别是要巩固革命中心。否则，奉系军阀统一北方，蒋介石统一南方，革命运动将会停滞 5 年至 10 年。因此在目前，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是巩固革命中心的问题。

关于党内情况的报告

从第四次代表大会起到现在，我们党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得到了发展，党的工作有了进展，党员人数也有所增加。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员只有 994 人，现在已增加到 57 967 人。党员的成分，根据 3 月份的统计，百分比如下：工人占 53.8%；农民占 18.7%；知识分子占 19.1%；军人占 3.1%；中小商人占 0.5%；其他成分占 4.2%。妇女在党内占 10%。各地党组织的党员人数如下：湖南 13 000 人，湖北 13 000 人，江苏(包括上海)13 000 人，广东 9 027 人，北方地区 3 109 人，

江西 3 000 人，陕甘 388 人，山东 1 925 人，福建 168 人，满洲(包括沈阳) 380 人，北满 137 人，安徽 233 人，四川 200 人，以上共计 57 967 人。①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共有八个：(一)湖南区委，其中包括衡阳；(二)湖北区委，其中包括襄阳；(三)江浙区委，其中包括安徽省铁路沿线部分；(四)广东区委，其中包括广西、云南、福建和南洋；(五)北方区委，这个区委包括以下几省：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六)江西区委；(七)河南区委；(八)陕甘区委。有六个地委：(一)山东；(二)福建；(三)南满；(四)北满；(五)安徽；(六)四川。有四位通讯员，他们分别驻在莫斯科、海参崴、巴黎和日本。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计有 280 万工会会员。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数铁路工人和矿工受我们领导。农民协会会员有 972 万人。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广东的 20 万有组织的农民受我们的领导。学生联合会将近 420 个。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共青团领导的学生联合会有 60 个。现有共青团员 35 000 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 2 365 人。

现在谈谈各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一)国民党左派统辖的地区有：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和甘肃等省。在这些地区，工农运动可以自由发展。(二)国民党右派统辖的地区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和四川等省。这些省份的群众运动已被扑灭，法西斯主义占统治地位。(三)奉系统辖的地区有北方、河南和山东等地区，以及南满和北满。这些地方的群众运动受到了镇压。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出席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同志批评了组织部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不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发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因而组织工作又停顿下来

① 总人数与各省人数之和不符。——译者

了。职工委员会委员当中,李立三同志只是被算作职工委员会委员,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工作。农民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委员划分了各自的所在地,起初没有做任何工作,而现在都聚集在武汉,开始了工作。他们已讨论了土地纲领。宣传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按期出版,并且翻译了十多种书籍。军事委员会只是做了技术工作。妇女委员会只是增加了通告的数量,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职工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连通告也没有发过。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像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如果只是由地委和区委领导一切工作,我们党的情况就会像朝鲜的党一样。现在,支部所起的作用不大。在工厂和学校里,支部并不是工作的中心,而只是召集会议和组织报告。因此,支部只是传达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命令的组织,而不是工作机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决定:应当加强中央,并把支部变为真正进行工作的组织。在党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提出这两个问题。宣传部这两年来的工作,不能称作宣传工作,实际上它是做了出版工作。而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不管怎样是按期出版的,其份数也在逐渐增加。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只有7 000 份,而从北伐开始,已增加到 5 万份。

《新青年》杂志出版了五期。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这两年当中,我们翻译了以下 16 种书籍:(一)《共产主义 ABC》;(二)《民族问题和共产主义》;(三)布哈林:《农民问题》;(四)波格丹诺夫:《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五)布哈林:《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六)斯大林:《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七)《共产国际纲领》;(八)布哈林:《唯物史观》;(九)《苏共的团结》(两册,已出版,尚未翻译);(十)《中国共产党五年来的政治主张》;(十一)布哈林:《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十二)《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十三)《不平等条约》;(十四)《中国关税问

题》;(十五)《戴季陶主义和国民革命》;(十六)《论北伐》。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宣传部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出版工作,而不是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部没有工作计划,不给地方发通告,也不向中央报告工作。宣传材料出版得很少,而鼓动材料却很多。例如,在江苏、湖南、广东和浙江等省,我们出版了许多鼓动小册子,其数量由9万册增加到了40万册,可是这些出版物散发得很不好。例如,我们有10万份号召书,人们读到的却不到5万份。从数量上看,鼓动材料很多,但利用得很不好。上海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书放在那里没有人读。材料和出版物的散发情况很不好,因此,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不好。党内教育跟不上党的发展。今后,宣传部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使中央宣传部更加坚强有力;(二)要使地方宣传委员会与中央宣传部建立密切的联系;(三)扩大翻译工作;(四)改进书籍的散发工作;(五)关于党校问题。我们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中央想成立一个党校,二、各个地区也想成立党校。如果中央成立党校,讲师会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党校,会更方便一些。据我看,前一种意见较好。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500人的党校。总之,这项工作现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坚守住,我们就在这里成立党校。我们必须出版一种党的日报,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就开始出版这种报纸。

现在谈谈中国的职工运动。虽然中央职工委员会并不强大,但某些地方对这项工作却很注意。成绩最好的是香港大罢工,其次,我们在上海、湖北和湖南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在湖南。缺点是中央职工委员会没有统一的领导,因此,全国的职工运动就没有统一计划和统一要求。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无论是在中央职工委员会里或在工会党团里,我们都应该有统一的领导。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我们有29万有组织的工人。到第二次大会时,有54万人。到去年五一节第三次大会时,有120万有组织的工人。现在各地有组织的工人人数如下:江浙有130万人,湖北有40万人,湖南有393 791人,广州有52万人,北方地区有1万人,山东有5 000人,江西有13万人,海员有8万人。以上共计2 838 791人。

今年，有组织的工人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职工运动也在逐渐开展和壮大起来。这是各地党组织加强工作的结果。现在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和工会工作计划。这是我们代表大会的首要任务。我们的同志早在党成立以前就做过职工运动的工作。我们的职工运动的历史已有 5 年了。

农民运动

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早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两年。根据现有的统计，有组织的农民的数量如下：湖南有 5 204 112 人，湖北有 1 714 000 人，江浙有 23 万人，广东有 120 万人，北方地区有 2 万人，江西有 30 万人，河南有 100 万人，陕甘有 116 000 人，安徽有 8 300 人，四川有 37 000 人。.以上共计 9 829 412 人。有组织的农民的总数比工人多。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青年运动

在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共青团员比党员多，而现在党员却比共青团员多了。青年一代组织起来的比老一辈少。这是因为：第一，共青团中央不是很强大的；第二，我们抽调了很多共青团的工作人员做党的工作，从而使共青团的干部减少了。现在共青团里并不都是青年人。就是一部分少年先锋队队员也已超龄了。因此，共青团应该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共青团必须青年化，少年先锋队也应如此。假如共青团员都是青年人，党就不可能从他们当中抽调工作人员。但是，党过去确实是很少注意共青团。这是党的过错。党和共青团都怕对方从自己这里抽调工作人员。

1927 年 4 月 29 日(李玲译)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

中共政治局会议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

关于与国民党左派在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的问题。

陈独秀通报同汪精卫谈话的情况，汪提出以下四点：

(1) 1927年1月3日占领日本租界的行动，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进行的。

(2) 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共产党人未向国民党通报的情况下提出的。

(3) 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寻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

(4) 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

鉴于这最后一点，参加谈话的徐谦要求苏联与国民政府结成反帝军事同盟。为了证实上述第四点，他援引了张作霖公布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似乎表明，苏联喜欢呆在幕后①。汪精卫也说，他收到了江西几位将军的会议发来的电报，他们在电报中表示反对蒋介石，同时也反对

① 指1927年4月19日在北京报刊上发表的《给驻华武官的指示》，似乎该指示是在1927年4月6日搜查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时所截获的文件中发现的。实际上这个文件是伪造的。详情见《历史研究》杂志，北京1985年第2期第181—196页。

共产党人。汪精卫以国民政府名义给他们发了复电，表示支持他们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同时汪精卫只字未提国民党左派对电报后一部分内容的态度。

汪精卫总结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谁领导群众？群众跟谁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人走？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的恶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共产党人的过错。如果国民革命因此遭到失败，那对人民群众来说会更糟糕。

为了改善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鲍[①]提出三点意见：(1)两党密切合作，共同解决所有问题；(2)制定对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政策，没有这种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3)制定对农民的总的政策。若这三点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那么国际形势就会变得毫无希望。

张国焘拒绝鲍提出的所谓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政策的指责。他要求派遣工人和农民到军队中去，并把他们武装起来。

维[②]说：这里讨论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国民党左派会在一定的方面摇摆不定，因为现在坐而论道的时候已经过去，需要解决的问题非解决不可了。对于农民，问题可以通过局部没收土地的办法来解决，国民党左派也赞成这样做，但湖南的农民运动使他们感到害怕。对所提出的问题共产党可以作两种回答：

(1)要求国民政府对土地运动有明确的态度，协调而不是反对这一运动，或者(2)完全支持土地运动(?)[③]。

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是明确的：国民政府应当帮助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它自己也要同大资产阶级作斗争，并且支持这种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帮助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为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应当通过工会加以协调。国民党内的派别问题也很重要。

陈独秀：比如在土地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共同的方针呢？原则上说，我们同国民党左派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似乎是一致的。但是今天有人告

---

① M. M. 鲍罗廷。

② ГН. 维经斯基。

③ 原文如此。

诉我，国民党关于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决定由于河南的形势而不会公布。

鲍罗廷认为，小资产阶级处境不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原因是看不见的，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的金融封锁和其他封锁，另一个原因是看得见的，也是小资产阶级明显感觉到的，这就是在手工业部门做工的工人争取自身经济需要的斗争。小资产阶级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第二个原因上。试图向小资产阶级说明真实情况，但只指出第一个原因，并用它来偷换第二个原因，这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出路是向小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但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在游行示威中和在其他重大事情上，共产党没有充分显示出自己领导群众运动的能力。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可以商定一定的方针，但条件是共产党能够执行这个方针。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如果共产党自己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它同国民党一起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为什么讲共同解决的原因。国民党相信，你们能领导群众，但实际上却不能。出路只有一条：或者同国民党决裂，或者一起作出决定，一起执行。

老头子[①]提出 6 条意见供讨论：

（1）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没收。

（2）成立解决小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纠纷的仲裁委员会。

（3）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

（4）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的贸易。

（5）邀请国民党积极参加工农组织。

（6）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和征收捐税，条件是不剥夺贫困居民阶层。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

① 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关于政局的公开的信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

亲爱的同志！

中国革命正在经过一个危急的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必定遇到许多难关，并且要克服许多困难问题。目前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醒觉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国民党革命的农民政策已经促起农民群众之奋起，实施这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的历史上的职任，就是实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中国革命的将来，中国人民的命运，全靠贵党在此时期之坚决的行动。

土地改革刚才开始，就促进了反动分子之反革命行动，代表不劳而获的大地主阶级之封建军阀，已经起来实行用武力反抗农民。他们威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欲加以破坏——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依然忠实于他们革命的主义，依然领导农民从事历史上的反封建势力之斗争。

军队中有些分子反对土地改革确是事实。不过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并非——亦不能——反对农民的解放。兵士们大都是无地或贫苦的农民，他们不会很自觉的反对农民运动。如果兵士们对土地改革表示敌意，就是他们还没有觉悟他们仍在受军队中反动分子的剥削。以兵士论，革命军在客观上应当是一个土地革命的军队。大多数的下级军官也是从中等阶级招募来的，他们也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国民革命并妨害不着他们的财产，他们必不以行动来保护豪绅大地主的政权和利益。现在把持一切政权和特殊权利的是豪绅和大地主。他们消灭之后，经济的关系和政治的权利一定要民权化。所以土地改革，不但不妨

害城乡的中等阶级，并且可以解除他们的经济的停滞，给他们以政权。如果将这一点给他们说明白，革命军中之下级军官一定很忠实的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民权的土地改革政策。再者国民革命军的将领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领袖，对于土地改革定能拥护。

国民革命军的组织如此，整个的革命军决不能敌视土地改革。其绝大部分（兵士、下级军官、上级首领）定能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那么，最少数的反动分子处于孤立的地位，如果他们有反革命的行动，不难一鼓荡平之。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反动的军阀已经公开的反叛革命（夏斗寅的叛变、长沙的政变可十足的表明这一点）。他们已经向工农运动宣战了。他们的屠杀工农群众，和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李济琛一模一样。他们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他们侮蔑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威权。长沙政变发生后，湖南省党部即被解散，并未得国民党中央的批准，擅自成立省党部（及所谓救党委员会），打毁党校，劫夺前方购买军米之款项，国民政府所派遣之特别委员团中途被阻不得到长沙，并且自由派军队到各县屠杀农民、工人、学生，妇女。

这是明白的反革命行动。少数反动军阀，背叛了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高级军事长官，而在湖南篡夺了政权。国民党的责任到此情形之下，非常明显，宜立即下令讨灭此少数叛徒，以维系其最高权威，还是和他们妥协？国民党如果采取第二种办法，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的主义，国民党的政纲，都将推翻，将在国民党政治的生命发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湖南的反革命必须讨灭，迅速的行动已经十二分必要了。犹豫不决，必遗后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采用以下的行动，削平湖南的反革命：

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

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

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

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

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

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

以此行动处置反革命，不仅湖南一省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发生坚强的信仰，全国各地的工农，定要遥瞻国民革命的旗帜，认识国民党的党徽，为他们自由之标志。他们必定自己起来向国民政府之敌作战！

当大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军阀代表向国民革命反抗时，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一定要和民权主义的群众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促醒他们革命的觉悟，并领导着他们大胆的向反革命进攻。当反动分子以公开的反叛行动集合他们的力量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倘不果决的领导劳苦群众向反革命势力作殊死的革命战斗，则一切反革命势力得有更多机会放胆集合发展其势力向革命进攻，革命前途将陷于危险！谨致

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陈独秀

六月四日

1927年6月8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七期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

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自成立〔农民〕部以来，局势非常严重。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最好是非常巧妙地、小心谨慎地谈及这个问题。谭平山不应对他们谈土地革命问题。在去湖南的问题上我与罗易有分歧。去是必要的。农民运动引起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我们主张派谭平山去纠正过火行为。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然后采取解决土地问题的进攻性措施。本应让谭平山委员会立即出发，但为时已晚。长沙的政变不只是反对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过火行为引起的。共产国际可能不知道，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谈及土地问题。

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对提议改变国民党领导的想法还有一种反对意见。如果像莫斯科希望的那样撤换老领导人，那么国民党就会变成工农党。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

① 本文节选自《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一文，根据原文可知陈独秀此发言的日期为1927年6月7日。

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

我们现在用不着拿许多很坏的话来攻击蒋介石，因为他自己有许多行为已经足够说明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了。并且他的罪状已经国民党、国民政府逐条宣布，更不需我们来重说。

我们也许可以说，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终牵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的忍耐牵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在去年三月二十之前，东征陈林胜利时，蒋介石成了著名的革命人物，帝国主义者甚至于攻击他或者恭维他是中国红军首领；然而那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着革命路上走；惟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之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外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于蒋介石之终身的刻骨批评！

在讨伐陈林和讨伐刘杨战争中，蒋介石很尊信共产党人，因为他们能苦战奋斗；即去年三月二十以后一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他在南昌演讲，还时常说共产党是革命的，他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须合作。他时常肯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共产党人当然很感谢他；可惜他不是说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须合作。他只说他也是革命的，共产党应和他合作，共产党听了总觉得很奇怪。蒋介石时时刻刻表示他自己的意思，而忘记了国民党，这是共产党终和他发生冲突之一个很重要原

因。共产党承认国共两党都是革命的，所以必须合作（不但国民革命中破坏工作可以合作，即国民革命中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也希望可以合作）。因此，共产党立在革命工作的观点上，对于国民党中任何革命领袖，无论新旧都愿竭诚与之合作，决不肯立在私人的感情上，帮助那一个领袖打倒那一个领袖；即使那一个领袖背叛了革命，例如陈炯明、杨希闵、蒋介石，共产党也只是立在革命的观点上，帮助国民党去打倒这班反革命者，而不是什么拥孙倒陈，拥蒋倒杨，拥汪倒蒋。蒋介石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始终只知道他个人而不知道有党，始终要求共产党以助蒋拒汪为合作条件，两次派人到上海和我们谈判，以哀的美敦式的态度，要求共产党停止迎汪复职运动，我们答以在革命进展的观点上，在国民党团结的观点上，共产党只是主张汪、蒋合作，而不是拥汪倒蒋，却没有理由可以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以及国民党党员群众的心理，而反对迎汪复职。这样合理的答复，当然使蒋介石失望，使蒋介石感觉得共产党到底不能做他的工具象孙文主义学会那样，于是在他的二月二十一南昌演讲中，便喊出“纠正共产党”、“制裁共产党”等口号了。蒋介石所举要纠正及制裁共产党之理，是因为共产党党员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以排挤压迫，可是他在此次演讲之前，两次派人到上海和我们谈判时，没有一字提出共产党党员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之事，而只说不满意我们附和迎汪复职运动，或者在他的见解，迎汪复职就是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

去年三月二十事变之后，蒋介石极力声辩不是对付共产党，他对黄埔学生演说，痛陈领袖争权之事，分明是指汪精卫；最近张静江致汪精卫书，却说：“岂知弟三月二十二日在长堤登岸，先二日介兄已向共产党行断然之手段……以为共产党之阴险，或有击而不中之虞，不告谷季（精卫别号），将失败时介自负之，季仍可自收其残局，各有其分义，弟亦何言，弟到之时，介兄仍欲彻底解决，断此亡党之毒腕，以慰总理之灵。”这样看起来，好像蒋、张之言大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三月二十之变，反共排汪，本是二者并行。排汪之经过事实，精卫先生自知之，近亦向我详言之，不但三月二十排汪必欲其去职离粤，并且自从三月二十，一直到汪回，蒋、张无时无事不与主张迎汪复职者为敌，试问这可是何种分义？蒋介石之反共，导源于戴季陶的小册子，这不仅是表面上简

单的戴、蒋等个人思想问题，乃是整个的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之反映。关于中国革命之前途，有两种理论与政策：一是无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一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无产阶级的理论政策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内推翻封建势力、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等的统治，建立革命的民主独裁制，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以达到全民族政治的经济的完全解放。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是：资产阶级与买办、官僚、地主、豪绅甚至一部分反动军阀结合起来，建立保护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军事独裁制，以压迫工农运动及反共反俄，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及些小让步，在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政策之下，根本停止民众的一切革命运动，发展并稳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中国革命之前途，只有这两条路，找不出第三条路，也许戴季陶、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找出第三条路，不过事实上他们所走的分明还是第二条路，并未曾发明第三条路，所谓第三条路，只是不肯走第一条路，而又不愿显然自承走第二条路之名，其实第三条路不通行，还只有走第二条路。戴季陶以为可以一面反共派，一面反右派，其结果他和右派走上一条路；蒋介石、张静江以为可以一面反共派、反工农运动，一面反西山会议派，其结果他们和西山会议派走上了一条路；现在又有人以为可以一面反共、反工农运动，一面反蒋，其结果也必然和蒋介石走上一条路；这都是因为他们想找第三条路，其实本来不会有第三条路，所谓第三条路，即第二条路之别名。自从戴季陶发行他的小册子，中间经过三月二十，一直到今年四月十二，都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者国民党右派首领戴季陶、蒋介石、张静江等，在寻找第三条路的口实之下，为实行走他们的第二条路而工作。

第二条路即资产阶级的路，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然要抑制工农运动不许他们强盛起来，更不用说是过火，只有时有利益于资产阶级的工农运动（如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示威与庆祝、追悼等），他们或者可以恩准，否则便是受了共产党煽惑操纵，只好用四月十二的办法。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然不愿意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特别是和他们的理论与政策不一致的时候（帮助他们对付他们的政敌之时，当然要暂时利用一下），

所以戴季陶自始至终都主张共产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最近《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中又说:"我在总理死后很辛苦地坚持着非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则救国的责任决负不起。"诚然,他们很辛苦地屠杀了共产党之后,很得意地向全国国民宣告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这想必就是戴季陶先生发挥他们资产阶级的"仁爱性"。如果共产党也这样宣告独立,不知资产阶级的学者要怎样大声疾呼的咒骂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残暴无仁爱性!戴季陶或者可以回答说:四月十二之事确如白崇禧、陈群所说只是"工人互轰"(六月三日陈群在所谓上海工会统一委员会还这样说),随后搜捕枪毙之共产党,或者那是许克祥所谓"暴徒分子",而非真共产党,至于朱培德欢送共产党出境,更是仁爱之至。可是吴稚晖曾大呼"杀尽共产党",李石曾说四月十二事变是革命,并且是最后的革命,从此再用不着革命了;诚然,共产党杀尽了,无产阶级压服下去了,资产阶级已经革了无产阶级的命,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纯粹国民党,从此得安然和英、日帝国主义及奉天军阀携手统治中国,还有什么革命!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联俄政策自然不大适用;蒋介石、吴稚晖、戴季陶都一致采用西山会议的意见,联俄原以平等待我为条件,言外之意就是苏俄现已不以平等待我了,联俄政策当然要抛弃。吴稚晖说:"有人说俄国已铲除不平等条约,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奥,皆已铲除不平等条约,依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止能认为最惠国,联合则平等未完全,显生问题,所以德、奥可认为最惠国,尚未联合也。"戴季陶说:"俄国既然说是同情于中国的革命,援助国民政府,而两年当中,既没有和国民政府定过相互的平等条约,也没有和国民政府交换过正式的代表……俄国既没有正式承认我们的国民政府,我们就无从承认俄国对我们的革命有正确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苏俄和国民党关系,至今和中山先生在世时无殊,何以现在忽然发现了没有正式承认和没有定过条约交换代表,联俄显生问题?其实这都是鬼话。吴稚晖说:"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赤化为口实,淆乱世之众听。"这几句话才真是他们抛弃联俄政策之隐衷!

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不得不将中

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放弃了。他们分明走的是第二条路，还厚颜说是第三条路，自以为虽然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而仍然是革命的，不知道他们的所谓革命作何解释？

汪精卫先生曾说："要革命的向左边来——"现在蒋党的人说："要革命的向右边来——"这句话虽然滑稽，可是也证明了他们已认识没有中间的第三条路！

向右是他们自己承认的，但是不是革命的呢？

三月二十的行动是革命的吗？

北伐总司令一就职，国民政府便无形取消了，这是革命的吗？

派李石曾向张作霖、杨宇霆谋南北妥协，这是革命的吗？

四月十二的行动是革命的吗？

收买青红帮打毁沿江各省的党部及工会、农会，屠杀工农群众，这是革命的吗？

搜捕枪杀各军政治工作人员，这是革命的吗？

正当北伐军在河南和奉军血战之时，勾结于学忠、张联升、刘湘、杨森、夏斗寅乘虚袭击武汉国民政府，这是革命的吗？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使田中的代表松井到武汉诱胁国民政府的领袖潜赴南京，这是革命的吗？

如果这些行为是革命的，那么，只有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与政策是这样。如果这样也算是革命，难怪张勋复辟、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也自称是革命！

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是一件小小事体；因为这不只是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他所代表的是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这是全国革命的民众和革命的领袖都应该认识的。他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所以一切不容于革命势力的许多反动派如国家主义者、研究系、安福系等，一向反对国民党，现在都跑到蒋介石旗帜之下，帮着他摇旗呐喊，向革命势力进攻。至于一些反动的大小军阀，自然有与蒋介石结合之可能，刘湘、杨森、于学忠、张联升、夏斗寅、许克祥等，不用说了；蒋介石、阎锡山、杨宇霆的三角同盟，不久也会实现。

安徽的蒋党，竟揭出“拥护新军阀”的标语，重庆的蒋党，竟挂出“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的标语，这是何等新奇的事！

一切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不但要依附假革命的蒋介石之名义以保存其反革命的实力，而且还要强奸三民主义一下，这是革命运动中最可耻的危险！

蒋介石已成了全国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我们所要敬告国民政府之领袖及军事长官的是：应为革命而讨蒋，不应为讨蒋而讨蒋；换句话说，即是不但讨蒋介石个人，而是要讨伐蒋介石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若讨蒋者在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上，在对民众态度上，一切仍蒋之旧，即令讨蒋胜利，亦与革命无涉，而且不足以服蒋之心！

六月十一日

1927 年 6 月 15 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八期 署名：独秀



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没收反动分子、大地主和土豪劣绅土地的建议。共产国际提纲建议没收反动分子的土地。此后中国共产党比以往更有力地推行没收土地的政策。土地委员会曾经一再讨论这个问题。起初它提出没收一切土地。但最后决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汪精卫回国后，国民党开始讨论土地问题。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通过决议，没收除小地主以外的一切土地。这个决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常会批准。但是由于军方反对，决议未能公布。大多数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因而反对土地革命。但是，军队用来作为借口的，不是没收土地，而是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如：军官们家里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属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罚款；禁止运粮；强迫商人摊款；农民私分粮食，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乡的小额汇款被农民没收和瓜分。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

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①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对土豪劣绅和土匪的联合进攻（虽然得到小地主和一般地主的支持）应加制止，使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抗击反动派。同时，在妥善规划的基础上和在充足的组织力量的支持下，作为没收土地的准备措施的农村自治和农民武装，就会加速建立起来。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国民党中总的情

① 指 1927 年 5 月 21 日长沙“马日事变”。——译者注

绪是既要与蒋介石作斗争，同时也要镇压共产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谭平山的就职演说是含糊的，那是在夏斗寅刚刚叛变后发表的。国民党决定延缓解决土地问题，而先去击溃夏斗寅。谭平山作为政府的一员，未能公开为一种与国民政府的意见相左的观点辩护。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并揭露言过其实的反动宣传，以中止军官和国民党左派间引起的恐慌，从而克服农民运动道路上的障碍。失业、无地的农民是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动力。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农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必须改变，贫农必须成为运动的中心。

1927 年 6 月 5 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



湖南政变与讨蒋

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缺少党的指导，遂不免有些原始的幼稚行动（所谓幼稚行动在任何国家革命的初期高潮中都不能免），如捕人、罚款、阻禁，企图均分土地，同时举行宗教革命（毁庙、毁祖宗牌位）、道德革命（妇女解放）等，以引起一般社会之惊恐，土豪劣绅复捏造许多事实在军队中宣传，反对土地改革及根本反对民众运动之右倾分子更从而张皇其词，使湖南出身的军官咸抱不安，对湖南农民运动多少都表示不满，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不无关系：然而说他们只是为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而发，则显非事实。在长沙事变以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已有纠正农民运动幼稚行动的命令，他们若真是只想纠正农民的幼稚行动，由省政府、省党部切实执行中央命令，已十分够用，为什么须用屠杀政策呢？他们说长沙二十一日事变是由于工农纠察队包围军队夺枪而起，这种笑话，和蒋介石在屠杀上海工人之前说工人纠察队将围攻龙华，是同样的把戏。过去的屠杀已遍于湖南全省，截至今天（六月十九日）的消息，新省政府的军事厅长仍在分派军队到各县大举清乡，想必也是因为各县的工农纠察队都在那里包围军队夺枪！这是欺谁？

我们再看二十一日事变以来，许克祥的所言所行，是否只是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

（一）二十二日下午省政府召集所谓各团体联席会议时，教育厅长董维键、建设厅长邓寿荃尚列席，次日即被逐出走，邓厅长的家产且被查抄了。

（二）省党部人员被逐一空。

（三）市商民协会代表左学谦在所谓各团体联席会议上说："昨晚

事变，因解散工人讲习所，波及商民协会，以致职员会物损失，会所亦被毁坏。"左学谦家宅亦于二十四日被封。

（四）省农民协会曾负责派员为政府采办军米四十万石，而办米之款九万元，竟被所谓救党委员会的军队抢去。

（五）许克祥在街上贴出"拥护湖南省政府"、"拥护国民政府"的标语，但是省政府的委员赶跑了，并且抄家了，国民政府的委员走到岳州竟被拒绝而回，并且许克祥竟电令岳州驻军要逮捕枪毙国民政府的委员。

（六）五月二十四日，在长沙戒严司令部，成立中国国民党救党临时办公处，推定许克祥、王东原、李殿臣、周荣光、张敬兮等五人为主席；当即发出命令如下：以后拿办暴徒分子，非经国民党救党临时办公处命令，各部队不得擅行，此令！主席许克祥、王东原、李殿臣、周荣光、张敬兮。

（七）国民党党校被军队捣毁一空。

试问上列这些事实，和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何涉？许克祥等不得政府或中央党部命令，而擅自在戒严司令部组织什么救党办公处，独揽军权、政权、党权，这和蒋介石的行为何异？

夏斗寅在湖北叛变，是受了蒋介石的指使，蒋介石已经亲自向外国新闻记者直言不讳，似乎不需要别人再为他辩护。许克祥等在长沙叛变，分明是和夏斗寅相呼应，分明是蒋介石袭击武汉国民政府之整个的计划之一，至少也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政纲（反武汉中央，反俄，反共，反工农），谋袭国民政府，扰乱北伐后方之整个的计划之一，纠正农民幼稚行动，不过是一个口实。

蒋介石的外交官，对于英捕房监视上海苏俄使馆不肯向英人抗议，蒋介石且在上海大捕苏俄同志；许克祥等亦在长沙搜查苏俄使馆。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广州搜杀共产党人；许克祥等亦在长沙、常德等处搜杀所谓暴徒分子——即共产党人。蒋介石一面屠杀工人，一面说仍然要保护真正工农；许克祥等也是一面屠杀工人农民，一面在街上贴出"拥护真正农工"的标语。他们和蒋介石有什么两样？

不仅许克祥等在长沙是如此，再看常德的五月二十四日事变是怎

样？在二十四日事变之前，常德的党部及民众团体，正在忙着开欢迎熊震旅长大会，开军民联欢大会，正在忙着采办军米；恰当此时，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的消息传到常德，蒋介石委任熊震为师长的密电一到，熊军顿时翻脸，于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派兵搜索工会、农会及党部徽章，下午到工会、农会、党部及其他民众团体捉人，遇见穿中山服的或有徽章的即逮捕枪毙，约在二百人以上，被捕者数百人，特别法庭所拘押之土豪劣绅一律释放，即用彼等为搜捕革命分子之侦探；并且鸣锣叫人报告谁是共产党人，一时被私仇诬陷而逮捕而枪杀的人，非常之多。二十五日又挨户检查，见有勇敢活泼青年，即指为共产党人而捕去枪杀之，如此又杀害了数十人。二十五以后，又从城里杀到乡下去，乡下土豪劣绅所把持的关防局，遂乘机帮着熊震捉人。

此外岳州、平江、浏阳、宝庆及湘南，都在铲除暴徒名义之下，解散民众团体，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人之事，成了普遍的现象。此次屠杀之惨，我们可以举出一例，即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被杀之事。杨于五月二十六日被捕，在学坪斩头，随将其头抛掷数十下，再用麻绳系电杆上示众，将杨尸倒悬于演说台上，以刀剖解，以铁丝作钩，取出腹内脏腑，灌火油于腹中，用火燃之，旁观有不平者，即以赤化论。至于捕获工农活人剥皮置沙上，旋转呼号而死者，也不只一次。试问湖南农民对土豪劣绅曾否有这样野蛮残酷的行动？

政府派周斓赴长沙以后，湖南的屠杀停止了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现有二事为证：

（一）是六月十日长沙的《南岳日报》载：

“昨日长沙市全市党员，在教育会坪开欢迎周副军长大会……周副军长由第三分校，偕仇亦山……到会……当众发表决议案十六条（一）公推周副军长为湖南救党委员会委员。

（二）请周副军长实力参加救党运动。……（八）请周副军长奖励马日铲除暴徒的武装同志。……”

（三）是湖南省政府军事厅六月十四日有派兵清乡电如下：“湘省暴徒啸聚各县，亟应肃清，以根本解决，分配兵力如下：

1. 许克祥酌抽二十三团军队，以一部分赴湘潭、湘乡、宁乡清

乡，以一部分留省警戒。

2. 周荣光督率警卫团担任省城内外警戒，并保护省内上下厘卡，城厢各机关。

3. 李仲仁团抽调一部分前往醴陵、衡山清乡，一部留省协同各军警戒。

4. 每营派兵分赴长沙县所属各乡镇清乡。

5. 熊震师向桃源方面警戒，并酌抽军队担任常德、沅江、安乡县清乡之责。

6. 王锡筹师担任宝庆、新化、祁阳清乡，并担任向武冈方面警戒之责。

7. 周盘、周希武、张岳(团长)协同向鄂西警戒，并应酌抽军队担任岳阳、临湘、华容清乡之责。

8. 陈汉章旅对于湘、黔军方面警戒，并抽军队担任辰溪、溆浦、安化清乡之责。

9. 戴斗垣司令于向津、醴方面警戒外，并抽军队担任石川、慈利、大庸、永定清乡之责。

10. 俞团担任衡阳、常宁、耒阳、资兴、郴县清乡之责。

11. 王德光团对于金州方面警戒外，并酌抽军队担任零陵、东安、祁阳、道县、宁远清乡之责。

12. 罗定(司令)担任攸县、茶陵、安仁、酃县清乡之责。

13. 浏阳、平江、湘阴三县之事宜，另商陈嘉佑军长酌派军队前往办理。

14. 湘南、湘西边境各县，俟由前方抽调军队回湘再行举办。

15. 此次清乡，限令到后十日内一律肃清。

政府未有明令申斥许克祥等所组织的救党委员会是反叛行为及严令解散，他们当然可以请周斓加入；政府也未曾严令申斥二十一日事变是反革命，他们也自然可以请周副军长奖励。这都是顺逆是非不明所致。现在军事厅还嫌过去的屠杀不足，分派大批军队到各县清乡，肃清所谓暴徒，以图根本解决。什么是根本解决？不用说是“杀尽真正革命党人——国民党及共产党”和“根本消灭工农运动”，以免后患！在这种

政策之下，许克祥等的首功，当然是应该奖励的。共产党是否能够杀尽？工农运动是否能够根本消灭？恐怕都是疑问吧？蒋介石并不能够办到这两件事，甚至更有力量的莫索里尼也未能办到。他人更休想！

湖南政变中所表现的事实，分明不是什么纠正工农的幼稚行动，分明不是什么救党运动（岂有离开最高党部，并且要枪决中央委员的救党运动？），而分明是和蒋介石、夏斗寅一气的反俄、反共、反工农、反武汉中央这四大政策的运动。

此时，武汉方面讨蒋运动的空气似乎很浓厚，倘若没有决心解决湖南问题，铲除这些豪绅代表的小蒋介石，那么我们恐怕南京的大蒋介石尚未铲除，武汉治下的许多小蒋介石——豪绅恶霸以及许克祥等叛徒，倒可以将国民政府推翻了！而且蒋介石可以说：你们讨我，但是你们境内也和我这里一样，你们并不能得到东南民众的拥护，你们所仗的，也不过是军队，来和我争地盘罢了。

六月二十日

1927年6月22日 《向导》周报第一九九期 署名：独秀



在土地委员会议上的发言[1]

这个问题甚复杂，牵涉甚大，全部的问题，现在在革命的理论上，财政上，社会问题上，方方都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已成了重要的舆论了。但是到了实际问题便发生困难，如军人的土地问题，中小地主问题，策略问题等等，都有困难，各方面都不能满意。我的意思，方法与原则是可以相符的，可以使到各方都满意的。我个人对土地问题的意见如下：原则不是马上实行的，如何实现原则呢？实行原则，应由中央与各省详细规定，因实行的方法不能用现在这种会议得到结果，即有结果，亦不过是武断的，故必定要有一种原则规定出来——

我个人对土地问题的意见：

（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

（二）公布佃农保护法。

（三）无土地之革命兵士，退伍时，必须给以土地。

（四）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以上是原则。

（五）政治委员会，必须命令农政部，迅速执行国民党第三次全体中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尤其是督促农村自治之实现。

（六）中央农政部，即须根据上列原则，订定土地改良法案。

---

① 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成立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任委员。土地委员会为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连续举行会议，4月19日至5月6日，又召开了六次扩大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各省区农运负责人以及一些军事将领。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土地归谁？和关于保护中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据土地委员会议记录，陈独秀出席了4月26日举行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并作了发言。

（七）各省省党部，会同省农协，依据中央农政部土地改良法案，按照当地实际情形，议定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条例，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

以上为进行方法。

1927年6月 《中国农民》第二卷第一期 署名：陈独秀

中国国民党的危险及其出路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从蒋介石到阎锡山,将来或至到张作霖、杨宇霆),他们现时所奔走呼号的救党清党运动,和国民党改组时冯自由、刘成禹等所号召的护党运动,是同样的把戏。他们所号召的口实是反共产,从冯自由、刘成禹〔禺〕到杨希闵、刘震寰,从杨、刘到蒋介石、李济琛,从蒋、李到阎锡山、许克祥,都是同样的口吻,即将来从阎锡山、许克祥到……从……到……也必然是一脉相传没有两样。这并非是偶然的事,乃因为代表封建军阀及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他们势不能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长久合作,以致身被南赤北赤等不洁之名,而不为帝国主义者所谅解所宽宥。

张继说:“我们国民党若反对帝国主义,则失败时将无地逃避。”吴稚晖说:“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赤化为口实,淆乱世之众听。”这就是国民党新旧右派始终反共之共同心理。他们都以为国民党之所以为帝国主义所疾视,乃因改组后加入共产分子之故,非排共无以救党,排共与救党、清党、护党,乃同实而异名。他们不懂得“为帝国主义所疾视”正是国民党之荣誉,而不是羞辱。他们所谓护党、清党、救党之目的,不是想把国民党从不革命救护到革命,而分明是要减少国民党的革命性,回复到改组以前的状况。汪精卫先生过上海时,曾面问蒋介石是否要把国民党回复到改组以前的状况,蒋竟直认不讳。

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是怎样?改组以来的国民党是怎样?有了进步没有?这应该是人所共知,不待多说了。改组以来的国民党,因为有了共产党分子加入捣乱阴谋破坏,又加以苏俄帮着“送牢饭”(蒋介石语,即令人吃不饱之意);然而其结果,国民党党员在全国各省都大大的增加了,党在民众中名望价值也日高一日了,军事上更有了突飞的开展,所损失

的只是去掉了陈、林、杨、刘这些势力，得罪了帝国主义或者更是美中不足！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他们只担心得罪帝国主义，遂把国民党改组以来的进步看做一文不值。他们反共救党之真正心理，正因为恐怕身被赤名，得罪了帝国主义无以生存，只有急急排共，把国民党回复到改组以前的状况，以表示“守身如玉”仍是“安分良党”，庶几可以稍温帝国主义之心而息其怒。试问以此救党，把党救到什么去处？

此时国民党群右（从蒋介石到阎锡山），纷起通电排共，其口实，除将民众对资产阶级及土豪、劣绅、地主所谓过火的行动归罪于共产党外，不能举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阴谋破坏之一二事实。其实，国民党现时之真正危机，不是右派所谓共产党之阴谋破坏，而反是右派之自身。国民党某领袖说的好：“此时国民党有蒋记、阎记之分，将来或者还有张（作霖）记……记……记，汪、谭无兵，所以没有汪记、谭记的国民党。”谁有兵权，谁就在他的地盘之内，以清党、救党名义，造成他自己御用的国民党，使国民党变成无数小军党；国民党真正危机在此，所谓亡党之痛或即在此，而不在共产党分子留在国民党之内。蒋介石到底还是一个老国民党，有些投机混入国民党军队里的新鲜漂亮人物如阎锡山辈，他们停止站在北洋军阀那边打击国民党才有几天，有些经过共产党人设法展转长期的劝告才肯接近国民党的；有些虽然勉强加入了国民党，经过共产党人再三劝告，才有点看中了国民党的；这班新鲜漂亮人物，终不能新鲜漂亮到底，现在都回过头来加入反赤运动，都伸起大姆指头自称是纯粹国民党员，自称是真正三民主义信徒，在清党救党名义之下，大声疾呼的排除共产党分子留在国民党之内。他们的面孔转变得这样快，他们这班大呼清党救党的“国民党忠实党员”，倘若半夜里想起来几天以前打击国民党之事，岂不要浑身流出愧汗！然而他们毫不惭愧。他们毫不惭愧之理由是：他们以前打击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革命的党，是反对袁世凯，反对曹锟、吴佩孚的乱党；他们现在大呼清党救党，正是要清除国民党中之革命分子，不但要清除共产党分子，并且对于纯粹国民党员之稍稍左倾分子，也要以暴徒罪名清除之，以图根本消灭国

民党之革命性；他们以前对国民党之态度与口号是铲除乱党，现在的态度与口号是铲除暴徒，他们对待国民党是始终一致的，面孔虽前后不同，内容实无变更，所以毫不惭愧。不但他们如此，即段祺瑞、张作霖都曾屡次表示可与国民党的妥协派温和分子携手合作，都无非是企图清除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以消灭其革命性。自袁世凯以来，他们站在国民党外边打击国民党，不但于国民党无伤，而且因于驱迫国中所有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使国民党的力量一天伟大似一天；他们现在跑进国民党，清除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以根本消灭其革命性，使革命的国民党变成他们新军阀御用的工具，这才是对国民党之真正打击，这才是国民党之致命伤，这才是国民党之真正的清党危机！

所以欲救国民党之危机，决不是清除党内革命的分子，而是要清除党内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机分子，不然将名存而实亡。国民党在现时严重的危机当中，和民国二年受袁世凯打击的无路可走相等的危机当中，以汪精卫先生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及左派的武装同志，应该有一大觉悟，下一大决心，首先自身团结起来，再和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拿出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的精神，来一个从左边的清党运动，毫不顾惜的清除党内一切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机分子，以救出真正革命分子的国民党正统之生命。只有清除党内一切投机分子，只有革命的左派团结起来巩固正统的国民党，只有消灭全国某记某记个人御用的国民党，国民党才有出路；若放弃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接受蒋介石的主张，不但失了左派的立场，且不是国民党的出路！“联蒋反共”固然是革命的左派国民党寿终正寝，所谓“反蒋反共”及所谓“反蒋分共”（分共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分离之意），亦属欺人自欺的鬼话，反共或分共，都是和蒋介石走上一条道路，尚何须反蒋？

也许有人以为联蒋固然是走到投降资产阶级的道路，反蒋则只有走到附属无产阶级的道路，国民党左派仍然是没有出路。其实不然。中国的国民革命，在社会的客观上条件上，固然不会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不是无产阶级单独的革命，而必然是工农中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革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各阶级联合的国民党在中国存在了数十年以至于今日，这是在中国这样社会的客观条件上自然产生的，国

民党左派在现在及将来的生命仍然是依照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而生存而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出路，不是投降资产阶级，也不是投降无产阶级，而只是实现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实现反帝国主义(民族)、反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民权)、反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民生)之工农中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以克服蒋介石为中心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右派，这不但是左派国民党眼前的出路，也就是中国国民革命眼前的出路。

七月一日

1927年7月8日 《向导》周报第二〇〇期 署名：独秀



寸　　铁

可怜的山西各界代表!

所谓“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本是阎锡山去年冬天就向国民政府所要求的官衔,意在拒冯而独霸北方。然而六月六日阎锡山就职宣言却说:“本总司令承六月五日山西各界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公推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事实上六月四、五、六这几日,是有一些阎锡山制造的御用党部及民众团体,在那里奔走劝进,阎锡山还再三谦让,经各界代表坚请之后,始允就职。有人说:阎锡山再三谦让时,如果各代表不坚请,则将如之何?我说:阎锡山无命令谁敢坚请?现在谁敢不坚请?

阎锡山的国民党……的国民党?

山西的国民党〈党〉部存在不只一天了,阎锡山是几时正式入党的?他一入党便下令清党,清什么?不用说,真正目的是要清去非阎锡山走狗的分子。不但山西,他省都有同样事实发生,国民党照这样办法,会真有“亡党”的事!

山西省议会移交烟具

自阎锡山就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阎锡山的国民党省党部也

迁入了省议会办公，旅居省议会之议员先生，各自持箱笼，纷纷搬出，报上说有数人急急跑出，竟将烟灯烟枪完全抛弃，不敢回取，可见惊慌之一班。其实他们未见得是因为惊慌而抛弃烟具，恐怕是移交给后来的省党部诸人受用！

1927年7月8日 《向导》周报第二〇〇期 署名：实

寸　铁

汪精卫的出路在那里？

汪精卫题《申报》双十增刊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请问国民党分子现在有几个不腐化？汪精卫的出路在那里？

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

代表绅士的《时事新报》，忽于今年国庆号上登出一篇很有趣的文章，题目叫做《双十节的民众化》，内中说："似乎与民众没有关系的双十节，又要来一次了！……中国的人民，到现在在实际上还没有任何式样的政权，……以致一般寄生虫来包办一切，越闹越起劲，寄生虫当然是残民以逞之徒，他们自己以为是圣贤的正统嫡派，其实只是一班无业的高等游民而已。让这许多非民众的人物来当道，民众自然要永远愚蠢，永远得不着一切政权。……汉字教育，本来不是为民众的，是残民以逞之徒的法宝，所以汉字教育的结果，可以造成圣贤之徒来对付民众。……世界上有文字的国家，差不多都是为民族的，只有我们中国人的文字是为寄生虫的，为圣贤之徒的，小百姓甚至于连极平常的官府文告都看不懂！所以要使双十节有意义，非使民众爬上来不可；要使民众爬上来，非把寄生虫所依为命的汉字打倒不可。……斯文扫地的工作实行了之后，圣贤之徒才无所凭借，民众才敢作敢为。"《时事新报》编辑先生们，大概是很疏忽的把这种议论登了出来，若是细

心再读一下，恐怕他们要吓一跳！

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

帝国主义眼中的赤军首领，一变而为反赤的纯粹国民党员，再变而为基督将军，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但不知他三变而成个什么东西？

滑稽的禁令

广东的民政财政必属之李济琛，两湖的民政财政必属之唐生智，河南的民政财政必属之冯玉祥，浙江的民政财政必属之何应钦，江西的民政财政必属之朱培德，这种军人割据的状况，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没有两样；然而南京的所谓国民政府，方通令各军长官，严禁干涉民政财政，可谓滑稽之至！

1927年10月24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一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国民党也可以为帝国主义镇压革命了！

今春汉、浔民众收回租界，上海工人大罢工，长江革命怒潮高涨时，各帝国主义者异常恐慌，以为北洋军阀已不能够镇压中国的革命，不得不亲自派遣海陆军队来华，以资镇慑，其中尤以英兵为最多，计二万余人。自蒋介石来到东南，极力为帝国主义者压服革命的民众，至八九月间，帝国主义者感觉得国民党的军队镇压革命也很得力，东南局面渐趋平静，无须他们自己多驻军队了，遂调回英军一半。现在又打算调回二千，其余留驻二年，观察此二年中，中国有无革命运动发生，再定去留。国民党如果能够继续镇压中国的革命，帝国主义者便永远不须御驾亲征了！

国民党也想求得帝国主义的信任了！

向来只做军事投机的国民党，自从改组后接受了共产党反帝国主义的口号，虽然沾染了一点赤化嫌疑，却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武汉派开始反动之时，一面反共还一面说是继续反帝国主义，以掩饰他们的反革命。可是他们的忠实党员何应钦，最近对英帝国主义的《字林报》记者索克斯爽爽快快的说："共产党离间吾人与外人，外人若能不为所惑，详察国民革命军自北伐开始后之记录，则自能信任吾人，而中外旧时友谊即可恢复矣。"原来帝国主义者不信任国民党，是由于共产党离间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旧时友谊，这正是国民党反

共之唯一因由！

国民党也要“外崇国信”了！

自命为忠于国家民族的戴季陶，他虽然不愿意反对他们的朋友——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却极力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说“反英”是他们总理三十年革命根本政策。然而他们总理的忠实信徒何应钦对索克斯说：“共产党则以‘反英’为政策，转使国民党与外人为仇，致丧失外人对我信用；今后吾人必须与外人重行讲信修睦，以免猜忌。”原来“反英”是共党的政策，国民党是要与帝国主义讲信修睦的，这可以说是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政策之失败，而是段祺瑞的“外崇国信”政策之胜利！

张作霖的遗嘱

自从高等华人梁启超、丁文江等，发明了和平谈判友谊磋商来代替革命暴动的理论以后，汉、浔民众以暴动收回租界时，奉天军阀也说要收回主权，但只宜和平交涉，而不应用暴力，可是至今也未见他们和平交涉过。现在何应钦又对索克斯说：“至于不平等条约必须废止，但不能急切从事，如共产党之所为，当用讨论形式以达吾人之目的。”这几句话，好像是张作霖的遗嘱，而不是遵守了孙中山的遗嘱：“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所谓无政府党本来就是这样！

有人曾慨叹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也居然怂恿蒋介石屠杀工人；汪精卫说：“所谓无政府党，也许本来就是这样。”果然，中国的一些无政府党人，对于血手的吴稚晖，不但不声罪致讨，而且还为他编辑《吴稚

晖最近之言论》和《吴稚晖丛书》，说吴稚晖是“革命之健将，人群之导师”！

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

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社会主义性，有非资本主义倾向，在革命进展的策略上，在使三民主义的革命性随时代进步上，也未始不可。然而，象李权时先生，老老实实把民生主义的理论，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劳力价值论那一类，倒是直捷爽快！所以，谭延闿说：“近来细读总理的书却实在是资产阶级的理论。”

孙中山无常识处

戴季陶曾说：“中山先生有些天才卓杰处非常人所及，然有时发起议论来竟无常识。”诚然，他曾批评马克斯的盈余价值说不对，他说：“资本家有时固然赚钱，有时也亏本，可见盈余价值说不能成立。”他在民生主义第一讲里，也说：“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这些议论，就是中山先生在经济学上缺乏常识之故！

不甚赞助捕房的法官之下场！

关于撤换上海租界临时法院院长问题，《时事新报》叹为“行政干涉司法，损司法之尊严”；我以为损司法之尊严，其事尚小，承帝国主义者之意旨而进退法官，损中国民族之尊严，则其事实大。两星期前，《字林报》记者索克斯对何应钦说：“公共租界之困难，在于临时法院不甚赞助捕房。”何氏即出日记簿记之，谓将立告南京政府。不久

临时法院院长便撤换了！

汪精卫是第五代反共者

汪精卫曾历数国民党右派反共人物：第一代是冯自由，第二代是陈廉伯，第三代是杨希闵，第四代是蒋介石，不知第五代是谁？哈哈！不料就是他自己！

好一个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张继告诉江汉通讯社记者："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是国民党人一致的主张。一国之中，各阶级各团体的利害与政见不能尽同，各就所同结党议政，这是人权之一，专制帝王之下，尚不能禁止王党之外复有民党；国民党主张"党外无党"，是谓横霸！党内有派，乃世界各国大党所不免，惟不若国民党中竟有"蒋记"、"唐记"、"冯记"、"阎记"之分（谭延闿语），则未免可笑。如此而主张"党内无派"，是谓自欺！

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

中国国民党自清党以来，不但各种各色的老党员都回到党里，而且增加了许多顶括括的革命新同志：久附北洋的阎锡山同志，做了党国的总司令；交通系大将郑洪年同志，做了党国的财政部长；吴佩孚的走狗杨森同志，做了党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连困杀武昌老百姓的刘玉春同志，也做了党国的国民革命军江左军北路纵队指挥官。将来张作霖如果失败，奉系军阀中，必然又要产生许多三民主义的忠实党员！今春刘湘、王陵基、石青阳等，在重庆大举反共清党时，街上大贴其"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的标语，当时闻者颇以为怪，现在看起来，何怪之有！

“杀尽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反共的唯一理由；汪精卫说：“国容共，共不容国，形成分共等等痛史！”然而事实上，倒是张继说：国民党人一致主张“党外无党”；并且最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的口号，第一个就是：“杀尽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宣言说：“清党工作不能以肃清跨党分子，做到‘党内无派’为已足；尤须将中国共产党之势力根本消灭，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根本推翻，做到‘党外无党’而后已。”请问究竟是谁不容谁？谁破坏谁？

1927 年 10 月 31 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二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黄埔失败第一个重大原因

蒋介石告别黄埔同学书说："我们同学应当一致反省，何以一往无前的胜利中，会造成不可挽救的失败呢？第一个重大原因，当然是全体同学意志不能统一，精神不能团结，不顾团体的重要，只逞私人的意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这是我们最不幸的一点。但如果把违背总理主义的一小部分共产的同学，清除出去，而其余大多数都能很精诚的为主义奋斗，我们仍是不会失败的。"照这几句话，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认识清除共产的同学，确是黄埔军失败之第一个重大原因了。

团结三民主义信徒之结果

黄埔军初成立时是何等精悍，可是自从三月十二以后，蒋介石专门引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清除共产分子，以团结三民主义的信徒。其结果三民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了，而黄埔军腐化了。那些腐化的情形，用不着别人造谣离间，最近蒋介石告别黄埔同学书说得好："骄傲，奢侈，放纵，贪污，诈伪，浪漫，不守纪律，不知责任，一切新旧军阀官僚的恶习惯，都丛集于你们的身上。……丧失了革命的志气，只计较官阶的大小，金钱的多寡。"

军阀政客是那些人？

蒋介石告别黄埔同学书说："这次革命的方法，根本上已经是错误

了，如果我不辞职，不能跳出现在这个环境，革命断无彻底成功的希望；就是我挣持到底，我可预料将来最好的结果，亦不过做几个军阀的掌柜和政客的傀儡而已。”这几句话将置欢呼“共产党肃清了！国民党统一了！国民革命就要完成了！”的沪宁衮衮诸公于何地！

1927年11月7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三期 署名：撒翁



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信[1]

(一)

常委诸同志：

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他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当然不回避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与民族争斗对峙)，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量。固然因经济争斗而不避免暴动，尤其在农运非暴动恐难发展。问题是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前在汉口，我对于湘鄂运动，也把这样的意见告诉过亦农。若飞对于江苏运动，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我当时曾表示不赞成。略说了几句，他似乎还不大以我的意见为然。这如果是他自己的意见，望常委急需纠正！如是常委的意见，我提议要切实讨论估计，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宜兴、无锡事件所表现的，也是偏于政治方面，经济的意味太少了，这样的暴动，使群众只看做C与国的政权争斗，和国之北伐有什么不同(我们脑中的不同当然无用)？在各地的运动和暴动中，今后务要使经济的意味着实加浓，如此才能推动广大的群众，如此才能使一般民众了解C与国的显明的不同。现在一般人都觉得连我也承认是C与国的冲突，而不是农民

---

[1] 原标题分别为《独秀同志来信》(一)、(二)、(三)。

革命，因为在宣传上在行动上都未曾表现农民的经济要求，与群众的骚动。我以为单是“耕者有其地”这个口号还不够，因为太文雅了，不能使广大的农民了解，而且农民的痛苦不单是土地问题。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明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我们此时若不用最彻底适合于农民自身经济利益的口号深入农民广大的群众，而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当然的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使国民党有组织黄色农民协会的可能。宜兴、无锡事件报上说是奉了唐生智的命令而做的，不知是反动的宣传或是幼稚同志的胡来，望注意！

独秀　十一月十二日

（二）

中央常委诸同志：

昨函谅达。

顷阅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政纲，且明言是“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而国际屡次议决案都说：“认为说民族革命已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革命已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彼此仍是大大的争质，不知最近国际已改正否？此问题不弄清楚，将来的政策，又会有异见发生。我以为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迅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与国分离之后，政纲尤十分紧要，现在若不宣布一明确的政纲，党内党外不明白我们究竟要做什么。诸同志意见如何？

独秀　十一月十二日①

① 这封信的落款日期与第一封信相同。从“昨函谅达”一句，可知接连两天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信的落款日期有误。

(三)[①]

中央常委诸同志：

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我有几个意见贡献于同志们参考：

一、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暴动时要立刻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这还不够，并要解决农村中一般的病苦事件，如此方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

二、"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我殊不以为然。政权的中心当然是工农，而不可用独裁口号。"苏维埃"本来只是会议意义，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别意义，我以为用"工农兵平民（贫民亦不妥）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关于此点，我有较详的意见，兹不具陈。）（平民即被压迫中被剥削之意。）

三、关于国民党问题，我自七月以来，即以为我们不能再留在国民党，即不必再附属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之下，亦即应独立行动；然同时亦以为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我现在仍旧是这样的意见。汪精卫在汉口时，我已察知其漠视农民利益，现在更加反动，广西老宣传广州共产政府仍举汪为主席，自然是极滑稽的造谣作用，惟广东方面，如尚赞成土地革命的国民党员，无论是团体或个人，我们应该与之公开的党外合作，不必强之加入我党，在民众工作上，在政府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只有我们的力量超过他们便无妨），都应如此。国民党各级党部如有赞成土地革命者，可许其存在，可与之开两党联席会议。即谭平山如以国民党地位或

---

① 中央常委收到陈信后，回了他两封信，其要点如下：（一）国民党从上到下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足见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二）"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惟一的方针"；（三）"农民群众在现在的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四）"现在的问题，在农民暴动中正是最迫切农民群众取得政权（苏维埃）的问题。"

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们也不可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

四、广东离香港太近，易为帝国主义者所袭击，我们为保护新政权起见，反帝行动要十分谨慎。

五、苏俄同志，此时最好绝对不赴粤参加工作，他们最好选择有革命经验者数人，在上海组织一委员会，帮助中国党的中央。由他们的委员会派一得力同志驻香港察看广州情形，及中国同志在粤工作有无错误。

独秀　十二月十三日午前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　1927年12月出版



寸　　铁

还是吴稚晖说老实话!

蔡元培在两路党部演讲:“及国民军到上海……(共产党)当时主张攻入上海租界,使风潮扩大……于是拘捕共产党徒,风潮不致扩大。”可是事实上,当时共产党并没有攻入租界的主张(有多种宣言布告可证),这是上海市民所知道的;所以,国民党军队宣布解散屠杀总工会纠察队的理由,只好说是因为工人互斗。然而吴稚晖在书汪精卫铣电后却说:“我们老实不客气,自然提出反共产口号,自然围缴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枪械。”

华官委托捕房越界捕人

租界越界捕人,这是中国人素所愤恨的事。不料近来上海法租界捕房竟公然驾汽车直入南洋大学捕去学生一人,该校当局向捕房交涉,法捕房谓:“法租界巡捕入华界捕人,全系事前受中国军警当局之委托,而有此举动。”说要向外人收回租界的白崇禧,高唱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做出这种甘心断送主权的事来,他们和何丰林、孙传芳有什么两样?

为新军阀造机会

孙科报告讨唐内容谓:“若不将此极大之障碍扫除,即北伐成功,亦不过为一般新军阀造机会,徒使国无宁岁,民不聊生而已!”孙科这几句

话说得痛快之至！可是贵党的军事领袖们，那一个和前几天还自称纯粹三民主义的忠实党员唐生智不是一样的货色？

蒋介石是向田中求婚吧！

从前替段祺瑞保镖的寺内内阁，实际上就是田中内阁。蒋介石此次赴日本，唯一目的也就是想求这位田中保镖；至于向宋母求婚，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鬼话。

国民党仍难团结吗？

戴季陶是主张分共最早而最有力之人，他以为共产分子留在国民党内，则党员间共信不立，有碍党之团结。现在他的目的完全达到了，共产分子出去了，三民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了。然而戴季陶最近致第一中大学生函，仍然是痛哭流涕的说："谁知今日纠纷之深，已至不易条理，果全体同志，去其派别之感情，从事于实际建设之分工，则合作精神，当可日趋丰富，否则愈欲团结，而团结愈难！"

江 南 二 老

汪精卫骂吴稚晖为"老狗"；钮永建自谓"老而不朽昏而不庸"，则分明是"老昏"了。前清两广陶总督幕下，有江南文武一对名士，一个吴稚晖办学，一个钮永建练兵；此时老狗与老昏，仍然是一对，可称为江南二老。

双包案的清党运动

在上海、杭州努力清党的陈希豪，现在以反对西山会议派的中

央特委而被通缉，说他是假清党；在湖南、湖北努力清党的唐生智，现在也以反对南京中央而被讨伐，说他也是假清党。真清党，假清党，国民党这种双包案的清党运动，实在闹得人们头昏脑晕，一世也弄不清楚！

枪决大批共犯

某处"枪决大批共犯"，各报上差不多天天都有这样新闻。我们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异日如有"枪决大批国犯"、"枪决大批……犯"的事，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切勿到那时忽然想起大喊什么集会、结社、言论、信仰之自由！大家都记着，毋忘今日！

横逆变成了神圣

去年今日，江浙商、教、新闻各界的绅士们，到处都把党化教育及青天白日旗当做两件最横逆的东西咒骂；现在国民党的武力征服了江浙，这两件横逆的东西，马上都变成了最时髦的东西，神圣的东西。这是很新奇的事么？一点也不新奇。被谁的武力征服了，便颂扬谁是太祖武皇帝，这班绅士们一向是如此。所以他们现在反某某党，反某某主义，都不成什么问题。

汪精卫行为不当

汪精卫既然决心反共，既然称蒋派及西山会议派为"反共先觉"，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和这班先觉们合作，而鬼鬼祟祟的跑到武汉，又跑到广东呢？所以，孙科大喊："汪精卫行为不当！"

国民党眼中的革命成功

自从国民党清党反共，遏止民众的革命高潮，以前所得的收回汉、浔租界这一点小小胜利，英帝国主义者都要乘势推翻，国民革命的成功在那里？蒋介石在神户讲演说："国民革命之大业，今已成功三分之二。"他显然是指中国三分之二的地方已经挂了青天白日旗。从前挂上五色旗便算是共和国成功，现在挂上青天白日旗便算是国民革命成功，哈哈！革命大业原来是如此吗？或者是国民党眼中的革命成功不过如此！

以国民党党员为限

凡在国民党政权之下的文武官吏及全体兵士，都照例要加入国民党，这种滑稽的办法，我们自不去管他。最发松的是：财政部的会计师注册章程，竟规定充任会计师者，以国民党党员为限。当教职员的虽无明文规定，事实却非入党不可。将来当医生的，做律师的，也难免有这样横霸的限制。我以为这样扩充党势还不痛快，最好由官厅令示通衢，凡行路者以国民党党员为限，庶几全国四万万人很快的都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党员！

1927 年 11 月 14 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四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辽皇帝与党皇帝

传说张作霖将做皇帝，国号曰辽，改元曰宏宥。天下事无独有偶，南方有了党国，北方便有了辽国；辽皇帝的年号是“宏宥”，党皇帝（张继《江南晚报》发刊词语）的年号应该是“训政”。这两位皇帝谁是半斤，谁是八两，终须血战一场杀死无数老百姓，才见分晓！

改组与纠正

段祺瑞、徐世昌倒了，研究系的机关报北京《晨报》，因为不受进步的青年欢迎，遂宣言改组，脱离研究系的关系。孙传芳倒了，他们的上海《时事新报》，因为不敢开罪于国民党，遂宣言改组，诡称由研究系让渡于新组织，并且装出国民党机关报的态度，比上海任何报都党化些；将来国民党失败了，他当然又要改组。汪精卫开始反共的时候，大做其“错误与纠正”的文章，说从前联共是错误，现在反共是纠正；我看他这种东倒西歪的人，将来应有第二次、第三次纠正。人们只要巧于运用改组与纠正这两样法宝，自不难头头是道。

党　　国

近来在报纸上时常看见一个新鲜而不可解的名词，叫做什么“党

国”。所谓“党国”，不知是指“党与国”，还是说“党的国”？若横霸之徒，硬说是“党的国”，则北洋“军国”即倒，仍然没有“民国”；非国民党党员的老百姓，仍然是无国之民或是党国顺民！

1927年11月21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五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数典忘祖

有些国民党人，大骂共产党主张“耕者有其地”是扰乱农村秩序，殊不知“耕者有其地”这句话，是国民党老祖孙中山说出来的，并不是共产党的特别发明。这种数典忘祖的国民党员，和马寅初攻击马克斯的劳力价值，是同样的糊涂；因为劳力价值说，并不始于马克斯，而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老祖斯密亚丹和李嘉图的发见。

驳马克思不是容易的事呀！

缪斌在他反驳马克思主义的大文里，发见了“马克思误于研究的材料，只偏于英国孟加斯得工业区之一隅，所以材料不免偏缺”。郭任远在他反驳马克思主义的大文里，发见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没有重大的关系。”反驳马克思学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学问贫乏的中国，无论能够赞成马克思学说的，或是能够反驳马克思学说的，都算是可贵。可是像这两位缪先生和郭先生的妙文，也居然印刷出来问世，我未免要为“徒灾梨枣”的梨枣痛哭了！

郭先生和自己开玩笑

郭任远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又恐怕人们因此说他头脑顽固，于是

在非难马克思主义之前，高唱表白他自己“是极端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关于经济的妥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是主张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并且大喊“马克思学说太不革命”，又大喊“我的反共并不是因为他们太赤，倒是因为他们太不赤；人家反共是因为相信他们是过激派，我的反共却是因为他们太不过激”。我看这位郭先生，未免太和他自己开玩笑了！

移步换形的骗术

章宗祥、曹汝霖留学东京时曾说：“我们虽不主张革命，而仍要以流血达到立宪目的。”袁世凯曾说：“我铲除了国民党仍然拥护共和。”蒋介石对汪精卫说：“我清除共党后仍要做左派反对右倾。”汪精卫、孙科在汉口说：“我们反共后仍然要反帝国主义与讨蒋。”这可算是他们一脉相传移步换形的大骗术。

夸大狂

戴季陶称孙中山为继承儒家道统之圣人，胡汉民则谓“中山贤于儒、墨”，而陈白虚更称中山“集古今中外诸圣之大成”。国字号的人们，称中山为“国父”不算数，近来还恭维他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夸大狂是中国人特性之一”，这句话的确有点道理。

同志之标准

江苏财政厅电各县长说：“第一批大县十万以上，中县五万至三万，小县一万以上……按数于十号解到……本厅长尊之敬之，引为同志。倘仍漫不经意……立予罢斥。何去何从，惟该县长自择焉！”那末，一班

县长们，不会搜刮老百姓的钱只好滚蛋！不愿滚蛋的，只好赶快搜刮几万洋钱继续做同志——三民主义的忠实同志！

世界太左了！

胡汉民说："共产党是右派，国民党是中派，无政府党是左派。"张继说："我不是右派，我比共产党还左。"《革命周刊》(无政府党的机关报)说："共产党倒是右，而民生主义倒是左了。"李石曾说："蒲派(无政府主义)必属于左，而马派(马克思主义)必属于右。"又说："武汉之共产革命为右派，上海护党革命为左派。"(以上俱见《革命周刊》)可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封建豪绅，一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而欢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与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李石曾、张继等，那么现在的世界未免太左了，难怪有人叹息"人心不古"！

好大胆的胡适之、褚辅成！

胡适之鼓吹"市政超然于政治潮流之外"，褚辅成主张"市政脱离政治而独立"，并且主张市自治及市长民选；好大胆的胡适之、褚辅成！不怕党国先生们治你们以"反对以党治国"之罪吗？

主义的流弊

我们固然力赞民族运动(限于被压迫者)，然而不相信什么民族主义。我们固然不赞成现在就要废除国家政府这种制度，然而却反对什么国家主义，更未闻有什么政府主义(Etatisme 应译"国家主义"，只有李石曾译做"政府主义")。我们十分提倡读书，然而不能赞成什么读书主义。代表物价的金钱虽然是货币商业时代不可少之物，然而却不应因此提倡什

么拜金主义。譬如人们都必须吃饭，而却不应有什么饭碗主义。因为这些事成了主义便流弊无穷。

反共清党后的两个印象

国民党一致反共清党后，有两件事给人们的印象万分深刻：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上海领事团，要取消北河南路所贴"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帝国主义"等标语，和英国要推翻汉案协定；一方面是何应钦主张"与外人重行讲信修睦"，与帝国主义者恢复"旧时友谊"，和李济琛向广州中山大学学生，"非笑以武力或经济方法推翻帝国主义之说"(七日路透电)。胡汉民曾说：因为CP是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我们已打倒CP就只好中止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运动了，这岂不是同时也打倒了国民党吗?"不知他忘记了这几句话没有?

反共而不流入资本主义?

罗家伦在他《转变青年的思想》文章里说："不可因攻击共产主义而流入资本主义，或变相的资本主义。我们反共则可，反共而流入资本主义则不可。"哈哈，罗先生！这是你在白纸上写下了的黑字，请你将来别忘记了！请你赶快去问问你的老师胡适之、顾孟余、马寅初(他们的头脑毕竟比你还清楚一点)：既然反对共产主义，又不要流入资本主义，则将在何种经济制度之下建设工业?

"杀其人而用其法"

张继说："国民党之反共，不特其主义而已，即其组织法亦当起而反对之。"不错，国民党改组后党章是共党起草的，是效法共党的，是应该

反对的。不但这个，改组后的宣言及政纲，也是共党起草的，更应该废掉。不但这个，连“反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这类怪话，也不是党国的国货，乃由共产党搬到国民党的，《向导》周报出版以前，国民党的文献上实在找不出这些怪话，这更是应该急于废掉的。否则不但反共不彻底，而且是胡汉民指斥的所谓“杀其人而用其法”，未免有点不体面吧！

中国人的晦气！

可怜的中国人，智慧受束缚于孔氏一尊者二千年，至今犹未能完全解放；现在又加上什么“党国”、“党治”、“党化”、“党外无党”这类怪东西来束缚，真是中国人的晦气！

1927 年 12 月 5 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七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反共产的国民革命

胡汉民曾说："除掉了革命的精神，就不成其为中国国民党。"这句话诚然不错，可是现在国民党革命的精神是什么？胡汉民答道："反共产的国民革命。"原来国民党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这样解释！所以李济琛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说："本年内国民党除清赤外一无成就，殊属可耻！"

下层轰动

冯玉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罪状是"下层轰动"。可是中国共产党实在惭愧得很，还并未做到下层轰动，冯玉祥未免太替我们吹牛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演讲里，都是保育政策的理论，都充满了非下层轰动的精神！在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冯玉祥及其他忠实党员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在这一点，他们和梁启超党主张贤人政治、反对暴民专政的理论，也没有两样，都同样以为民权自由应该是上层绅士恩赐的，即统治者的仁政，不应该由下层民众自动的争取。不过中国革命之成功及民权自由之实现，是由上层绅士的保育政策或是由下层民众轰动，将来历史先生会答复这个问题。其实各国的革命史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

“第五层序”的革命

李石曾谓苏俄革命属于“第三层序”；他们（无政府党）和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是三民主义的民生革命，属于“第四层序”。不错，他们的革命，比苏俄更进步了一阶段；可是他忘记了还有一个“第五层序”的革命——张勋复辟！

1927年12月12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八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我们发见了国奉之不同了

以前我们不明白国、奉之间因什么不同而战争，现在发见他们的不同了，乃是国民党军阀以为奉天军阀讨赤不彻底，所以他们先北京政府而与赤俄断绝国交，蒋介石比张作霖更有牺牲中俄协定的勇气。

请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国民党改组时广州支部邓泽如等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政纲，函呈孙总理，一则曰"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再则曰"使我党永无获得国际同情之一日，更使我华侨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蒋介石开始清党时，李石曾对汪精卫说："目前只宜反对北洋军阀，不必牵及反对帝国主义。"最近蒋介石对新闻记者说："我们既然要对俄绝交，便必须与各国一致来反对第三国际。"这就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国民党死亡之正式讣告

象汪精卫这样东倒西歪的人，当然是左右站不住；然而反汪的人象邓泽如、古应芬、马超俊（南京讨共救粤大会首领，曾因在兵工厂作弊被孙中山驱逐离粤）、谢英伯（上海讨共救粤大会主动者，曾因反对改组被中山开除党籍）这类人，都群起跟着广西老向汪精卫、何香凝等打落水狗，这便是改组

后的国民党寿终正寝之正式讣告。

之洞主义

据戴季陶《青年之路》所说，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义，不外是恢复忠孝仁爱民族固有的道德及提倡西洋科学；如此，我们并不需要什么孙文主义，我们原有的张之洞主义，老早就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至多只能说这样的“之洞主义”比孙中山早年的“鸿章主义”（吴稚晖的话）进步了一点。或者有人说之洞主义比鸿章主义还退了一步，因为他有复古的趋势。

少一个皇帝

李烈钧前说：革命军中少一个楚霸王；现在又说：少一个皇帝，中国非皇帝不能统一。可见这班英雄们非伏在皇帝脚下不过瘾；而且非一独尊的真皇帝不可，多头的党皇帝仍然是不过瘾。

共贼汪精卫

汪精卫大喊：“杀尽共产党”（见两件大事文中），又大喊：“一个共产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的。”（见他们十三日宣言）邓泽如指汪（精卫）、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潘（超五）、王（乐平）等，是广州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起事的主谋正犯；国民党中人一致说顾陈二人是共产党；南京讨共大会的请愿书，也明言“共贼汪精卫”；因此，汪精卫等都应该杀尽，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这乃是很正确的逻辑。

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

在表面上看来，上海《时事新报》简直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好像是研究系投降了国民党；然而在政治主张上看起来，如贤人政府、联省分治、仇俄反共，本是从进步党到研究系多年的一贯主张，现在国民党都一一采纳，无怪乎《时事新报》得意洋洋的举起双脚来欢迎，这便是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两党二十年来的政治争论至此才告了结束。

杀人的国民党

国民党大喊共产党杀人，仿佛是千真万确的事。然而到底共产党在两湖杀了多少人，近来在宜兴、无锡、广州杀了多少人，各报都含含糊糊，未曾指实；倒是最近国民党在黄安杀人一千五百，在广州即十四一夜杀了二千余人，上海各报都有确实数目可稽。这也许是各报受了共产党的金卢布故意宣传国民党之惨杀！

小　人　党

吴稚晖说汪精卫是卑鄙小人；说胡汉民是刚愎小人；说徐谦是大胆老面皮的小人；说顾孟余是懒惰阴刁的小人；说陈公博是贪财无厌的小人；说甘乃光是善伺人意的小人；说他自己是酷刻小人。如此说来，国民党简直是个小人党。

1927年12月19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吃人的血腥的道德文化

国民党一面大喊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文化，一面在广州一夜枪决二千余人（上海各报广州电及薛岳布告都如此说），路上死尸累累，非常凄惨（电通社十五日广州电）；截止十六日止，殓尸千五百余具（《时事新报》十一日香港电）；女共党数人在大南路被人用棉花包裹，浇以火油焚烧（《申报》十五日香港电）；截至最近，枪决共党确数，五千七百人（《申报》二十一日香港电）。有人说中国民族旧有的道德文化是吃人的是血腥的，这句话或者不错。国民党正在恢复这种道德文化！

究竟是谁惨杀？

东方社十九日香港电说："每日被枪决之共党（其实不尽属共党），尚不下百人。……除抵抗之兵士警官以外，被共产党员所杀者，并不甚多；所谓达二千人之惨杀者，殆不能不归罪于自称白卫军之李福林军薛岳军及右派工人会之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等之复仇与报私愤行为也。"难道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也赤化了吗？何以他们也说此次广州之惨杀者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呢？

研究系称心了罢！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研究系等绅士们，看见共产党领袖未被段祺

瑞杀头，老大的不称心，大喊共产党及其领袖藏在群众背后牺牲青年。自从李大钊被绞杀以来，上海、广东、广西、汉口、湖南、河南、北京等处，成百成千的共产党被腰斩被杀头被枪决而且有被剥皮肢解火焚者，绅士们该称心了罢！可是大家要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

反共先生的下场

不独张发奎、黄琪祥、李福林因共党头衔被讨伐；不独汪精卫、何香凝、顾孟余、甘乃光等因共党嫌疑被拿办；而李汉俊、詹大悲且以共党首领名义被杀，孔庚、李书城也以共党名义被捕。今后有枪的人处置异己最简便方法，就是给他戴上红帽子。各派反共先生，将来都难免作法自毙，唐生智、汪精卫等的下场，便是很好的先例。

1927 年 12 月 26 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一期 署名：撒翁



国民党四字经①

1927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
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
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
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军阀得意；
训政时期，官僚运气；
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诚党员，只要洋钱；
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陈独秀诗存》 2003 年 10 月安徽教育出版社　未署名

① 郑超麟先生在世时曾多次对任建树说：陈独秀的诗《国民党四字经》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的夹缝里。我们遍查不得。后经任武雄同志首先发现。此诗初见于《上海工人》第43 期，未署名，时间：1927 年 12 月 26 日。经郑超麟先生鉴别认定是陈独秀的作品。

寸　铁

白崇禧口中的清党大功

白崇禧在汉口演说："过去的清党，有报私仇者，有受厚贿而为富家翁者，误杀冤死者不乏其人。"国民党忠实党员这样的清党大功，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

真正国民党

真正国民党，只有西山会议派，亦即环龙路四十四号的国民党。怎见得？因为只有他们自始就反共反俄，而且最彻底。其余若汪记、蒋记、冯记……记……记国民党，都曾经联共联俄，即现在反共反俄还是不彻底，还是不敢公然取消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代他们起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政纲及党章。只有西山会议派要完全复活改组以前的国民党，这才算是真正老牌的国民党呀！

分治合作与联省自治

程潜在汉口演说："最近上海有所谓分治合作说，实即变相的联省自治制度，完全违反总理学说，这种人就是作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工具。"不知道李石曾听了这几句话作何感想？陈炯明、赵恒惕及《时事新报》记者听了这几句话又作何感想？

孙中山瞎了眼睛

白崇禧致电何应钦等表示对蒋出处意见，谓“领袖出处方式，须极磊落，介公于汪派诸附逆委员，不免瞻徇过甚，于张、黄诸叛将，不免庇护过深，倘对汪派及张、黄不有明显态度，窃恐为盛德之累。”是的，张、黄想利用共党，汪又想利用张、黄，蒋又想利用汪，这班叛逆一串的利用，都因为要对付忠实同志广西老。孙中山在广州革命的时候，专重用这班叛逆，而未曾看中忠实同志广西老，真算是瞎了眼睛！

1928年1月2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二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蒋介石也谈什么土地问题

蒋介石最近在南京党校纪念周说："在训政实施时期，土地问题，至为重要，我们要丈量每县的土地，以为平均地权的步骤，土地问题如不得到解决，则不能实现我们总理的民生主义。"蒋介石也说说什么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然而他的方法是要经过丈量每县土地的步骤。他又说："要解决土地问题，不能不有户口的调查。"可是自从顺治皇帝定立清丈编审法令，一直闹到洪宪皇帝设立经界局，二三百年也未曾丈量好那一县的土地；自从顺治三年定立户籍律以调查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一直到现在不断的调查户口，也从来不曾查清那一地方的人口实数。每县各乡耕种的土地实有多少，耕种的人实有多少，只有各本乡的农民自己查得清楚，若候政府丈清了每县的土地，查清了每县的户口，再来实现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这大约也和吴稚晖三千年后的无政府主义相差不远吧！

容安与共信

于右任说："石曾先生以为世界只有马克思、蒲鲁东两派，而忘却除马、蒲外，尚为吾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可与马、蒲鼎足而三也。"又说："吾党固不必取法苏俄，亦何可妄自菲薄，弃固有之信守，而从蒲氏以安那其主义为出发点之分治合作说耶。"戴季陶曾谓国民党容共而伤了党的共信；照于右任的说法，国民党容安，也未免有伤共信吧！因

此，反共清党之后，应该有反安清党的举动；否则国民党的主义仍然不纯粹呀！

金　箍　棒

国民党人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好像孙悟空在猪精腹中舞金箍棒。共产党是否承认这句话呢？承认的。共产党的金箍棒是什么？不过是反帝国主义、军阀及主张工农民众政权。可是安那其派在国民党中所舞的金箍棒，乃是实现蒲鲁东的分治论与排斥马克思派；研究系在国民党中所舞的金箍棒，乃是贤人政治、反民众运动、联省自治与仇俄反共。他们说共产党挂着羊头卖狗肉，他们自己何尝不是挂着羊头卖王八肉。

武汉又多一个冤鬼！

李汉俊、詹大悲已经杀得冤枉极了，现在又有一个林可彝，也以共党重要份子而枪决了，武汉的冤鬼又多一个！

国民党根本不要民众

“反共后不要民众”，汪精卫曾说这句话是共党造谣诬蔑他们的。现在怎样么？自从十二月十四日，蒋介石在招待上海新闻记者席上，发出“停止一切民众运动”的主张，方声涛、杨树庄即在福建下令停止民众运动；胡宗铎即解散了武汉一切民众团体；蒋梦麟即“函请浙江省政府并令行浙江省党部，自即日起，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民众运动之工作，严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聚众开会，结队游行等举动”。这难道也是一般无智识者借党的招牌所做的吗？非也！军阀党根本不

要民众。

一朝天子一朝臣

西山会议派得势之时，便有人恭维他们是“反共先觉”，南京发出“反特委会即反革命”的标语。特委会取消，蒋派占住了南京，便有人提议“取消非法特委会所产生的各级党部各机关”，“永久开除西山会议派党籍，并封闭环龙路四十四号反动机关”，“立即拘捕谢持、邹鲁、覃振、居正……葛建时等”，“抄没西山会议派财产”等等。张继先生回想得意大书“当年碧云寺今日紫金山”联语时，未免有点今昔之感吧！

可怜的胡汉民！

胡汉民致函某委员说：“目击吾党命脉，已日就阽危，比虽昼夜彷徨，勤筹补救之方，而茫无所得。”你不是说过“清党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一定比清党以前的中国国民党要好，更要进步”吗？现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完全清除了，并且成百成千的屠杀了，和苏俄已绝交了，民众运动也下令停止了，国民党应该大大的进步了，何以党的命脉反而日就阽危，无法补救呢？可怜的胡汉民，你昼夜彷徨些什么？

1928 年 1 月 16 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四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国民党是一种什么党?

党有三种:倚靠军队,钳制民众,夺据地盘,是曰军党;倚靠国会议员,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之下,用改良口号欺骗民众,以选举手段窃取政权,是曰官党;倚靠民众,破坏现制度,建设新制度,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是曰革命党。现在的国民党是这三种中那一种呢,党国先生们自己扪心想想看!

国民党的劳动立法

国民党人常说:共产党鼓吹工人革命,是害工人的;我们主张由劳动立法,改良工人生活,增高工人地位,是有益于工人的。是的不错,国民党政府已经有了劳动立法了。中华民国十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卫戍司令白崇禧阻止工潮布告:"嗣后如遇有劳资纠纷事件,仍须静候主管机关,持平调解,不得有轨外行动,倘敢聚众滋扰无故罢工,即按军法惩处!"这就是国民党的劳动立法!

冯玉祥眼中的共产党与国民党

一月三日冯玉祥对总部人员训话说:"共产党往往对于有些微过错的党员,即加以开除党籍的处分。……我们国民党是很宽大的,党员若

非为很大的错误，轻易不肯把他开除。”是的，共产党诚然严厉，一个腐化分子也不许存在；国民党诚然宽大得很，所以对于军阀、买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无不尽量包容。

险象丛生的国民党

国民党人常说国民党不统一，是由于共产党挑拨离间。现在国民党中不但共产分子都清除出去了，连吴老狗所谓共产党的大工具（汪精卫）、小工具（陈公博）都赶跑了；可是最近的中央会议，竟因多数而且重要监察委员不出席而开不成；一月十四日上海各报宣传国府要人说：“正式会议，暂缓举行为妥，否则恐将发生军事问题。”同日白云梯通电说：“入都之后，详加视察，失望非常，险象丛生，一触即发。”这又是谁挑拨离间的呢？

请看中国的阶级与争斗！

国民党常说，国民革命中，应牺牲阶级利益，而为民族利益争斗，不应为阶级利益争斗。然而近来各省商会联合会的决议案，没有一件是关于民族利益的；一百十四件决议案中，总括起来只有两桩大事：一是拥护并扩张商人经济的政治的权利，这不是阶级利益吗？一是向工人店员进攻，这不是阶级争斗吗？然而顾孟余却一口断定，中国没有阶级，所以不应有阶级争斗。然而吴稚晖却一口咬定，顾孟余是共产党！

逼钱与打战

逼钱与打战，固然是革命时代所不能免的事，然只是逼钱与打战，

丝毫不为任何阶级兴利除弊，此所以国民党的政治和北洋派的政治没有两样，甚至于北洋派中的孙传芳，还不像国民党现在这样肆无忌惮的逼钱。至于怎样逼钱，如加盐税，抽亩捐，预征钱粮，这般专门杀穷人的办法，国民党也和北洋派一样；北洋派打北洋派，国民党打国民党，这般自相残杀的打战，国民党和北洋派也是一样；此所以国民党的势力必然和北洋派一样的不能长久存在。

杀 穷 人

财政没有办法，谁也不能久握政权。中国财政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自管海关盐税，停止赔款及内外债的本息偿还；一是推翻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由国家征收农产税。前者每年在一万万元以上，后者每年至少有二万万元。可是北洋派、国民党都不敢采用这两个办法中任何一个，所以他们都只得采用苛捐杂税等杀穷人的办法，而终于自杀。

两件肉麻的事

有许多人从前非常鄙视孙中山及国民党，或者即是现在仍然对国民党貌从心违，而开起会来，都像煞有介事的恭读总理遗嘱，这岂不是一件肉麻的事！国民党一面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屠杀异党，勒收种种色色的苛捐杂税，无微不至；而一面天天在报上大登其中国国民党政纲，“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与夫“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这岂不是一件肉麻的事！

反共始祖

冯自由反共，不但在西山会议派之前，并且还在杨希闵、刘震寰之前，他真是反共始祖，他真是先觉之先觉；国民党赶走汪精卫，便应该欢迎冯自由。果然，《申报》一月十七日广州电："冯自由应当局召，十四日启程南下。"啊呀呀！反共后国民党之进步真是一日千里！

1928年1月30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五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反革命的阶级

五卅运动时，代表大工商业家的上海总商会，始而旁观，继而反对，现在他们却和外国工厂主联防工潮。南京募捐办冬服，上海总商会借口商业凋敝，一文也不能代募；同时工部局募集什么“压制罪案特别经费”，大老板们却整千整万的拿出来，给洋官儿奖励爱活生一流人物。

英国驻上海防军司令官邓戡回国，市长张定璠忘了邓因为什么带兵来中国，特和他交换像片，以为纪念。这些事，都是表明上层阶级总是依靠外国帝国主义，而反对革命的！

殖民地驯服的奴隶

李长傅先生说：“驻华的外国军警，是借口保护外侨，实在是来征服中国的。南满洲日警，可以逮捕中国人；上海的英国巡捕，可以枪杀中国人；英美的炮舰，可以轰击万县，轰击南京，轰击江阴；所以他们派遣海陆军到中国的意义，是到殖民地来的。”（见二月二日《时事新报·学灯》）这几句话说得很对。然而英军司令邓戡回国时，中国官张定璠和他交换像片，中国资本家虞洽卿、冯少山、叶惠钧等亲到码头欢送，这是何等驯服的殖民地奴隶！

第三国际之野心？

世界新闻社据美报载莫斯科通讯："第三国际决议：(一)对于凡拟派军队至中国之各国，煽动其妇女儿童在铁路车站及船坞等处为示威运动；(二)对于凡驻有军队在中国之各国，煽动其妇女儿童及残废兵士在国会及政府之前为示威运动。"《时事新报》谓此为"第三国际之新野心"。如此说来，必须第三国际煽动各国派军队驻中国，才算是他们对于中国之友谊。

呵，原来你们是革心党！

钮永建、张之江提议："自共党乱政，遂发生打倒基督教等口号……共党宗旨在破坏道德，基督教重革心，遂为共党所仇视。今清党之举，正在进行，最近更有清去共党理论进一步之办法，似该项打倒基督教之口号，自应及早取消，以免为共党所欺惑(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听者！)，并以仰慰先总理信仰之诚。"是的不错，孙中山不但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照戴季陶说，还是一位信仰礼教的圣人之徒。是的不错，唯物史观的共党，不但反对基督教，并且要打倒一切唯心的反科学的反物质文明的教派，如孔教、佛教、道教、阴阳五行家、同善社、悟善社等等；唯心史观的国民党，必须把共党这些理论彻底清去，才免得为共党所欺惑呀。

拜金主义能救中国的穷吗？

新年一见面，便开口互道"恭喜发财"；拜年客一坐下，首先要奉上"元宝茶"；"招财进宝"、"金玉满堂"、"一见生财"，这都是大多数人家所贴的经常标语；"咦！好大元宝！"是清末河南某巡抚署中的特别标语；

宗教中还特别有“财神”。我们贵国人的拜金主义，可谓世界第一了。然而胡适之、吴稚晖还在那里伸长着颈子喊拜金主义！有人以为胡、吴提倡拜金主义，是羡慕美国富；然而最近美国国立工艺学校校长具理氏，批评中国学生“惟汲汲得金”。或以为胡、吴提倡拜金主义，是因为中国太穷；我以为能救中国之穷的，只有去掉阻碍中国工商业发达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而不是什么拜金主义。

1928 年 2 月 6 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六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三民主义者的阶级观

蒋介石等的“改组中央党部建议”，开口便说：“窃以本党为代表全体被压迫民族利益的党，而唤起各阶级被压迫民众，共同奋斗，更为本党所主张唯一无二之革命方略。”怪哉，怪哉，真怪哉，代表全民利益的国民党，仍旧学舌共产党，说出什么“各阶级被压迫的民众”来！然而一点也不怪，谁是被压迫者，李济琛早已解释过，他说：“工人是压迫阶级，资本家是被压迫阶级；农民是压迫阶级，地主是被压迫阶级。”所以国民党唯一无二之革命方略，是要唤起被压迫的资本家与地主，共同向工农奋斗。所以缪斌主张严禁罢工、减租、加薪、减时。所以浙江省政府将各级工会一律封闭，公安局长章烈主张一切民众运动及工会等一律取消。

三民主义者的交友与模楷

蒋介石在四次全会致开会辞，一面说：“所有以前之共党理论，一致铲除。”一面仍旧学舌共党说：“扫除军阀及帝国主义……如此则消灭共党，仍不忘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到还是纯粹三民主义的缪斌老实说：“中国在国际上……束缚的痛苦，欺侮的羞辱，都饱受了；但平心静气推想起来……须得自怨自艾，不能一味归咎于他人身上。……不必口口声声喊打倒……伤感情而启仇怨。……若本党目前不求与共党为泾渭的分辨，则可无望于国际上得一‘交友’。……不妨让他们来筑铁路，来兴工厂，来开马路，……他们到底不愧为我们的先进，应当奉为‘模楷’

而仿效之。”

三民主义者的阶级调协办法

缪斌的党务提案，主张取消旧有农会农民协会，另组业佃联合的农业协会；取消旧有工会，另组厂主工人联合的工业协会；取消旧有商会商民协会，另组店东伙友的商业协会。主张阶级调协的三民主义者，这种口说打倒阶级敌对性而心实单单打倒工农阶级，名为联合协会而实是根本消灭工农组织的办法，本来很高明；然而全国商会联合会首先发电反对。

乱　党

贱婢一旦做了夫人，马上张嘴骂别人贱婢；国民党不被人称为乱党才几天(此时在奉张统治之下还是乱党)，胡汉民便大喊“剿灭乱党”，这都是无耻之尤。从前的国民党可贵，正因为它是乱党；现在的国民党可鄙，正因为它是治党。社会进化未到美备以前，任何时代，总有一班人因为不能满足现有制度，起而反抗谋改造，当时的统治者总称它们为乱党；因此，我们可以说，乱党正是社会进化之一种重要的动力。

哈同花园与俄领馆

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关系而封闭俄领馆；可是哈同花园里分明有孙传芳的机关，为什么却不敢损他一根毫毛呢？呵，我明白了！哈同虽然是犹太人，然而他入了大英国籍，便是党国先生们的“交友”与“楷模”，如何能和他“伤感情而启仇怨”呢。

1928年2月13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七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忠实同志乎叛逆乎?

唐生智同志,何健同志,刘玉春同志,杨森同志,叶开鑫同志,这班反共的忠实同志,亲亲密密的喊得没有好久,都一个一个的变为唐逆、何逆、杨逆、叶逆了。究竟谁是忠实同志,谁是叛逆,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永世也弄不清楚,世界上的政党,只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有这种怪现象。

谁是中国的国民革命者?

中国真正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国内上层阶级有力者,还是军阀、地主、官僚买办的资本家。汪精卫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还是屈服在上层阶级势力之下;戴季陶、顾孟余、甘乃光所梦想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在摇篮里,并且终于在摇篮里。此所以汪精卫弄得进退失据,此所以戴季陶只得烦闷颓废,此所以蒋介石、李济琛得了胜利。蒋、李胜利了,中国反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国民革命可是失败了。此所以现在愿意而且能够继续完成这个革命的,只有工农阶级。

无赖与有赖

现在有一位中美合璧的正人君子,骂卢骚是无赖汉,恭维耶稣是正

人君子。其实卢骚、耶稣都始终是无赖汉;假使耶稣对于犹太正人君子所指斥的罪恶,能够翻然改过迁善,何至钉死在十字架?无赖汉是世界创造者,正人君子是世界创造之障碍物,或破坏者;所以无赖汉一旦为有赖而变为正人君子,其人便不足观也矣。丹敦、罗兰夫人、米勒兰,当初本是无赖汉,其后都为有赖而变为正人君子。中国的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辈,当初在保皇党看来,何尝不是无赖汉,可惜后来都为有赖而努力要做正人君子了。

即　是

蒋介石从前说,"反对我即是反革命";南京特委会也说,"反对特委会即是反革命";最近蒋介石对南京军校学生说,"反对校长即是反对国民政府,亦即是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想必也即是反革命,反革命想必即是该杀头。古有"必须有"(今通讹作"莫须有",惟《宰辅编年录》作"必须有")三字狱,今有"即是"二字狱。

国民党的理论与方法

此次国民党全会主要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所谓"肃清共产党的理论方法,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方法"。国民党的理论与方法是什么?就是: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各国为模楷为交友,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苏俄;同意研究系的和平建设及贤人政治的保育政策,而屠杀主张民众暴动民众政权的共产党;在民族利益国民经济的名义之下保护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财产,而向工农民众进攻,停止其运动,解散其组织。这就是正式抛弃孙中山晚年三大政策的假面具,而回到原来纯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所谓"肃清共产党的理论方法",就是肃清改组后的国民党之革命性;所谓"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方法",就是恢复以前不革命及反革命的政策之正式确定。

“党人可杀”

二十年来做国民党死敌的研究系，助袁世凯诛锄国民党，助段祺瑞压迫国民党，助陈炯明反对国民党，盛称直系的两次战功、八省地盘，北伐军出发时，犹在他们的《时事新报》上反对国民革命，反对青天白日旗，为孙联帅捏报胜战。一旦北伐军占领了上海，《时事新报》马上改变态度，装出党人的口气，也称呼先总理，也痛骂奉直军阀。乃日久玩生，复萌故态，渐渐埋怨道：“民众(研究系)谋与党接近，乃造‘投机’之名辞以却扫之……冒国民党招牌之共产党固可诛，而冒国民党招牌之‘党人’，其罪亦可杀矣。”然而他们还很胆怯，一露“党人可杀”的论调，马上便抬出缪委员来做护符。呜呼研究系，可耻亦可怜矣！

1928年2月20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八期　署名：撒翁



寸　　铁

上海工统会的饭碗快打破了

工统会化身的什么上海全市工会宣言说："最近的事实又告诉我们，中央有停止党务的活动与民众运动的提议，这个不幸而离奇的消息到了民间，何等的失望呵！"工统会请求启封杭州各工会通电又说："不意中央执监会议方庆开成，而离弃民众传言，即随同发布，停止运动之提案，已迭见明文，封闭工会之举动，又相证以事实，浙江省政府对于杭州工会之措置，实令民众启悲忿之怀。"其实民众对于国民党之失望与悲忿，已不自今天起；现在工统会的失望与悲忿，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饭碗问题吧！

国民党人腐化的亲供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化身的什么各工会也发表宣言，说工统会是"纯为腐化分子所把持之机关"；反对第四次全会停止民众运动，说这是"现在新旧国家主义派、政学系及研究系之余孽，与一切腐化分子，又乘机混入本党，各以其非国民党之主张，冀图变更本党之主义与政策，鱼龙混杂，怪论纷乘，瞻望前途，可为痛哭"。这些话真是他们由反共而腐化的亲口供状。

谁说国民党不要民众?

国民党虽然议决停止民众运动,虽然下令解散工农团体,然而蒋介石到杭州时,公安局通令各区署:“本月二日午间,蒋总司令来杭,着该工厂全体职工,手持欢迎旗,到站欢迎!”谁说国民党不要工农不要民众? 你看!

1928年2月27日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九期 署名:撒翁



致中共中央常委同志信[①]

——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中央常委同志们：

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也许是慢性的（因为中俄都不利于轻率开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间都还未曾充分准备好，现在谁都不敢断然取独占的形式，会需要经过一些曲线的斗争）。然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

这种纠纷发展到爆发战争，有两种可能形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互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无论是那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或者在受了欺骗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别持异议。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众多

---

① 1929年8月3日，中央复陈独秀的信，认为：他对于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如果认为中东路问题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或者是‘国际纠纷问题’，这就离开了阶级观点，走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7日，《红旗》第37期在《两个口号——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专栏内，公布了撒翁（即陈独秀）的这封信，和《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此后，《红旗》第38、39期以及《布尔塞维克》发表多篇文章，批评“误国政策”口号。

数心理又是这样，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形，都不能让我们闭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进的。

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象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军事根据地。”七月十二日的宣言中这句话，显然有几层语病），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

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战场，或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进攻苏俄所加于中国民族的灾难，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稍有常识的人，一经指出，都能懂得，即不倾向革命的中立分子，也能了解；而且只有这样的宣传，才能够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然后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这个名词更能使群众亲切的了解），然后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

第四十二号中央通告说：“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

只是在客观上也许会演成事实，但我们根本上反对一切反动的国际战争的党，尤其是正当极力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紧急关头，决不应该向同志这样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罢！"因此，我主张中央赶快补发一通告，取消这几句话。

我估料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发言引起大家的误会与揣测，所以我以后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并且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独秀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 1929 年 10 月上海民志书局发行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①]

中央常委同志们：

一　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这个错误的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我们若不深刻的了解这个根由，将仍要辗转陷于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将只是口中反对机会主义这一名词，而手中所做的仍旧是各种各样变相的机会主义。

"八七"会议以后，仅仅是笼统的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广州暴动失败后，我们分明是失败了，当时应该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即是我们从战场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当时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尚在进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在党的"暴动！暴动！继续暴动！"这样命令之下，受了一时不能回复的

---

① 1929年8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认为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性的错误，批评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中央不容许公布这封信。（见10月10日陈独秀致中共中央信）。10月5日，《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认为"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走入了取消主义观点"。陈独秀的这封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号召全党"拥护中央决议，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

损伤，党中最积极的战士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复。

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听说在六次大会时，特立对布哈林说："盲动主义极盛时，我实觉得不妥当，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说出不同的意见。"的确，当时的中央同志们，以为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者才是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只有暴动才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如有人对于革命高潮有点怀疑，对暴动有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打击，大有"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概。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可惜太晚了，并且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

二　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则在政治分析与估量上自然要发生错误。政治上有了错误的估量，即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党内德谟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褊狭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证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说"（这是造谣，中央正反对

认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见，参阅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与复江苏省委同志的信——编者①)及盲动路线之正确。有许多同志都感觉着中央在政策上组织上或工作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以为不是这样零碎的问题，而是有系统的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若长此照这样不正确的路线蛮干下去，于革命及党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

三　你们对于蒋桂战争性质分析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于不曾洞察资产阶级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这种传统的错误这种整个的错误观念所表现之一例。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由这传统的错误观念做出发点，所以你们才把蒋桂战争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斗争，都当做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矛盾之爆发。(你们把蒋桂战争看得如此严重，如此夸大，所以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一分钟，尚坚决的预言战争不会就爆发；这个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代他们格外夸大，遂不得不代他们格外慎重。)

其实，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早已成了它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累)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至于说资产阶级企图发达市场，列宁曾经告诉我们，这是要靠"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第一，为生产手段创造市场，即是由富农把他们在衰微的地主及零落的农民身上搜集的生产手段转化为资本；第二，由购买能力较强的农民消费扩大，以创造市场"。若改良一般农民生活，增高一般(这里连工人也包含在内)购买能力，则非资本主义生产力终于不能有高度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所需要与可能(国民党政府丝毫也没有想到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正因为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与可能)。此外，这两个阶级之

① 本文内标有"编者"字样的，皆系《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书的编者。

“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甚么呢？而且，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它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它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它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它们所以现在尚能残存，乃因为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未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你们忽视了这些很明显的事实，遂至今还是过分估量封建势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负责同志日前和我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竟说：“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又是造谣，中央只是说中国是农业落后国，农业生产还超过城市生产。在发展的方向上，当然是城市支配农村，这里没有争论，但农村总是比较城市落后，绝不能将中国农村看得如上海汉口一样——编者）像这样不正确的观察，自然会幻想中国尚有这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与资本）战争之可能，自然会产生“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这是曲解，中央在反对向导式的唯心的分析的时候，指出每个战争每个政治事变都有他的经济的背景与阶级的意义。参阅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三十四号等——编者）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只可说每个战争都有经济的背景，在阶级的社会里，便有阶级的意义（这里所谓阶级的意义，如就阶级内部战争说，是和个人的意义及其他意义相对立，不是和阶级战争之涵义完全相同；因为每个阶级战争，必须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之革命战争），不能说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这是因为未有阶级以前的原始民族，民族已有战争；已有阶级的社会里，各阶级内部也有战争，最显著的例，如日本的西南战争，中国的北洋军阀战争，南北美战争。

如蒋桂战争真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蒋介石讨伐桂系，如果

真如你们所说是“为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而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三十号通告)，不得不和你们所谓“更反动的”“尚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战争；那末，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还未完全丧失其革命性，我们便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够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因为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这些也都是群众所要的。三十四号中央通告所谓:“同志中有以为‘蒋桂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拥护蒋介石的路线上去”。这些同志对于蒋桂战争性质所下的定义，和中央自己所说的一样，这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与策略，正是中央自己错误的分析之必然的结论，如何能够归咎于同志！于是你们又解释道:“阶级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许多同志都说中央有这样的解释)(中央只说中国的军阀战争虽然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可是主要的动力是帝国主义，所以没有一点革命或进步的意义。——编者)；如果真是这样，则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的战略基础，便根本倒台！“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及“阶级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这两个理论，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加了闻所未闻的修正，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四 蒋桂战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对于他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战争，究竟取什么态度呢？我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很复杂的流变生长过程中，和欧洲已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有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同，它们的阶级来源太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纵，它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以至爆发战争，这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是较长期的现象，蒋桂战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不但代表复杂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之国民党是如此，即在欧美先进的资产阶级，它们当中，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轻工业和重工业及财政资本之间，虽然很少国内战争，而冲突仍然不断，这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那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有大的冲突。无产阶级对于它们的态度，只是分析出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为了经济上或政治上某种具体问

题之利益矛盾而必然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利用它们之间每个冲突（不管它是经济的或政治的），来扩大自己的运动，对于他们之间因利益不同而爆发的每个战争（不管它是大规模的或是小的），都只有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不但是消极的反对，且须积极的转为阶级战争，此时不需要代他们分别那个是纯资产阶级的，那个是带封建性的；或者那个较进步较左些，那个更反动些，那个还有改良政策的企图或欺骗，那个连这些都没有；因为这决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当面的任务是推翻整个反革命势力之统治，因为我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

对于它们之间采用不同的战略者，例如从前俄国的少数派；少数派总以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比代表封建势力的沙皇进步些，沙皇更反动些，它们之间的确还有冲突，无产阶级就该和资产阶级联盟扫除更反动更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多数派坚决的回答说：否。它们对我们已经是整个的了，我们对它们也必须是整个的。“我们正在反对封建，你们不要反对我们！”这是民主立宪党所要的；少数党居然做了它的应声虫，多数派则断然拒绝之。“对桂战争是反封建势力”，这是蒋介石爪牙的宣传，我们共产党中央也这样说，这是何等痛心的事。

五　因为不曾洞察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不曾看出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政纲中，对于富农取了犹豫态度。列宁说：“农民社会之分解，是为资本主义创造国内市场。”“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富农、中农及农业无产阶级》）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之初步形式，它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资产阶级取一致态度；是因为富裕的农民，蓄有余资的以营利为目的而购入或租入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雇用较多的雇农，生产商品，出卖于市场；或于农业之外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至包耕包佃；他已经走进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下层群众（贫农）站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了初步的民主革命之后，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下层群众起来均分土地，取消高利贷，富农反对革命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

每个革命斗争都首先要看清那些社会成分必然因革命所给予的利益不同而发生向背；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与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因为它所失于革命的农民的东西比所失于地主的要大得多。所以若是始终想和富农联盟来反对地主，和始终想和资产阶级联盟来反对帝国主义，是同样的机会主义。

并且中国的农民革命，不是简单的反对封建地主问题，中国的地主阶级中，根本就没有象法国、德国、俄国革命时封建领主那一特权等级。商业资产阶级，不但直接剥削农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业资产阶级，并且许多衰微的地主正因为商业资产阶级及富农的两种榨取，更要加紧剥削农民以自存。在垄断原料方面，城市商业买办阶级，使农民经济陷于极困苦不自由的奴隶地位。富农占有较多的土地剥削雇农；高利贷所剥削的，不用说多数是贫农；包佃者对农民所取租额，当然比较地主所取得还多，他才好于中取利。所以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阶级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

六　最令人不解的，你们不但在阶级比重上把封建势力看做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或者更强固些，最后更进一步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你们从前肯定的说桂系和冯玉祥都不代表资产阶级，随后又说："蒋介石并不等于资产阶级"(三十四号通告及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号《红旗》)；那末现在中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及其领导势力是什么呢？国民党政权和他的一般政策之中心意义所表现的是什么呢？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政治代表呢？如说有，既非桂系，又非冯蒋，那末究竟是谁呢？如说没有，那末，以前所谓"阶级联盟"，及所谓"资产阶级背叛革命"都成了弥天大谎，岂非滑稽之至！大约是你们看见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并未能排斥帝国主义，并未能改良农民生活，并且它战胜了桂系反而马上取消了已实行的二五减租，你们对他很失望，所以说他不等于资产阶级。他们致河南省委的信上说："假如冯玉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必须解放农民等等。"如此说来所谓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并不是现在实有的这些冒牌的假的资产阶级，只有幻想着在你们头脑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才算是中国老牌的真正资

产阶级。你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的观察，分明不是依照辩证法，在一切现象流变生长过程中，抓住现在实有的资产阶级，而是依照形式逻辑，虚构一个超时间性的一定模型的资产阶级。国际说你们“夸大资产阶级”，正确点说乃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

这样的幻想，决不能够领导群众向当面的资产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群众去寻找你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你们心目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带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期才会有；现在不但在中国寻找不着，即欧美各国也都已寻找不着了。各国革命史已教训我们，资产阶级一抬头，一看见下层阶级有独立的行动，马上开始反动，毫不犹豫的和封建的旧势力妥协，什么无耻的反革命举动都会做出来；这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历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经济文化落后国的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例外。所以我们不能除开现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即是除开冯蒋等派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另外幻想会有某一派（如在野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或者是不反动的；我们对于整个的资产阶级及其各派代表不能有丝毫幻想，无形中帮助他们欺骗群众。

七　不错，你们着实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宣传，可是你们说了千遍万遍反对资产阶级的话，都被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打销了。这是因为你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把所要反对之目的物（资产阶级）从地上引到空中去了；你们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之错误的分析，又把群众政治斗争的视线混乱了。因此，群众会向你们反问：诚然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但是蒋介石既不等于资产阶级，冯玉祥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桂系，阎锡山，张学良更不用说；那末，我们反对谁呢？我们的阶级斗争，是不是仅仅反对工厂主和公司老板们就算完了事呢？或者说：你们以为资产阶级还要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要反对干这事的人呢？更或者说：资产阶级多少还有点这些企图，虽然不彻底，总比封建阶级进步些，是否还要联合它，领导它，为实现这些企图而斗争呢？群众只认识简单明了的事实，对于许多“然而”、“虽然”、“可是”、“但是”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学，不大理会，你将怎样回答他们？党内同志因为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也会复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

之幻想与希望，并且觉着更反动的封建阶级尚有这样的强固基础，遂至推论到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在理论上现时仍有客观的可能性，遂至怀疑工农单独起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这一政策，失了理论的根据，莫非真是谭平山所谓“超时代的政策”。诸如此类的右倾思想，都会跟着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发生出来。

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彻底完成这些任务的，只有列宁当年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

八　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和盲动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第一，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群众的革命斗争逐渐发展，汇合达到最高点，而不是陡然可以到来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象，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不断的经济斗争，有转向总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决不能把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都当做革命高潮的征象；至于因为资本进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众斗争本身而言，统治阶级之内哄及中间阶级之动摇，只是帮助革命运动易进于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势力是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客观的估量，而不是向群众宣传鼓动的口号，我们固然不能向群众宣传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众宣传什么“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使群众以为在他们自身斗争之外，另外一个什么革命高潮将从天上降下来帮助他们，一切问题都静候他到来解决，因为他就快要到来了。

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这种取消派的见解，自然是不正确；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消尽现实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说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前考茨基拿莫斯科一九〇五年革命，比较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四个不同点，决定俄国革命有再起之可能（见列宁《俄国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任务》）；多数派也曾指出俄国的一九〇五年和德国的一八四八年不同，而决定了俄国无

产阶级的战略，这都非常正确。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孙中山及其党徒的梦想，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可能性，不但远不及经过毕士马克[①]时代由上而下大改革的德国，并且还不及斯特黑并[②]时代的俄国。中国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来之可能，至于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只可说不会快要到来，因为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他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

现在是一种什么时期呢？我们怎样工作呢？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现在还是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工作路线，便应该和这个时期相适应，即列宁在一九〇八年所说的："过渡期之特殊任务是准备力量，集中力量。"我们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的精神，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的上推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不应该也决不能够站在群众外边，命令群众，我们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来推动群众的实际斗争；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切实实推动群众不断的斗争，在客观上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线进行；不应夸大吹牛在主观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路线进行，夸大吹牛，不但要助长同志们的盲动主义，同时也要助长他们轻视日常琐细斗争的心理。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列宁在一九〇八年，为此曾和多数派内排弃一切合法手段的"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斗争。

当然，群众的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并且群众"自发的"斗争发展到愤激不可遏制的跑到街上示威，这更是走近革命高潮的倾向；但这决不是党以命令强迫少数群众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现一下，或者喊几声我们发下的口号可以冒充的，群众上街示威，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每次号召群众示威运动，也都要有严肃的精神与意义，不可常

① 即俾斯麦(Bismarck)。
② 即斯托雷平(Stolypin, Pyotr Arkadyerich)。

常随便把他们领到街上玩弄；至于根本就还没有群众，也要命令同志充当群众出来做示威运动，以便证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之说绝对正确，这种把戏更万分玩不得的。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夸大主义者（即盲动主义者）无可如何的这样的最后的手段，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

当然，我们领导群众做一切斗争，必须指出总的中国革命前途，方不至使群众感觉着一切斗争，好像是盲行大海中，丝毫也看不见彼岸的远景。并且，中国革命也不是没有很有希望的前途；他就是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积聚下很好的力量，一直到武装暴动的力量，和宰制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冲突所加于中国各下层阶级之榨取与痛苦及因此而发生绝大的经济及财政恐慌等事情结合起来，那时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时我们的党在群众中如有强固的领导力量，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简单的急性的屡次预约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而事实上屡次没有到来，这种“打吗啡针”的办法，决不能使群众明确的认识革命前途，其结果只有使群众失望，减少了革命情绪。

九　盲动主义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除国际所指出的事实外，在此次“五卅”运动中，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旧根性，由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完全暴露出来了。

不认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不认识统治者的阶级性之转变，以为现在国内战争的性质和从前是一样，统治阶级将因之崩溃；不认识现在还是革命两个波间过渡期，把群众斗争程度夸大得如何如何的高昂，虽然经过六次大会以后，不便公然说中国革命高潮仍旧是一直高涨，只好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索性更进一步，换一句更确定的话说：“革命复兴”；并且以为“各国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现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剧”时期（四十号通告）；拿这样错误的政治认识与夸大的估量为前提，以为在这样好的革命环境，自然应该“动”，一点也不“盲”，从前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好夸大的人，永远是盲动主义者，永远自己不承认是盲动主义，永远不认识盲动主义，把

它当做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把他当做革命的正确路线。

你们在此次“五卅”运动前政治的估计，是统治阶级动摇，然而经过蒋桂及蒋冯冲突后，他动摇了没有？又说是改良派的势力缩小，然而对中东路事件各工会一致发反俄宣言，改良派的势力缩小没有？又说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进展；然而为什么你们还要用那断然用不得的办法，派几个同志到老怡和及恒丰纱厂去强自关车呢？你们在此次运动中所取政策，完全是从中央一直到支部一贯的命令主义，“可恨的只是这些自发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展的群众，在革命运动现在这样紧张的时期”(江苏省委委员的话)，不听命令去革命！从前盲动主义极盛时，有人说：“中央骂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骂区委不革命，区委又去骂支部不革命，支部去骂谁呢？只得骂群众不革命。”这样的怪现象，现在仍旧存留着，省委委员因为工厂罢工办不到，遂逼着下级党部下命令罢工，说：“在原则上必须罢工。”这是什么话?！你们忘记了列宁“罢工与否，要依工人自己的意识和自由意志来决定”的遗教了吗？你们不是根据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意志来决定党的政策，而是拿党的政策来决定群众的情绪与意志。

“五卅”运动应该尽可能的努力去做；所得的成绩无论如何小，都有相当的意义；这都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根据你们盲动主义的精神，在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都给了党内党外群众很坏的影响，以至有了“强迫同志吹牛皮”的谑评。

在客观上看来，即以上海一隅而论，我们若有正确的估量(非夸大的)和切合群众实际需要与可能的政策(非夸大的)，群众斗争是能够逐渐开展的，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也能逐渐恢复的；可是下级党部同志们刻苦工作所得的一点效果，决敌不过中央机关盲动政策之摧毁(例如邮政工会及恒丰老怡和事件)，在这种状况之下令同志们如何能够安心努力工作！

十　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

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这样的办法，为了操纵一切使盲动的命令能够顺利的施行，自然觉得很方便，其如毁坏了党的组织与力量何！倘若现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下，党内德谟克拉西势必缩小到连区委支部都不能行选举制；这根本上连少数人都不能集会，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党内的基础组织便已经不存在了，还说什么党已有相当的发展，还说什么革命复兴！倘若说他们的观念都不正确，只有中央政策是对的完全对的，他们盲动执行命令好了；那末，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线若有小小的不正确或大大的不正确，则是否需要“自我批评呢”？

列宁说过：“我们的机关报上，并不一般的排斥同志的争论，宁可说，为了说明现存之意见相差深到若何程度，为了争论诸问题的全面讨论，为了讨论诸种见解之代表者等，陷于褊狭性之斗争，在每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意识的劳动者面前公然争论，都是必要的，既然有不同的见解，而缺乏公然的争论，把关于真实问题之不同的意见隐秘的搁置起来是现代运动缺陷之一。”（《火花》发刊宣言）他又说过：“一切团体员，选举代表者，同时独立的各自对团体全部利害的争论题目，都有陈述意见的必要，民主的组织之党也没有例外，征求所有党员的意见，不能视为原则上可以否拒的，至少在最重大的场合，例如罢工，选举，大规模的杯葛特(Boycott)于政治的行动。”（《一九〇七年彼得堡之分派》）他又说过：“中央委员会知道党员大众之意识的意见，从而不是盲目的指导大众……”（同上）他又说过：“在我们的报纸上，努力给关于理论问题的论文占了很多的篇幅，并且怂恿同志们对于争点无忌惮的发挥。”（《我们的纲领》）

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辩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

出来，俄国布尔塞维克党的理论，就是长期在这样的争辩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同志政治水平线一般的低，也只有不同意见的相互争辩中增高起来，决不能拿出陈套话什么“程度不够”（又是造谣，中央只说在目前白色恐怖的严重环境中，党的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又薄弱，党的民主化是要相当缩小的。——编者）[①]的理由，以为必须他们的政治水平增高了才好“恩赐”他们发表意见的理由，你们主张：党内民主化是要依着党员政治水平提高而扩大，党员政治水平低便应缩小；这正是因果倒置了。

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

公开的理论争辩尚未被容许开始，你们突然发生“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了，这是因为少数派的阶级联盟政策及经济主义取消主义，一贯的推翻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根本战略，目前在中国党内，如有人以为中国还是封建势力所领导的统治，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仍主张什么“四个阶级联盟”政策，又或者有人以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已消尽了中国革命之可能性，革命决不会再起，党当然要和这班人不顾党内和平的斗争，除此以外，其他或稍左或稍右的错误，我们可以用教育及争辩方法来矫正，用不着小题大做，拿“反对党内和平”这种严重的口号来代替“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有人说这是六次大会喊出来的口号，又有人说是国际代表个人的意见，未知孰是?）。至于同志们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和中央意见不同”便是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便要拿“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对付他们，这更是天大的笑话，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二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

---

① 原书的编者。

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只有革命战争紧急时，这种德谟克拉西才应受限制，甚至于一点也不能有；然事后的自我批评仍须是德谟克拉西的。）

我会见过一些曾为党努力工作或现在正为党努力工作的同志，说他们在政治上，在工作方法上，有许多和中央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我曾很诚恳的指出他们的错误；有意见应该向中央陈述，或在党部开会时提出讨论，不应只在个人间闲谈。他们都很惨痛的回答说："你的话在原则上是对的，可是在事实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侦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机关都有，只要你一开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者调到万难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远地方去，甚至教你从党内滚出去；我们是不忍心离开工作的，你说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同志，都因为这样情形烦闷着没有出路，而灰心丧气，而取了消极态度，或是严守'休谈国事'的教训，敷敷衍衍的做着工作再说，而没有一点兴奋精神，或者找个机会给敌人杀了完结，大家也都感觉到这不是好的现象，然而没有办法！"（这些完全是谣言，是独秀阴谋破坏党分裂党之最无耻的煽动同志反中央的话——编者）

听说布哈林曾责备特立说："你是个政治家，不是小孩子，为什么对于盲动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列宁常常说过："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是有政治自觉的。"党教育党员，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马，不是要教成纯粹的雇佣劳动。只要不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者，便不能不承认"活的人究竟和死的人机器不同"，照你们现在的办法，你们褊狭性一致的团体即或造成了，而各个党员都有政治自觉，能够自动的奋斗活泼有生气的党在那里！？

十一 综合上述的说明，可以看出你们有系统的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为改正这些错误之总的路线，我现在提议几个要点：一、在政治上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问题，对于革命高潮问题即目前在革命中是什么时期问题，对于富农政策问题，都需要重新有个正确的决定。二、在组织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谟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

自由，党员间政治上意见不同的争辩，准其在党报上发表。三、更有一个根本而紧急的问题：六次大会对于党的全般政策并未充分讨论，七次大会又不能即开，应由中央及地方把党的全般政策之各个问题提出于全党党员之前，要求每个党员都充分发表意见，尽可能的在党报上陆续公布，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即真正党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党的政策，以便决定党的一切工作之真正的正确路线，必如是才能统一整个党的意志，才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唤起全党党员对于工作自动的努力，对于铁的党纪自觉的服从；必如是才能使党复兴，使革命复兴！

十二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们：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的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此致革命的敬礼！

独秀 〔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 上海民志书局 1929 年 10 月发行

复中共中央的信

中央常委同志们：

读了你们八月四日[1]对于我论中东路问题宣传方法那封信的回答，我感觉得你们对于我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因为是关系党的宣传策略之重要问题，不得不再向你们剀切的重复说明一下，这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我们要懂得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复杂的错综的全部理论与政策，首先要懂得辩证法的时间与空间之变化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不懂得这个，所以往往拿他们自己的形式逻辑之"不容间位律"来攻击马克思和列宁，说他们是诡辩派；有些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因为不懂得这个，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并且还不是替党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宣传大纲，也不是讨论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宣传原则，而是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此外你们已有的话，当然不用再重复加上一些赘词了。你们对于我的前信不了解，有许多是由于这一点。

原则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谓之原则；至于策略战略，则因有复杂的时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时时事事都必须照着原则机械的死板的应用不能有一点变化性；有时因为在时空性上有需要经过曲线才能达到革命之目的，竟可采用和原则形式不同的策略。我们若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责备列宁布勒斯特和约的政策，是"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是"因为原则的错误，所以发生策略上的不同"；因为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在形式上显然违背了"不和资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原则。像这一类

① 中央复信的日期是8月3日。

的“矛盾”政策，充满了列宁一生革命的全部活动；此所以列宁被称为“政策上的辩证论者”，此所以列宁骂反对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的同志：“不如一个鸡尚能跳出人画的白粉圈”。我们若只拿几个原则甚至几个名词，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未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看得太浅薄了，我们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们的来信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之错误。你们的原则，是原则和策略不分，以为策略必须是原则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传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不同的活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在原则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对这一口号的宣传；反之，我却以为我们以前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至于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并不是说对群众解释因收回中东路而必然发生的危险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之后，而不归结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拥护苏联，而是说必须对中东路问题本身有了正确的详细的解释，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后我们的口号才能发生比较大的效力；所以我在前信上说，“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这是因为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迷惑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或者你们以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对于中东路问题，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向群众宣传，对于其中夹杂的民族问题，不需要我们有什么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群众的观念模糊了；并且你们很肯定的说：“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广大群众……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这是你们完全忘记了列宁曾经说过：“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族长制度，爱乡的观念，根

深蒂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即民族自我主义和民族的排外心，必然热烈的存在着。这种偏见，必须先进国之资本主义根绝了，后进国之经济生活的全〔部〕基础都根本改变以后，方能消灭；消灭这种偏见，决非短期所能。因此，各国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对于长期间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里面所存在的民族偏见，应予以特别的戒心和注意。”(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的提案)这是你们还没有真能深切的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自己阶级以外的群众，最革命的以至比较落后的广大群众之拥护，才能够成功。你们说，“不应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这是对的。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在我们领导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照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战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够争取群众，而是脱离了群众。一个布尔塞维克党，若是脱离了群众，便成为只是口头上纸面上的布尔塞维克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实际是个幻想；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也实际是假面具；用收回中东路的名义而开始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或弄起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以及战争中加于中国民众的灾难，也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怎见得这是“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呢？又怎见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呢？前一个是反革命势力对革命势力的战争，后一个双方都是反革命者牺牲下层群众为上层阶级争权利的战争，我们能不反对那一个？只有反对一切战争(不论是革命或反革命)才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若虑同时反对两种战争，群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一战争，会把苏联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当做两个交战团体，平等看待，“双方都要打倒”；则当然应该如你们所说，“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的势力内部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我们须公开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诉广大群众，然后群众才能知道对付这样两种不同的战争之不同的策略”；如此，群众还何至误会？并且，我还要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这一口号，其涵义是些什么？为什么不说“反对俄日战争”或“反对俄美俄英战争”，而说“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

联”，这是否已经明白表示对两方的敌与友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俄的战争”和“反对英美战争或日美战争”，已有显然不同的意义；何况还有在这些口号之下不同的详细宣传，何至使群众误会？

单就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向无产阶级的苏联进攻这一点说，不但在本质上，即在字面上，也已很明显的是阶级冲突，这是任何同志都无需解释而能够懂得的；并且不需要把中央已在通告上解释的话再向中央解释一遍。所以我前信上的说话，目的是在说明由中东路问题将引起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而不是说明其性质。我所以要说明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是因为我对于中东路问题的发生原因及发展前途之客观的观察，都不像你们主观上的那样简单。美国对于北满的野心，有他的经济基础和长远的历史，近来正在企图以共管的名义攫取中东路；日本一刻也不忘中东路，自然感觉着中东路落到美国手里比暂时留在苏联手里对于他更是不利；所以除了把中东路仍旧回复中俄共管的原状，这两个帝国主义对于此路的竞争，必日益加剧，虽然他们对付苏联之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在总的国际局势上，帝国主义间尤其是英美两国领袖的帝国主义之间，由于他们经济上之生死存亡而难以久延的战争，和他们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是同样的严重；这两种战争那一种先行实现，谁也不能机械的肯定像你们肯定蒋桂战争不会即来那样，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两种战争发展的前途，都同样有深切的注意之必要。

即以中东路问题的时空性而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固然应该告诉群众，同时帝国主义之间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不告诉群众；这是因为：第一，若是我们隐瞒了这一可能的事实，一旦局势转变，群众所眼见的战争，不是向苏联进攻而是帝国主义互斗，他们不是感觉到我们的指导不正确或欺骗了他们，便是以为帝国主义的互斗于中国人没有什么危险；第二，指出帝国主义会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不但没有迷乱群众对于进攻苏联危险的认识，而这样正是暴露了帝国主义所以要进攻苏联之秘密（当然，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还不在此，这里可不必说），也正是暴露了国民党仰承帝国主义意旨收回中东路进攻苏联之真实的卖国罪证。

你们以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那么，七月十二日党的宣言，也攻击国民党“卖国外交”以“卖国勾当”，难道这也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总的政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决不能单拿这一方面的话来指摘党离开了阶级的观点。所谓资产阶级的左派如汪精卫等，也会拿这样的话攻击南京政府；可是我们要问：他们总的政策是些什么？他们用这样的话是否为了要打碎他们的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之假面具，而达得动员群众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之目的？如有这样的目的，他们已经离开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了，因为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左的资产阶级。我们不能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意见，以为现在的无产阶级字典上已经不应有“国际”、“国家”这类的字，有用这类字的人，“就是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大声攻击沙皇及克伦斯基政府因战争“把国家及资本主义弄到未曾有的荒废”。如果我们不懂得列宁这句话有战略上复杂的时空性(即是除了深入阶级利益的口号外，还需要这类广泛的宣传，才能动员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来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也会曲解诬蔑他是降低口号，是国家主义观点，并且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或者你们以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口号，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时，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时，我们便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其实如果我们认定某一口号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完全是为他们阶级的利益的，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也不能用；至于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中，也不能说“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一口号，不是在原则上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在策略上够不够的问题。“只是”这一口号，实际应用起来到底够不够了，最近几次我们号召的示威运动已经明白的回答了我们，不能再用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了；你们如果仍不觉悟，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同志们不接受欺骗发生反感，则大失中央的威信；同志们接受了欺骗，以为我们已经有如何的力量，则去刻苦工作争取群众的精神日远，这也不是个小小的问题，至于你们把群众没有在你们提出的口号之下起来的原因，归到白色恐怖，这乃是机会主义者把自己主观上错误的责任推到客观原因的老法子。

只是因为这一战争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苏联而反对，同时不提及这一战争也如何加害于中国人民，不能使一般群众都真实感觉到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联系，只是为无产阶级而拥护无产阶级，为苏联而拥护苏联，则"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只能动员苏联及各国（中国也在内）的无产阶级，而不能动员中国的广大群众。"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也只能动员中国没有小资产阶级偏见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动员多数比较意识落后的革命群众。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方法之缺点正在此，我前信主要的意思亦正在此。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为问题。问题就是"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则能动员无产阶级的最觉悟分子；同时对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又未曾有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尤其是比较落后的群众，明白自己的幻想与国民党卖国误国的罪恶，而接受我们的动员口号。你们这样大成问题的战略，乃是建设在"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一前提上面；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帝国主义战争会引起革命，这是对革命发展前途的估量；正在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同时"告诉群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中国革命有利的条件"，终非时空性所许。

前言所谓"因我的发言引起大的误会与揣测"，乃是恐怕增加党的纠纷，并不是由个人出发而隐藏自己的意见。

以上的说话，似乎稍复杂了，为使同志明了我主要的意思起见，再简单的重说几句，做一个总结。我这封信和前一封信，都不是陈述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之全部内容，也不是讨论此次宣传的原则问题，而是觉得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

（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释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

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两点，因为我们的党应该是实际斗争的党，不能忽视下列的各实际问题：

一、每个原则是否都可以机械的应用，不许有策略上的变化？

二、中国此时是否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三、在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上（关于中东路问题的），除了它勾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外，是否还要说到它这样反革命的政策，对于中国有怎样的结果？

四、中国的广大群众是否都已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五、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是否需要正确的详细的非我们主观的而是群众所能亲切了解的解释？

六、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是否都能够无条件的接受我们阶级的口号？

七、对于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我们是否应一概不要？

八、除阶级的口号外，是否还应该用其他广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号，能够唤起广大群众，参加反对进攻苏联的斗争？

我希望这封信和前几天论党内各种问题的那封长信，都能早日在《红旗》上登出。①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 上海民志书局1929年10月发行

---

① 8月20日，《红旗》第39期刊登中央党报委员会《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一文，并附陈独秀8月11日的来信。

致中共中央的信[①]

中央常委同志们：

自从前月二十八日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约我谈话以后，又看见你们一些关于党内问题政治理论的宣传品，最近又接到你们本月六日的来信[②]，我已经知道你们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之观念与决心，已深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我为对党对革命负责起见，不得不向你们作一次最后的警告！

列宁说过："每个政党，其对于自己的过失取如何态度，乃是表示其党之真诚性的最大证据之一。公然承认自己的过失，暴露其原因，对于其事情之所以发生加以解剖，热心研究矫正方法，这就是真诚的政党之记号。"

我们的党在革命中所做的过失，彻头彻尾的原因，是犯了机会主义，很深的机会主义；我们若不能认识，并肃清机会主义，不但不能得到过去的教训，不但不能矫正现在的错误，而且将来还要走错误的道路，重演革命失败的大悲剧。要彻底认识并肃清机会主义，不仅是枝枝叶叶的指摘那几个人犯了机会主义便可了事，重要是在解剖指出整个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之真实内容及其原因究竟是些什么，无忌惮的暴露出来，然后才能彻底的认识，才能够彻底的肃清，才不至重走旧路；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表示党之真诚性。

中国党犯了很深的机会主义（过去，现在，并且将来），其主要原因是

---

① 中共中央在未决定答复这封信之前，陈独秀便将此信"作公开宣传，经过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极力煽动同志起来反党，并破坏支部与党宣告脱离。这很显然是反党的小组织行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67页）。1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开除彭、汪、马、蔡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

② "来信"，指中共中央10月5日通过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即是以少数派的“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多数派的“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之错误；此种给中国革命以致命伤的错误政策，不但广州三月二十事变后不肯改变，上海四月十二事变后仍不肯改变，一直到长沙马日事变后还不肯改变，强迫无产阶级的党始终屈服在资产阶级的政党之下，做它们的苦力，甚至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已经一脚踢翻了这一联盟，国际还恋恋不舍这一可爱的联盟，还说：“青天白日旗是我们的，勿让国民党右派抢去！”所以南昌暴动，还是涂满了工农热血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的。同时，国际以苏联无产阶级血汗造成的巨量金钱和军器，帮助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冯玉祥等)的力量发展；帮助中国党及中国工农群众的，便是“始终勿放弃阶级联盟”这一革命理论。这种根本政策，分明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一直到社会革命之无产阶级的战略，而是机会主义。中国党的领导机关，为什么盲目的执行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而不怀疑抗议(我个人曾几次提议准备退出国民党，独立领导革命，都为中央多数同志及国际所阻止)，当然不能说不负责任；我是当时领导机关一主要分子，当然也要负责任；谁希图自己躲避过去的责任，都是无耻！

我个人正因为过去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对于机会主义深恶痛绝，力图纠正，尤其是在第六次大会以后，你们虽然口里反对机会主义，实际上并不认识过去机会主义之真实内容及其原因是些什么，而且也不愿意去认识，所以至今还说以前“阶级联盟”政策是对的，至今还说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甚至于根本否认国民党是个党，至今还说武汉国民政府是革命的，至今还说以前主张退出国民党是错误的，所以对资产阶级及富农怀了种种奇妙的幻想，这些都充分说明你们实际在思想上，在政策上，仍旧继续着传统的机会主义，而执迷不误〔悟〕。最近你们对于国民党内部战争，不把全力放在用适合现时政治环境的口号来推动广大群众的政治斗争，而是采用旧时机会主义的政策，向国民党的改组派将军们接洽，作军事投机(你们口头上是采取失败主义，而忘记了失败主义必须是向战争双方面军队下层的秘密活动，绝不是向一方面上层的公开活动)；并且公开的把许多很好的军事同志交给阶级敌人的将军们，这是何等危险的事！

并且，你们至今仍旧盲从国际对于中国革命错误的观察，以为中国还是封建的统治，以为资产阶级仅仅是参加政权，以为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仍旧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为限，企图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仍旧要再行建立资产阶级性的政府即阶级联盟的工农民主政府，像这样始终系念屠杀工农群众的资产阶级，为它开生路，始终依赖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为它留地步，试问你们的机会主义已深到如何程度！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地主及富农这些剥削者，都已经站在反革命地位；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的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工银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阻碍中国进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等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及政治势力，普遍了深入了中国国民生活一切体系中，它们又和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非经过长期的大流血的艰苦斗争，中国的民众是莫想得到解放的；在这长期的大流血的艰苦斗争中，稍微动摇不坚决的社会成分，都必然要被革命吓退，而中途脱离，所以要想用阶级联盟的政策来贯彻革命目的，只是痴人说梦，这不但不能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在将来革命高潮到来时，我们的党若死守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而不立即发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无产阶级贫农专政”这些口号，明确的〔向〕广大群众指示这一革命的前途，坚决领导广大群众彻底完成这一革命；倘稍存游移顾忌的态度，不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足并且拉着革命的群众向后退，使革命流产，群众再被一次更大的屠杀；便是党跟着群众后面跑，变成大革命斗争中的落伍者。所以像你们这样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不但不能认识过去的错误，不但不能免去现在的错误，并且将来还要做出更大的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盲动主义也是机会主义之另一种形式，过去盲动主义为害之深，全

党同志那一个不深深的感觉到，现时中央领导机关中，有许多仍旧是当时鼓吹并实行盲动最力者，尤其是李立三之在广东，蔡和森之在北方，至今谁曾公然承认自己的过失，以表示自己的及党的真诚性？现在你虽然口头上反对盲动主义，实际仍旧和从前一样，以过分的估量革命高潮为前提，实行盲动政策命令主义。你们头脚颠倒的意见，在革命高潮中都主张以民主主义革命为限，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反不主张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使民众不至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使党不至脱离民众。必须使广大民众在这些民主的口号之下活动起来，才能动摇反革命的政权，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们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根本口号，成为民众运动中的行动口号。你们的政策，不是这样的促进革命高潮，而是离开了民众现实的政治斗争，天天梦想革命高潮；并且仍然采用盲动主义的政策，不断的命令同志（党中最勇敢精锐分子）机械的按照各种离开民众要求的厂史纪念日，孤露的放在街上示威，而没有一点党外群众掩护，使党内党外的群众都感觉着这样连续不断的示威（实际是示弱）实际上没有一点出路，像这样必然要一天一天脱离群众，一天一天削弱党的力量；像这样的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双管齐下，其结果必然要把党送到死路去！

领导机关犯了这些严重的错误，只有党员群众对于党的政策，合法的讨论，无忌惮的自我批评，方能够把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纠正过来，才能够使党公然承认自己的过失，以表示党的真诚性；而你们只知企图掩蔽你们自己的错误，绝不顾及阶级的革命的利益，极力拿中央的威权和组织纪律，来恐吓箝制一切同志对于你们的意见不同的发表与公开的讨论。你们口头上也说容许讨论，而事实上是采取了审判方式，由中央派代表到下级党部，提出问题审问同志们是否和中央的政治路线相同，如有不同的，马上就实行取消工作，警告，甚至开除党籍；讨论的议决案，也是先由上级机关做好带来交党员通过，这样还要讨论做什么？还要议决做什么？最近你们给我的信，也是命令我“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你们既然代我决定了意见，还要我做文章发表意见做什

么？我真想不到你们现在竟至发狂闹笑话到此地步！这种现象已充分的说明了由党员群众合法的讨论和公开的自我批评来纠正领导机关之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丝毫没有希望的了！

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范围内，向党建议，希望有相当的补救，并且希望因此敲开党员群众公开讨论的门，其结果将能够比我的意见更能把党的政治路线根本改正。你们屡次回答同志们的质问，都说必将我的信发表讨论，事实上迁延了几至两个月还不曾发表；并且突于前月二十八日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约我谈话，谈话时，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能容许把我的信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国际代表用这样的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用这样不合理论不合事实的藉口来阻止中国党内政治问题所急需的公开讨论，我不责备这位代表，我只感觉到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最后，你们还拿出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我还要告诉你们：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的问题，决不应该用组织纪律(列宁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你们忘记了没有？)来掩护所能解决的；若用这样方法无理由的开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任的！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独秀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

致中共中央的信[1]

中央政治局：

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来源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的箝制与操纵，它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必然是长期的现象；果然蒋、桂战争之后，继以蒋、冯冲突，现在这种冲突更加扩大，一方面是倒蒋派的军事行动，在北方是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冯玉祥、段其〔祺〕瑞、张宗昌、张学良、安福系等代表官僚买办银行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在南方是以改组派为中心的张发奎、俞作柏、方振武等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势力；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打倒蒋介石的独裁。另一方面是代表南方买办银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挟中央政府军权和中央党权来讨伐“背叛中央，破坏编遣”的人们。这次冲突以至爆发战争的原因和前途，以及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站在自己阶级的观点上，对此次战争应取如何的态度及政策，亦即当面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有以下的意见。

一、战争的原因及其前途

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深入了普遍了全中国，甚至僻远的农村都必须依赖市场，它们利用关税制度，以巨量的廉价商品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整个的中国简单的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

---

①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认为这封信与10月10日的信是“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脱洛斯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553页)。《红旗》第57期《论陈独秀》一文“公开宣布陈独秀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是中国革命的变节者”。

市场；因此，中国本国的工业资本未能自由发展到统一全国的阶段；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难以形成并巩固统一全国的统治；因此，目前的南京政府还未能以东南银行大工业资产阶级为中心力量支配全中国；因此，旧时的军事系统得以结合并代表各地方的资产阶级的势力，相互争取支配全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便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关系，做其直接代理人。

中央为掩饰其政治路线破产（在蒋、桂战争时所暴露出来的），最近的通告仍然牵强附会的说："战争是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取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现在的战争里面仍然反映着阶级的矛盾"。像这样的分析，显然是错误的，不但买办是资产阶级更接近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现在的地主是资产阶级最保守的一部分，虽然它们剥削农民的方式仍袭用封建陈法，而它们（买办、地主）都已经不是和资产阶级对抗的一阶级，所以它们在经济上都没有和资产阶级根本对抗的不同政纲；并且由中央自己在另一政治报告中也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分析取消了："在反蒋与蒋系的两个军阀的营垒中都有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力量"。（《布》报第十期第五页）

帝国主义者为伸张其在中国的支配力量，除了箝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要操纵利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此次反蒋冲突中，很明显的要利用这个冲突，一面援助北方反蒋派以巩固它在中国北方的势力圈，一面要挟南京政府开始订约谈判，以便获得最惠国的待遇，并逼迫南京政府通令取消检查日货。但这决不能像中央所说："帝国主义间在中国相互冲突，这是中国军阀战争之最根本的动力，蒋与反蒋的战争，完全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所促成。"甚至机械的说：北方张、阎、冯是代表日本，南方桂系与改组派代表英国，蒋代表美国，这中间又"确有英日联合对美的趋势"。（《布》报第十期第五页）这种机械的见解已屡次发布于党的文件中，而屡次由事实证明其不确实，这也是中央根本路线破产之一端。假如说中国之不能统一，根本是由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我们是无异议的。假如说军阀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战争；那末，蒋介石打败了桂系就是在中国推翻了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蒋介石二次北伐成功就是打破了日本的势力；这岂

非滑稽之至！事实是这样：各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除涉及地方利益需要直接支配当地的政府外，总的方面，它们都要争着挟持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权，以巩固并伸张其势力，同时，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南京政府，自然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只有在"各个投降"的政策之下过它的生活，只有站在这样的观察上，才可以解释南京政府自解决宁案以来的外交政策及各帝国主义对它的态度。

由于我党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造成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结果，除了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外，国内问题什么也不曾解决，资产阶级不但不敢丝毫动摇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且使之更加巩固。中国整个的资产阶级生产力既无法脱离帝国主义的箝制，除加紧剥削下层民众外，只有相互牺牲别省别系的资产阶级各求自己的发展。这次战争以及从前的蒋、桂战争和将来的战争，都是各地各派资产阶级相互冲突的最高表现，决不是什么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军阀混战"。同时，因为工农的暴动与反抗，资产阶级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军事独裁来镇压，现时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军事独裁，都正合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它们在现状下唯一可能的形式，否则它们便无法统治这些几千百万被压迫剥削的饥寒奴隶，维持它们榨取剩余价值的来源。这种军事独裁，虽然足以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并且有些部分的资产阶级也感觉不便，因为它有时也侵犯到资产阶级个人的自由或增加负担，但是它们为维持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各派资产阶级（无论买办、官僚、地主、银行家、工商业资本家等）都一致忍受军事独裁，而不计及有所不便，所以此次战争的前途，以及将来资产阶级内部各派战争的前途，无论此起彼仆至如何形势，它们依赖帝国主义的卵翼和以军事独裁压迫剥削民众，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中国的下层民众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惨受帝国主义及本国的军事独裁两重压迫剥削的痛苦呻吟，也是不会解放的。

二、我们党的当面任务

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军事独裁之下，一切下层群众所深深感

受的是：

1. 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日益横暴(例如济南铁□事件)。

2. 内战继续涂炭人民。

3. 军权党权双管齐下的蹂躏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自由，以军法代替法律，任意逮捕枪杀人民。

4. 一切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及滥发公债票。

5. 米价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日益腾贵。

6. 因不断的内战，水利废弛，引起广大区域不断的灾荒(全国没有饭吃的灾民多至五千七百余万)。

7. 工人工作时间增多，实际工资日渐减少。

8. 农民耕地不足，尤其是高利债迫之无以为生。

这一切都使民众很敏锐的感觉着，但一时在政治上找不着适当的出路，无产阶级始而因过去机会主义的领导，使它们附属于资产阶级，未看清自己的任务与前途，继而又受着盲动主义的摧残，目前也陷于无出路的状态，一切斗争都感觉得没有办法，一般小资产阶级自然不免跟着改组派作大资产阶级的工具。

我们的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整个的无产阶级，同时也代表各下层阶级被压迫剥削的民众，即全国大多数的民众应该即时出来站在它们的前面，大声疾呼的唤醒因战争而有了初步惊觉的群众，以影响更广大的群众，指出它们一切痛苦的来源：即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军事独裁之剥削与压迫，并指出改组派的军事投机和改良欺骗，只是为它们自己争夺政权，断然不是为广大群众的利益领导群众向它们的国民党政府奋斗，更应该指出它们所号召的重新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这分明是为了它们党内的斗争，丝毫与民众无关；我们的党应该向民众指出目前适当的政治出路，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众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由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政府的军事独裁，由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必如此才能免掉层出不已的战祸，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这就是我们党目前的当面任务。

你们一听见“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必然很高兴的大喊：这是“取消派”，这是“降低口号”，这是“机会主义”！如果你们真是这样喊，这不但说明中国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没有认识实际事变的能力，没有努力实现的政治斗争之决心，只是滥用抽象名词骂人；并且证实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指导之破产，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不仅对于将来的革命性质，仍旧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也估量不正确，遂至陷中国党在目前现实的政治斗争上无出路，六大总的政治口号，只是工农民主的苏维埃，总的政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既非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做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的回声，群众不是无意识的木石，可以由我们任意舍取，没有总的政治口号和现实的政治斗争，决不能够争取比较广大的群众。自从六大到如今，这种弱点已由事实一天天暴露出来，中央天天命令同志上街示威（实际是示弱），也不能激动一个群众争取一个群众，眼看着济南事变就这样安然过去了，蒋、桂及蒋、冯战争也都这样安然过去了，现在又要老调重唱一遍。只因我们的党没有适合目前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坐视资产阶级的军阀战争及其他有利革命运动的事变如流水一般一次一次的空过，不能号召一次群众的现实的政治斗争，不能争得一点群众。共产主义者不是一个蠢才，只是眼望着那最后的目的！假使是这样，那就一点也用不着什么目前最小政纲，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便够了，还要向资产阶级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加资、减时、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等等做什么？

当然，我们提出国民会议是附有条件的，当然要反对政府官僚的操纵把持，同时我们要在这一运动中试验我们的最小政纲（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反对帝国主义等）。假使有人相信国民会议能以照我们所附的条件完满实现并接受我们的要求，那不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并且是一个蠢才！问题是这样：统治阶级之专横腐败无能力，已显然暴露于民众之前，它们内部不断的冲突破裂，尤其是此次战争渐渐打破了民众对它们的幻想，全国大多数民众对于现状不满是一致的，都正在寻找政治的

出路，惟革命领导的无产阶级，在上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犹未回复其创伤与元气，目前犹未具有能力及决心和统治阶级作最后的斗争；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应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它们提出它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口号，指示它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方能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的及其他下层阶级的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这些证明，都必须是群众自身在这些实际斗争的经验中，才能真实瞭解，单靠我们的宣传是万万不够的。所以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已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时，尚向临时政府要求召集国民立宪会议，直到政权获得后尚参加其选举。

现在的中央，对于此次战争及整个的目前政策是说：“我们对于这样反革命的战争是要采用失败主义的路线，就要使战争的两方通通失败，革命的势力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是我们中心的宣传口号，必须使这一口号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使广大群众瞭解只有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然后才能永远消灭军阀战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以反军阀战争的一切部分的斗争……渐次汇合成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之总的斗争。”（中央第四十九号通告）列宁说过：“即使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既已充分醒觉，单是先锋队不能够得到胜利，非至一般民众即全无产阶级直接支持先锋队，或至少采取好意的中立态度，先锋队若取最后行动，乃是无谋之紊。要使一般民众取态度，单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

不使它们自身有了直接的政治经验是不行的。”(《左派幼稚病》)你们现在反对用“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推动群众的现实政治斗争,以走到武装暴动,而企图靠宣传群众的力量来根本推翻国民党统治消灭军阀战争,这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在目前没有群众的革命高潮时期,并还没有群众的初步政治斗争,马上提出“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以群众革命的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这样的口号,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在地下,一声也不响!所以你们自己也说:“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所以‘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只是宣传的口号,发动群众的行动,必须提出许多部分的口号……”(同上通告)所谓部分的口号如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反对运兵,反对增加工作时间,像这些零碎的消极的没有气力的口号,当然不能代替积极的总的政治口号,没有积极的总的政治口号,只是这些消极的零碎斗争,又如何能够汇合成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这样大的革命斗争呢?如果群众问我们的党对付目前战争之总的政治口号和政策是什么,你们只好回答说:“马上”还没有!

你们对此次战争究竟有不有政策呢?我们知道是有的,是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是盲动主义的政策,即是以命令强迫和说谎欺骗两个方法同时并进,使同志到街上示威;自“五卅”到现在,这种不断的没有群众孤露的党员示威,除了日益脱离群众日益削弱党的力量之外,没有丝毫影响,你们自己此时也感觉到你们的群众运动破产,不得不采用第二个政策来救急。第二个是机会主义的政策,你们口里说的是失败主义,手里做的是军事投机,即是鬼鬼祟祟的和改组派的军事长官俞作柏、石友三、刘珍年等勾结,甚至派人去劝屠杀湖南农民的李明灏到广西帮助俞作柏,这是什么失败主义!这分明是替改组派军官做走狗,说得最好听,也不过是企图恢复已经破产的阶级联盟。你们大概也感觉到这样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受不起同志们的批评,遂藉口“时局紧张”,滥用中央威权,箝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对于政治意见不同的党员,无理由的发狂的阻止其发表意见,并且超越党的组织路线即不征求支部的意见,不顾支部的异议,悍然由上级机关任意开除和中央政治意

见不同的党员，以掩饰自己完全破产的政治路线，以保全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这就是你们的第三个政策。由你们的这三个政策领导党，将要把党领导到那里去?!

托洛茨基同志在去年十月所作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之中国问题》中说："中国革命的领导路线，有机会主义的公开妥协形势(一九二四—二七)，于一九二七年年底，突然转变到冒险主义方面，广州暴动以后，它又厌恶盲动主义，转变到第三阶段，即俄国某时期所称为'哀的美敦书主义'和'召还主义'(这两派是一九〇八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派，它们当时反对参加国会，反对一切公开的合法运动——译者)，这是一种最坏的极左倾向，而且最得不到结果，它只是企图将旧的机会主义理论和空洞而无丝毫行动的激烈主义结合在一起"。你们此时一面进行军事投机，秘密的与国民党军阀勾结，帮助军阀战争；一面又大喊"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完全忽视了动员群众参加公开的政治斗争之正确的口号("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斗争")。这不啻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先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不幸的是一九〇八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把那些哀的美敦书派和召还派一个一个的开除了，而一九二九年中国的哀的美敦书派和召还派反而一个一个的开除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欺骗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而绝不计及自己个人的利益，尽量的发表正言谠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有一线之延，使全党党员及全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至对党完全失望!

独秀

述之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告全党同志书[①]

亲爱的同志们：

我自从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我固然不应该效“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夸口吻，把过去失败的错误而将自己除外。任何人任何同志指摘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我都诚恳的接受。我绝对不愿为要拥护我个人的错误（自从“八七”会议到现在，我不但对于正当的批评不加掩护，即对于一切超过事实的指摘，也以为是个人的细故，默不答辩），而使过去无产阶级付了重价的苦经验埋殁下去，得不到一点教训。我不但不愿掩护我过去的错误，即现在或将来，如果我在思想上在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掩护，同样希望同志们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加以无情的批评，只要不是附会造谣，我都虚心接受。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我深切的认识，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想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邃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普列哈诺夫，晚年尚犯了不可恕的机会主义；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如史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像我辈这样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何可自满，一旦自满，便是自己阻住自己的进步。就是反对派的旗帜，也决不是张天师的灵符，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根本去掉，对过去机会主义的系统没有深刻了解并坚决参加斗争的分子，若仅仅站在这一旗帜之下骂几声史大林李立三的机会主义，便以为机会主义的魔鬼永远不会近身，这便是妄想。我们要真能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

---

① 《告全党同志书》一文，见之于多种现代史资料书刊，其中某些字句互有出入。现以1930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查获件（上报蒋介石的手抄本）为主，并参阅其他本子校订。

只有在马克思列宁的遗教中，在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中，在同志相互批评中，不断的虚心学习，才庶几可望。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附注一)。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的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蹈于以前机会主义的覆辙。

本党创立之初虽极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的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议决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廷，他

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在此时期前后，中共所染机会主义还不很深，所以还能够领导“二七”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有时还严厉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便应运而出了。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联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后，国民党中央议决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我在三月

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其后，北伐军出发了，因为我们在机关报《向导》上批评因北伐而抑制后方的工人运动和向农民勒派军费大受国民党的压迫，同时上海工人将近要起来暴动驱逐直鲁军，暴动如成功，必然发生政权问题。此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说这样的意见会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秋白所重视的是上海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反对大资产阶级；彭述之、罗亦农和我的意见以为：当时市政府选举及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群众，那时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话，势必引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因为蒋介石如果公开的背叛革命，决不是简单的他个人行动，乃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到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应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

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

我于四月初到汉口，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在上海谈话时大两样。我告之鲍罗廷，他也说是如此，并说汪精卫一到武汉，即受了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延闿等的包围，渐渐和他疏远了。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像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史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一直到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全体国民党公开的反动，公开的取消了联俄容共（他们老早就说，"只承认容共而不承认联共"）及帮助工农运动等所谓三大政策。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所以"八七"会议以后，自从南昌暴动一直到占

领汕头，共产党仍旧是隐藏在左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在群众中只看做是国民党的内哄，并没别的什么。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所产生之幼稚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相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一开始便遇着大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指导之下，才可望不至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不幸在以上这样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么会看清自己的前途，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于资产阶级，附属于资产阶级，以至一旦资产阶级的大屠杀到来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长沙马日事变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或暗受他们的包庇。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三）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既没有工农兵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由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去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鲁易把国际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

（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够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璜呢？）

（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

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改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否

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回答国际的电报说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列席中央会议的樊克(听说他是史大林的特别使者)，也以为没有即时执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国际的电报，说："只好这样回答"。"八七"会议后，中央极力宣传，说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机会主义者不接受国际训令(当然即指上述这些训令，此外别无什么训令)即时转变，不知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圈内能够如何转变，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谁？

党犯了以上这样一贯的根本错误，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述的枝叶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的发生出来。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史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现在的中央说我们企图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国际好躲避自己的责任，这简直是笑话。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犯过机会主义而永远取消他批评上级机关的机会主义及他自己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权利，同时任何人也不能因为机会主义政策之来源出于上级机关而有躲避自己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责任之自由。机会主义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地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到谁呢？我们应该很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还没有自己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至于盲目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而没有丝毫认识与抗议，这是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这不是太滑稽，简直对革命不负责任。我坚决的相信，我或别的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能够象托洛斯基同志对于国际机会主义政策之错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有那样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群众的热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致使革命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党这样政治破产。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竟没有这样做，党若根据我过去这样的错误，更或者因为我坚持

过去的错误路线，对于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的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然而现在中央开除我的党籍之理由是：

（一）说我“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其实我正因为根本的诚意的认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真正错误所在，和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被开除了。

（二）说我“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了。

（三）我在八月五日致中央信中有下列诸语句：“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什么呢？”“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曾写了几封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的崩溃。”“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它当作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白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即过渡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中央把这些语句似是而非的改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并且每个语句都加上引号，好像是引用我的信的原文。这也算是开除我的理由。

（四）我在十月十日致中央信中说：“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必须使广大民众在这些民主的口号之下活动起来，才能动摇反革命的政权，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们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根本口号，成为民众运动中的行动口号。”我和彭述之同志在十月二十六日致中央信中说：“目前即非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

争'作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回声。"中央说我们是"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党籍的理由之一。

（五）我说要指出"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使还有民族偏见的"广大民众能够同情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口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这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中央说我是"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六）我写给中央几封信乃是党中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延搁起来久不发表，而且国际代表及中央向我明白宣告以不能公布党内不同的政治意见为原则。由党员群众合法讨论以纠正中央错误这一方法，既已绝望，我不应再为寻常的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七）"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到本年十月六日（距开除我的党籍只四十天），因为我几次发表批评中央继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他们为准备开除我的手续，才忽然来信说："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

（八）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坚决的反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我们不能听史大林派的造谣，便相信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真有反革命的事实（只拿中国的史大林派李立三等对于我们的造谣，就可证明）。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同志们！中央现在竟勉强制造以上这些无理由的理由，将我的党籍开除了，并且凭空加我以反革命的罪名；我相信同志们对于这件事多半还莫名其妙，就是中央他们自己也说："有些人或者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们竟公然在有些同志还莫名其妙的状态中将我开除了，说我反革命了，他们为什么要诬蔑我为反革命？我却"很名其妙"。这就是现

代中国人新发明的攻击异己的武器。例如国民党大骂我们共产党是反革命以掩饰他自己的罪恶，蒋介石挂着革命的假招牌欺骗民众，妄以他自己为革命之化身，凡反对他的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分子。

许多同志都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这些无理由的理由，都不过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实际是讨厌我在党内发表意见，批评他们继续过去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厉行以下的破产政策。

全世界各资产阶级的国家，那一国还都有封建的遗迹和袭用封建式的剥削方法（黑奴和南洋群岛的"猪仔"，事实上就是封建奴隶制度），有些国家甚至还存在封建势力，中国就是其中一例，我们在革命中自然不能放过他；可是国际及中央一致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上都仍然是封建残余占优势，并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们竟把这种残余当做革命之目标，把压迫革命的主要的当面死敌——资产阶级势力轻轻放过，把资产阶级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仿佛说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要革命的，他永远不应该反动，一反动便不能称为资产阶级。因此，他们不承认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不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其结论必然是：中国在将来或现在，除了国民党以外，或在南京的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个不反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存在。因此，现在在策略上，在实际行动上，是跟着改组派做倒蒋的军事投机；在政纲上，是主张将来的第三次革命。至于其革命的性质（附注二）仍须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阶段为限，反对在将来的革命中侵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像这样始终一致的迷恋资产阶级和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不但是继续了过去的机会主义，而且更加深了必然要造成将来革命之更可耻更悲惨的失败！

"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果是用为行动口号，必须在革命高潮中客观条件已成熟时才能够发出，不是任何时都可以任意乱来的（附注三）。过去在革命高潮中，未采用"组织苏维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等口号，自然是主要的错误。在将来革命一起来，立刻就要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就要发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口号奋斗；并且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不是什么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当前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大众的革命运动没有高潮的时代，不管任何角度来

看,“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在客观上都未成熟。“建立苏维埃”目前只能是教育宣传口号,若用为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实际行动起来为“建立苏维埃”而奋斗,必然得不到群众的应声。所以目前在行动上应该采用最民主主义的口号:“为召集国民会议奋斗”。因为这一运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目前,可以仅仅用这一口号推动广大群众,从政治暴露斗争走向革命高潮,进而发展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可是,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中央派却完全与之相反,他们认为革命复兴的气运已经成熟(附注四);并指责我们认为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自然他们认定目前已经是行动口号了。所以,不断地以命令强迫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以命令强迫罢工,每个小的日常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政治斗争,以至工人群众甚至工人同志更加和党脱离了。并且最近在江苏代表大会上,竟至议决了“组织大的罢工运动”和“地方暴动”。自从去年夏天到现在,上海工人起来一些小小斗争的萌芽,一露头即被党的盲动政策铲除了,今后自然还要继续铲除,江苏省代表大会的议决案,如果真去执行,更要大大的铲除。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

现在的中央,忠实地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附注五)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过去的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无论是国际或中央过去不自觉地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革命失败,已经是罪恶了;现在既经反对派的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来,还是悍然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自觉地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还要为了掩护少数人自己的错误,不惜自觉的抛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滥用上级机关威权,钳制党内的自我批评,并且对于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大批的开除党籍;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每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不应该害怕在群众面前公开的自我批评,党只有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方能够获得群众,决不会因此失掉群众。反之,像现在的中央这种掩护自己的错误,则真要失掉群众。全党大多数同志,对于党这样的错误与危机,没有不或多或少感觉到的。我们只要不是简单地为领生活费混饭

吃，只要自己有一点觉得对党对革命不肯放弃责任，任何同志都应该站起来严厉的实行对党自我批评，以拯救党的危机；倘眼看着党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都知道，谁一开口实行自我批评，党的错误还未纠正，谁就自己先失掉了党籍。但是我们要权衡一下，自己个人一时失掉党籍和拯救整个党的危机，孰轻孰重？

自从“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好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当时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不是高涨，国民党政权也不会很快的崩溃，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应该改变政策，在日常斗争中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当时的党中央以为普遍的武装暴动是纠正机会主义之绝对正确的新的路线，主张要估量暴动的条件和计较成败，便是机会主义。当然对我的意见，不但丝毫不加考虑，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说这是我仍旧没有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之证据。我当时为党的组织纪律的拘囚，不得已取了消极态度，而未能积极的超越组织对中央的毁党政策作坚决的斗争，致党走上了崩溃的道路，这也是我应负责任的。其后经过第六次大会，我还是怀着错误的见解，还是幻想新的中央受到许多事实的教训，将能够自己醒悟过来，未必盲从国际的错误路线到底。我自己仍是继续消极态度，不欲独持异议，致引起党内纠纷，虽然我对于六次大会的根本路线十分不满，直到经过蒋桂战争及五卅纪念运动，我深深的感到中央牢不可破的继续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明明是不会自己改变的了，非有自下而上党员群众合法的公开的讨论和自我批评，是不能纠正领导机关严重的错误路线了。然而党员群众都在组织纪律的拘囚与钳制之下，一时陷于“敢怒而不敢言”的状况。此时我实在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严重错误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挺身出来，自从八月初起开始向党发表意见，以尽我的责任。此时有些同志还劝阻我说：“中央的人们把他们少数领袖的利益，看得比党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更重要，他们坚决的企图掩护自己的错误到底，决不能接受同志的批评。像你这样不避忌讳的批评他们，他们将来会借故开除你的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的心逼迫着我一

定要走向不顾计到我个人利益的道路。

国际及中央一向是反对算旧账的，一直到现在看见我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他们才忽然想起来说我："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这几句话正是他们自己的真实写照。其实，我若是能够昧起良心来不顾阶级利益和他们肮脏一气，没有决心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并附和他们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他们必然还要借重我老机会主义的笔和口，来攻击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以希图大家心心相印的掩护自己的错误，更何至于开除我的党籍。和社会恶势力奋斗了大半生的我，怎肯做这样颠倒是非黑白的下流事。李立三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附注六)，不愿意正确的去认识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想躲藏到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之下，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其实，在托洛茨基同志所发表的文件中，他所指责我个人的话，比史大林、布哈林更严厉；然而我不能因为他指责了我个人，便不肯承认他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我宁愿受任何同志任何严重的批评，而不愿使过去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埋殁下去；我宁愿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数人开除我的党籍，而不愿眼见党的危机而不力图拯救，将来要受党员群众的责备。我宁愿心安理得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受恶势力几重压迫，不愿和一切腐化而又横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

同志们，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他们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不但免得我在党内发表意见和主张要公开的讨论政治问题，并且拿开除我向党员群众示威，叫大家都免开尊口；我知道决不是党员群众有开除我的意思。我虽然被党的上层少数领袖开除了，我和党的下层群众丝毫没有什么隔阂与芥蒂。所有党中的同志，只要不是始终坚决的跟着史大林派(国际的和中国的)的机会主义政策走，我仍旧要和你们携着手为无产阶级服务。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史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甘心做史大林留声机器的中共中央负责的人们，自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列宁在联共第十次大

会上曾经说过："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是正当的"。他当年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运动，就建筑在这个理论之上的。现在我们党的危机也不容许在党内有别的方法(即党内合法的公开争辩)来解决了。我们每个党员都负有拯救党的责任，应该回复到布尔什维克精神与政治路线，一致强固的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不但反对史大林的及类似史大林的机会主义，并且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

此致

无产阶级的敬礼！

陈独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附注一)[①]史大林说："多数派在一九〇五年中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是正确的，但未〔为〕什么有了苏维埃的存在。有了多数派的正确政策，一九〇五年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呢？这是因为封建残余和专制政府要比工人革命运动的力量强大些。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过去没有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亲密无产阶级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和没有增长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望呢？很明显是不能这样说的。"正确的政策固然不是胜利之唯一保证，而错误的政策却是失败之主要的保证。若以为商人之力量如果强大些，虽有正确的政策还是不能胜利，则俄国一九〇五年的失败和中国一九二七年的失败以及一切革命工人运动之失败都是定命的了！我不愿意史大林为中国党有这样的辩护，我更愿藉史大林的话为我自己辩护。

(附注二)中国革命之现阶段是反革命时期。目前对于民主的反革命运动，只有走向革命之可能，而不是革命。至于改组派倒蒋

① 本篇附注皆系作者原注。

运动，只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内部冲突，根本连民主运动还说不上。只有民众高潮发展到推倒整个的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六次大会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事实上应该指是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他们承认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所以产生出思想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即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这正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之混合物。

（附注三）一九一七年四月巴格达梯夫为首的一部份多数派，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尚且公开的责骂他们发出这一口号太早，说他们是冒险。

（附注四）最近国际训令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中共中央初接此训令时，尚疑成熟二字或译文有误，后交宣传部查对原文，译文并未错误。同前在江苏省代表大会中，多数代表对成熟二字也一致怀疑，群起争论，后经中央出席委员极力坚持，终于决定中国革命复兴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成熟了（大概他们以为改组派倒蒋就是革命复兴）。

（附注五）第六次大会所决定之破产的路线，用白纸黑字写在议决案上，如：“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实现工农民权独裁制”，“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革命运动现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等等。中央所忠实执行的正是这些破产的路线，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调和派，以为六大议决案没有错，只是中央执行的不对。这是表现出这班调和派不但不懂得我们反对派的政治路线是什么，并且也不懂得国际直接指导之下六大的政治路线是什么，他们自己更是没有路线。

（附注六）李立三辈对于机会主义，不愿探本溯源的使全党认识机会主义整个的路线之错误，而是想利用党的宣传机关与权力，把那几个个人造成机会主义的象征，以集中全党同志的视线，形成群众心理，好自然而然的把他们自己除外了。他们对盲动主义的宣传也是这样，只是瞿秋白造成盲动主义的象征，好把他们自己除

外。其实在汉口时代，瞿秋白在农民部通告上，大骂农民“过火”，运动是流氓行动，命令各级党部须顾到国民政府一般政策。马日事变后，国际代表鲁易说了一声：“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马上红着脸提高了嗓子抗议道：“鲁易同志说这样的话，简直是送棺材给中国党。”蔡和森力主自行取消武汉总纠察队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请问：这些都是表现什么意识什么主义?! 杨殷及罗绮园都曾亲自告诉我：“李立三在广东省委负责时，他所表现的盲动主义比全党任何同志都厉害。”

（以上均为原注）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

自从列宁同志患病和逝世，在季诺维也夫史大林布哈林主持之下的共产国际及联共领导机关，发生了机会主义的绝大危机，即是在政治上，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和上层领袖谋妥协结合的策略代替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之门雪维克的策略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在这种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下，先后断送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的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且造成了苏俄的大危机。在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的□□之下，失败最惨的，要算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

中国国民党，无论在其行动的历史上，在其三民主义的政纲上，在其建设中国实业计划上，在其上层领导成分上，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自始即带有不少的反动性（如希求帝国主义的帮助及不主张没收土地及大贫小贫论）；至于其中的下层群众含有不少的工农分子，在欧洲各

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中不乏此例，决不能因此改变其党的资产阶级性；无论其如何口头上主张世界革命，拥护工农利益，和联合苏俄，凡在一个革命运动高潮中，羽毛还未丰满的资产阶级往往采用一部分迎合无产阶级的口号，甚至于拿出社会主义的幌子，以猎取无产阶级的同情与拥护，这是资产阶级的常态，是在欧洲革命运动史中所常见的。无产阶级在没有独立的政党时，常常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常常的是简单的替资产阶级服务，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去推翻封建的统治，而马上即被资产阶级践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幸也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错误的幻想的政策领导之下，不自觉的做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简单的工具，以苦力的资格替它们推翻了代表官僚买办资本的北洋派的统治，以与帝国主义妥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刚一抬头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残它们的昨日的拥护者——无产阶级。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掩饰了国民党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的统治，终致国民党对工农不断的大批屠杀和它的政权意外巩固。

我们在国民党的政策，因为希望留在国民党内，保持长期的阶级联盟，所以不惜不断的让步：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许国民党组织国际联络委员会，监督我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凡国际所给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须先交该委员会看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蒋介石政变，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苏俄顾问和苏俄视察团的卫队枪械，逮捕大批共产党党员后，复以国民党党务整理议决案的形式，令共产党及青年团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单缴存国民党，禁止我们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令我们同志退出军事学校或退出共产党；这些事实已经是资产阶级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而不是什么联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际的政策不但不因资产阶级进攻使无产阶级自己更加独立起来，反而采用了最可耻的投降政策，严厉的阻止中共退出国民党，连准备退出都不许，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国际代表还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帮助并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从此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完全投降了资产阶级，不啻自己正式宣

告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开始大屠杀，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仍然是继续拥冯拥汪，说冯玉祥是工人出身，说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并且在蒋介石叛变以前，曾命令我们以劳资仲裁代替罢工斗争，命令我们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冲突；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曾命令我们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军官们的土地，命令我们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最后，全部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还命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直到南昌暴动，还是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的。这样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碎了自己的旗帜，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变成了国民党约束工农的工具；这样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终从头到尾一贯的空前未有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分明是卖阶级的政策，完全不是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维克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妥协，独立的领导农民，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政策。关于阶级联盟问题，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国际既强制中共混合在国民党组织之内，复大喊“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是超越阶段的危险”，事后却责备中共不应损失其组织上及政治上的独立；其实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难道除了这些实际问题外，还有悬在空中的独立吗?!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这样破产的政策，是根据他们对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关系之根本错误的认识。他们以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可以团结中国国内进步的各阶级，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便是国民党，国际称它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这分明是组织上的阶级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联盟，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对中国商品与资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的剥削工农，才能

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商业竞争，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因此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农的冲突更为不可调和，更易于爆发阶级战争。资产阶级最初参加民族革命，乃是企图利用能够在它们控制条件（过去国际的政策正是对资产阶级担保这种条件）下的工农群众声势，向帝国主义做买卖，好取得于它们自己阶级的那几种利益，一看到工农群众根据其本身利益，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领导革命时，资产阶级便马上感觉到工农革命比帝国主义对它更是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快的反对革命，乃是其阶级性之必然。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使国内的阶级斗争加紧，决不能因此促成阶级联合和缓阶级斗争。国民党是一种资产阶级欺骗利用民众的工具，用抽象的"国民革命"的口号（在我们不进行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状况之下）麻醉住工农群众意识，不组织自己的独立的武装，而只是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夺取江山，资产阶级独享胜利之果，而且马上回过头来屠杀工农群众，这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我们加入及留在国民党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经过国民党去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与它联盟，这也是机会主义的模范的表现之一。无产阶级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即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固然，无产阶级随着革命发展之现实的环境，要团聚一切革命势力，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着眼是在群众，尤其是下层劳苦群众，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所领导的民主政党。我们要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在自己方面来，首要的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要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鲜明的旗帜。有时可以甚且必须在一定的明确的行动纲领上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建立联盟；但这个联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去揭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与欺骗，以夺取广大劳苦群众在自己的政治影响方面来，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迁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更不可在组织上与它混合起来，以"集中革命势力"！从前第二国际即主张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应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合并，他们常说：不懂得在落后的俄国为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分而为三。列宁则坚持只能和社会革命党有政治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合。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尚保持和劳

动者同盟对封建党及大资产阶级的党作革命的反抗；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共产主义同盟的信，严厉的指出这一同盟者的危险性，指出他们号召一切民主派联成一大反对党之欺骗，极力主张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他说："即为对付共同敌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组织，对敌直接斗争时，两党利害一时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时的结合"。过去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遗教，而是采取了从前第二国际的意见，特意把国民党装成一个狮子灯，我们都钻在里面去舞。像这样混合组织的联盟，则遇事掣肘和混乱了我们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经过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并且要丧失我们自己阶级的群众。

在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即城市乡村的贫民联合之最好的形式，便是苏维埃，即是由工农贫民兵士的广大群众选举代表组织的苏维埃，它的任务是武装群众及指挥群众的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的机关。共产国际的领导，在革命高潮中，为要跟着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跑，作那种无希望的同盟梦，于是根本抛弃代表城市乡村贫民的利益，在斗争上服从国民党的政纲，越此便是"过火"，在组织上把农民协会及店员小商人的组织工作通统交给国民党，不许组织苏维埃；他们竟至说，"中国的国民党对现时中国革命的作用与一九〇五年的苏维埃对俄国革命作用是一样"，"武汉国民党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若现在即刻建立苏维埃，拒绝拥护武汉政府，提出二重政权的口号，推翻武汉政府，便是对蒋介石和张作霖予以直接的援助"(史大林)。"在将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还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布哈林)他们的错误，完全由于迷信少数派的阶段论遮住了眼睛，不去观察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内容和当时民众革命斗争急激进展的环境，以至盲目的反对建立苏维埃；他们完全不认识不但南京的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即武汉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已日渐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马日事变后，他们和蒋介石张作霖已经没有区别，此时国民党资产阶级(凡是剥削劳动的大小资产阶级都包函在内)参加民主革命的历史已经告终；同时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国民党一致承认"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打破了

各阶级联盟，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开始由民主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革命性质已经开始转变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至少在三月二十事变后即应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在北伐开始时就应该在北伐军所到的地方组织苏维埃，至少在四月十二事变后即应建立苏维埃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由二重政权进到推翻反革命的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这样，而是始终拘泥民主革命的阶段，始终迷信国民党，始终想用大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党代替了工人与乡村城市贫民群众的苏维埃。中共中央此时未能力争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反而在国际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农民部通告中，都承认农民有“过火”行动；并且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这都是莫大的错误。一直到国民党全部公然反革命，革命运动已经一败涂地，此时反而突然想起用苏维埃的口号，作夺取政权的冒险尝试。

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但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退守，上海广州长沙汉口的共产党党员及工农群众相继被屠杀后，没有一点有力的反攻，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已完全走到反动营垒，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都已经结合起来，革命分明是失败了，此时即应马上采取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做改守为攻的准备。当时党的政策恰与此相反。联共及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布哈林此时企图以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挽回其机会主义政策之绝望，以抵制反对派的非难，乃特派心腹代表到中国，以国际名义包办“八七会议”，在此会议中，既未便根本的系统的指出改正机会主义（仍旧说留在国民党有四大理由，仍旧主张站在国民党左派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又加以从莫斯科带来的事实：“中国革命浪潮还在一直高涨”，“中国已经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经过翻译员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之手，造成了盲动主义。当时党的领导者，以为只有武装暴动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的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如有同志对于革命高潮及中央政治路线表示有一点怀疑，对暴动有一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严重的打击，严厉的命令各级党部改

组并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即所谓“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凡不赞成此新的路线者即不许其登记，甚至开除已登记的同志。不仅命令党部，而且命令群众，命令他们无条件的乱动；以至盲动的情绪和大大小小的暴动普遍了全国所有我们党有组织的地方。从“八七会议”到“六次大会”乃是整个的暴动时期，在此时期中，党的领导机关之唯一的工作，“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用中央绝对正确的路线，客观上帮助国民党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打得骨断肢脱伤残委地，至今不能立起来从事战斗；党的本身更加溃散，党的政治地位更加坠落，变成了单纯的“杀人放火”之象征。

机会主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盲动主义是彻底完成这个失败，六大以后的路线是继续巩固这个失败，并为下次革命准备新的失败！

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

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机会主义的批评，并未曾把中共中央在革命高潮中所执行的机会主义政策之根本错误（没有及时退出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没有组织苏维埃等）指摘出来，因为这样便要侵犯到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之本身，而只是指出中国党三种主要的错误（一、缺乏独立性与批评性，二、不能了解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三、党没有成为广大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这不过是说中国党执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所以共产国际所指示的六次大会所议决的新的政治路线：将来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的政权性质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应联合富农而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他们虽然口头上大喊反对机会主义，而这些实际政策，仍然没有转变到另一阶段，仍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对于盲动主义的批评，虽然口头大喊反对盲动主义，也同样因为要掩护国际自身的盲动主义，未便指出中国党在革命失败后，按照当时全国总的形势采用暴动政策是根本错误，而只是指摘中国党对暴动政策机械的应用，没有事先组织

好，玩弄暴动等等，这也不过是说中国党执行国际暴动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所以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公开的说："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走向革命的大道。"并且更说，"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六大决议案)，"我们的面前是一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国际代表的政治报告)，所以第六次大会后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通告，开口便说"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国际更进一步训令中国党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这分明是国际自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极力供给中国党以盲动主义之前提。对于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探本溯源的把整个的机会主义路线指摘出来，便不能得到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因此现在党的政治路线，仍旧沿着机会主义进行；对于盲动主义的前提即革命潮流没有正确的估量，便不能了解目前的革命形势，因此现在党的工作路线，仍旧沿着盲动主义进行；政治路线工作路线，事实上日益证明破产，因此现在党的组织路线，便不得不日益效法联共的现行党制厉行官僚主义，借以钳制党员群众的异议，来保持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这一切一切都不是中国的国货，都是史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没有相当时期经过马克思主义及阶级斗争锻炼的中国党，自己本没有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过去及现在错误的根本政策与理论，自然都来自国际。但过去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机会主义没有一点认识与抗议，忠实的可耻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这是应该负责任的；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仍旧继续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经反对派明白指出，依然毫无觉悟，而且自觉的掩护错误，这简直是罪恶了！我们对于过去革命之失败，只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重要的是在深刻的了解错误，彻底的改正错误，并且坚决的参加反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的斗争，对于革命才有实际意义，这才是我们正当的道路。

现在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表现的是：国际及中共中央一致主张将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理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握政权，中国还是封建势力的统治，并且中国还是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或封建社会势力占优势。现在

的国内战争还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战争。这样的说法，简直是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都站在一条战线，因为他们都正在大喊反封建势力。第三党最近发表的政治主张说："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社会，而掌握国家政权的便是封建势力，支配社会关系的，……最显明的亦是封建阶级的剥削。因此，分明的表现，中国革命还没有通过民主革命的阶段。""反动统治势力的政治中心便是下级的封建势力，构成反动势力大联合。""社会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而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中国目前的革命运动，如果不针对着封建势力，可以说绝对收不到集中革命势力的实效，必归失败。"这些话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及中共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没有两样。

我们以为：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崩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自国际资本主义打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银行工厂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到了欧战前后，更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及货币经济，连穷乡僻壤都达到了，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并且全国一切形式的经济之最高统治，都在本国的一万五千万元以上银行资本依赖外国的五十八万万元以上银行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态，不但占领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乡村主要部分经济都直接间接隶属于市场，因此城市经济绝对的支配了乡村，因此一切封建残余的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力求资本主义化以自存。土地早已是一种个人私有的资本而不是封建的领地，地主已资本家化，城市及乡村所遗留一些封建式的剥削，乃是资本主义袭用旧的剥削方法（以前美国的黑奴及现在南洋群岛的猪仔，还是封建前奴隶制度）；至于城市乡村各种落后的现象，乃是生产停滞，农村人口过剩，资本主义落后国共有的现象，也并不是封建产物；若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中国不占绝对优势地位，则只是常识的判断，而不是科学的观察。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经过两次革命，已经掌握政

权，社会阶级势力之转变，更是异常明显。在民众斗争发展上，已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火”；并且广州上海汉口的工人和两湖的农民，已经有过相当的二重政权的形式，广州暴动中且出现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开始了社会革命的行动；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总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已经是将来第三次中国大革命的预演，在第三次革命中各阶级的行动与变化，给了我们许多丰富的材料，使我们能预测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远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及土地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取得政权，才能彻底完成，换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城市及乡村中都与帝国主义经济及现在的土地关系有很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它决不能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以土地给贫农，而且当革命高潮时必然坚决的反对工农运动“过火”，无产阶级没有与他们合作的可能。其次，在城市中，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二日即应进行没收中外银行及大工厂企业，打破私有财产制。在农村中，因为土地在资本家化的地主之手，富农多兼高利贷与商业剥削者的资格，是贫农与雇农仇视的中心，是农村贫民革命的对象，当然在乡村中更无与富农联合战线之可能；我们应该领导贫农，反对富农，使中农中立。当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时，我们即应动员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而不是为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站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民主专政奋斗。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了一种反动的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根据。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依据这样的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和政治路线，已经演了过去可耻的悲惨的失败，现在又在准备重演将来更可耻更悲惨的失败。

现在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所表现的是：不承认资产阶级是胜利了，不承认过去的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前提之下，强迫罢工，每个小的经济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大的政治斗争，不断的命令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召集小组或支部会议时，都照例不讨论政治问题，不讨论日常生活斗争的工作方法，只简单的传达上级机关命令上街示威，散传单，贴标语；无处无事不采用盲动政策，

无处无事不实行“自己失败主义”，弄得党内党外群众都感觉没有一点出路，党的下级干部同志都感觉着在中央路线之下无法工作；党内工人同志都一天一天感觉着党的政策和行动绝对不适合工人群众目前的需要与可能，尤其是盲动的命令逼得他们一批一批的与党无形脱离，因此各生产机关的支部已雕零不堪，党员数量及无产阶级的基础已削弱殆尽，像汉口，长沙，广州，这样重要的中心都市，连党的组织都没有了。党和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更等于零，铁路，矿山，纱厂，丝厂，五金等重要产业工人都没有群众的组织，就有点组织也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海员方面也只仅仅有点线索，在这样状况之下，革命高潮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

我们以为：自从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上次大革命，又加上盲动主义根本破坏了工农组织，减弱了工人阶级之阶级斗争的力量，形成了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我们在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反省过去失败的教训，溶化过去革命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以锻炼我们的党，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恢复和工农群众的联系，恢复群众的组织，以积聚自己阶级的力量；一面重新估量现阶段中新的客观局势，即因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和经济相当恢复而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与其政党军人间之冲突，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军事专政间之冲突而开始的民主立宪运动之趋势，我们应利用这种趋势，而力争彻底的民主主义做我们目前过渡时代政治斗争形式，重新闯进政治舞台，由现在的政治斗争，缩短反革命的现阶段，开辟新的革命环境，走向将来的第三次革命。民主要求口号，现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群众以至工人群众还需要，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身，也须有相当的政治自由才能够实现其力量发展所需要的组织上之民主集中制。因此，我们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即力争由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产生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做我们在过渡时期中四个不可分离的民主要求口号，以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必须如此才能够动员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公开的现实政治斗争，不断的扩大斗争，由要求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到无产阶级的

民主主义，即拥护劳动大众——全国多数民众权利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是主张积极的号召及参加，力争其彻底民主化，而不主张消极的空喊苏维埃来抵制；因为"苏维埃政权"必须由"武装暴动"来产生，在目前只是教育宣传口号，而不是行动口号。在主观客观条件都未成熟时，若发出"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做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行动起来，为这些口号奋斗，不仅得不着群众的应声，而且更加扩大党的盲动情绪，离开群众，削弱党的力量。同时，我们更不是主张用国民会议来代替苏维埃，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斗争来发动广大的下层民众反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走向"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

现在的中央，一面大喊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大喊苏维埃政权，大骂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人，大骂提出国民会议口号的人是取消派或反动派，并且发出"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和"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的口号；同时一面又声明："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这就是说我们的党现在没有号召群众行动的政治号召，只有盲动，只有继续长期的离开政治舞台。

最近党的政策，不但极力发挥国际对于中国现局势盲动主义的观察之谰言，丝毫不了解民主运动在两个革命间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上有重大作用，而且是机会主义的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不断示威，双管齐下，表面上说是采取失败主义，实际上是命令同志帮助改组派做"反蒋运动"，并且在香港参加各派的反蒋会议。不领导民众做公开的政治斗争，而跟随改组派将军们做军事投机，这不但是离开政治舞台，而且是葬送党的政治生命！

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所表现的是：以委派制度与绝对的命令主义消灭了党内德莫克拉西；以夸大的虚伪的报告，从国际直到中国党各级机关，上下互相欺骗，以欺骗群众。团结无原则的系统，如周恩来所领导的黄埔系，项英所领导的全总系，拥护个人的势力，各自庇护私人，互相排挤，任意摧残有政治自觉的党员；以大批开除党员的手段来解决党内的政治问题；置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于全党全阶级的利益之上，以

借口“敌人进攻”,“时局紧张”,“秘密工作”,“铁的纪律”……等,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变布尔什维克热烈争辩的精神为官僚的盲目服从,从支部到国际活像君主专制之下从地保到皇帝一样,只许说一声“是!”,否则马上便有不测之祸,因此所有党员都不敢说一句心中所想说的话。

现在党的统治机关的官僚们钳制党员之最大的武器,要算是“铁的纪律”;党员也因为迷信这一武器自己束缚了自己,对于官僚们的统治,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我们以为:“铁的纪律”自然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铁的纪律之基础“第一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之觉悟及其对于革命之忠诚,能自主,勇敢牺牲;第二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和无产阶级以至半无产阶级广大的劳苦群众融成一片;第三是极广大的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相信它的策略与战略是正确的,没有这些条件,一切要创造这个纪律的企图,都必定变成废话,矫饰,欺诈。”关于服从组织纪律的限度的问题,列宁又说过:“我们曾经屡次确定对于工人政党的队伍中纪律之重要与见解。行动统一,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一个纪律,才配称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以无产阶级,若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即不承认有任何行动的统一。所以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永不应该忘记有非常严重的原则之违犯,竟至逼令我们必须与一切组织的关系决裂。”现在党的官僚们的所谓“铁的纪律”,恰恰和列宁的遗教相反,恰恰是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已经明知党的策略与战术是错误的,而他们还不顾一切的继续执行,恰恰是不容许党员对于他们错误的策略与战术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恰恰是官僚们用为掩护自己错误和维持官僚统治的工具;这样的“铁的纪律”,除废话,矫饰,与欺诈而外,没有别的意义。

我们的党,始而在机会主义指导之下,未能使全党党员群众参预到党的政治生活及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智识,因此党内一般政治水平线非常之低;继而又在盲动主义指导之下,党的组织弄到残破不堪;第六次大会后,更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交互错杂,不能进前一步。处此情形之下,党的领导机关要想恢复党的基础,形成党的纪律,必须

根本改变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民主集中制代替官僚集中制，实行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产生能够使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是正确的策略与战术，以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必如此，才可形成真正的行动统一，抵御敌人的进攻。现在党的官僚统治机关，反而利用党内一般政治水平线之低落，党员群众对于党的生活之隔阂及党的组织之残破实行任意操纵，欺骗与威吓，实行以金钱维系党员及空洞的工会机关和雇人示威，实行制止党内的讨论和批评，以国际威信和党的威权强迫党员强迫群众相信"中央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并且胆敢凭借敌人进攻做护符以恐吓党。这样的领导机关如果听它们仍旧存在下去，我们的党，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必然要名存而实亡，一切有政治自觉的分子，都应当及时奋起，从党内推翻它，才能够将我们的党从坠落而危亡的现状中拯救出来！

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

即从中国问题本身，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过去失败不是关于执行上的部分的问题或偶然的错误，而是有一个系统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并且现在还在继续这个路线；这个路线也不是特别在中国范围内形成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史大林布哈林所领导的整个的机会主义的国际政策之一部分。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实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后，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从此更加真实的密切起来。苏联实际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司令部，联共成为第三国际领导的党。这个党的政策之正确与否，不是仅仅关系苏联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而是关系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运命。同时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之每个胜负，都影响到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之存在与巩固的前途。

十月革命到现在，以列宁之病和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夺取政权，建设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军事的防御，及采用一些基本的办法以确定经济道路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党的全体都上下一致

自觉的做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也就是在这个自觉的一致中,党的全体才有它的内部巩固,在列宁同志正确的政策指导之下,勇猛精进的向资产阶级进攻,当时资产阶级的潜势力及其意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不能发生什么作用。后一时期即史大林继列宁而执政时期的情形就不同了,它的主要的特征,就是二元政权的势力增涨。其客观的原因是物质生活相当的提高,内部的军事状态停止,及世界革命到来的迟缓,群众需要恢复他的疲劳,非无产阶级的成份及其意识渐有抬头的机会,于是曾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至此反而被抛弃放在后面去了;在它之傍,甚至在它的面前,树起别的阶级成份,别的阶级意识大显其作用,在政权上占领了一大部分势力。这些别的成份就是那些一天一天形成一个很大的官僚系统之国家机关,职工会,合作社的职员及其他自由职业者和办事员等。这些人员们由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习惯及他们的思想方式,是与无产阶级分离的,或一天一天与它分离。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成份及其意识甚至侵入联共党内,由党的机关职员,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官僚系统,滥用国家机关巩固他们的特权,使党日趋腐化。到了史大林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反对派,遂拼命拉拢结合这些党内及国家机关的官僚分子,做他的群众,无论什么人,只要他喊一声反对托洛茨基,至少也要给他一个合作社主席的位置;因此一般投机分子,都蜂拥到史大林派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之下,蜂拥到党内及国家机关内,更加速了国家机关及党内官僚主义化的过程。此时党对国家机关已不能起领导及监督作用,倒转过来,国家机关反用官僚的系统和势力来支配党。苏维埃政权从它的产生和传统上,由它的现在势力来源上,还继续凭借在无产阶级身上,虽然渐渐少直接的形式。但是由上述的社会成份之沟通,它一天一天堕落在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之下。无论苏联内部资产阶级怎样弱,它是很自觉地做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派,并构成世界帝国主义的传达机。况且资产阶级内部的基础也决不可忽视。农村经济在市场之个人的基础上发展,必然要从它的内部新产生许多农村中小资产阶级。即已经富或正在求富的旧时贫农也和苏维埃立法的限制抵触,于是表现出法国革命中“本拿巴特主义”(即倾向拿破仑之主义)的倾向。以上就是说用政权二重性之社会的来源。

新经济政策在客观上自然是包藏这政权二重性的一些可能，因为他在恢复市场上，新创造一些条件可以使小生产者重新复活并一部分转为中等资产阶级。但这些可能性仅存在于经济的可能中。它开展成为一个真实的力量仅在十月革命的后一期，开始于列宁同志之病和死及史大林派的小组织集中反“托洛茨基主义”之斗争的时候。新经济政策之实现，是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一个很大的让步。这个让步在当时的环境是必须的，其本身并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损害。暂时的退守是为着后来的进攻。问题只在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党是否有正确的政策能够很快的反守为攻，继续阶级斗争，阻止政权二重性之发展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陷落在这个退守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基本的生产力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家的指导政策对于经济是操有必胜之权。但史大林不懂得列宁的政策，不把让步当作暂时的退守，而当作经常的路线。一直继续让步，继续右倾；不特别注意发展国家工业，不发动农村阶级斗争，而实行对富农宽容，并且造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怪理论，说苏联农村生产力是由两极向中间，以图掩蔽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以便避开阶级斗争，和平的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着着助长了富农的发展，助长了政权二重性。他的中心的口号是："普遍的繁荣"，"大家富起来"，不管这个富是资本主义的富还是社会主义的富，甚至他把资本主义的富当作社会主义的富。因此非无产阶级的势力及其意识益加抬起头来；因此，十月革命的后期特征，不仅简单的表现于城市和乡村中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之发展，并表现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之武装继续不断的被解除。复兴的中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隐藏在苏维埃的保护色之下尽可能的前进，把他们的凭借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史大林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保守的理论就在这个环境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基本方法，列宁主义战术之主要的教训，都被史大林加以严厉的修正，以适应党内党外新生的小资产阶级的职员之安富尊荣及其畏难苟安避免革命震动的心理。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有不可分离的真实联系”之“不断革命论”，自然首先激怒一切新的社会层，因为他们认定已经把他们抬到社会上高高地位的

革命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因此，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之保守理论为出发点的史大林派乘时得势，对于以“不断革命论”为出发点的托洛茨基派，不断的加以攻击与迫害。

很明显的，列宁始终认十月革命只是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起点，并不是认为俄国一个国家已具备了经济条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可以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是在全世界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之部分的突破，是全世界资产阶级阵地较弱无产阶级主观力较强的部分之突破，要维持它巩固它，主要的是在它不断的向外发展，即是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成为真实联系，在全世界总的阶级战争形势上决定最终胜负，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自然，为巩固推动世界革命之策源地苏联，必须发展其国家工业即社会主义的工业以加强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权。但若是因此便相信“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是对的，那就等于幻想世界资本主义从此还有很长期的生命。果真是如此，则一个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终不免为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所战胜，十月革命一定被破坏，而只存留一些土地改革的遗迹。

史大林派，根据其“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对苏联内部政策，要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求助于国内富农及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因而在国家政策上不肯得罪富农加重他的赋税，对富农一直让步到准其出租土地及使用雇工(一九二五年)以致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富农得到突飞的发展，操纵乡村一切经济机关，其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增加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及使资产阶级影响增大，同时又使苏维埃政权在贫农中失了同情。富农和新兴资产阶级，居然在去年提出要求废止对外贸易的国家独占权，居然非难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有碍农民的发展。因富农抵制政府收买面包，以致一九二八年秋天全国城市都发生面包恐慌，对外输出贸易计划也被破坏了(一九二六—二七年度谷类输出总价值为二〇四九七〇，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减至三四二二八)，这就是富农抬头，实行对苏维埃政权抵抗之严重的表现。史大林受了事实的打击，不得不采用表面左倾的口号，如建立集体农业，向富农强迫募债，发展经济五年计划，等。因此影响，在党

内亦公布“自我批评”的口号，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右倾；同时共产国际在国际政策上亦有几分表面左倾。但是站在官僚势力基础上的史大林派，因为官僚与民众间的利益矛盾，他的左倾政策，只能说而不能行。并且史大林对付富农的政策，只是限于用盲动的非常手段，而不愿在根本上取消富农之经济上的优势，由此更引出大的危机。所谓左倾政策，“实行”了几个月便完全坍台。在打击富农之后，又忽然对富农作绝大的让步，提高面包价格，使工人及贫农对富农须多付二万万以上卢布。所谓自我批评，变成一半滑稽（批评内容须先得上级机关认可），一面侦查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把戏。所谓反对右倾，只是反对右派中和史大林有冲突而且势力较弱的一些个人，并没有把右派的危险即其整个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要党员群众公开讨论；因为如果发动党员群众反对右派的路线，必然要走到反对左右动摇不定的中派（即史大林派）而倾向左派（即托洛茨基派亦即反对派）。（史大林这种左右动摇不定的政策，实际不过是向右的道路上一些曲线。这种向右的曲线政策应用到中国，始而主张“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继而又主张“要坚决的反对富农”。然而他反对富农，仍然因为它是半封建。那末，对于富农具有资本阶级性质的那半面便不应该反对了。这真是使中国党迷陷在乱山中找不着出路！）

现在苏联真实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物价日益增长，工人的实际工资日益下降，去年在七点钟工作制的口号之下，实行工作强度加速，罢工事件及失业工人日益增加，为十月革命以后所未有的现象。乡村中中农受富农的煽动，对苏维埃政府之不满日益增高，乡村中时常发生富农有组织的对苏维埃政府官吏及共产党党员青年团团员，加以白色恐怖。红军中的上级军官亦多有富农子弟和受富农影响的。中派史大林的政权在此时机之左倾右倾，都是受了两大阶级（工人贫农及富农城市新有产阶级）的压迫，他只是聚集这一切矛盾，而不能解决这些矛盾，大斗争的爆发即在前面；若没有从左边来的工农群众力量来克服富农新有产阶级及官僚的反动，使十月革命复兴，使无产阶级专政更臻巩固；则从右边来的“特尔米多”（Thermidor，法国罗拔士比儿殁落的政变）终不免到来，将成立一反革命的独裁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将宣告灭亡，苏联回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大林派“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即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苏联内部所造成的危机是如此。其对外

政策，也为着要安宁的在苏联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怕得罪世界帝国主义，因而就不敢积极的援助世界革命，而一味地与帝国主义的外交家做和平运动的周旋。如在一九二五年，英国大罢工中不能予英国工人以积极的帮助；在中国革命高潮及孟买大罢工中，不敢号召英国工人起来反抗英帝国主义；在日本出兵满洲及占领山东时，都不敢有所表示；在俄德通商条约中使德国工商业家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免除对外贸易垄断的监视决定，在一九二七年在拉丁美洲开泛美洲大会的地方召集反帝国主义同盟的大会，而延期改在现时已没有殖民地的国家柏林开会；这些都是怕侵犯帝国主义之露骨的表现。

这种妥协倾向应用在各国革命的战略和政策上，就是不敢坚决的发动无产阶级之阶级斗争，而企图用外交政策及拉拢上层妥协的分子。这种政策之模范的表演，就是在英国工人运动中之英俄职工委员会及在中国革命中之国共合作。史大林派组织英俄职工委员会，企图与英国工团总会卖阶级的官僚领袖们结成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联合战线，以抵御对苏联的进攻，并在柏林会议中公开宣布不干涉英国的工人运动。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就是以全部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在英国工人中担保那些卖阶级的官僚领袖是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真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承认这些卖阶级的领袖是英国工人运动中唯一代表，阻止了反对这些官僚领袖的“少数运动”；使俄国无产阶级不能直接——因为要经过英俄委员会——援助英国工人运动，如矿工大罢工及全国总罢工；使布尔什维克与这些卖阶级的官僚领袖们一同坐视英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及印度罢工；使张伯伦既有大英帝国的政策，又有工团总会的政策以挟制布尔什维克。

这种机会主义政策要以在中国革命中所实行的结果最为悲惨！史大林派不敢彻底侵犯帝国主义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唯一的只在消灭(?)“封建残余”，因而不要无产阶级太露头角，始终要求中国共产党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不要退出国民党而真正独立起来，直接领导群众，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及其将军们领头做革命；因为要让这些将军们领头，就不能不抑制工人的要求以免吓退资产阶级，抑制农民的土地革命以免侵犯所谓“革命军人”的财产；极力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在中国

建立苏维埃的提议，反对推倒国民党的领导，以免侵犯资产阶级专政。在美国，在日本，都改变共产党为工农党，在印度也有同样的企图；甚至在日本竟主张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大林派诸如此类的右倾政策，遂经过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在各国党中形成了一般的机会主义路线。

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路线的斗争

史大林派所领导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五六年来，不仅使苏联内部的危机增加，并且因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迭次的失败与挫折，尤其是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上更加濒于危险。一切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要明白这些危险，正是为着要克服这些危险，救护十月革命。史大林派之不可恕的罪恶，还不仅在他对苏联内部的和世界的资产阶级继续做了许多让步和投降，更重要的是在他采用官僚压制和欺骗等方法，阻止真正列宁主义的意见之发展，使苏维埃及世界工人把严重的让步当作成效，把退步当作进步，把内部困难之增加解作向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之胜利的前进，把投降中国资产阶级当作中国革命之发展。

在这种情形之下，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中自然要产生反机会主义的反对派之斗争，即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之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就首先担负了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在十月革命后一期开始时(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同志即向联共指出应该注意防止错误的经济政策所达到的结果：工业发展之迟缓曾引起所谓"剪刀问题"，即是工业和农业生产品价格之间的不平衡，足以破坏工农的联合，并且其结果会连带农业发展之停滞；因此他在联共第十三次大会即提出厉行工业化的主张，使有廉价的工业品与农产品交换，以巩固和中小农民的联合。可是象史大林这般瞎子，却骂他是为着工业的经济利益去牺牲一切。在十四次大会以后反对派又提出工业化之具体的政策，史大林布哈林又认为是过度(?)的工业化，而予以否认。直到十五次大会，史大林因为过去一个

时期经济的恐慌及许多困难的逼迫，才稍稍注意到工业化的问题；在十五次大会上所提出的发展经济五年计划，就是这种注意的具体而微的表现。可是他没有正确的估计到工业发展之可能和没有发展工业之决心，因此他认为“将来工业发展的速度也许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对派则认为工业发展的速度决不会是什么“也许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对派在经济计划的提纲中，提出可能实现的工业速度，并且在提纲中指示出来每年工业各部门速度增加的百分率。到十六次会议时为期不过一年余，事实证明工业发展的速度，竟超过了史大林赖可夫所提出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限度。关于富农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三年及联共十四次大会前后即主张国家应加重富农的赋税，并发展集体的农业，以遏制富农发展的危险。史大林布哈林因此一致骂反对派不要农民，说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老毛病。同时他又指出党内腐化官僚化的危险，有实现德莫克拉西化之必要。他反对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主张无产阶级国家应积极的切实的——不是用官僚方式而是用阶级斗争——援助并发展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对于英俄委员会，他也及时有极正确的批评。最后在中国革命问题中，他的观察与意见，更自始至终绝对的正确（主要的是他远在蒋介石叛变以前及蒋介石叛变以后，屡次警告联共中央及国际依赖国民党之危险，他主张中共必须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建立苏维埃及武装工农，彻底的土地革命）。他不仅把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完全为我们指示出来，并且为我们指出现在及未来的根本政治路线（未来的革命性质及目前国民会议的口号）。假使我们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政治的指导，我们也许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即使失败也不至于政治破产及组织溃散，至少也不至于再发生盲动主义将无产阶级的力量彻头彻尾的破坏干尽。史大林派对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真实意见，一切都拒绝公布，只是在他们的口中捏造一些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谣言，以蒙蔽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将中国无产阶级付了严重代价的教训，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面前用官样文章隐藏起来，对于中国的同志特别封锁得严紧，谁要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便加以反革命的罪名，谁要主张研究讨论托洛茨基的意见，便也有反革命的嫌疑，以便使中国党对于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得以很顺利的继续执行。

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再加上官僚主义的统治，不但不肯及时采取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意见，不但为维持其官僚的统治不顾一切的错到底，不但向世界无产阶级隐藏真正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在党内组织他的走狗系统（史大林在列宁病中即在党内进行小组织），用种种卑鄙手段使反对派的意见不能达到群众，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对抗，混乱群众的耳目，以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为名，实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最后更开除反对派同志的党籍，滥用政府权力监禁并放逐并枪杀他们。许多与列宁共同奋斗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许多十月革命的战士都受史大林官僚统治的种种虐待。史大林派为锄除异己，把党的德莫克拉西剥削干净，一切重要问题都不许公开讨论，全党党员非史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史大林或被处罚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此外别无道路可走。于是党内的领导地位及其他一切工作，都由长于逢迎的官僚分子占领，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勇敢而有能力的先锋分子，多被驱逐在党外奋斗。这样为着对付反对派的斗争，史大林更将从苏联的社会来源和经济基础上所发生的官僚制度发展并巩固起来。这种官僚制度竟在史大林派的统治之下形成一种特别党制，并且经过第三国际普遍的发展到各国支部中，形成了史大林派的统系，把各国党的领导机关都变成了史大林派的忠实工具。否则便不能存在。一切我们在中国党所见到的压制，欺骗，蒙蔽，笼络，收买等官僚政客的方法，都是从史大林学校中学习出来的。

我们据两年以来各方面事实的观察，已在实际生活中直觉的感觉到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及官僚主义为害之烈，在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反对派各种重要文件，以之和史大林派的文件作比较的研究后，我们不但更系统的根本的认识中国革命之失败是由于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指导，并且深切的认识现在整个的第三国际中显然有两个根本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史大林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路线，即现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路线；一个是托洛茨基所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即国际左派反对派的路线，而不仅仅是关于中国一国的问题。反对派是主张严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策，反对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加以修正，史大林派受了苏联内部非无产阶级的力量与意议

〔识〕发展之反映，企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政策，无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在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印度)，都加以修正，他们是联共党中的中派，实际已站在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这两派(史大林派与反对派)的斗争，不但不是个人间的斗争，并且不只是简单的派别斗争，而是关于决定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两个路线之斗争，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也只有这两派路线之彻底的斗争，史大林派现在尚想利用旧的机会主义一名词来转移全党同志对目前这两个路线争论注意的视线，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企图。

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

反对派的责任是在使全体党员明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摆脱机会主义的领导，而回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真正民主集中的党中，党内政治不同的意见本可由公开讨论的方法来解决，不但不会使党分裂，并且使党更加巩固。反过来，官僚主义的压制与蒙蔽，势必使党崩坏与分裂；反对派为拥护真正无产阶级的路线，为实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统一，不能不与机会主义的领导有组织的作坚决的斗争。机会主义已迭次在中国宣告其可耻的破产，中国无产阶级已付了过重的代价，直至近一年来方产生反对派的斗争，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受第三国际长期机会主义的领导与蒙蔽，直到现在才接近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我们下列签名的人，认为我们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都应该起来根本反对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国际的苏联的中共的现行政策和党制，都需要根本改变。我们相信在中国的反对派运动得到党内多数同志同情时，史大林也会采用反对派一部分主张和口号或更换一部分领导者，以图统驭群众的左倾；但是我们所争的乃是整个路线之根本改变，而不仅不是一时策略上的曲折，更不是简单那几个人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共受史大林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之害最为酷

烈，应当是国际各国党中站在最前线勇敢的反对现在国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因此，我们提出下列建议，希望全党同志一致坚决的要求并督促中央以中共名义向国际并直接向各国兄弟党提出；同时我们应该在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为下列各项奋斗到底：

一、召回托洛茨基同志等反对派，释放在监狱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亚土耳其士坦等处的联共及其他各国反对派同志，恢复其党籍，并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

二、公布五六年来反对派对联共及国际政策发表的各种文件，公布列宁遗嘱及其他被史大林派隐藏着的列宁遗著。

三、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的政策及国际政策。

四、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并立即公开的讨论根本政治问题。

五、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

六、改组联共及国际与各国支部的领导机关。

签名者：①

王阿荣　王永庆　王芝槐　王视民　王　畅　王绍华　王季平

王大昌　伊　宽　左　斌　史文学　江鸿生　江常师　江又容

李果夫　李　季　李　轩　李静涛　朱崇文　朱继熹　朱天章

何炳根　何资深　杜　谦　杜发义　杜　琳　汪泽楷　汪复兴

汪复盛　林金生　余　伟　吴季严　吴若萍　吴琢辅　岑舜乡

马玉夫　马　图　徐竹林　段　浩　段震亚　孙平州　高语罕

---

① 据郑超麟回忆，下列八十一位的签名者，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假的。所谓假，一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例如第一名王阿荣。“中国的习惯，注意第一名，责任大，弄个假名字，是陈独秀的意见。”二是本人不知道，但被作为托派的发展对象，当本人知道后也没有加入托派。

1930年3月12、15、29日及4月12日《红旗》第83、84、88和92期，先后发表文章批判《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在《红旗》第86期致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公开信，“望他们自登报日起在一星期内切实执行下列办法：如系被取消派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限一星期内必须交到中央。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的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后的制裁。”不久，这五人都被开除出党。4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红旗》第94期上发表给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王永庆的通知。通知内容与上述中央公开信基本相同。后这五人亦被开除出党。

梁筱山　庄季贞　陈　洪　陈碧兰　陈独秀　陈其昌　张　虚
张以森　张素秋　张胜秋　张阿宝　屠景山　屠维纳　陆　沉
程裕和　汤　正　彭桂生　彭桂秋　彭述之　单直夫　叶禄堂
董江素　刘右山　刘静真　刘伯庄　刘　毅　刘逢鼎　潘希真
潘伯华　蔡振德　郑　重　郑超麟　蒋石甫　钱又萱　薛农山
罗世藩　韩治臣　顾幸到　顾　满

(附记)以上是我们签名者今后的集体意见,以前个人所发表的言论,概由个人负责。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



答国际的信[①]

国际执委政治书记部：

中国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早已紧急地宣布我为“托洛斯基主义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贼”……企图这样一次决定我的前途。同时，你们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给他们的训令也就教导他们：“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及托洛斯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然而现在你们突又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们的开除党籍问题，你们这种思想，我很不容易了解！

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固亲身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我虽未能及时彻底认清这个失败的教训在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着我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的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然而国际的领导机关却轻轻地把这个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如果这样便解决了问题，关于我个人当然用不着说什么；但若以个人的责任问题掩盖了全部政治问题，掩盖了失败之真实教训，因而断送革命之前途，其罪实不可恕！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然而自一九二七年以后直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取消了“陈独秀

---

① 中共中央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但由于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还需申报共产国际审核。1930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部给陈独秀的电报，转交与他。电文说：“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部审察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会议“将于两月之内举行”，请你尽快转告你是否愿意前来参加。“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或得不到你的答复，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中共中央希望陈“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的机会主义派”而引导中国党于正轨，两年来事实的经过是怎样呢？中心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东的政变，就应该给我们争取无产阶级独立地位的一个猛省，然而我们恰于这时完全屈服于国民党。四月十二日上海的大屠杀，应该使我们根本改变过去机会主义的路线，然而我们因不容于上海的蒋介石，而转趋于武汉而求于汪精卫，武汉失败后，机会主义无出路又转入盲动，把中国党从政治上的破产再加上组织上的毁坏。最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八月)就应该彻头彻尾地整理过去革命之真实教训，肃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然而它却受了官僚主义浮面批评之敷衍，仍由留在旧的道路上……机会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及工农民主独裁)及盲动主义的策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因此中国党领导机关现在正忙于政治投机和土匪式的骚扰！

列宁教导我们在反动时期“革命党被迫着要完成他们的教育。他们已经学习过进攻(可惜中国党在过去所学习的还只是投降！)，现在应该教他们了解这个科学应该由退守的科学来补充……为着战胜，应该有规律地进攻，有规律地作退守战”。一个国际的领导，却在当进攻的时候，教中国党投降；当退守的时候，教中国党胡乱地拼命。列宁以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失败后能够“最整齐地、最少损失他们的武装，最少损失他们的中心而退下来，”及“经过最不深沏〔彻〕和最容易恢复的分裂，受到最少的颓丧，最能够重新开始最广泛的、最规则的及最有毅力的工作”为成绩，而国际的领导，却叫中国党战至卸甲丢盔一兵一卒都不留——只留下一些雇佣队。列宁说：“布尔什维克能够获得这样的结果，唯一的乃是因为他们早已无情地揭穿并开除那些口头的革命家，这些革命家他们固执着不了解有时应该退守，应该善于退守，绝对应该学习在最反动的各种议会中，在俄工会协作社中，在救济会中，及在一切团体(即使是最反动的)中合法的去工作。”(当然列宁并不主张取消秘密工作，他要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紧相联系。)国际的领导，现在教中国党制造“同盟罢工”，“政治罢工”，“上街打电车”，“乡村游击战争”，“苏维埃的割据”，“公开的赤色工会号召”……等等。

现在中国党官僚主义，已具小资产阶级失败后愤激的情绪和流氓

无产阶级的意识深相结合着，党的群众基础已扫地无余。党不但不能与群众恢复联系，不但不能领导工人抵御资本（阶级的）进攻而团结其队伍，并且一味地夸大盲动，在群众斗争中客观上做了破坏工作，同着资本的进攻双方对工人进行夹攻！这种情形你们不能说不知道，知道而不能不如是做下去，因为他们现在"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

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得到国际之列宁主义的领导，才可顺利地达到他的解放之前途，这是必然的，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斯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真正的根源所在。当你们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斯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并且予〔预〕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然遭到的结果。现在这种予〔预〕言已经一步一步由事实证明出来了，可是你们却把托洛斯基放逐到苏联以外，把他交在阶级的敌人之手中，即土耳其的蒋介石之手中，其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

我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关于整个的政治问题，我从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已完全证实五、六年来国际的领导是站在官僚机会主义的路线上，尤其重要的就是你们滥用国际的威信及凭藉官僚机关的权力，继续维持这种路线，不惜破坏一切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原则，不惜恶劣地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根本方法，列宁主义的战术主要教训。关于中国问题中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一）将来第三次革命的政权是工农民主独裁，还是无产阶级独裁？（二）目前的任务是直接准备武装暴动，还是提出过渡时期的政治口号（如国民会议）作民主的斗争？你们因未得到机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来认清革命发展中阶级关系的转变，因而你们在未来革命政权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工农民主独裁；因为未得到盲动主义失败的教训，不承认上一次的革命早已完结，因而你们在目前直接任务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准备武装暴动和乡村

游击战争。这样你们在总的政治路线上是要把革命拉向后退;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是破坏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我及我们意见相同的同志所发表的政治意见书,不久你们当可以看见。这些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便没有别的问题可解决。但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政治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世界革命命运的问题,应该从党内公开的讨论来解决。托洛斯基同志关于中国以及整个国际问题的许多文件,你们不肯正式公布于各国支部加以讨论,驻中国的国际代表会以开除党籍当面威吓我,禁止我发表政治意见;中国党中央仰承你们的意旨不允许把我屡次所提出的政治意见交付党内讨论,只凭他们片面造谣;同志中有提出疑问的,立即被指为"暗藏的陈独秀派",开除出党——这样便算解决问题吗?你们如果有诚意解决问题,你们备有一切权力与方法,否则一切问题都只有凭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一道去解决。

独秀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

1930 年 7 月 1 日 《无产者》第二期



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策，在有革命局势时和没有革命局势时，是不相同的。这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浅近真理。”（列宁）

中国过去的革命是否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是否尚未到来，现在的阶段是否还在两个革命间之过渡时期，换句话说，现在是否已有革命局势，这是决定现在政治斗争的策略与口号之先决问题。

中国的革命局势，不仅单就本国情形来看，它和国际的革命局势也有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能够依据整个的国际局势，对于中国革命给予以正确的政策之指导，更有绝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自西欧各国革命失败，世界革命潮流移到东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如有正确的政策指导中国党，中国革命如果成功，必然影响到欧洲革命高潮之再起。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是世界革命之整个的时期，中国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乃告了结束，从此世界革命形成了退潮时期。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一九二八年）所谓世界革命已进入第三时期，这不过是史大林、布哈林这班国际领导者说几句空洞好听没有证据的话，以安慰群众，以遮掩他们自己对于中国革命之机会主义政策失败的羞颜。瞿秋白说：“世界革命进入第三时期即非事实，亦不妨写在决议案上。”好乖巧的孩子，真能仰体上峰的意旨！现在他们竟弄假成真，居然信口胡吹“欧美和东方革命新高潮的兴起”，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他们把历史上自有工厂即有经济斗争的罢工，都算是革命高潮；又把自己盲动命令所造成的柏林五一示威和卸甲丢盔的各国八一示威，也算是革命高潮；甚至把反动势力进攻苏联，法西斯特派及工会官僚进攻赤色工会和工会中的革命派，大批的开除革命工人出会，各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到处都转到反革命的营垒去，到处都发动反共产运动，也都算在革命高潮之内，这真是无聊之极！革命高潮，必须依靠革

命的无产阶级力量在阶级对比上加强，在阶级的斗争之进展上，能够适时的向走近崩溃的统治阶级蜂起进攻，才能形成。单是被压迫阶级之困苦，统治阶级之压迫和资本及一切反动势力之进攻这些客观条件，不一定时时都会促成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潮。现时欧洲工人群众虽然有往左的倾向，而目前尚未左倾到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圈套，尚未左倾到共产党方面来。在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这几年来在数量上，在政治地位上，大部分是削弱而非加强；同时，改良派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动党其势力反日见增长。国际帝国主义间，尤其是英美间和美日间的利益矛盾虽然日益加紧，而目前尚在利用改良派之暂时的弥缝，以和缓战争之爆发，以便各自勾心斗角的力争武装和外交之制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在革命中的作用，已经告终，革命的使命正在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转移到无产阶级的期间；在这一期间，因为各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党不健全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之背叛，革命运动不免还要经过许多困难与顿挫。此外，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即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及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没有正确的政策能够脚踏实地的推动世界革命的主力军——下层群众势力向前发展，只有向上的让步妥协和向下的不适时机的盲动；并且苏联本身也有了右倾和保守政策所产生的危机，影响到世界革命运动进展之迟缓。因此，国际一般形势，只是在革命新高潮之酝酿时期，并不是什么“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夜”。所以国际右派的取消倾向固然是错误的，而盲动主义的史大林派大喊“革命复兴”、“新的革命浪潮”、“第三时期”，也是错误的。

单就中国讲，自从共产国际及中央以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组织都溃散了，党与工农群众断了联系，党本身也几乎解体；紧接着革命失败群众溃散之后，又加上共产国际的盲动政策，自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经过两年多盲动主义的摧残，不但工农群众的组织没有恢复，即各地散漫的一些经济斗争萌芽，都被党的盲动政策铲除干净；阶级力量之对比及阶级斗争之进展，既然是这样的状况，那里会有革命高潮从天上掉下来！因此，资产

阶级的军阀在战胜无产阶级及农民之后，虽然经过其内部不断的战争，仍然能够从容的巩固了他们的军事专政的政权，厉行对革命势力之白色恐怖，形成了中国革命低落之整个时期的现阶段，即反革命的阶段。这一现阶段是过去革命中及革命失败后一切事变一切错误政策所积累之结果，同时也就是走到将来新的革命高潮所必然经过之道路。我们若不认识现阶段，则过去的失败不能给我们一点教训与经验，并且眼前复迷陷在乱山中，找不着怎样由现在的政治斗争开步前进走向将来新的革命之出路。

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一点也不认识中国革命由三次失败(上海、武汉和广州)，所形成的现阶段是什么，并且他们实不愿意认识它是什么。这就是因为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布哈林为了要掩饰他们自己过去引导中国革命三次失败的机会主义政策之破产，为了避免证实托洛斯基同志对中国革命政策和事前预料之正确，乃始终讳言中国革命失败，始终说中国直接革命形势依然存在，乃由极右的机会主义一跳跳到极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冒险政策。那时在莫斯科如有人敢说一声“中国革命失败”，马上被斥为“取消派”、“托洛斯基主义”，直到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自己也觉得中国革命失败的形势已再遮掩不住了，才把盲动政策的错误推到中国党身上，说中国党犯了盲动主义。可是把革命已经失败误信为直接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的中国党，那时已经撞得头青脸肿，已经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彻底肃清，把党的干部及一般积极分子摧残殆尽了！即在第九次扩大会，国际领导者仍然是说：“中国目前的情形是一种革命潮流在两个浪潮中间，……现在正在新波浪开始的前面，在新高潮的足下。”到了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八月)，国际领导者一面口头上大喊反对盲动主义，一面又大喊，“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我们面前是一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并且还说：“武装暴动在有几种例外的情形之下是可以干的。”同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见地，仍然和第九次扩大会一样，胡思乱想的在什么一个潮流两个浪潮中间乱滚，根本不认识现在是没有一点浪潮

革命低落的整个时期，所以它仍然和第九次扩大会一样，虽然嘴里大喊反对盲动主义，手里所做的自然只有盲动，除非是不动；所以虽然承认把“武装暴动”变为宣传口号，虽然说：“只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时候，这个口号才重新变为直接行动的口号。”而未能前进一步指示中国党在革命高潮未成熟以前现时的政治斗争中，用什么做行动口号，而且反对中国党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一直到现在，他们自己还没有向中国党指示出来任何政治口号。这自然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即在前面，即在足下，“武装暴动”的口号已在喉中呼之欲出，用不着别的政治口号；否则便是认为现时不必做什么政治斗争，不必有什么行动，一总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时再武装暴动。此外，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失败后新阶段中的认识与策略，没有一点别的高明见解。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第六次大会反对中国党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和其第七次执委扩大会（一九二六年）反对中国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同样是不认识新的客观局势，同样是把中国党送到绝路上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论在过去或将来的革命高潮中，都看做金科玉律，一步也不敢越过它的范围，独有在没有革命高潮的现在，反而把提出民主主义的口号当做机会主义，这是什么理由，不但别人不懂得，恐怕他们自己也不懂得。最近国际第十次执委会（一九二九年七月）以来，他们索性决定中国新的革命浪潮已经成熟（附注一）；那末，“武装暴动”当然要重新变为直接行动的口号了，所以江苏省代表大会已经发出“地方暴动”的口号。将来弄糟了，当然仍旧是归咎到中国党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和不久以前对于富农问题归咎到中国党犯了机会主义是一样。像这样的国际领导机关，那里还有一点资格配领导世界革命！

统观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失败后现阶段之认识与策略，中间虽然经过一些曲线，而始终一贯的精神是：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并未完全失败，一直到现在还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对于现阶段的策略，始终是直接进攻，始终是武装暴动与苏维埃政权，民主的要求口号与运动一点也用不着。这分明是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变成了“革命高潮不断论”。这种不断论表现得最充分的就是中共第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承认中国仍旧在革命的阶段，是把中国现在

的反革命阶段和将来的革命阶段混乱在一起。由这样现在和将来不分的混乱思想,遂产生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就是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把目前日常斗争的口号,过渡时代的要求和将来夺取政权的政纲,都混合在一起,就是把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混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不学无政府主义者,两眼只看着最后的目标而放弃目前的现实的政治斗争,对于现阶段,我们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必须认识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二次大革命已经过去了,是完全失败了,各国革命史已告诉我们,大革命失败之后,必然经过一个反动时期,中国也没有例外,无产阶级在这反动时期的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培养自己的能力,彻底反省过去失败的教训,溶化过去革命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以锻炼自己,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积聚阶级的力量,以筑下将来新的进攻时自己阶级力量的坚固基础;一面重新估量现阶段中新的客观局势,采用现局势所需要所可能的策略与口号,重新闯进政治舞台,由现在的政治斗争,开辟新的革命环境,从反动时期的现阶段,走到新的革命阶段。

中国从辛亥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第二次革命,中间相距至十余年之久;从第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到将来的第三次革命;其间距离之长短,是要靠国内的阶级斗争进展之形势及国际形势来决定,此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但其间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的现阶段,这已经是一件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的责任,不是在否认这一过渡时期的现阶段,而是在怎样发展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加速这一过渡时期之缩短,怎样努力参加现阶段的政治斗争,减少从反革命阶段到革命阶段的障碍与困难。现阶段尤其目前的局势之特征是:

一、自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革命,盲动主义的政策铲除了革命的势力,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犹未回复其创伤与勇气能够立起来和统治阶级作最后的决死战。在目前所有的斗争中,都只是对资本进攻的防御战,根本没有武装暴动的进攻之可能,连即时实行准备武装暴动也谈不上;尤其是缺少一个有团结力有战斗力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此时虽然各地劳动者和店员有些对于资本进

攻的防御斗争，即令各地再有些农民饥民兵士散漫的骚动，而没有整个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有计划的有准备的为之领导，也决不能形成革命的群众运动高潮，很容易为统治阶级各个镇压下去。

二、资产阶级在击败无产阶级屠杀工农民众之后，不能不容忍在国民党训政之下各系军人的军事专政，以镇压工农革命之激进，以保持他们在革命中所获得的利益。国民党各系军人代表各地方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互相冲突，发生了蒋桂，蒋张，蒋冯，蒋唐等资产阶级内部争夺政权的公开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都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走向崩溃，而是走向逐步的统一与相当的稳定(附注二)，虽然其前途尚有不少的困难或意外的阻碍；其主要的有力的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东南的银行工业资产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心势力和帝国主义特别是需要向中国输入资本的美国急于在中国扩大市场的德国，各应他们的需要，都一致企图援助中国代表整个的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之统一与稳定。

三、通常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统一与稳定，乃是其经济复兴之可能的前提。现时中国经济复兴的程度虽然还是很迟缓，而前去两年的对外贸易额则已逐年递增，即以上海一口而论，去年一月至十一月对美国输出总额比前年增加美金一二九一五六六三元，其中增加最多的是纺织品及其原料，共值三千五百七十余万金元，比前年增加一千三百余万金元。这种未能脱离殖民地地位之低度的经济复兴，不但不至消灭革命，并且因此重新团聚离散的工人队伍于生产机关，增加工人阶级的自信力，扩大工人组织及扩大共产党影响的条件。其最终结果，将至重新引起一切未解决的问题之紧张和加紧阶级冲突(军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间的冲突，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跟着不可免的新的经济恐慌一到来，将成为革命的推动力。

四、国内外一切矛盾仍然存在，在帝国主义势力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它的政治和经济都不会发展到能够解决中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民主革命的任务(如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等），革命的巨潮仍旧潜伏的存在着。

五、国民党资产阶级军事专政所产生的苛捐杂税，战祸，灾荒，物价腾贵，使一切下层民众尤其是工人对于加时减薪、贫农对于耕地缺乏与高利贷，一致感受暴政和贫困之严重的压迫，一致对于现状不满，急于寻找政治的出路。被欺骗而投降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因身受国民党政府暴政苛税之苦，又开始左倾，开始厌恶剥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军事专政，要求民主政制即立宪政治。甚至于资产阶级本身，也渐渐感觉到军事专政对于他们资本主义之发展有所阻碍，渐渐需要适合他们利益比现时较民主的政制。

依据这些特征，自然是没有革命高潮的局势，并且革命高潮也不会有马上到来之可能；然而在两个革命间之整个的过渡时期中，目前的局势已经有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并不是表现革命高潮成熟，而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和各阶级反对现时军事专政的斗争之开始。这一运动这一斗争做得愈有力，则现在的过渡时期愈缩短，由反革命阶段转变到革命阶段的速度愈加速。目前既然是没有革命高潮的局势，无产阶级既然不能即时武装暴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缩短过渡时期，为加速到革命阶段的速度，为要求自己的利益，为力争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政治自由，她对于已经开始的民主运动所应取的态度，便不应消极的或用激烈而无行动的空洞口号来抵制，而应积极的号召广大的下层民众参加这一运动，领导这一斗争，使之彻底的民主化，使之向前发展，走向革命高潮，然后这一运动这一斗争才不至停止在目前的阶段上。

当然，民主主义不是超阶级的，一般所称为民主主义的，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一民主主义本来是资产阶级从前用做反抗封建贵族以及欺骗劳动阶级之工具，到了社会阶级关系一转变，即封建势力已溃灭劳动阶级走进了政治舞台，统治的资产阶级马上认识这一工具的锋芒要戳伤到自己身上，急急的设法收藏起来，重新在废物储藏室中拿出他们从前所抛弃的反民主主义的宗教，礼教，旧道德等等来代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及在它还未达到夺取政权的时候，

应该不客气的借用资产阶级这一有锋芒的工具(民主主义),来对付资产阶级,来廓清无产阶级走进政治舞台的障碍,来成熟自己阶级解放斗争的条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未实现以前,单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传力量,不会使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大部分工人群众能够认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伟大与真实,当他们需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时期还未终了之时,当他们还睡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抱之时,我们不能离开他们,此时也必须采用民主主义的口号,发展民主主义的运动,吸引他们到我们的周围,这也是无产阶级运动中一个历史的任务,决不是机会主义。但群众向统治阶级要求的民主主义,是其实际而非空名,我们必须防御资产阶级空洞名词的虚伪与欺骗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妥协,因此我们必须力争由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产生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做我们在过渡时期中四个不可分离的民主要求口号,以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以充实在过渡时期中整个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内容。必须是如此,才能够引进广大的劳苦群众参加这一民主运动,扩大这一民主运动,要求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改变其形态与程度;资产阶级的民主之终点,接着便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之起点,即是拥护占全人口绝对过半数的劳动大众获得权利与自由的苏维埃政权之起点(附注三)。

对于国民会议这一口号,我们党中现有三种态度:一是现在中央的态度,他们说:"国民会议,在过去一切历史的经验上证明,只能够产生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由我们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造成了,已经不待国民会议来产生了,现在正要利用民主的国民会议来和资产阶级军事专政对抗。列宁所指导的十月革命,在已经武装暴动夺得政权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宪法会议还是议事日程中三个问题之一,这一历史的经验证明了什么,他们说我们:"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代替'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与'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两个口号。"然而他们又曾声明:"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既然没有群众暴动,当然不能够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这就是说,我们

的党现在实际上并没有号召群众的政治口号，只有盲动，只有采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投机，冒险，阴谋，暗杀等政策，只有长期的离开现实的政治斗争。一是有几个自称左派的同志态度，他们说："中国将来的政治发展，是否有议会制度之可能，我们认为他有或然的可能，而且无产阶级并当力争这样的发展。""我们对工人阶级宣传国民会议口号，应当告诉他们国民会议之实现，是比现在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有进步的意义，我们应该参加此种进步的斗争，我们所主张的是普选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产生的国民会议，解决国家重要问题，如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力争中国之独立，同时我们认为此种国民会议也许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我们也要向着武装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国民会议的口号是引导千百万劳动群众重新参加政治生活的口号，这种斗争之进行，将加速中国议会制度之实现，假如中国能实现议会制度，这使我们在更高的一阶段进行夺取政权"，又批评我们"提出了国民会议的口号没有将他与中国将来的议会制度发生联系，这是没有前途"（见刘仁静同志起草的告同志书）。这分明是在主观的策略上不重在为民主运动而斗争之动的意义，而是拜物教似的把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都认为进步，并且很单纯的只是把资产阶级任何形式的议会这一静的制度看做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之根本目的，即是我们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国民会议的斗争，只是为了实现国民会议实现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这一前途，别的都还要待在更高的一阶段进行，这和以前主张先完成国民革命然后才干社会革命现在主张先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议会制度也是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内容中所应有的事），然后才干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同样的机械，是同样的没有自己的前途。这种极右倾的态度，和现在中央极左倾的态度，恰恰是相反的两个极端。向左的极端是梦想革命，向右的极端是抛弃革命，都不是推进革命，这两个极端政策所能得到的结果是一样：巩固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以为观察这一问题之要点，是国民会议在客观的作用上将是怎样，在无产阶级主观的策略上应该怎样。

现在各阶级需要国民会议是一致的，而各个所需要的国民会议之内容，则极不一致；因此，将来国民会议之实现，在客观上能够发生的作

用是怎样，这是要看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下层的广大民众参加这一运动至怎样程度而定，此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此时所能够预见的有几点：(一)最近即有实现召集段祺瑞善后会议式的以至孙中山国民会议预备会式的国民会议之可能；(二)将来的政治发展，有由国民会议而实现三民主义的宪法，而实现俄国沙皇时代的或土耳其式的议会制度之可能，并且若革命高潮到来得迟缓，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会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三)我们有利用这些政治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在选举运动中，有获得接近广大的民众，向民众宣传我们的目前要求(如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独立，政治自由等)，恢复工农群众普遍的组织，领导广大的下层民众重新参加政治生活和公开的政治斗争，在会议中提出我们的要求特别是土地政纲，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增进工人阶级的政治社会地位，和得到相当的政治自由等有利于工人阶级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之可能；(四)从善后会议式的国民会议一直到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同样不能够解决中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如对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归农民，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独立等等。中国目前所需解决的根本问题，只有革命高潮到来时，由无产阶级领导城乡广大的下层劳苦饥寒民众，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够解决。

因此，我们在主观的策略上，一方面应该纠正向左的错误，即是对于要求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和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以至将来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运动，都应该坚决的积极的领导下层民众(不与任何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进行迁就妥协的政治联盟而且要和他们对抗，斗争，争取农民)，极力要求参加，极力要求其民主化，即力争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并且以我们的目前要求充实其内容，丝毫不可犹豫，始终不能取消极态度和抵制政策，因为在这些运动中，工人阶级有获得力争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之可能。"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我们的前途，是将来革命高潮中的行动口号，在目前只是教育宣传口号。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怎样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是怎样才能够动员群众开始政治斗争。在主观客观条件都未成熟时，若发出"武装暴

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做政治斗争的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行动起来，为这些口号奋斗，不仅得不着群众的应声等于放空炮，而且更加扩大党的盲动情绪，离开群众，削弱自己的力量。至于“要求召集国民会议”这一口号，其客观条件不用说已经成熟了，我们即应重新瞭解新的客观状况，决定我们的策略，即是利用这一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口号，发展两个革命间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这不是我们在主观上开倒车，而是因为在客观上无产阶级的党已被革命失败推向后退，退到以前的发足点，现在的政治斗争，几乎要从头做起，所不同的（可以说实际上是大大的不同）只是根据过去的苦经验，必须根本改变其方式而已。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曾说：“在工人阶级夺取整个政权的斗争还未成为当面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形式。”在一九二〇年他又说：“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之后，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这件事，不仅不妨害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帮助无产阶级，使之能够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议会为什么应该解散，为什么要促进解散这种议会，为什么要促进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之政治破产。”因此，我们在反革命势力高潮时代，若不懂得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在此时也是推进历史一个动力，不去做力争国民会议民主化的斗争，只向左发出毫无行动的激烈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这乃是梦想革命而不是推进革命，乃是把发出行动口号领导群众行动的政党变成宣传研究在纸上写出些宣传口号的小团体，或离开群众组织的政治斗争，只是少数人阴谋暴动恐怖的巴枯宁派。瞿秋白反对国民会议这一口号的理由是说：“我们由中国革命可以看出，当殖民地的革命达到决定胜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明白摆在我们面前：即或者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他这几句话里面包含不少的错误，可是表面上似乎很漂亮，可惜说迟了一点，或是说早了一点，即是他忘记了过去的革命决定胜负时机已经过去，将来的还未到来，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民主运动不管能够达到若何程度，都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尤其是它的政党，为力量发展所需要的组织上民主制之实现，政治自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有些同志以为我们过去也曾做过国民会议运动，不曾得着什么。其实，过去的国民会议运动并未

达到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然而已经建下五卅运动的基础，假若没有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未必能够形成那样规模的五卅运动。有些同志以为我们参加国民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便是承认它的存在，并且承认他们当中的各派军阀官僚得以利用国民会议做争权夺利的合法工具。我们要懂得国民党政府之存在是一个事实，不是否认便可了事，而是要造成某种力量怎样去动摇推翻它的存在；他们可以利用国民会议做争夺权利的合法工具，我们也可以利用国民会议，以力争民主政制做反对军阀官僚等一切反动势力的合法工具。列宁说过："社会民主工党之承认资产阶级制度……并不是承认它的监狱警察私产卖淫，而是为广大的自由斗争来反对这些制度。"(《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有些同志以为参加国民会议会使我们的党发生右倾的危险。自然我们并不否认因此使党有发生右倾危险之可能，但决不能拿这个来做消极抵制的理由。列宁说过："没有并不能够有一种斗争形式一种政治状况不能引起危险的。如果没有革命的阶级的本能，如果没有立足在科学上的整个人生观，那末，参加罢工也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变成经济主义派)，参加议会斗争也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变成议会的蠢才)，赞助乡村自由派的德谟克拉西也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变成乡村运动计划)。"(同上)现在的中央，拿改组派，中华革命党，新中国国民革命党，中国青年党，以至段祺瑞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都赞成召集国民会议，说我们也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便是他们的政治盟友，其实，我们所要的国民会议和他们所要的国民会议，其作用与内容都大不相同。列宁在一九○五年曾主张召集全民代表大会，在一九一七年又曾向临时政府要求召集国民立宪会议，难道他也是沙皇及克伦斯基的政治盟友吗？有许多同志也正因为各种反动派都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我们最革命的共产党，实在不好意思把这一口号从口中喊出来。这正和以前少数派讥笑列宁"把'临时革命政府'和'万岁'联在一起，是污渎了自己的口"，是同样的糊涂。况且我们的党在第六次大会前后没有向民众提出"要求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做革命失败后有重大作用之一种政治斗争形式，这已经是大错；现在对于这一口号这一运动，若仍旧是取消极的抵制态度，若不赶快积极的向下层的广大民众宣传，鼓起下层的广大民众热烈的要求参加，要求平等直接普选不

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则将来的国民会议真会是反动派及各上层阶级的上层分子包办的国民会议了事，那便是莫大的罪过！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要纠正向右的错误，即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民会议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进行中，我们丝毫也不应该向工人群众和从前歌颂国民党一样歌颂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与进步（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之发展更是进步），助长他们对于国民会议与议会制度及宪法的本身之幻想；因为它们本身都不能解决中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我们应该在要求召集国民会议的鼓动中即告诉工农群众：这个会议即使召集成功，国家权力如果仍操在国民党军阀之手，这个会议将没有一点执行的力量；我们应该在这个会议集会中，向工农群众极力暴露各上层阶级党派的政治破产及其政策是如何背叛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以证明并使群众自己认识只有工农武装暴动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才能够拥护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而不能告诉工农群众："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力争中国之独立，此种国民会议也许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我们也要向着武装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这样很明显的是要助长工农群众的幻想，以为国民会议也许不难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力争中国之独立，所以不必一定向着武装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主张召集全民代表大会，其根本目的是在以民众暴动推翻沙皇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不在议会制度；只有少数派幻想"革命对沙皇制度彻底胜利之可能……或由某种代表机关的发起，在革命民众直接威逼之下，决定组织全民立宪大会来达到"（见华译《两个策略》第二二页）。列宁告诉他们："政权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决议都好，都会与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时历史上有名的佛兰克府国会的决议一样，只是成为一纸可怜的具文。"（同上二三页）列宁一九一七年也曾向临时政府要求召集国民立宪会议，其根本目的也是在完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生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不在议会制度；只有少数派死守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阶段，歌颂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与进步。这还是革命高潮时代的事，在革命低落的一九〇七年，少数派主张参加第三国会，多数派中的多数人即所谓召还主义者抵制主义者则主张抵制那破碎的冒牌的国会，独有列宁一人力排众议，极力

主张参加；他随后并且承认前两次抵制国会选举的口号都是错误的。列宁主张参加国会，和少数派主张参加是不是同样的政策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少数派是迷信歌颂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之本身，以至在他们影响之下的工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都落到和平的幻想中去了；而列宁的政策是在革命低落时期利用议会制度，利用参加选举运动和国会议坛来帮助革命。他虽然极力主张参加国会，因此和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的斗争；而他的根本政策，仍然要革命民众的注意力不集中于国会，而集中于阶级斗争，集中于准备暴力推翻专制政权。

所以，向左的消极抵制国民会议和否认议会制度，而不知道积极的利用民主运动和议会制度，空喊"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而不知道怎样发动群众走向"建立苏维埃"、"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这便是梦想革命，而不是推进革命，这固然是蠢才；同时，极右的人们抓住议会制度，向工人群众歌颂国民会议与议会制度之进步，而且幻想国民会议也许不难解决国家重要问题，这便是根本抛弃革命，也不是推进革命，这真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托洛斯基同志有言："瞿秋白又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正要拿国民会议口号来代替苏维埃口号。这是可能的，多半可能的，甚至必然的。机会主义者将要首先抓住议会制度的方法，抓住一般类似于议会制度或接近于议会制度的事物，——这是有世界工人运动尤其是俄国工人运动的整个经验可以证明的。少数派抓住议会制度的行动而抛弃革命的行动。"这几句话正是给一些极右而自称左派人们之当头一棒！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决不取消极抵制政策，而是积极的号召参加，力争其民主化，我们认为力争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是从反革命时代走向革命时代这中间过渡阶段有重大作用之一种政治斗争形式，这种政治斗争一扩大紧张起来，合成直接革命之先导；同时我们也不能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有所幻想，更不能助长工人群众的幻想，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民主政制来促进民主政制之死亡，而不应该歌颂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我们是要利用民主口号与运动来辅助我们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民主政制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我们不主张用苏维埃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口号，同时也不主张用国民会议口号来代替苏

维埃口号，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与斗争来引导群众走向苏维埃口号。我们不反对参加国民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同时也不能对于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都认为进步。我们必须大声疾呼的攻击军阀官僚们操纵包办国民会议，必须尽情揭破他们的欺骗与假冒。我们必须调动全国千百万下层民众在民主运动过程中，力争国民会议之彻底民主化和力争下层民众的要求，以反抗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揭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假面具，并且打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取得广大的下层民众，走向革命高潮，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这就是我们前途，这就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对于一般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态度。这也就是我们党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之政治斗争的正确策略。

(附注一)①他们所谓中国新的革命浪潮已经成熟，大概是指改组派倒蒋运动之不断的高涨起来。听说最近国际又有训令给中国党，对于反蒋运动分析说蒋是代表豪绅买办阶级，改组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国际为什么把反蒋运动中这样的阶级分析训令中国党，大概他们又要复活和"中国土地革命领袖"汪精卫所领导之在野的资产阶级联盟，来推翻代表豪绅买办的统治阶级，来实现他们所梦想的工农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吧！可惜不替史大林争气的改组派，国际训令方到中国，他们已经倒台了，大概中国新的革命浪潮之成熟，又要成问题了吧！

(附注二)这里所谓相当的稳定，是就其内部状况而言；若就全国阶级斗争的状况说起来，在无产阶级之阶级的斗争没有剧烈到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前，它始终是稳定的。

(附注三)列宁曾论民主主义说："'普遍的民主主义'无论在如何资本主义文明国都不存在，所存在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比较中世纪，不用说是高度发展的制度；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的要求要从

① 本篇附注皆系作者的原注。

根本改变。""民主主义之形态，在几千年的经过中，自从古代发生萌芽，其后每次由一阶级交代到另一阶级时，都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改变，在古代希腊共和国，在中世纪的诸都市，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民主主义都有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程度。""在俄国的苏维埃权力，其意义乃是真正的实现劳动阶级即占全人口绝对过半数的人们有获得民主主义的权利与自由之可能。""马克思主义者应以争取国家权力为目的。这一目的不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即平等与自由是决不会实现的。实际上向这一目的引导者，便是苏维埃权力亦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以上均为原注）

1930年3月1日 《无产者》[1]第一期 署名：陈独秀

---

[1] 1929年9月，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由陈独秀任书记。1930年3月1日，创刊《无产者》，故该派亦称"无产者社"。

关于所谓"红军"问题[1]

昂格斯曾在《德国农民战争》序文中说：

> 游民无产阶级——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乃是所有同盟中之最劣者。此辈绝对易于被人收买，且极是累人的厌物。法国工人纵然在每次革命中每家榜其门曰："处盗匪以死刑！"而且曾杀过一大批，这并不是由于热中保护私有财产，而是因为法国工人很正确的懂得：应该首先和此辈土匪分别开来。每个工人领袖，他若要利用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且企图在他们当中找着自己的支柱，只此便证明他是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

世界几十国的共产党，一向都是遵守昂格斯的遗训，不敢采用利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政策，列宁在世时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中，法国党因为有接近此种秘密会党的倾向，曾受了严重的批评，现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叛徒……[2]正在利用此种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为支柱，简直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企图扩大凭藉在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基础之上的所谓"红军"来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来"影响到大城市。"他们公然的说：

> 军阀崩溃的基点——兵变，他显示了在殖民地军阀制度统治的国家中，兵士具有更大的革命作用，他不但在军阀制度下养成了的生活，而且在军阀制度下锻炼了一副钢锤铁铸的获有惊人技术的好身手，这副好身手就成为毁灭军阀制度的主要武器。(无产阶级想必只算得是次要的武器了！)这(指兵变)是军阀制度急剧崩溃的明

---

① 本文撰写于1930年4月中旬，攻击中共中央领导人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攻击红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本文发表前后，《红旗》第97、110、116等期，均发表文章批判陈独秀。

② 有十个字模糊难辨。

证，这是革命高潮的象征。

> 红军是推动革命高潮到来的主要条件之一，……而且促进革命局势的开展。
>
> 至于全国广大无比的灾民，半农半匪的武装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群众组织，……是必然会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生长成为红军的。我们更相信在中国或者是全世界尚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障碍着这一伟大的且有强有力的社会基础的红军力量之发展的前途。（以上见第七十二期《红旗》）
>
> 在江苏已有无数次刀匪群众的武装，而仍有人怀疑到在南京政府直接管理之下，游击战争是否可能。（见第七十六期《红旗》）

"兵变是毁灭军阀的主要武器"，"灾民、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刀匪，是生长成为红军的社会基础"。凭借这种社会基础的"红军"来推动革命高潮，这就是叛徒们的革命策略，也就是他们自己对于现在所谓"红军"的内容之分析。他们更公然很得意的说：

> 据十二月三十一日《申报》载："如皋境内土匪与共产党结合，聚众三千余人，抗纳捐税，民间自卫枪弹，悉被缴劫、势焰甚张，……"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大本营附近，又发生了流氓、土匪、地痞……的武装行动，反对派真要气死了！（见第六十七期《红旗》）

统治阶级骂我们是共匪和匪共并称，都不足为异；所可异者一个先进阶级的政党，竟以与土匪结合自豪向列宁主义者的反对派夸耀，我们多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被叛徒们使之堕落至如此地步，我们反对派安得不"真要气死！"

不错，中国的土匪运动是有它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广大的社会基础，因长期的生产力发展之停滞，造成了大量的过剩人口，流为游民盗贼，形成定期的战争，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现象，自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入中国，破坏了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更加增多了中国的游民，尤其是在农村中。这种无业游民之来源，最多的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官僚后裔、小地主、小商人堕落其中者亦不少，此即昂格斯"所谓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他们的出路是：移植

国外，进工厂做工，当苦力，当兵，这只是一部分，充其量不过一千万乃至两千万人，其大部分便是当土匪。其中最有组织力的，如北方的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中部的红帮、青帮等，南方的三合会等，他们不但盘踞农村，在城市中也有很大的势力。此外，各种名目的零星股匪，布满了全中国的乡村镇市，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是非至社会生产力有高度发展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巨大数量的游民无产阶级，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统治阶级内部有了纷争动摇时，他们便要大规模的骚动一次，从赤眉、黄巾到白狼、老洋人，都是这种把戏；这还是失败的部分，成功的帝王当中有许多都是凭借这种势力。但在城市发达和武器战术进步尤其是城市产业无产阶级出现的现代，游民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遂和前代大大的不同了。它们是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是绝对易于被人收买的厌物，他们反复无常，只要有利可图，无论革命反革命他们都可以钻进去鬼混，所以即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党，虽然能够拿金钱官位利用他们，也不能专凭借他们的力量得到成功，孙中山的同盟会以多数资产阶级的革命青年加入新军，才能够推倒满清；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利用工农势力，才能够得到北伐的成功，这便是明显的例证。在无产阶级已经登过大革命舞台的今天，我们无产阶级的党，还拾取孙中山的老政策，企图结合土匪，凭借土匪势力来扩大“红军”区域，来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此便证明他们是工人运动的叛徒！”有些政治意识浅薄的党员，受了叛徒们胡吹乱喊的宣传，竟以为现时红军区域扩大是事实，我们也许能够得到胜利，中央的政策也许是对的，这班人是被“红军”、“苏维埃”一些金字招牌所眩惑，并未仔细想想现有的所谓“红军”、所谓“苏维埃”其内容究竟是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所谓“红军”的区域之扩大固然是事实，土匪猖獗遍荡了全中国更是事实，而且并不是新的事实，它们之扩大与猖獗，本来就有它们的社会基础，再加上农业日益荒废，金价米价日渐高涨及统治阶级内部纷争动摇的近因，叛徒们甘心把共产党变为土匪党。除现有的所谓“红军”的区域外，将来还有扩大之可能，例如闽匪何金标支配了闽东几十县也可以于现有的八军外，生长成为“红军”第九军；湖匪郭老大等，以太湖为根据地，洗劫遍了江浙两省沿湖数十县的乡镇，已组织天下第一

军、第二军，这也可以生长成为“红军”第十军；此外还有更庞大的大刀会、小刀会和神兵，红枪会本来就有什么“红军”的组织，所谓“红军”区域凭借着这种社会基础扩大起来，自然是前程远大。土匪及所谓“红军”之骚扰扩大，自然也增加资产阶级统治之困难；然因此便想凭借他们为革命的主要武器，当做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这是绝对的错误。因为这种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这班绝对易于被人收买的厌物，在他们有利的条件之下，今天戴起红帽子便是袁文才与王佐，明天换上白帽子便是樊锺秀与孙殿英。倘凭借这种势力可以生长成为真正红军，可以建立真正工农苏维埃政权，那末，真如史大林派所说：“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而马克思、昂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在中国能否应用竟成了问题！

军队，尤其是中国的雇佣军队，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所构成，他们不但离开了生产，并且因为一种特殊生活形成了一种特殊意识，所谓官兵即是合法的土匪，即便是最好的军队，也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在革命斗争中才有作用：(一)必须城市工人斗争已进展到成立苏维埃，尤其在工人群众已经起来武装暴动中，兵士走到群众方面来，才更有作用；(二)并且必须是统治阶级所直接依赖的军队才是对于它们致命的打击。现在是怎样？第一个条件，谁也知道还没有；第二个条件也没有。第七十二期《红旗》所列举的三十六处兵变，没有一处是统治阶级所直接依赖的军队，并且大部分还是它们所正要排除的。这种兵变，不能算是军阀急剧崩溃的明证。兵士也是游民无产阶级之一种，这本是中国之整个的社会问题。兵变的现象，虽然不象土匪是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未能统一安定和财政稳固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现象。若以为凭借这种势力能够代替城市产业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红军与苏维埃政权，除了叛徒们所谓，“有中国式的特点”外，不能有其他的解释。

不错，我们还知道所谓“红军”中多少也有些武装农民，并且有些还是参加过上次革命的积极分子；可是他们在数量上比起土匪溃兵的成分来，简直是喧宾夺主，并且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这部分武装的农民已经离开生产，和土匪溃兵过同样的流寇生活，其势必至一天天游民

无产阶级化。游击战争式的战术，用之某城市武装暴动时，好过死守堡垒，列宁曾称之为“新的巷战战术”；若在农村中长期的作游击战争便是中国的老把戏：“流寇而已”，这种流寇的游击战争所得之恶结果是：(1)使原有的武装农民离开生产，过和土匪同样的生活而堕落腐化；(2)使农村所有的革命分子及我们积极的党员都不得不集中到军事组织和军事投机方面，如结纳土匪溃兵等。民众运动的组织与领导，必然要落在无足轻重的分子手中；(3)农民的组织与斗争连所谓“苏维埃”也在内，都随着游击战争的武装势力而生灭，使农民群众只有依赖一种武装的特殊势力即所谓“红军”为长城，而不相信自己的组织力量能够斗争；(4)游击战争所经过的地方，强有力的农民只有跟着“红军”走，留下的孺弱分子经过白色的镇压与报复，这地方的组织与斗争必然要推迟若干年都没有希望。这样的游击战争，真是断送革命之最有效的方法。

赤卫军是城市工人武装暴动时的群众组织，红军是工人取得政权后的军事组织，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工人都还在反革命势力统治之下被压迫着动挣不得，我们的党不把力量集中在这方面，刻苦工作，而因利乘便的在离开政治中心的乡村中，纠合一些土匪散兵以及失业农民，冒称红军。想用这样的红军来“产生”革命，而忘记了真正红军乃是革命产生的。苏维埃是工农群众斗争高潮中所涌现出来的公开组织，现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现在上海租界秘密召集，只此已充分说明其性质与作用，先进国许多制度，一到中国便有名无实，现对所谓“红军”及所谓“苏维埃”也是这样，这才真是“中国式的特点”呵！

中国革命之再起，主要的是靠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来决定，单是统治的资产阶级内部纷争动摇是不够的。游民无产阶级固然不是工人革命之卫军与支柱，即农民虽然在农业国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然它们从来不能有独立作用及独力的成功。尤其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的社会，只有两个阶级(有产与无产)的力量决定一切。在经济生活上，农村已走出了自足经济时代而隶属于城市，离开了城市，便根本不能自存；农村的多数武装队及政权，更无法日久维持其独立的存在。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来领导，农民暴动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走到反对工人

阶级，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权，彻底的土地革命是不会实现的，没收一切土地不但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办不到，即农民暴动也办不到，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余的农民暴动，都只是为富农即乡村资产阶级开辟了道路。列宁说："分析目前革命中的阶级对比，是革命政党主要任务。"目前中国城市工人斗争中所表现的阶级力量对比是怎样呢？叛徒们说：

> 现在全国的罢工潮流不是在汹涌的向前发展么？不是日益脱离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而走向坚决的革命斗争么？上海、天津、青岛、唐山、哈尔滨、武汉、广州，到处暴发巨大的罢工，这正是中国革命浪潮复兴的主要象征。(见第七十一期《红旗》)

如果真是这样，革命高潮即在面前，我们便应该集中全力准备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为什么反而跑到乡村里组织土匪溃兵和失业农民的"红军"呢？其实我们的党在城市中还很软弱，统治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加紧向工人进攻：加时，减薪，开除工人，掉通班，严定厂规，具保结，不断的雇流氓巡捕毒打工人(如最近上海的永安、新怡和、申新第七厂)，以至不断的枪杀工人(如最近上海的安迪生电泡厂、祥昌棉织厂、三星棉织厂)，而工人的斗争还未曾由防御走到进攻，由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主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自从遭遇了上次革命之严厉的失败，至今尚未恢复其组织，不但工人还没有自己的工会，即国民党黄色工会也没有群众。两年以来，对于资本进攻不断的经济罢工，大半因为是无组织的斗争而失败。史大林派的盲动政策(每个小的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大的政治罢工)，更是加速其失败，加重其失败；因此工人群众往往自动的斗争起来而不愿意接近共产党。在金价米价日渐高涨的现在，工人经济斗争早迟必然要普遍的起来；然对此方兴的斗争，若加以过分的估量，以为即此已是革命复兴，而采用盲动政策来领导，会铲除此方兴的斗争之萌芽，而延迟革命高潮之到来。叛徒们自己也并不真是相信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复兴已经可以领导农村的暴动，他们自己也说：

> 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充实，尤其是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

就是史大林派的国际也说：

> 赤色工会的大多数（其实那里有半个赤色工会！）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还是很大，国民党改组派在（北方）黄色工会里尤其有影响，共产党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里的工作，还没有认真的实行，共产党还没有能够在生产里，把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共产党当然是更加没有解决。（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信）

城市中既然还没有群众的组织，党的组织力量也不健全，更未能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并未能团结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在党的周围，在这样状况之下，怎样会有工人革命高潮来领导农村暴动？怎样会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说有共产党的领导吗？离了工人群众的组织，共产党还有什么？说有全国总工会领导？全总之下有几个工会呢？差不多全总就是罗章龙，罗章龙就是全总。说有共产党员在"红军"中做领导工作吗？这不仅如几粒盐放在水缸中不能使水变成咸味，并且日久因生活方式及环境关系，也跟着游民无产阶级化流寇化了。叛徒们现在还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口头上不得不说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游击战争只有获得城市工人的领导——才是唯一的胜利的前途"和"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这类话做假面具，而实际上他们另有一个根本理论和这些门面话完全相反。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的信说：

> 中国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

因此中央第六十八号通告说：

> 固然，全中国革命高潮将要到来之最主要的象征，还是大城市工人斗争的复兴；但继续两〔年〕来的农民土地斗争与红军的发展，的确反证了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决无稳定可能，而且因军阀战争之继续必然日趋崩溃，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目前农村苏维埃与红军之发展是处在极苦的斗争时期，……我们要使这一斗争，不仅单

发展在许多南方乡村，并要影响到大城市。

又这个通告开始便说：

> 自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遭了失败，无产阶级受了莫大的损伤，但在南方的农民土地革命却并未因之死灭，反而因中国党脱离了机会主义的领导(?)，坚决的领导农民作艰苦深入的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于是从湘鄂赣三省的秋收暴动蔓延发展成为整个南方的游击战争，……红军的发展，自朱毛第四军至最近鄂东因大冶兵变而成立的第八军，总共已集中的武力不下五万人，散布在两广、闽、赣、湘、鄂、豫诸省。……这一伟大的革命事实之存在和发展，便连反动统治的报纸都不能予以否认。

第七十二期《红旗》上又说：

> 取消主义者费尽了气力的大声叫喊着：现时中国尚没有革命，中国也就不会有红军。不错，红军是革命产生的，红军是苏维埃政权下的军事组织形式，可是取消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中国现时有的是日在深入与扩大的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的发展上再加上统治阶级矛盾的剧烈，和中国经济的地理的条件，遂建立了布满南中国的苏维埃。在这些苏维埃中，广大农民的游击队伍，各地地方暴动的工农武装(?)以及全国普遍发展的兵变，都在围绕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与扩大上逐渐转变而为红军，这就是取消主义者所不愿了解而且不能了解的事实。

叛徒的理论很明显的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了，无产阶级虽然受了莫大的损伤，然而农民仍能够继续担负中国革命的任务，现在更加上变兵、土匪、神兵、回民、红枪会、大刀会等所组成的“红军”日渐发展，就是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就是城市工人还没有群众的组织，也可以由这班“红军”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来影响大城市，决定新的革命高潮，完成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就是所谓“中国式的特点”，而为反对派所不能了解的。这种由“中国式的特点”所推演出的理论，不但屈服于农民的原始情绪，而且很明显的是“以乡村领导城市”、“以游民无产阶级领导工人”的政策，诚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派所万分不能了解的。

他们这种理论，是有始终一贯的思想，决不是偶然的。中国的革命有为马克思、昂格斯、列宁所未见到的中国民族的特点，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能够领导革命；所以中国的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的组织；所以中国的国民党可以代替苏维埃；以至现在所以斗争能够凭藉土匪、散兵、失业农民所组织成的“红军”，来代替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决定革命高潮。所以从前对工人群众宣传欢迎拥护国民党北伐军，现在又对工人群众宣传欢迎拥护“红军”，始终不是教育无产阶级把解放自己阶级以至解放全民族的使命担在自己双肩上，而是教育无产阶级欢迎拥护自身以外的一种特殊武装势力来解放自己。叛徒们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非无产阶级的政策，将给工人群众和党员群众以很坏的教育，我们反对派若不及时在工人群众和党员群众面前从原则上公开的指摘出来，简直是罪恶！

不错从前国民党北伐军之发展和现在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的“红军”之发展，都是客观的事实；可是我们正因为沉溺在客观事实里而离开了无产阶级之阶级立场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机会主义发生的源泉，机会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不同，它不是毫无理由的空想，它有很明显的客观事实之根据，而且这些客观事实之根据，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应该忽视的。倘然没有很明显的客观事实之诱惑可以资为口实，则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又何至发生机会主义的右派呢？西欧大革命后各国资本主义之和平发展，这是很明显的客观事实，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为口实而曲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西欧机会主义发生的客观原因；在东方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在客观事实上，自然免不了许多这一民族在历史上在经济上所形成的特殊现象，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策略时当然要十分注意这些现象，但若是根据这些特殊客观事实的需要做出发点，而离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阶级立场，必然要走到机会主义。谁不懂得这个，谁便终身不能脱离机会主义的窠臼。

我们再退一步从客观事实上来考察现在所谓“红军”的内容是怎样：

(一) 鄂豫皖交界之第一军，为原有鄂东北黄安、麻城之三十一师，豫东南商城、光山、罗山之三十二师和皖西六安尚在拟编中之一师所组

成，第三十一师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后所成立，有枪五六百枝，兵数一千左右，其中农民成分较多。第三十二师为当地农民团、土匪、富农合编而成，有枪三四百枝，师长及参谋长等重要分子，多是土劣出身；商城县委和该师长勾结一致，曾谋杀党代表，他们用“保境安民”的口号，拒绝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最近中央派黄埔学生某前往接替该师工作，但某以该地纠纷未解决，不愿去冒险尝试，六安附近有二百多土匪（大刀会）一部分民团和少数暴动后失业的农民，合计三四百人，多无枪枝。

（二）湘鄂交界贺龙的第二军，系一色土匪即所谓贺大哥的旧部，人数根本不能确定，这个“红军”向来就没有一点党及农民组织的关系。

（三）赣西吉安一带之第三军，除当地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及醴陵萍乡逃去的农民外，便都是井冈山的积匪和江西警察大队，吉安的靖卫队联防队及金汉鼎部的变兵，合计二三四团和一二两大队约三千人，枪枝与人数相差不远。

（四）朱毛的第四军（略）。

（五）湘鄂赣边之第五军，主要是彭德怀部之变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农民几乎是没有，彭德怀骂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骂彭德怀是军阀，现在彭已火并了王佐等的“红军”，逃散后王佐等的“红军”已树起反共产反彭德怀的旗帜。

（六）鄂西宜昌、沙市一带之第六军，也是些土匪和新一师的一部份变兵组成的，人数及枪枝不详，据《红旗》上说：“这个部队（指新一师）我们可以领导的有枪四千，”又说：“惜旗帜并不能十分鲜明，”又说：“他们还未坚决的扩大游击”。

（七）广西西边之第七军，主要的是俞作柏的旧部，俞军中本有两个大队长是同志，俞军被粤军打败后，这两队之一部份遂退至百色恩隆挂起红旗，不久即为李宗仁的军队所败，退走到龙州，随又被桂军第八师及安南法军夹攻而溃走上山，此“红军”在龙州时，竟有“专杀广东佬”的口号。

（八）鄂东南之第八军，除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外，多属溃兵改编而成，最主要的是独立十五旅，《红旗》盛称十五旅兵变是模范兵变；而据第八军政治部主任报告：初加入的十五旅兵士多数动摇，要求每人月饷

二十元。据湖北来人说：第八军及第五军所到的湖北地方，都不侵犯地主及富农的土地财产，并竭力保护商业，对土劣只勒捐而不杀害。以图经济的生存。

其余另星的红军如：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当地土匪及景德镇附近的溃兵，阳明山之周文所部土匪，四川旷部的变兵，现在都算是"红军"了。此外，《红旗》上所大声呼喊的"红色闽西"，倒还未曾编成第几军，据最近从那边来的一个工人同志说：自朱毛的"红军"侵入后又有省城的政变，闽西各县的驻军调走一空，因此农运和"红军"得着自由发展的机会；可是"红军"大半是土匪，有小部分是溃兵，农运领导者多半是富农及中农，他们的问题得到相当的解决，对于"红军"及"苏维埃"都很冷淡，更不愿参加"红军"，而"红军"及"苏维埃"却竭力保护商人，并出示禁止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这不但代表商人的利益，农民也会有这样的要求）。

综计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它们的现象，已走上内哄、火并，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这都是客观事实，这些客观事实说明了什么？是说明了所谓决定革命高潮的"红军"，这一伟大革命事实之存在和发展，"的确"有它的"中国式的特点"，其实就是非民众直接的武装势力之共同点。

无论从理论上看，从事实上看，这种游民无产阶级的"红军"之发展，都没有决定革命高潮的可能，此时不但党内并且党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因为对统治阶级愤激，遂对于所谓"红军"发生幻想。可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欲望，终于不能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因此，他们的愤激与幻想，虽然有时也利于我们，但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若追随他们的意识，而不将先锋队及整个的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解放出来，而不根据自己阶级的意识估计自己阶级的力量来决定政策，便是无产阶级的叛徒。

没有城市工人革命领导的所谓"红军"，其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部战争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阋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此外不能有别的前途。

我们在这里可以预言：将来所谓“红军”的运动失败了（所谓失败并不一定是马上完全消灭，因为中国的土匪问题是一时不能解决的），史大林派的国际，必然又要归罪于中国党，说他们未能遵守国际的训令，“特别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其实他们教导中国党以“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和“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则游民无产阶级意识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本来浓厚，惯于军事投机的中国党，受了国际指导机关这〔样〕的暗示，自然更加游民无产阶级化、农民小资产阶级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于农村游击战争，自然无法同时“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工作了。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恶，也就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领导之最后破产！

我们的结论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是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绝对不能做我们的卫军与支柱；缺乏土地的贫农，在中外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几重榨取压迫之下，势必起而斗争，我们当然应该和他们有很好的联络，并领导他们的斗争，但仅仅是这个还不是革命的出路；主要的是要加紧城市工人的组织与斗争，必须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峰起（即普遍的政治罢工），才能够得到城市及农村苏维埃及赤卫军的组织，才有转变现有的所谓“红军”的武装为民众之直接的武装势力一部分可能。

四月十三日

1930 年 7 月 1 日 《无产者》第二期 署名：陈独秀



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之序幕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乃是我们的二大首领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携着手第一次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道路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为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起草的致德国支部一封信上说：

> 当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至多只要实现上列的要求时，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革命，使一切大小的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独在一国向前进步，并且还在全世界的所有主要的国家中向前进步，因此使这些国家内无产者的竞争消灭，至少使各种生产力集中于无产阶级者的手中……你们的战声必须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不断革命”的遗教，有深广两种意义：深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阶段，而不断的行向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广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国家，而不断的行向世界革命。必须合深广两方面，才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整个意义。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不断革命论”的战声后六十七年，当俄罗斯二月革命资产阶级一取得政权，他们即力排嘉美涅夫、季诺维埃夫等拘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成见，而坚决的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同时他们把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只看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序幕，始终认为它的成败是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胜负相连的，胜利的第二日，他们即利用苏俄无产阶级胜利之精神与物质，促进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与斗争，我们可以说，十月革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创造了两件财产，一个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个是共产国际。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是怎样忠诚的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整个意义！这本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季诺维埃夫、史大林、布哈林，这班不肖门徒，在十月革命后第五六年，在列宁同志的病中，即秘密结合小组织，企图在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名义之下，背叛了马克思的遗教。列宁同志死后，这班不肖门徒更是大放厥词了。他们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其中心问题是反对他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确实抓住了中心问题，然而正因此他们背叛了马克思遗教的罪恶，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季诺维埃夫、史大林、布哈林，这班不肖门徒，他们由讨论苏联内部问题上，造出“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为依据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取政权的可能，这样的观点，也是由“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的。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不但过去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应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为限，即将来的革命也仍旧必须经过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们拿这样机械的阶段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从前他们在十月革命前甚至在十月革命后几个月反对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完全没有两样。现在完全是旧词重弹。他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阶段论”，无论在广的方面在深的方面，都很明显的背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遗教。他们企图用宣传的力量，把“不断革命论”说成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只可惜他们没有力量烧尽世界上所有留存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这封信。

史大林派妄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之不同点，是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跳过了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政权的阶段，这完全是曲解，是抹煞事实。当一八五〇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那封信时，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还未得着政权，还正在企图革命，所以马克思那样说：一九一七年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社会革命党）和一九二七年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国民党左派），都已经得着了政权，不但都已经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而且都已经公开的反对革命了，这能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跳过了不应跳过的阶段吗？若说

他跳过了完成民主任务的阶段，那末正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巧妙地跳过了它，才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才能够彻底完成了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正因为史大林、布哈林不敢跳过，使中国革命惨遭失败，完成了中国反革命。

当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由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而放过了，此时龙迷那兹和瞿秋白忽然大叫“不断革命”，然而他们所叫喊的“不断革命”仍然没有走出所谓民权革命的范围，仍然没有放弃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他们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只是他们的“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盲动主义，正是这个“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所产生的。史大林和布哈林反对龙迷那兹和瞿秋白的“不断革命论”，而却承认了他们的“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这便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十足双全的表现。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拥护十月革命，首先必须拥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一脉相传的“不断革命论”，因为它是十月革命的灵魂；同时必须打碎史大林、布哈林、季诺维埃夫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和“阶段论”，因为这是伤害十月革命的魔鬼。

1930 年 11 月 10 日　《无产者》第五期　署名：独秀



答列尔士同志[①]

仁静同志：

你的两封信及四篇文章都早已收到，只以种种障碍未能即时答复你，请你特别原谅。

统观你的信和文章，固然有些见解我不能赞同，但在每篇文字中都感觉到你有可惊的进步，至为欣慰。

我们过去的争论，本来不十分重要，我以为只要大家理论水平稍稍增高，便自然冰释，犯不着把我们中间咬文嚼字的争论来代替对史大林派的斗争。就是需要争论，也必须大家摒除成见才有结果，否则徒增纠纷而已，所以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现在你也认为过去的争论有些是"基于误会"，"有些是说法不同，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我以为现在已到了稍加解释作一结束的时候了。

国民会议是否幻想的问题　我记得彭(述之)尹(宽)二同志曾说：由国民党召集民主的国民会议，这是幻想，并以为任何国民会议都没有召集之可能。但因此便把他们的论调和"我们的话"[②]所谓"国民会议之实现在今日是不可能的"之说相提并论，这完全是误会。我们所谓"对国民会议本身不能有幻想"，即是说不能幻想国民会议能够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你们也误会是我们不主张在国民会议的口号之下为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斗争，甚至说我主张："在会议中只提出土地政纲……并不提出工人阶级本身利益及要求。"

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问题　把"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和"无产

---

① 列尔士(Lels)，是托洛茨基为刘仁静起的假名。

② 1928 年 1 月初，梁干乔等被苏联遣送回国，在上海成立第一个托派小团体"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设立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1929 年 4 月 16 日，"总干"创刊《我们的话》，因此，该派亦称"我们的话派"。

阶级专政”看做是含义不同的两个对立的口号，实自你起；继而“我们的话派”“十月社”①都几乎把这个问题当做不能和“无产者社”统一的基点。一直到最近协议委员会纲领起草者，仍然指谪“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是反动的或含义模糊的口号。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算是攻击“无产者社”，而是诬蔑列宁和托洛斯基同志；因为列宁和托洛斯基同志不但生平未曾用过反动的口号，并且从来不说含义模糊的话。你现在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相当的了解，然尚不充分。在布尔什维克文献中，由工农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在政权构造之阶级关系上，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在列宁和托洛斯基同志的著作里，所有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其实际内容都等于“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贫农专政”的意义，决没有什么“工农平分政权”的意义。我们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意义与内容了解它，若以常识了解它，会变成另一意义，或毫无意义，例如多数派及苏维埃这两个名词，只有了解其特殊内容才有意义。你现在重复细看我的原文，并且在原文中发现了“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句话，才承认：“这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实际已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过去之反对此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以为你的了解尚不充分，不然，就仅仅是你前后感情冲动有了变化。

过去教训的问题　这本是我们永远不能忽视而需要讨论的问题。你所发表的文字，关于这方面最多，不过我以为有以下的缺点：首先就是你的讨论精神不重在过去的教训，而重在攻击个人，因此把过去的一切错误说成和国际没有关系。其次就研究过去教训看，不但不充分，而且缺乏系统。最不妥当的是许多非事实，例如因为你在北京批评党报的政治路线要开除你，我撕碎童子团的简章等等。

现在对于这些问题，已没有争论的必要；然而我们之间是否已经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呢？我以为仍然是有的，我现在举出两点：

一、关于国民会议的认识问题　我认为从孙中山国民会议预备式的国民会议到法国大革命中的“康文汹”，其本身性质都属于资产阶级

① 1930年3月，刘仁静、王文元等创刊《十月》，因此这一托派小团体亦称“十月社”。

的议会制度之范围。在反革命时代，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为此实现和发展而斗争，然而这不是我们的前途。你过去以为“提出了国民会议的口号没有将它与中国将来的议会制度发生联系，这是没有前途”。现在又听说你以为“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如果你真有这样的说话，则我以为你对于国民会议的本身性质始终都没有正确的认识。

二、关于将来的革命性质问题　就整个的革命性质看，将来的革命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不待言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得到胜利之前，无论经过若何事变，即使蒋介石政权被推倒，总只能有他派国民党或非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权。所以史大林派“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在反革命阶段中是幻想的，在革命阶段中是反动的。托洛斯基同志说：“第三次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是否得以别样更缩短的形式重演过去的‘全民战线’，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一时期将只是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其‘四月大纲’于民众的面前，就是说提出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照这样的说法，则机械的断定“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自然有把社会主义当做一种教条的错误。你指出这种错误，特别是指出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机械的对立之错误，我以为你是对的。但你以为蒋介石政权与无产阶级政权之间，“将是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这便有讨论之余地了。以克伦斯基政府本身的反动性而论，现在的蒋介石政府，即是在中国更成功的克伦斯基政府；以阶级间相互关系而论，克伦斯基政府，是表现政权由封建沙皇转移到资产阶级，其间小资产阶级政党还有很大的作用，我以为这些情形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如假定还会有，即不能根本排除“工农民主专政”短期实现的可能性之存在，我去年夏天做的《论中国革命性质》①那篇文章，中心意义正是反对下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机械的见解。现在看起来在这一点还是对的。不过那篇文章的结论说：“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不是两个阶级在两个时代所领导

① 此文未发表。

的两次革命，而是无产阶级一手在一个时代两期所完成的一次革命”。这段话下一句还没有什么大毛病，上一句则不对了。因为俄国的十月革命亦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还只是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且这一任务只是在这时期才完成的，二月并未完成，正不必机械的以十月代表社会主义革命，以二月代表民主革命，更不能以初期的革命任务变更俄国十月革命的阶级性，将来中国的十月革命也是这样。你现在赞成我以前二月十月之和的意见，以为中国下次革命的初期还要经过二月，我倒不能赞成了。

是不是因为还有这些不同的意见我们便不能共同工作呢？不是的。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了，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若要参加工作，我想各派都不应该拒绝你。

你说：“现在反对派运动的离心力倾向太利害”。你言之沉痛，我闻之也沉痛。你并且承认过去之分裂与你不无关系，我以为现在有向你进言的机会了。你回国时负了组织工作的重任，我对于你怀了莫大的希望。当时你若不中途惑于正统的见解，即令大家争论无结果而诉之国际，现有的局面已实现于去年今日，可惜你不曾这样做，致令反对派的小组织不但未能由两个变成一个，而经过你的奋斗由两个变成了三个，并且几乎变成了四个。现在你应该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我所谓努力，并不是希望你另外团结小组织来增加统一的纠纷，而第一是对于统一的共同纲领及组织路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第二是奔走尽力消除各派间不正当的成见与琐细纠纷。

你的文章因技术关系不能代你全数付印，至希原谅。

C的敬礼！

独秀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　《无产者》第9期

国际路线与中国党

最近党的统治机关内，瞿秋白在大嚷“反对李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口号之下，打倒了李立三；永久派又在大嚷“肃清李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口号之下，打倒了瞿秋白以及瞿秋白所领导的三中全会；他们内部并争的污糟及其斗争使党所蒙的损失，现在且不必讨论，我们所需追问的是：这样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闹不清楚的国际路线，究竟有什么深奥难测的秘密？

史大林派的国际领导中国革命之向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失败之后，一变而为向左的机会主义即盲动主义冒险政策的路线。自从在第六次世界大会否决了过渡时期的民主口号，它一向就是指导中国党，“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我们的面前是二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现时暴动路线是应当存留的”，“准备武装暴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国际代表在中国党六大的政治报告），“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六大政治议决案），“目前是大战后的第三时期……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工人革命运动新的浪潮已正式成熟”（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十次全执委会议的政治决议案），“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之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个革命的口号……就是群众政治罢工”（莫洛托夫在第十次全会的演说），“中国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要多份的注意士兵运动的工作”（一九二九年十月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的信）。史大林派的国际这一盲动冒险路线之错误，我们左派反对派老早就不止一次指出过，他们因此诬蔑我们为取消派（例如陈绍禹认为批评“党在政治上非常危险……是过于注意准备武装暴动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而忽略了甚至放弃了经常的宣传，煽动和组织工作未注意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是取消派的见

解——见《红旗》第五十六期)。在红军问题上,我曾经说过:我们在这里可以予言:将来所谓"红军"的运动失败了,史大林派的国际必然要归罪于中国党,说他们未能遵守国际训令,"特别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其实他们教导中国党以"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和"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要多份的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则游民无产阶级意识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本来浓厚,惯于军事投机的中国党,受了国际指导机关这样暗示,自然更加游民无产阶级化,农民小资产阶级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于农村游击战争,自然无法同时"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工作了。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恶,也就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领导之最后破产!

一直到中国党执行国际这样的盲动冒险路线不断的失败和多数的损失之后,一直到中国党中央政治局在本年六月十一日所议决进攻长沙(当占领长沙时,莫斯科《真理报》上,大呼中国农民战争胜利是给予托洛斯基主义以打击),会师武汉的企图失败以后,它才感觉得到在这一路线所必然产生的实际政策行不通,才不得不开始转变。然而转变以前过去盲动冒险政策所招致失败和损失的责任是应该谁负呢?它便轻轻把这个责任推在中国党身上,说这和国际路线有原则上不同互相对立的"李立三路线"之错误;这分明是企图把中国党员群众二、三年来感觉盲动主义冒险政策行不通的积忿,从现在的怒目集中到反对所谓"李立三路线",牺牲李立三及其追随作众矢之的,好让国际偷过难关。现时党内闹得轰轰烈烈的"反对李立三路线运动",其意义只是如此;这一简单明了的运动,闹得像现在这样混乱不清,其原因亦正在此。

国际指出所谓"李立三路线"的整个系统,是说:李立三同志并不是从对于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的,并不是从对于斗争力量对比的分析出发的——这样的分析,对于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必要的责任。因此,他所做〔犯〕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他造出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脱离了具体的

事实，脱离了群众，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发展之中引导到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从这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就发生了一种理论，说中国已经有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并且这样的革命形势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也已经成熟了。……

这分明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这一公式在中国实际应用，愚蠢的李立三那里会有他自己的路线！此外国际又指出李立三的政治路线之危险和害处：第一，他没有估计到国内各地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特点；第二，他忽视了农民运动高涨超过工人运动这一个事实；第三，他曾提议在武汉暴动；第四，他不去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府坚强的苏维埃政权，不去组织团结革命的根据地，不去联合苏维埃区域以巩固已得的胜利；第五，他不明白真正工农红军，其指挥的干部必须是工人，和须有强固的党之骨干，现在还没有；第六，他看轻了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而在四月里号召四次综〔总〕同盟政治罢工，五月里号召五次总同盟政治罢工……赤色工会也专去准备暴动。

在没有“全国范围的成熟革命形势”之现在，想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府坚强的苏维埃政权，想巩固某些区域已得的胜利，这里史大林派的国际已明明白白说出它自己想入非非的幻想，还指责什么“李立三路线”！一年以来，各国史大林派的机关报充满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消息，何以直到今天才发觉真正工农红军现还没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只在传单里只在纸上？革命形势一成熟必然是全国的，我们不能懂得革命形势怎样会仅只在一个地方成熟；同时，我们也不懂得为什么必须国内各地革命运动都有了平衡的发展，才算是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之成熟。只要有当时的主要阶级领导革命运动，在一个或几个有支配全国政治经济作用的大都市爆发起来，能够影响各地革命运动向全国范围发展，例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巴黎暴动，一九一一年中国的武昌暴动和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彼得堡及莫斯科暴动，这就是全国革命形势之成熟，也必须这样才是全国革命形势之成熟，并非必须机械的计算革命运动在全国各省各县各乡村都平衡的发展起来，才算是“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李立三企图把几个农村区域的暴动，夸大为“全国

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这企图失败了。史大林派的国际，便企图在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特点”之下，夸张“革命运动可以在好些省份好些区域得到胜利，并且已经胜利”，以创造其“一个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新学说。这两个方面错误的形势虽然不同，而有一共同点，即是：忽略了无产阶级领导和都市的中心作用。无法在武汉暴动，便缩在农村中，依靠非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并巩固割据式的苏维埃政权，这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史大林主义？国际既然指导中国党以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中国党自然会走到看轻工人阶级日常斗争的道路；国际既然发出“政治罢工”和“准备武装暴动”、“准备组织暴动”的口号，何以中国党一执行，就变成了必须彻底肃清的李立三路线？

国际所指出的“李立三路线”许许多多错误，和罗迈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所指出“李立三路线”更多的错误，我们左派反对派都早已一一指摘过。可是在今日以前，党的统治机关，把这些显然毫无疑义的错误，都肯定为“绝对正确”，不许党员有丝毫异议，两年以来，有许多同志是因为反对或怀疑这些错误而停止工作，甚至于被开除出党，更甚至被诬为“取消派”、“反动”、“反革命”、“新工贼”。有许多“李立三路线”的忠实信徒(罗迈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也起来大叫“怎样肃清立三路线”？这班落井下石以固权位的鄙夫，所以还能留在党内，不是因为他反对立三路线，而是因为他懂得“站在国际路线上反对立三路线”这一奥窍。

其实大家必须要明白，李立三许许多多盲动夸大的错误，都是在国际的盲动冒险路线之下所必然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李立三路线”及其实际政策行不通，正是史大林派国际路线之破产！

国际在指责所谓“李立三路线”以后，它告诉我们它自己现在的路线仍旧是“武装暴动的方针是定下来的了”，“中国共产党执行这个路线，不是退却，恰好相反，正是进攻，任务并没有降低，恰好相反，正是最具体现实的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应当用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和彻底性，列宁主义的顽强性，去准备组织暴动”。

国际如果不是在教育中国党的列宁党的特性及其总的根本任务，

我们不知道它从什么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从什么斗争力量对比的分析出发，指示中国党现在已经是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之时期，就要去准备组织暴动！这没有现实性的政治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同样是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这一路线，只有军阀战争再起时再用做军事投机和盲动的根据。否则只有消极不动，因为它没有现实的政治斗争之内容，只是些激烈的名词而已。

现在它的现实政策是：（一）立刻团结锻炼出真正的红军，即使是初只有四万五千到五百〔万〕人；（二）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的根据地而依据着红军；（三）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开展经济政治的群众斗争……动员群众去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四）在非苏维埃区发展游击战争……十倍加强在军队里的工作。在这些实际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缩小红军与苏维埃区域，没有一点新的政策，没有政治斗争的口号，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

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现在所谓"转变"，只是在实际政策上拉住中国党在执行它的盲动冒险的路线时，把范围缩小些，或者完全执行不通时暂时和缓些，和缓时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并没有指出一个根本不同的新的政治路线之转变；这是由于它根本上仍然不认识反革命的现阶段，不认识有指示给中国党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口号之必要，即将来再有进步的转变，也不过是在他整个的机会主义路线之中，以前从右转变到左，将来又从左转变到右，这种钟摆式的转变而已。以盲动反对盲动的现在路线，将来会更进一步碰着墙壁。史大林派的国际路线，当然只有向右转变，即现在的路线已经是在照例的"左倾"空谈的遮盖之下偷偷的向右移动：没有政治斗争的口号，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将来公开的向右转变有两个方向：一是跟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面，参加所谓"反封建势力的民主运动"；一是既没有"苏维埃"和"红军"的运动，又反对做国民会议的斗争，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自然只有走到经济主义。

所以党决不会在仅只反对所谓“李立三路线”和反对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运动之下，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站在盲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这种滑稽运动，固然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并且仅只反对盲动主义，而不反对史大林派的国际始终左右摇摆于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之钟摆式的路线，也仍然不能够挽救党于危亡！

独秀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撰

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　《无产者》第十期

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①]

在国民党以分区工会法消灭工人阶级组织与罢工的今天，在国民党包办国民会议以欺骗群众的今天，在群众得不着我们党一点领导与帮助的今天，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我们若不痛改前非，若仍旧要搜索枯肠，发明一些在其狭猛意识中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条件，来阻碍统一，这是罪恶之罪恶！

国际局及托同志以前迭次对我们劝告且不说，现在单看托同志最近的来信，他十分恳切的说："亲爱的同志，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的合并起来吧！不要太延缓了统一的准备工作，因为不然你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去制造一些人为的分歧意见"，"不应该太过于长久的回顾昨天，不应该止步不前，应该走去迎接明天"，"三派奥国反对派进行'统一'有一年半之久，各派□□的发明一些条件，务使统一失败而后已，这种罪过的玩意儿，不过反映那充满着正式共产党腐败倾向之奥国反对派的一段悲惨状态，奥国反对派每一派在一年中都充分的表现他们宁可放弃国际反对派的思想和原则，而绝不愿放弃各自小团体的自尊心"[②]。这些说话是如何沉痛，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

---

① 托洛茨基见到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后，认为"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并要求中国托派小团体统一起来。此后，托氏及托派国际又多次来信要求各派联合起来。1931 年 5 月 1 日至 3 日，无产者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战斗社四个托派小团体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会议通过中国托派名称，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委员。5 月 5 日，陈独秀被选为书记。

② 这段引文出自托氏 1931 年 1 月 8 日给中国各托派小团体的复信。（见《中国革命问题》第 234 页，1947 年春燕出版社）

他又说："与奥国反对派相反，中国反对派不是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发生起来的，而是从那被机会主义领导机关所葬送的伟大革命经验基础上发生起来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使中国反对派负起特殊职任。这里，我们大家希望中国反对派肃清了小团体的精神，并全身站立起来，去进行它所应负的任务"。这几句话更使我们惭愧无地！

有些同志，在表面上并不反对国际局及托同志的意见，甚至于公开的承认托同志来信主张"从今天起即应合并成一个组织"是很正确的，可是接着就提出一些统一的条件，仿佛是不曾看过托同志这次来信中许多解释和驳斥一样。在现时幼稚的环境中，各个小组织或者是各个小组织中某些分子，很难说能够免掉错误，甚至很坏的倾向，即以"无产者社"而论，若有人愿意搜索它的坏倾向，特别是个人自由的坏倾向，连团体带个人，足够写成一本小册子。这些坏倾向，不用说应该纠正，并应该严厉的纠正。但是纠正的方法，一般都应该首先从政治上下手，从组织上下手，已经落后了一着。况且正在力谋统一运动中，我们为整个的反对派运动负责，就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才是正当办法；若不此之图，并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实，相互以纠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坏倾向为统一的条件，并且各自号召其组织内的同志为这一条件而斗争；这样只有制造无穷的纠纷，只有加深派别的成见，只有使还未统一的现有各派更加分裂(现在已有这样的象征)，采用这样方法坚持这样意见的人们，即令他们口中不反对统一，即令他们口中不反对国际的意见，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站在统一和国际意见的反面。

或者有人这样想：国际不懂得中国的情形，像现在这样的统一，实在要不得，如此则应该一面向国际力争，一面还是积极的执行国际的意见，我们国际主义者，只应该取这样的态度。

或者有人这样想：向国际力争也未必有效，所以现在不必说空话，只要能团结一部分群众在我们的背后，那时向国际说话便两样了，国际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了。如此则完全是李立三对斯大林派国际的态度，是以市侩自居，并以市侩看待国际局，左派反对派行伍中如果真有这样思想的人，那便是莫大的污点！

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应该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诉所有的同志，并且为真理奋斗，我的义务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愿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张国焘和瞿秋白在旧党里所做过的大买卖，而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

署名：独秀

1931 年 2 月 《无产者》第十一期



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

因为协委[①]第一次纲领草案有“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句话，引起了刘仁静同志的驳论，接着第三期“十月之路”和二十三期“我们的话”对仁静同志的驳论都加以反驳，像这样热烈的政治争辩，无论它本身是幼稚或是深刻，都算是我们队伍中最好的现象，虽然争辩的态度中还有些非科学的方法。无论如何，我们的进步只有由堂堂正正的政治争辩得来，不能由作政治的相互诋毁得来，至于从组织上弄阴谋诡计小把戏，更是自杀！

我以为这回争论自始就不该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这样的题目。因为这一问题在我们左派反对派中已不应该讨论，并且事实上在大家争辩的文件中，都未曾否认中国将来第三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定论，只要大家不用枝节之词或是用整个革命的性质把问题弄混乱了，我以为争点很明显的是在“引起将来革命的因素是什么”，“是否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是否在最初阶段还会经过民主时期”，“在什么时候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这类问题。所以我现在只提出“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这样的题目来讨论，并且我认为在托洛斯基同志的文件中，已有相当的解答了这类问题。

一、“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完结自己的民主革命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极重要的特点……[②]在殖民地国家因土地问题之尖锐和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

① 1930年10月，“我们的话”、“无产者社”、“十月社”和“战斗社”(由赵济等刚组成不久的托派小团体，出版有《战斗》刊物，故得此名)派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商定四派的统一工作。

② 省略号是原有的。

权”。(不断革命论)

二、“革命民主运动达到一种阶段,那时蒋介石已经不能拿住军事机关在其手里,而共产党人也不能够夺取政权,革命发展的这种过渡阶段,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个时代,将产生一种中国式的两重政权,新的‘临时政府’,国民党和第三党联盟等等。这种政制,将是非常动摇的,这种政制不过是到无产阶级专政去之一个小小的阶段,但是这种阶段是可能的”。(最近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

三、“第三次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是否得以别样更缩短的形式重演过去的‘全民战线’,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一时期,将只是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其‘四月大纲’于民众的面前,就是说提出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

四、“第三次革命(虽然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些)连像俄国十月革命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而将于开始时就要坚决的动摇而且推动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同上)

在托洛斯基同志对中国革命发展前途这些远景的观察这些历史的假定中,我们可以得着几点结论:一、在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中国,民主任务仍然是能够引起将来第三次革命之因素,这一革命因素,不但不能用做第三次革命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由,并且反而正因为有这一因素,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所以能够比在先进国家早些获得政权。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可以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上获得政权,便不能否认在将来革命高潮之最初阶段中会有很短的民主时期和两重政权之可能。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史大林派“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整个时代”的见解,便否认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中任何小的过渡阶段。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高潮之最初阶段中,即应提出其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在革命暴动之胜利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开始,即应和完成民主任务同时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连像俄国十月革命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

这也就是我对于中国将来革命发展前途的估计和意见。

因此,我以为像有几个同志所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

的性质”这样的客观估计，是未必和将来的事变进程相符合的。同时，像仁静同志所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民会议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任务，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落后国家，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是外壳与内实之关系……[①]真的国民会议，必与无产阶级专政之实现同时，而成为后者被去掉之外壳”。(《明天》[②]第三期)我以为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托洛斯基同志在论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就说过：“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将是完成民主革命，但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自限于民主政纲，他将不得不跑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自传)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性，国民会议无论“算”到如何的程度，也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二者之间有阶级性的根本分歧，如何能说只是外壳与内实之关系！

仁静同志在另一文章中，曾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话：“落后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在我们时代直接的引到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乃将社会主义的任务置之于议事日程”。这样说法，便完全没有毛病了。

中国的革命“是以民主要求开始，而以社会主义终结。”仁静同志这一总的结论我以为是对的；张霆同志也认为“这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张霆同志接着又说：“我们同刘仁静的争论，都不是这一问题，而是在这中间——自民主要求开始至社会主义终结——是否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时期的问题。”刘仁静回答我们：还要经过。又如王文元同志说：仁静主张“先单独解决民主任务，然后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是在我所见过仁静同志的文章中并没有这些话，如果根据仁静同志“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民会议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任务，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这类说话，和他始终把补助的暂时的引导至革命道路的民主口号，当作我们的前途或目的，批评他有因反对轻视民主斗争而走到另一极端的错误，这却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张霆同志虽至今尚坚持“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

① 省略号是原有的。

② 1931年1月1日，刘仁静一人独自成立“明天社”，创刊《明天》。

命”。然同时却又说：“我们肯定的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即应采取夺取政权的路线。”王文元同志最近也说：“所以我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要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劳他同志也说：“究竟第三次中国革命‘一开始’时，我们应不应该即坚决的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呢？如果是应该的，那么革命的‘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他又说：“如果我们一方面拥护这条路线，同时又反对革命‘一开始’时是这条路线，这是非常滑稽与不合理的。”同志们！我们要注意：客观上天然的一开始“就是”和主观上党的路线一开始“即应”“就要”，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们讨论问题时，必须把客观的估计和主观的主张分别开来，才免得论点的混乱，更不可把别人的客观估计指为主观的主张。如果是从主观上说即从党的路线说，在今天即应肯定的说：“我们的战略之总路线是在夺取政权。”如果单就主观说即是单就党的路线说，至少我们的党是从去年六月十一日已坚决的采取了夺取政权的路线，并且在此以前早已有了所谓“苏维埃政权”与“红军”，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已经开始一年多了呢？在我们的主观上，在我们的战略之总的路线上，当然不反对夺取政权，当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然而我们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派的争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不但张霆同志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以民主要求引起……这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王文元同志他不但说“新的革命运动虽然是一定的民主口号引起”，并且说“多半还要在这种口号之下夺取政权”；劳他同志也说，“我们丝毫也不忽视中国革命是以‘民主要求’为开始”。我不懂得怎么同时又都会坚持“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类的客观估计呢？

最奇怪张霆同志说：“我们即或□然的与资产阶级联合成立克伦斯基政府。”王文元同志也说：“到底在将来中国革命事变的发展中是否会有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发生？我们的回答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谁也不能说在第三次革命中决不会有。”劳他同志也说：“在将来中国革命中要‘在苏维埃基础之上会产生一个俄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麦克唐纳尔式的政府……它的存在只能是：一个很短时期……就是向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个小的阶

段。”无论是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也好，麦克唐纳尔式的政府也好，总不能说它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气味。只要不能绝对否认它会在将来中国革命中发生的或然性和可能性，即令是一个很短时期，是一个小的阶段，我们便不能肯定的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十月即社会主义革命。”

张霆同志和王文元同志，在纲领草案的讨论中，都曾坚持要写下这样的一句：“真正的国民会议只有经过武装暴动来召集。”到了举行武装暴动，则革命之发展已经不是最初阶段，而是最高阶段了。国民会议无论“真正”到如何程度，也说不上什么社会主义，这样又怎样地会说“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呢?

反对派肯定的说，“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不是等于否认整个第三次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呢？我以为不是的。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引起革命开始的因素，也不在革命发展之最初阶段是怎样，也并不仅仅由于革命党所采取的路线，而是实际斗争的发展达到那一阶级的政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第三次革命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仰还是民主专政的胜利，这是决定第三次革命性质的唯一关键。

“资产阶级的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放在自己的肩上。”这是不断革命的路线。倘然有人说，“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放在自己肩上”，这不但无所谓“不断”，而且也太滑稽了!

倘然有人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夺取政权的革命暴动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真理!

1931 年 3 月 15 日 《无产者》第十二期 署名：独秀

致蔡元培

孑民先生函文：

在报上见先生病后已复康宁，至为喜慰。兹特恳者，前承盛意，致函军政部请释放中央陆军监狱郑超麟一事，至今延宕未行。顷据人云，此事非有先生亲笔信，恐难生效。不审先生已完全康复，能为郑生作一短函否？闻该监狱近来保释之人颇多。酷暑中续求，惶恐无似。

专此敬祝

道安

独秀手叩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据手札）



中国将往何处去？

大半个中国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大水灾，为现在活着的中国人所未曾经见；而国民党政府之筹划赈款，对于富有阶级没有一点断然处置，并且对于立法院所通过的八千万元公债，表面上勉强替□，而事实上另出花样，即是以五千万元向美国购麦，一面买美国帝国主义的欢心，一面宋子文又从中做一大批买卖。蒋介石力争赈款要归财政部保管，更明显的是为了便于派用到军费，实际用到灾民身上的不知有几文?!

对于万宝山及朝鲜惨案，只有国民党政府官样文章的抗议和资产阶级滑稽的排货，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被国民党军阀枪尖压□□得抬头不起；至使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得寸思尺，藉口中村事件要出兵满洲(见九月十二日上海《新闻报》北平电)，又吉林日领事公然重提二十一条件的问题(见同日《□□□》哈尔滨通信)！

天灾外患，如此紧急，国民党一概不理，他们的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还是要调动海陆空大军到湖南开战，使湖南人民未死于水灾的仍要死于炮火。

天灾外患，如此紧急，国民党一概不理，他们仍然继续在江西屠杀农民，据他们自己的□□，今天杀了□万，明天又杀了八千；匪尸横山，流血成河，遗尸□七八千具，伤者不知其数。(见九月十二日《新闻报》□□□)

赈灾之□如此困难，而国民党政府却有巨款向美国大购飞机、炸弹及枪炮，运往江西、湖南，去残杀农民和兵士！

这样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引导中国将往何处去?

近见上海《申报》载有一篇未署作者姓名的论文:《中国经济学社当前之巨责》，这位国民党党员或准国民党党员的作者，他在第一段中分

析世界资本主义现状及其前途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殆即将于第二次大战中决定其命运，而新世界或亦即于是时蜕化而产生"，而在第六段中分析中国经济前途即中国将往何处去的结论是"遵循其旧轨（指资本主义）适足以回归于没落之陷阱……①又绝不容依附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之系统，孙中山先生于此曾昭示吾人以光明之大道，对内以土地革命铲除封建残余，使中国经济得大踏步向前发展，对外则以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使中国经济得以自主自立，而其归趋则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之民生主义经济之前途。"

这一篇话，我曾经亲耳听见另一人说过，即前一段是戴季陶前半生说的，后一段是他后半生说的。

我现在简单的答复这位作者和其他抱同一见解的人们：

一、第三国际的叛徒们所谓社会主义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之初步，必须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归之社会公有。

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企图向列强争得对中国资产阶级让步，所以他不是"以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使中国经济得以自主自立"，而是欢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他的民权主义，是鄙薄人民程度不够，必须俯首承受国民党的训政，才够资格；所以吴稚晖公然讥诮人民是"阿斗"，他的民生主义，并不是主张土地革命，而是主张要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并且说："对□外资本制度，只能逐渐改变，不能够马上推翻。"

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并不是如邓演达等所说，蒋介石违背了三民主义。

四、中国要对内实现土地革命铲除封建残余，对外实现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城乡，一切劳动贫民来担负这个责任，三民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已经站在封建残余和国际资本主义之反革命的营垒中了。

五、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要铲除封建残余和打破帝国主义束缚，同

① 省略号是原有的。

时也要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自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民主主义的胜利。

在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这种离奇的见解之外，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见解，以为中国经济落后，还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的革命，例如，《新社会》杂志记者讥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革命点金术（□□□出版的《新社会》杂志第二期，他们的论调和《中国经济学》□□□□□□的作者很相像，我还疑心他们是同一集团的分子）；又另一极端的见解，以为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例如"中国经济研究"著者任曙同志。二者根本错误的共同点，都是从纯经济观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斗争出发；都是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整个的世界革命出发；都是从革命阶段论出发，而不是从不断革命论出发。

像现在三民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不但说他归趋社会主义的经济前途是错误的，批评它没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也是滑稽，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它也没有，有的只是军事独裁和训政。根据孙中山反动的五权宪法，恢复了帝制时代的御史（监察院）与科举（最近考试院竟举行主考入闱金榜题名，开科取士的大典），如通令各学校一律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再以"匡正人心挽救颓风"；如此等等国民党秉承其先总理遗教"仁爱"、"和平"，屠杀了无数革命工农与青年志士，在不断的内战中牺牲了无数兵士与平民，如果他们当中的内战不停止，连他们的资本主义之发展也是极有限制的，他们将引导中国往何处去？民气销沉，青年颓废，封建残余的旧势力旧思想旧道德及一切反科学的迷信，仍旧笼罩着全中国，国际帝国主义加紧束缚与压迫，大多数人民加紧贫穷化，这已经是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一幅明显的画图！

在历史的先例中，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倘不能发展其经济巩固其政权，如一八四八年的英国和德国，则一直线的反动会像一八四八年的法国，不独革命的工人站不住，不独温和的民主党亦站不住，最后连最反动的秩序党也站不住，中国的秩序党——国民党的政权，将被推翻于革命的民众，或将被推翻于代表北方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北洋派，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征象可以断定，无论将来是这样或那样，以民主

主义的狂飙运动扫荡南北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这一革命旗帜，乃是此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明白确定的。

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各党派，无论是北方的张阎冯或是南方的蒋介石胡汉民改组派第三党，他们口里说的或者有多少不同，而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同样是军阀或军阀的秘书，同样是反民主主义的，同样是害怕民主主义的。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之民主主义运动的任务，已落在无产阶级身上了，中国无产阶级愈能努力于民主主义的狂飙运动，它跑上权力地位将愈有保证，民主主义运动前进一步，中国资产阶级政权将动摇一步，决不是如史大林派所说民主主义运动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

资产阶级政府和农民的冲突，资产阶级内部冲突如现在已开始的湖南战争和传说中的北方大变动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这些事变都很明显的是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以发展民主主义运动最适宜的机会，也很明显的只是发展这一运动的机会。从前史大林派白睁眼而放过了许许多多的机会，是再愚蠢没有的，现在不容我们再放过了！

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不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是玩弄空洞好听的名词，而有它的实际内容：取消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与权利，打破它对中国之束缚与压迫；实行土地革命，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贫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完全自由；停止军阀战争，驱逐军事独裁者；召集直接平等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建立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政权。

我们要请问史大林主义者：在国际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束缚压迫和军事独裁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拼命屠杀农民压迫工人取消人民一切自由不断战争的中国，无论还没有城市苏维埃的现在已有苏维埃的将来，我们不提出这样具体的民主口号以号召集合民众的政治斗争，而应该提出什么呢？苏维埃不在这样一类的具体的民主口号之下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难道在没收一切私有财产的口号之下夺取政权吗？假使蒋介石的政府为南方的改组派或北方的军阀所打倒，他们都会拿出“民主政治”、“立宪政府”这类□□来欺骗民众，这

时候我们不提出这样具体的民主口号来揭开他们的假面，而应该提出什么呢？

我们又要请问一班对资本主义怀疑而又留恋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知识分子：三民主义□引导中国将往何处去？我们共产主义者引导中国将往何处去？我们是不是“革命的点金术”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

1931年9月28日 《火花》第二期 署名：独秀

抗日救国与赤化

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暴行之“不抵抗”和“力持镇静”的政策，已为国人所厌闻了。然而一班国民党官僚和官僚御用的所谓大报（如上海申新时事报等），还时时徒其余窍中放出一种对“不抵抗”和“力持镇静”巧为辩护的论调，即是说：日本蓄有挑衅阴谋，我方若不退让，则正为彼之诡诈所动，致堕彀中。不错，世界第一等聪明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前次对于济南事变的挑衅，这是第一次未堕彀中；对于万宝山和朝鲜惨案的挑衅，又第二次未堕入其彀中；此次对于满洲事变，乃第三次未堕其彀中；将来日本在上海在南京挑衅，当然仍不至堕入其彀中；中国的领土与利权终有限制，日本的阴谋挑衅永无止期，我方永远退让，当然永远不至堕入其彀中；日本正欢迎中国这样永远不堕其彀中！

有些自以为善于取巧的高等华人，当然会赞美这种永远不堕其彀中的亡国政策，我们很呆的人，认为只有由广大的革命民众力量，绝不退让的立刻应战，持久的应战，终获得革命的胜利，否则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退让又退让，终要退让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割取蒙满及其他地方，引起帝国主义在中国战争，瓜分全中国；此外，没有第三种前途。

中国评论记者认为：“反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博得中国人民欢心的最好方法，并且吸引中国到共产主义的方面；布尔扎维克化的中国，即布尔扎维克化的欧洲甚至美国的先驱。”这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宁肯对日本退让而不愿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抬头之真正心理；由此心理出发，才会有力持镇静的政策和不堕日本挑衅之彀中的妙想。

颜惠庆对美国人说：“中国目前唯有两条路可走，一、遵守国际公理，以素和平之精神与奋斗；二、迫不得已，则与共产主义的国家合作；前者非友邦各国予以正义的有力的帮助，恐难得最后的胜利，后者殊非中国人所乐为。”他也认为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是对的，但是他所说的

第一条路不是“此路不通”的路，便是引导“瓜分中国的路”，最后之胜利当然不会属于中国；他所说的第二条路，自然非中国资产阶级所乐为（他们主要是！只放出一点这样的空气，想吓帝国主义，得点帮助或让步，颜惠庆的说话，便是这种心理），中国人民是否乐为，自有事实答复颜惠庆。

过去的事实：中国的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共产主义的国家——苏联援助之下，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运动中，迫得帝国主义不得不增加上海租界的华董，不得不应允召集关税会议和修改税则，香港几乎变成了荒岛，无条件的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租界，这一点小小赤化的成绩，是每个中国人民都还记得的。在这一小小赤化的时期，中国只有所得，虽然很少，却毫无所失。或者只有北洋军阀失去了政权，资本家和地主失去若干历史的威权。所以，我们敢断言，赤化是全中国最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者乐为的，所以不乐为者只有少数的军阀、资本家和地主而已。

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正代表这班军阀、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而反对赤化，自从他屠杀赤化的工农和共产党压平革命以后，摧毁了一切民众组织，只剩下为国民党做留声机器的空洞机关；它口口声声骂人民是阿斗，骂赤化是得罪了一切帝国主义，骂赤党是危害民族之生存；它妄以代表民族利益争得民族自由与平等的党自欺欺人。实际上的效果是怎样呢？在它统治中国四五年中，它的专制腐败战乱搜括（十余万万公债，一旦跌至全部停顿无法维持时，将牵动全国金融陷于空前而不可挽救的恐慌）等一蹋泥糊涂的现象且不说，单就所谓民族利益与自由平等而论，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之空前的压迫，如济南惨案，万宝山和朝鲜惨案，以至此次东省的惨案，连珠而至，自称代表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政府，每一次不是诡称“已有办法”，而无一次不是拱手退让，还要力戒人民“镇静”、“忍辱”，还要用武力制止民众运动，视为“轨外行动”。

经过这些次鲜血的代价，按理总可以唤醒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自己认识实际危害中国民族生存的究竟是赤化还是反赤了。然而事实上，还只有工农劳苦人民是愿意赤化而不愿意亡国的，一切高等华人是宁愿亡国而不愿赤化的，此外还有一班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一面还不愿意亡国，一面又害怕赤化，想找出第三条路，即是既不亡国又不赤化

的中间道路。

其实，中间道路是不会有的，至多只能在某种特殊环境短期一现的。蒋介石也曾声称一面反赤，一面反帝国主义，实际是投降了帝国主义。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曾声称一面反共，一面讨蒋，结果仍是投降了蒋介石。号称反共反蒋的第三党，自谭平山脱离邓演达被捕而无形解散了。即将来还会有这一类的组织出现，亦不过是一时结社的游戏，革命运动一发展，其中左倾分子只有走向共产党，右倾的则归到国民党，很难久持其中间态度。

不但在落后的中国一班寻找中间道路的英雄，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即英国麦克唐纳尔的所谓“工党政府”，现已屈服于保守党了，拥有德国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民主党，亦已不能维持其中间地位，眼见它就要投降于准法西斯的白鲁宁狄克推多。

全世界已经只有两大营垒：一面是赤化的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民众；一面是反赤的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此外所谓中间势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于不存在。

单就此次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具体问题而论，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援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瓜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这里有个问题我们必须答复，即是有人要问：主张赤化的人们，要在中国赤化些什么？要把中国怎样的赤化？那末，我们必须明白告诉你们以赤化的政纲：

㈠ 驱逐帝国主义驻在中国的海陆军，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无条件的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有特权与利益，取消一切外债，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国家独立与统一——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

㈡ 实行八小时作工制，改良工人生活与待遇——反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党部干涉工会内部一切事务，反对国民党资产阶级利用"劳资一致共赴国难"和"增加生产"等口实，加紧榨取工人的血汗。

㈢ 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或土地不足的农民，取消高利欠债——反对国民党政府剿杀争取土地的农民武装队(红军)。

㈣ 改良兵士待遇，发清欠饷，军饷公开，兵士有选举官长之权——反对国民党军阀对兵士用体罚，反对国民党军阀克扣军饷，反对国民党军阀牺牲兵士争夺地盘，反对国民党军阀用命令强迫兵士屠杀工人农民。

㈤ 一切工农劳动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等完全自由，不加依据任何法律的限制——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紧急治罪法，工会法，出版法，民众团体组织条例等。

㈥ 召集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建立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政权——反对军事独裁的训政的国民党政权。

㈦ 恢复苏联邦交，并与之缔结反帝国主义同盟——反对国民党政府勾结帝国主义。(以下有一行字辨认不清——编者注)

㈧ 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治自决权——反对国民党政府压迫回民及内蒙并企图征服外蒙。

这一个赤化政纲，定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纲相对立的，请问你们愿意接受那一个？我们相信中国大多数人民是能够接受赤化政纲的，颜惠庆所谓"非中国人民所愿为"，只是代表中国的军阀、资产阶级和地主说话。

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香港

《火花》第一卷第四期　署名：独秀

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①]

用外交政策牵制某方面敌人，使有利于自己之斗争，有时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没有斗争之决心与实力，专依赖外交来以敌制敌，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卫，仰仗一面敌人之保护以拒绝另一方面敌人的危险政策，菲律宾之赖依美国，朝鲜之依赖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经验。

前清不自奋斗，妄用所谓“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于一八九五年依赖俄德法三国之干涉，归还辽东，次年又遣李鸿章使俄，秘密赠送东清铁路敷设权于帝俄，缔结喀西尼条约以抗日，这便是三十六年以来中国自己提出满洲以供国际帝国主义竞争践踏之开幕。一九〇三年帝俄占领奉天，前清不知利用民愤自己奋斗，乃转而依赖日本主张公理公道，出来打抱不平，主张公理公道的日本果然出兵“为中国打抱不平”了，一九〇四年日俄开战，中国竟公然宣告中立，只暗中帮助日本的忙，其结果日本继承了帝俄在满洲一切权利有增无减，这便是二十七年以来中国自己断送满洲于日本帝国主义之开幕。其后，美国于一九〇九年以来提议“满铁”中立，日俄于一九一〇年成立《满洲协定》，日本于一九一五年利诱威迫袁世凯政府签定基于二十一条要求的《中日条约》，日俄于一九一六年订立《秘密协约》(此密约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新政府宣告帝政时代带侵略性质的条约一概无效，才公布于世)，以至一九一七年《日美共同宣言》(即日本所称《蓝(辛)石(井)协定》)发表，中国的满洲以至全部中国，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竞争场与践踏场，亦即所谓东方的巴尔干。日美共同宣言，乃由于日本为抵制美国两次和帝俄所订立的《满洲协定》和《日俄密约》，都被新俄宣布无效，不得不直接与美国协商，以日本

---

①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于10月30日，11月20日第22、23期载文批评这篇文章。

承认“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和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相交换，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共同宣言之全部内容。当时日本一方面大庆外交成功，一方面以承认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为美中不足，特别在南满。中国北洋派的北京政府虽然曾通牒日美及其他关系各国，不承认此宣言；而一班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留美学生，竟信奉“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为救国的金科玉律。一九二七年以来，资产阶级的新政权，如蒋介石张学良辈，害怕以民众的革命势力对付帝国主义，仍袭用前清“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野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势力，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遂亦急乘美国和英国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无暇和它竞争以及中国政府消灭了民众运动的机会，由万宝山和朝鲜惨案的尝试，进到突然出兵占领满洲，以便进行其新二十一条的谈判。

以上就是此次满洲事变的一切远因和近因。

一直到现在还自夸“革命政府革命外交”(蒋介石答上海请愿大学生)的国民党政府对付此次满洲事变的政策是怎样呢?

中执委会通电：一、铲除赤匪；二、努力救灾与御侮；三、党员大团结；四、全国下半旗一天志哀。

蒋介石报告：守严整之纪律服从统一之指挥，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行动。

张学良饬其部下：坚忍一时听候交涉。避免与日军冲突，以维中日邦交。决持镇静态度无论日方如何压迫，始终取不抵抗主义，并对日侨予以安全保障。

张学良语北平记者：仍望国人冷静忍耐，勿生枝节。

张学良决定：对日取不抵抗主义，向世界宣布，以求公论。

邵力子语记者：中国取无抵抗态度，愈足暴露日人横暴，国际间定有公评。

王正廷语记者：致电国联，请主公道，以维国际信义。静候国联公平处决。

王正廷报告：致电日内瓦本国代表，想国联方面，当能依照盟约，处

理此事。

张继语记者:须取甘地不合作主义,毋须喊口号,贴标语。

韩復榘电:请为镇静应付。

北平各要人:力持镇静,因日违国际公法,我取不抵抗主义,世界必有公判。

杭州党政当局:主张暂持镇静。

蒋作宾电外部:对日军在东北行动,仍持镇静态度。

褚民谊语记者:此种举动(指通电各国良心公平裁判)实较其他有力,因世界上公理尚存,决不能任强权霸道:电粤方及中央重复团结,开救国会议。

戴传贤报告:似此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兽行,绝不能使其存留于世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话可说,唯劝告大家努力做人。

张继演说:过去呼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口号……得罪了全世界,今后必拥护一个政府……实行读书,造才救国。

李石曾演说:对日强盗行为,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必须以经济建设抗敌,沈阳事件吾人可证实须和平奋斗,不要感情用事。

国府通电各军:坚忍沉毅,力持镇静,取稳健团结之精神,务须避免轨外行动……保护日侨,并切实劝谕人民,务守秩序,听政府为正当之解决。

何健通电:消弭内争,力御外侮。

何成濬:主张力持镇静,听候中央交涉。

汉口官场:劝人民力持镇静,以待公理解决。

沪市执委告同志:指导民众使不致有越轨盲动的流弊。

中执委告全国学生:学生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以为全国国民倡,则国事必有可救。外交仅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

吴铁城诫平党部:勿唤起民众对日侨有轨外行动。

李石曾张继电粤:维持中枢即所以应付国难。

行政院电北平市府:保护日侨,并防反动分子乘机作轨外煽动。

北平军警对学生:禁止学生结队游行,校内期会由便警参加,学生演讲以三五人为限。

青岛市府电外部：力持镇静，切实保护外侨，严防反动煽惑，并与日领馆接洽，双方开诚，共同防范。

以上这些“革命政府的革命的外交政策”，可归纳为下列几点：一、对于日本任何压迫，都力持镇静态度，逆来顺受，始终取不抵抗主义，避免与日军冲突，而且还要切实保护日侨，以维中日邦交；二、一切人民须一心一德的维护，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外交政策”，听它统一之指挥，严守它力持镇静的纪律与秩序，勿感情用事，勿为越轨行动，静候国民党政府正当解决，否则以反动分子乘机煽动治罪；三、国民党政府的正当解决是：静候国际联盟公平处决和发起凯洛非战公约的美国出来干涉。照国民党政府这样的“革命外交政策”来应付此次事变，自然只有顺着这样的方式进行。

人民静候政府正当解决——政府静候国联公平处决——国联认日本行动为满意——日本更将满意的自由行动。

照常情说，凡是中国人都不能满意于这一公式；独有跑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的上海大学生，对于蒋介石的训话，表示满意，这真是出乎常情以外的事；这班大学生在口头上似乎也很热心于抗日救国的运动，然而费了很大的气力跑到南京，什么表示也没有，只跟着南京的学生喊了一阵“拥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万岁”，这类口号，人民耳朵里已听得烂熟了，如果它能反日救国，满洲事变已不至发生了，并且这些口号，张学良、曹汝霖、王正廷都会喊，不必青年学生；并且这些口号，在上海也可喊，不必旷时费事的跑到南京去喊，这真是出乎常情以外的事！上海学生群众，对于这样出乎常情以外的事，如不即时加以纠正，这便是学生运动重新低落之起点，同时便是国民党政府重新制止学生运动之起点。

本来民众运动中能以坚持较久的只有工人阶级，所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极力制止工界组织抗日救国会。

报界工会说得对：“四五年来，反帝国主义运动低落到地平线底下，而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不但不曾减少，反而与日俱增。”这便是此次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横行无忌之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国民党政府，一直到现在国难临头，对于民众忍无可忍才一开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还想乘间

伺隙，用违反革命纪律或扰乱秩序等罪名，加以制止，所以如果有人一面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一面又拥护国民党政府，则不啻直接向帝国主义自缚其手足！

在仅可能的对帝国主义逆来顺受仅可能的制止民众运动的国民党统治之下，此次满洲事变发展前途和关系中国民族命运如何，大致是可以预见的。

日本帝国主义此次突然出兵占据满洲，并不是冒昧从事的，它看清了列强此时不暇和它竞争，和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战中一样；它看清了中国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府决不敢和它抵抗，也和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政府一样；它看清了中国现在是反革命势力的统治，也和一九一五年一样；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已为国民党政府长期的普遍的压下去了，再经过万宝山案和朝鲜惨案之探试，更看清了国民党干涉与领导之下的所谓“民众运动”只是些官样文章，没有一丝一毫革命的气味，所以它才敢四顾无人的自由行动起来。它此次出兵的手段，即所谓“外交保障占领”；其目的是在获得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更凶恶更确定的中日条约，至少在南满与东蒙，这便是年来他们所喊叫的“根本解决满蒙悬案”，换句话说，就是要获得和日韩合并五年前《日韩协定》相等的中日协定，以决定满韩合并的命运，并且，日本解散韩国军队，是由统监伊藤博文到韩后才实行的；现在日本更急进一步，满洲还没有日本的统监，而已在非战争状态的平时，驱逐解散了所有的奉军，毁坏了奉天兵工厂，夺去了：

大炮八十余尊
其他炮六百门
飞机二百六架
步枪十二万支
机关枪五千挺

此外还运走了张作霖所遗留的八万金条（值现洋二万五千万元），姑无论芳泽撤兵的声明是否可信，姑无论是否滑稽的撤退若干军队至满铁附属地；而最近满洲所发生的事实却明白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指派一班卖国奴宣布满洲独立，这是已经以吞并韩国的故技公然施之

于满洲了！然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某一要人竟得意忘形的发表谈话："芳泽已郑重为日政府声明，立将现在东省之日本军队撤退至南满铁道附属地，此事足证军阀已受极大惩创……日军占据东省之一幕凶剧，由此将告一段落，日本军阀苦心经营之计划，竟于一星期内归于失败"（九月二十八日《新闻报》），又另一国府要人对中外记者说："距今十二日前，日本开始破坏远东和平，暴力侵占东省，当时日本国内军阀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以为多年迷梦，吞并计划可实行，乃不旋踵间，已不得不在国联行政院宣告失败"（十二月二日《新闻报》），原来是日本帝国主义失败了！像这样昏瞶无耻的官僚，真值得学生青年大喊"拥护"与"万岁"吗？

日本不完全退出占领地，不恢复事变前原状，国民党政府拒绝和它谈判吗？这是鬼都不能相信的，国民党政府只要有代表国民签字的资格，它能够拒绝新二十一条的要求到底吗？（承认满蒙独立包涵在内），就是他们自己也不能相信，经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迫与利诱，始而将要把全部至少是一部分严守外交秘密，因为"民气嚣张，一经宣布，舆论沸腾，措施益难"（曹汝霖语）；继而又会欺骗国民说："政府兢兢业业，既不敢意存挑拨；以速危机，又不敢轻言让步，自丧国权"（袁世凯派曹汝霖在参政院报告语），同时自然要求救于主张公道的国联与美国出来打抱不平，结果，恐怕还是要照济案的先例，坦然向国民宣布"不得已忍辱负重"，那时谁要反对，谁便是共产党，"如有违反革命纪律，或扰乱秩序者，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

或者有人以为我们这一类预测，未免侮辱国民党太甚；其实，国民党求救于国联与美国，固然不侮辱它自己，而侮辱中国民族则更甚了！因此且陷中国民族于最悲惨的命运！

英帝国主义因金镑奇跌，至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取消金本位制；美国帝国主义国库岁亏十万万金元，最近又有十六家银行倒闭：他们自身无法挽救的经济恐慌，使他们很难即时和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争衡，至于希望他们为中国打抱不平，便是等于希望国际帝国主义者自动的抛弃帝国主义，这是何等滑稽的幻想！为争夺市场和重新分配殖民地半殖民地，却是帝国主义挽救其国内经济恐慌之盲行的出路；中国的满

洲问题，倘不能自己由民众的力量得到革命的解决，而依赖别的帝国主义力量来解决，则过去的“以夷制夷”政策既然重演，过去的失败历史也必然重演：不是门户开放和特殊利益相争持的美日战争，甚至扩大到世界战争，在中国做战场；便是列强阳为应援中国，阴实坐视日本新二十一条要求之进行与成立，向中国要同等的特权与利益，中国沦为列强分辖的殖民地：无论是那一种结果，中国国民党和一班高等华人妄想求救于国联或美国，其罪恶岂只是侮辱中国民族而已！

在此次反日救国的运动中，只有“排货”和“对日宣战”这两个主张，不但是多数民众的意志，而且比较的正当；然不加以明了正确的注解和有效的方法便会归于空泛无结果，甚至走入歧途。

先说排货。第一，我们要懂得：只有站在政治斗争的利益上，以非常手段与决心行之才有意义，才有效果，即是说排货者自身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长期忍受极难堪的痛苦，以期获得被排者政治的让步；若站在经济观点上，计及某种原料之损失，某种日用品之缺乏和某种工业之破坏等……则处在现今盛行分工与交换密切相关之整个的经济世界，所能排之货，只限于某国某几种商品，这乃是国际间工业竞争之经常方法，所加于被排者之打击至极有限，如此而被以排货或经济绝交之名，实属空口呼号而无实际意义的滑稽把戏。自来排货之无效与不能持久，其弊实在于此，即是计较经济上的利害得失。第二，我们要懂得，排货是商人绝对的损失，希望商人自动的排货和商人自己检查，这也是再滑稽没有的事。所以只有由工人和学生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然后排货运动才能收实效。

再说对日宣战，希望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也等于希望商人自己检查日货。第一，殖民地或落后国家对帝国主义宣战，和寻常两国间的战争不同，这是一种革命战争，是需要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的，是不能抑制民众运动抬起头来的。而国民党政府宁甘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不愿受革命民众威胁；第二，若没有广大武装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政府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击，国民党丧失了军队即丧失了政权，它宁肯牺牲民族命运而不肯牺牲政权。要对日宣战，要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要获得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只有中国

第三次革命复兴，以革命的民众政权（这一政权，将经过全国抗日救国会而实现或经过国民会议或苏维埃[①]而实现，是由其组织的内容与斗争来决定的）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领导全国的革命民众和兵士，抱着美国十三州独立和法国俄国大革命始终不屈不挠的精神，再加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日本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朝鲜民族的帮助与声援，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同时以长期的排货，给日本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即令日帝国主义在军事不曾失败，其国内经济的政治的危机，也会迫着它不得不向中国革命的民众让步。这便是我们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

此外并没有别的路，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服从它力持镇静逆来顺受的统一指挥，跟着它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决不是中国民族应该走的道路。

十月二日

1931年10月8日 《火花》第一卷第三期 署名：陈独秀

① 本文在收入储安平编《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一书（新月书店，1932年11月版）时，将“或苏维埃”四字删去。

致蔡元培

孑民先生赐鉴：

敬启者。比月以来得晤海门陈训丹先生，与谈文字学，甚为快慰。陈先生于此道颇有深造，且多创见，独秀以能时与晤教为乐，陈君亦以居通州太孤寂，思来京获得友朋商榷之机会。因此日前曾言之于志希[①]、孟真[②]二兄，为寻一相当职业，使陈君得以寄居京中。闻中大及史语研究所目前均无法可设，故特陈情于先生，倘研究院其他部门或教部之图书馆及编审方面，如有可谋，请先生为之一言，使陈君有居京研究之机，则独秀之所渴望也。此上敬祝

健康

独秀拜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

（据手札）

---

① 罗家伦字志希。

② 傅斯年字孟真。

两个路线

——答民杰及小陈两同志

最近我们当中，因为讨论“抗日救国”口号的问题，发展到“革命的民众政权”口号的问题最后又发展到“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不是民杰及陈同志有意把问题扩大或节外生枝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们对于民主口号的态度根本有他们的整个路线，他们的路线是：

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机关。

“召集国民会议而实现民众政权”不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权。

“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的国民会议，必然成为无产阶级在反对阶段——两个革命过渡期中走上政治斗争最可怕的绞绳！

“国家政权”不是国民会议可以建立起来的。

仁静同志和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以为“中国第二次革命并未解决民主任务，因而第三次革命是以民主要求为开始”，因而革命初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革命；〔这是〕仁静同志……错误百出的分析。

“动摇而且推翻资产阶级私有财产”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这“在民主口号之下”可以发动起来吗？此时民主任务虽未完成，但政权已经转移……民主革命已经完结，再来的革命只有社会主义革命。以上是陈同志的意见。

若果说：“经过”资产阶级所御用的“抗日救国会”或“国民会议”来“实现”所谓“革命的民众政权”，那末这种政权，仍旧是“资产阶级的专政”。

如果承认所谓“革命的民众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别号，不但在目下要提出尚非其时，而且也只有列尔士的“鸡蛋哲学”之逻辑的发

展才可以得到说明。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靠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势之“国民会议”而“实现”，而是发生和发展于在“资产阶级专政”相对抗的革命斗争中之群众组织（如：赤色工会、贫农协会、罢工委员会等）非资产阶级所御用的机关中，只有用这些革命斗争的一切力量，来“消竭资产阶级之民主主义的源泉”，最后冲破“国民会议”，倾覆虚伪的“民主之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之后才完成”。

由“资产阶级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依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只有“经过暴力”……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最后毁灭“国民会议”来完成，并非“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以上是民杰同志的意见。

这一左倾的路线和斯大林派有一个共同点，即是鄙视国民会议的口号，至少也不把它看做是一个革命的口号，不愿意为它的实现而奋斗，有机会还要向它放冷箭，因为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机关，它只能实现资产阶级政权，于是无产阶级若是为实现国民会议而奋斗，便无异于为巩固或改良资产阶级政权而奋斗。对于国民会议这种定命论即国民会议（或抗日救国会）定命的只能为资产阶级所御用，而不能为无产阶级所御用，自然要否定“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了。那么，将经过什么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呢？

拟陈同志的答复是：“再来的革命，只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并且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话“……第三次革命……将于开始时（注意——陈）就要坚决的动摇而且推翻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他和以前王文元同志一样，只看见“开始时”这三个字，而忽略了括弧中“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这十五个字。

拟民杰同志的答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靠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国民会议”，而是靠“赤色工会、贫农协会、罢工委员会等”，“最后冲破国民会议”。照他这样说法，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号召工人贫农斗争中，不需要有什么总的政治口号，更不应该采用“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国民会议”口号。这一始终未被采用的国民会议口号，大可原璧送还卡笛科；或者拿这个不用“经过暴力”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国民会议”

口号，只限于在反革命的阶段，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做做争自由的灰色运动。

在反革命的阶段只能做做灰色运动，大约一向群众宣传鼓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和以革命政权代替反革命政权，就算是逾越了反革命阶段的政治斗争之“正轨”，这种和平改良主义的倾向，陈同志和民杰同志是一样。他们当然不是无政府工国主义者，但一谈到政权问题，陈同志便谆谆的教训我们：“目前是一个反革命的阶段，应是反对派对于现阶段之具体认识，亦即是目前政治斗争策略之出发点。”因此，他们的路很显明的是：在反革命的现阶段，无论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与否，都只能做做不涉及国民党政权问题的灰色运动，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夺取政权，是将来革命阶段的事。换句话说就是国民会议的口号，至多只好用在反革命阶段做做灰色运动；革命高潮一到来，马上便是社会主义的世界，便用不着什么国民会议的口号了。我以为这样整齐划一的阶段论者忘记了一件小小的事，即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革命的高潮是否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者会有何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替我们从反革命阶段走上革命阶段？或者他们现在还须秘而不宣，或者只有上帝知道！

和这一阶段的路线对立的，就是国际左派反对派不断革命论的路线，如托洛斯基所说：这个斗争(指国民会议斗争)本身有如一个锥子凿入有产阶级结合的中间，使其发生裂痕，并以此扩大无产阶级活动的范围。(《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一四九页)

民主主义不尽是幻想和欺骗，而且是历史的动力。(同书一五一页)

形式的民主主义口号，不仅抓住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抓住广大的工人群众，使他们感觉有可能(根本上是幻想的)以自己的意志去抵制军阀、地主和资本家。无产阶级先锋队就要在这个经验之上教育群众并领导群众前进。(同书一五三页)

我们的党领导无产阶级走到专政，只是因为党以最大的毅力要求彻底的和无条件的实现民主主义口号和要求。(同书一六七页)

在某一时代，民主主义问题，将不仅吸引农民，还要吸引工人，这件事情必须在我们领导之下进行。(本年一月八日来信)

煽动工作须要宣传来完成，至少能使无产阶级的最先进分子了解，走向国民会议的道路，只有经过反对军事独裁的暴动和由民众来夺取政权的手段，才有可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答《我们的话》的信）

不断革命论指出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在我们的时代直接引到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的任务置于议事日程，这就是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不断革命论》一四——五页）。

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完结自己的民主革命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极重要的特点……在殖民地国家，因土地问题之尖锐，和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同书一四〇页此条及上条均依仁静同志的译文）

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将是完成民主革命；但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自限于民主政纲，他将不得不跳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自传》）

苏联由民主主义行为到社会主义行为的过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进行的。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由民主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过程，进行得将比俄国还要快些。（《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

无产阶级先锋队，为民主口号斗争愈勇敢，坚决和会所顾惜……则在群众意识中，民主共和国和工人共和国愈快的成为一个东西。（《西班牙革命问题》）

托洛斯基同志所指示的这个路线，很明显的认为民主口号，不但在反革命阶段用得着，即在革命阶段也用得着，并且它的重要性，还是在落后国家可以经过它由反革命阶段直接走到革命阶段，我个人绝对相信这个路线是正确的。

我现在以十二万分的诚恳，要求每个同志拿出相当时间细心的把这两个路线比较研究一下，以决定赞否。因为这是我们究竟是否左派反对派的根本问题之一。此外一切词句，那个不正确，那个更正确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值不得拿革命工作的宝贵光阴来热心讨论修辞学。如果我们不决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夺取政权，而决定须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夺取政权；如果我们不相信落后国家的民主任务可

以直接引到无产阶级专政，然后由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而主张一开始就是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然后再回过头来附带的解决民主任务，这种“把车子放在马前面”的办法将使中国无产阶级获得政权的时期，推迟到世界革命成功以后。因为“若说现在的中国依现有的技术与经济的基础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跳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只有最无知识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才能作如此想”(托洛斯基)。在我们的时代，若有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和平发展到了相当时期，能够准备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这便是戴季陶混进了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队伍中！如果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例如在抗日救国或国民会议的斗争中，结成了比五卅运动中更大的力量，能够以暴力夺取政权，这时如果有人以为我们还没有苏维埃，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而出来主张慢点夺取政权，则这班迂腐先生，至多只能充当红色教授！

我还以为如果有人企图在这两个路线之中，东摘几个名词，西下几句批评，来建立一个折衷路线，这也是徒然的，这只是表明他自己没有路线。

我认为“无产阶级在中国占民族中最少数量，它要把持政权，只有于自己的周围团结民族中最大多数人，即城市的乡村的贫农”，“所以在一般鼓动上使用”“革命的民众政权”或“民众的革命政权”这类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冲突，而只是“无产阶级与贫农政权”的一种通俗说法，决不能说他是和介于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在历史上有一定意义之术语相等。这样的通俗说法，并不如陈同志所说是我“一种新的理论上的论据”；在去年十二月第七期“无产者”上，我已经提出“以全权的国民会议为最高统治机关来代替国民党的训政与军事独裁”的口号，并且我更不应拿马克思和托洛斯基的说法，冒充做我的新发明。托洛斯基所说“由民众来夺取政权”这句话，上文已经引过。“民众革命”，马克思在写给 Kuyilmation 论巴黎公社的信中曾经用过，俄国的少数派也曾经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一种话病，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后出版的“国家与革命”上详加解释与辩护，他认为“大多数民众”“便是贫农群众和无产

阶级自由联合”(详见《国家与革命》汉译本六一—六五页)。民杰同志硬指“民众政权”即“民主专政”——“工农民主专政”,于是连篇累牍的引用托洛斯基同志指斥“民主专政”的话来攻击仁静和我,这是侦探先生们栽赃捕人的办法!

十一月十六日

1931年11月28日 《校内生活》第一期 署名:独秀



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

在此次反日运动中，我们内部由讨论抗日救国的口号，进而讨论到我们在宣传鼓动中可否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我以为名词是次要的问题，根本问题是我们在战略上应不应参加并领导爱国运动，这必须切实的讨论，必须明确的决定，否则含糊两可的概念，会把同志们送到迷宫中去。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我有以下的意见：

（一）一切政策与口号，若不择空间和时间一概采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对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加以讥讽。例如马克思、恩格尔斯和列宁，对于民族主义的运动，都曾表示过赞助或反对两种不同的态度，这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 A、B、C；即布哈林后来也承认共产主义运动内不应排除民族主义运动，承认他当初对此问题反对列宁的错误。马克思、恩格尔斯和列宁都认为殖民地或被压迫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革命的，是有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我们应该相信，世界革命乃是先进国的社会革命和落后国的民族革命之合流。

（二）托洛斯基同志，在他所写的中国反对派的任务中，给我们以民主民族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等，正是由上述的观点出发。如果我们否认这一出发点（被压迫国的民主民族运动是革命的），则国际左派反对派所给我们的纲领和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因为如果在先进国提出民主民族的口号如国民会议和国家独立等，不但是无的放矢，而且是反动的；如果我们幻想帝国主义会自动的停止对中国压迫，或者幻想中国资产阶级会自动的采用民主政制和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则民主民族的口号对于无产阶级便没有一点革命的意义。

（三）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关系，史大林和布哈林所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因帝国主义的压迫要革命些；托洛斯基同

志所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国家,因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这两个结论的分歧点,当然是在估量那一阶级真能够担负民族解放的任务。我们反对派当然不能同意史大林和布哈林的估量。中国两次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基本利益都未有相当的满足,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不但过去曾向左盘旋,现在也是向左盘旋(如反日排货),即将来还有不少的盘旋。但资产阶级,比有些共产主义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必然要提高革命的群众,这首先便是对于它本身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负民族解放的任务。因此,领导中国的民族运动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不能看做是别个阶级的任务,更不应对之加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嘲笑,这样高贵的嘲笑之结果,没有别的,只有把自己任务和民族领袖的地位拱手让诸别的阶级。

(四)我们号召领导群众斗争,除在日常环境中找出些特别活泼的口号外,必须有一个总的政治口号即政治旗帜,能够召集比较宽广的群众参加全国性的斗争,走上革命道路。这样的政治旗帜,这样的政治口号,在落后国幼稚的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只能采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于社会主义的。如果人们不能肯定的说要用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又不屑于用民主民族主义的旗帜,那末,用什么旗帜呢?这必然陷于没有任何旗帜的混斗。史大林派正是这样。史大林派不是没有单个的具体的民主民族口号,不是没有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所谓“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他们更特别重视;然而他们却没有胆量明白的决定一个民主口号,做总的政治口号,做一切政治斗争的旗帜,以至于在实际战略中,拿苏维埃的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运动,好反对世界大战反对进攻苏联来抵制抗日救国的口号。仿佛民主民族主义的口号,只应该写在纸上,说在口头,到了民主民族主义的实际运动起来时,便要从左边向它放几支冷箭。为什么会有这样颠倒错乱的事,根本是没有真实了解民主民族主义运动在被压迫国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五）在此次反日运动中，有些反对派的同志，也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发出这样论调的人们，若不是简单的因为不满意那些名词，而是根本上有他们极左倾的立场，是因为有“工人无祖国”，“我们不应爱资产阶级的国救资产阶级的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阶级的立场”。这一大堆理论在他们的头脑中作怪。即便他们还未曾这样痛快的完全倾倒出来，而他们当中确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这样意念。如果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运动的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纲领，我们的民主要求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这是值得我们严重讨论的。

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永远不是教条，无论如何正确的理论，倘不能正确的用当其时其地，都会变成不完全正确，甚至于完全不正确。“工人无祖国”，是从消极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实，即是说还没有一个“国家机关”是拥护工人利益的，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之下工人都应该不要祖国；所以更须从积极方面（特别是被压迫国家）号召工人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它正在出卖的国家，以创造工人的祖国，在这样意义之下的救国爱国，正和资产阶级的卖国是对立的；难道被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应该领导这一反外国帝国主义并且反本国资产阶级的救国爱国运动吗？难道它应该和资产阶级一样不要祖国吗？反日，对日宣战，和通常称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一样，都不包含日本全体人民在内，即中国资产阶级的报纸，亦不曾把反日和对日宣战解释为对日本全体人民，所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也只是说它进攻苏联政府即无产阶级政权，并不包含苏联全体人民，至少也不包含苏联中资产阶级的成分在内。这些只是咬文嚼字的问题，实在值不得讨论。不错，“救国”“爱国”“民族主义”，其本质原来是资产阶级的；可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和其他民主任务一样，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了。

在民族运动中，怎样才是我们阶级的立场，这更需要有正确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而不是形式逻辑的了解，我以为应该是这样：帝国主义的国家如日本，这里的工人阶级，如果在压迫中国的反革命战争中，采用“救国”、“爱国”的口号，则是直接帮助了他们自己的资

产阶级帝国主义，间接帮助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直接打击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间接打击了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运动；并且更加紧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对他们剥削压迫，这便是离开了阶级的立场。如果中国工人阶级在努力救国爱国的民族革命斗争中，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啻打击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给在印度的英国帝国主义以威吓；不但生长了中国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力量与气焰，并且给了日本和朝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机会；这完全合乎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没有离开阶级的立场。或者有人驳问：中国工人阶级努力于救国爱国运动，虽然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岂不也是帮助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吗？我可以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话来答复："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运动，可以给资产阶级以扩大或加深其剥削的机会；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独立的行动，则有恐吓资产阶级并消灭其任何剥削之可能。"(《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一一页)。我以为必须这样提出具体的事例加以分析，然后对于所谓阶级的立场，才不至陷于空洞的笼统的形式逻辑的了解。

我真不懂得，我们在此次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中，必须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国和对日宣战的口号放几支冷箭，才算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如果人们效史大森〔林〕派骂我们采用国民会议口号是民主主义者的口吻，来骂我们采用抗日救国口号是民族主义者；那末，只有让这班社会主义者坐在亭子间里，静候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取得了政权，再请他们出来到社会主义者的元老院中去。

(六)又有些同志，一般的抽象的说来，并不根本反对民主民族的口号，可是对于某些具体的名词如"救国"、"爱国"，甚至于"民族主义"，也要放点冷箭，以为这些名词都含有毒素，这在根本观点上至少是接近于极左倾的立场，否则便是没有立场。我以为一切民主民族的口号，都多少含有点毒素，不但"民族主义"，即"民主主义"也含有毒素，例如形式的民主主义，我们不能因此便一般的反对民主主义，对于民族主义也是如此。这主要的问题不在某些口号本身是否含有毒素，而是看用在什么环境，发生什么作用，例如"救国"、"爱国"口号若用之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和平"的口号若用之于现在的中国，都同样的大有毒而特有毒。国民党党部和南京官僚甚至蒋介石，都还说说反对帝国主义和民

族解放；汪精卫和孙科，更是大喊民主政治；我们决不能因此便避讳这些名词。史大林派惯于拿改组派，中华革命党，新中国国民革命党，中国青年党，以至段祺瑞、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都赞成召集国民会议，说我们也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便是他们的政治盟友，我们也不能因此便避讳这一口号。同样，也不能以"抗日救国""爱国""对日宣战"流行于一般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国国家主义派"(即中国青年党)的口中，作为我们应该避讳这些名词或口号的理由。要令这一班虚伪的甚至反动的"爱国者"破产，只有在我们以具体要求领导广大群众发展剧烈的救国爱国斗争时才能够办到，决不是向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放几支冷箭可以办到的。

我们固然应该在纲领中规定总的政治口号，以为一切政治斗争的旗帜；然而仅仅这个还不够领导整个革命斗争的发展，必须在总的旗帜之下，从日常环境中随时得出特别活泼有生气的口号，才能够在实际斗争中领导群众。如果我们虽然采用了总的民主口号(国民会议)，而对于日常环境中发生的特别的民主民族口号(抗日救国)加以排斥，并且这类特别的民主民族的口号随时都会发生，若随时加以排斥，则总的民主口号便变成了一个偶像！

(七) 当然，在进步的工人中，对于"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我们应有原则上的战略上的正确解释，即：不是无条件的采用，也不是无条件的否拒。这是在工人中的教育问题，而不是在一般群众中的鼓动问题。

当中国资产阶级利用爱国口号来对付苏联时，我们便宣告它是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卖国而不是爱国，当它用这类口号对付蒙古时，我们便宣告它已经是帝国主义式的压迫弱小民族，而不是自卫的爱国救国；这时自卫的爱国救国口号，应该是蒙古民族的，这里没有一点矛盾，如果有人认为有矛盾，我们本来不能够强求形式逻辑的矛盾和辩证法的矛盾一致的。

(八) 最后，我还有个意见。我以为民主主义固然包含了民族主义在内，而后者在中国更特别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没有传统的民主主义运动；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之尖锐化更远

过于民主主义运动，主要的如五四、五卅运动和现在抗日救国运动，都是全国性的运动。这一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不但吸引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并且吸引工人；“抱中国人的义气”，“反对外国人”，这是在五卅运动中从广大的工人群众里自然发生的两个普遍而有力的口号，当时确有在这样爱国口号之下涌现工人苏维埃的可能，如果党有革命的政策；并且带工人苏维埃性质而且比广州暴动中的苏维埃更有群众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便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这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不应该忽视。过去我们的错误，根本是在以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也就是把民主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的任务，两个阶段的革命，所以认为“现在是他们（指国民党）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在将来”。（鲍罗庭到中国和我第一次见面，就宣布这样的根本方针，并且说这是莫斯科的意见。）这本是一切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传统的根本观点，我们现在若不粉碎这一观点，根本便不是左派反对派；忽视旧的教训，必然铸定新的错误。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条件之下，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将来还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民族从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压迫之下完全解放出来。在解放斗争中，尤其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环攻中国无产阶级新政权的斗争中，“爱国”或“保卫祖国”更是号召广大群众的唯一口号。“爱国”和“民族解放”，只是同一实质而新旧不同的两个名词；旧的名词（爱国）更富于历史性，更容易在群众中流行，并且已经在群众中普遍的深入的流行着。我们对于正在群众中流行的爱国运动，应该积极的去参加领导呢还是应该消极的向它放冷箭？这是必须明白决定的问题，尤其是一般到群众中去工作的同志立待决定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我们对于爱国运动，不独不应该向它放冷箭，并且不应该只是尾巴式的参加，而应该是领导；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并且它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斗争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

1931年11月28日《校内生活》第一期　署名：独秀

《热潮》发刊词[①]

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此次日本帝国主义无忌惮的强占了辽吉黑三省，并在中国各地示威行凶或炮击，英美法各帝国主义在巴黎会议上，无忌惮的牺牲中国见好于日本，正是他们乘着热潮还在伏流中一逞其凶焰；然而他们的凶焰，有时固然会使热潮低伏下去，有时也会使它高涨起来，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熏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只有近视的寄生虫们，只看见枪炮军舰飞机的力量，而不看见民众热潮的力量，并且他们就根本害怕，仇视这一力量，因此他们宁肯受帝国主义凶焰的薰灼——实已薰灼到他们的眉毛。

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

抗日救国的民众们，只有你们自己奋起的热潮是你们的根本武器，没有它，一切都是幻想！

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纪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或者为内外凶焰所毁灭，或者浮在热潮中向前发展，这就是它的命运！

1931 年 12 月 5 日　《热潮》第一期　未署名

---

① 本文原标题为《发刊词》。《热潮》，由陈独秀主编，并题刊头，铅印，至 1932 年 1 月 23 日共出了七期。

论对日宣战与排货

“对日宣战!”“对日宣战!”这是全中国最普遍的呼声,也是对待日本帝国主义无忌惮的侵犯中国时所应有的呼声,而且应该是最后的呼声,如果连这一呼声都没有,则只表示全中国各阶级人民都是□羊似的不抵抗主义的亡国奴而已,并不表示什么高尚理想,如果有人拿什么“大同主义”,什么“打破国界”,什么“不要祖国”,什么“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什么“反对爱国”,什么“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他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

可有人认为“对日宣战”是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反革命派别所拥护的,国民党中央胆敢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吗?恐迫〔怕〕只有相反的事实吧!这只表示造谣者对于国民党中央的幻想罢了!“对日宣战”这一口号,现在广大的群众中流行着,难道群众都反革命了吗?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你们的革命口号又是什么呢,你们主张“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对日宣战是什么?难道他像某军校心理测验中“战而不宣”的滑稽口号一样吗?

我们不能根本反对对日宣战这一口号。反对对日宣战,即是变相的不抵抗主义,或者说是高尚理想的不抵抗主义,实际是反动的,我们只能告诉群众,对日宣战必须靠民众自己的武装力量,如黑龙江二万农民弃锄投军;黑东双阳等十余镇组民团抗日军;哈尔滨护路军二十六旅三营十连的兵士,愤日军攻黑,长言不发令救护,廿四晚击毙连排长,由司务长率领,投马占山,驻富拉尔基的二十二旅一连,也取同样行动;这就是眼前已有的实例,若向政府请愿对日宣战,也和希望国联和美国主张公道是同样的幻想:因为政府诸公无论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都始终

不会舍弃对日不抵抗政策，他们都害怕开战损失了实力，不能保持地盘——搜刮民脂民膏的地盘。

对于排货运动，我们也是不应该根本反对的，根本反对排货的人，只有敌探和奸商，他们不能算是中国人！

我们只能告诉群众，(一)单是消极的经济绝交是不能制胜的，主要的是积极的努力于政治斗争；(二)经济绝交要想收到实效。我们自己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像工厂主和商人们那样计数经济上的利害得失，不肯牺牲，排货必然是一句空话；(三)因此，排货必须有学生和工人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严厉的充分严厉的检查，才能收效，希望商人排货，希望一般人自动的不用日货，这种办法等于没有办法，现在的排货运动，自然也得到了相当效果，然而影响还不算很大，并且排货前途已有不少的悲观现象；这正是政治斗争不进展，资本家计较经济上的得失利害和奸商反抗的力量远超过检查员的力量这三个原因。

有人认为排货要准备牺牲，即是"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中国的工农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这一句话包含了几方面的错误，在此次抵制日货运动中能够排除资产阶级的牺牲吗？上海的商人，正因为计算他们二三千万元的损失而主张启封日货。中国工农是不像资产阶级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是准备牺牲的，不但牺牲经济(即排货中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之昂贵)，而且还准备牺牲生命，因为在被压的中国，抗日救国是中国工农民众自己的任务，不能推诿到别人身上，不能看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谁不肯牺牲，就请离开民族革命的战线，去做一个不抵抗主义的高尚理想家。

1931年12月5日 《热潮》第一期 署名：顽石

时局已到了转弯点

时局一般都到了转弯点，不向前进即向后退，不能够停留在现状之下了。

先看帝国主义方面。一方面，日本对于调查团决议案力持修改两点：一是不许调查团报告九月三十日理事会决议犹未实行；二是日本对于匪贼及不逞分子活动应有实行军事行动之完全自由。又对于中立区事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拒绝国联干与。并且表示这是日本最后的意见，而绝无让步余地。同时，又声称如果中国不将锦州之兵撤去，如果拒绝中立区之设立，则是中国不履行其约，日本政府即无法阻止日军进攻。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民众所迫，对于中立区与锦州撤兵又有反悔之表示。国联怎么办？压迫日本吗？巴黎回声报说得最痛快："日本为抵抗苏俄之健将，法国以此原因，并为镇压殖民地之革命计，宜袒助日本。"实则具此心理者，并不只是法国，英美亦同因此心理而一致不肯得罪日本，现在他们只有更进一步一致压迫中国接受日本要求之一途，即所谓"承认日本地位"和"予日本以满意"，不能再在现状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

再看南京政府方面。反对设中立区，反对锦州撤兵，反对在日本撤兵前开始交涉，反对日军有在中国剿匪的权利，并且反对调查委员团之来华，这是从一般民众一直到江苏国难救济会这班老腐败一致的意见。并且这些意见，已经日渐坚决化和普遍化，尤其是到了北大学生来在南京示威的今天，已经不像以前用空头支票可以搪塞过去的了，已经走到施肇基顾维钧不得不辞职的狭巷中了。政府如果不愿公开的露骨的撕下欺骗人民的假面，只有退出国联和对日开战；如果继续任国联接受日本的要求，其势必须对人民取高压手段。站在人民方面，或站在帝国主义方面，它立须选择一个，再不能在现状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我们不

能幻想政府有丝毫选择前者之可能，拘捕大批北大示威的学生，明令禁学生集队请愿，已经是政府选择它的道路之表示。

或是服从政府安心当亡国奴，或是起来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民方面也立须选择一个。在此时局一般都走到转弯点的当口，不向前进即向后退，决不能够含糊敷衍的停留在现状之下了！

1931年12月12日 《热潮》第二期 署名：顽石

“一二一七”与“三一八”

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中国的爱国青年在北京所流的血犹未干，现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爱国青年又在南京大流血，前后五六年间，就流了爱国青年两次血！奴性已深感觉早已麻木的上流绅士所统治之国家社会，有多少奴性尚未深感觉尚未完全麻木之爱国青年的血，经得起这样流法！

在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之下，青年学生因感亡国之痛，不避忌讳的奋起向政府呼吁出兵抗日，这种“越轨行动”即不识时务的行动，我们早知会有第二次“三一八”血案发生，然而想不到这个血案不发生于军事独裁者尚未下野之前，尚未发生于蒋介石辞职后的第三天，而发生在汪精卫一流号称反对独裁政治主张“民主政治”的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之第三天，也就是发生在汪精卫派欢呼“接触到民主政治的曙光”（《民众》三日刊第十六期第七页）的时期。所以此次血案之负政治上的责任者，固然是整个的国民党政府；而负实际执行上的责任者，不能推之于已辞职的蒋介石（事实上当然还是蒋介石从中作祟而且大大的作祟），不能推之于昏聩无权的林代主席，而应由新政权之中坚分子及过渡者代理行政院院长陈铭枢负法律上的责任。

在此次血案发生的前二日，所谓“民主政治”的新政权之主脑人物汪精卫，已开始痛骂爱国青年是“少数不良分子，欲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譬诸败群之马，自无许其有存在之余地”。如果青年因爱祖国而危害党国，汪精卫便不许其存在；不许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杀！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卫所谓“民主政治”史之光荣的第一页！

蒋介石在下野期间，自然要用所谓“民主政治”家替他做两件事：一是替他屠杀爱国民众，一是替他签订卖国条约。这两件事也可以说是一件，即前者是为后者清除障碍物。所谓“民主政治”家，已在开始替他

做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将来自然也要替他做。并且，在“不危害党国”的原则之下，他们两方都愿意做这两件事。

“三一八”血案，因为是爱国学生反对安福政府对于日本舰队封锁大沽和外交团要求冯军离开天津之不抵抗而起；此次“一二一七”血案，是因为，爱国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占据东北三省和炮击天津之不抵抗而起；同是血案，而后者之起因，其严重远过于前者。

“三一八”血案，是安福政府在北京学生面前暴露其狞狰面目；“一二一七”血案，是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学生面前暴露其狞狰面目；同是血案，而后者之影响，其普遍远过于前者。

“一二一七”血案死伤之数，亦远过于“三一八”。只有政府所谓“暴徒从中利用”、“反动分子主动”、“藉端暴动”的宣传，则先后一揆；政府对学生的胜利，也后先媲美。

政府虽然胜利，而“三一八”失败学生的血，曾在中国史上写了“宣告安福政府死刑”八个大字！

十二月二十日

1931 年 12 月 29 日 《热潮》第四期 署名：硕石



"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

在此次学生反日运动中，除一般学生因国事危岌而左倾外，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也都起了相当的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认政党有在群众斗争中起作用的必要；问题是在某一党派在群众中所起的作用，是真正为了政治进化而斗争，或是单纯的为了它的政治地位而斗争；是在政治斗争中起了正的作用，或者是负的作用。

要认识汪精卫所领导的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在学生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怎样，首先便要查考他们的政策是怎样。

改组派的政策，在对外问题是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很明显的，抵抗与交涉是难以并行不悖的，他们的真意当然是交涉而不抵抗，所谓"一面抵抗"不过是门面话。汪精卫说："现在有些人，他们说，现在观察国民党的政府，如果和日本宣战，打败了后，国民党一定要灭亡；否则如果国民党与日本讲和，则可以加国民党以卖国之罪，也是要灭亡的。在国难当前的时候，谁也不应拿外交来对付内政，"照他的说法，他当然不愿意因宣战而致国民党灭亡，只有希望国人不以外交来对付内政即是不加国民党以卖国之罪，使它能够与日本讲和，以免"危害党国"；所以他们的覃振，更爽快坦白的说："现在对日，不应言宣战，当速改宣战而言备战。"改组派这样的对外政策，和蒋介石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对内政策，是标榜"推倒个人独裁"和"建立民主政治"两块招牌。可是在实质上，他们所谓"推倒个人独裁"，即是以他们一部分人的独裁来代替蒋介石个人的独裁；所谓"民主政治"，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甚至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官僚的民主，而不是政府对于人民的民主，也就是汪精卫所说"以均权求共治"，其对待人民之反民主的党治与训政，仍然和蒋介石政府的主张一样，照旧不动，如果有人想

动它一动，便是反动，便是危害党国，便“不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汪精卫所谓“均权共治”之具体方案，即是组设各地方的政治分会和军委会，据伍朝枢最近的表示：“（一）关于设立政治分会事，为应时势需要（陈济棠、张学良的需要吧！）起见，在某区域组设分会亦无不可；（二）既有组设军事国防委员会之主张，亦为应付时势计，将来或在东北西南各成立分会。”这样的“均权共治”，不但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是一个东西，并且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论”之复活，这样，只有使中国的财政与经济更加分裂与削弱，更加离国家统一愈远。

汪精卫所领导的改组派，其对外对内政策，并不比蒋介石政府高明，他们要赶走蒋介石，显然不是为了政治进化而斗争，而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所以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一到上海，他们即在上海学生中鼓吹“蒋已下野，学生已无赴京之必要”；所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数小时以内，汪精卫即宣布“少数不良分子欲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譬诸败群之马，自无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所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三日之内，陈铭枢即用刺刀来对付学生，造成“一二一七”血案，即改组派中较左的“民众三日刊”派，也认为“一二一七”血案是学生的“错误和过失”，他们对待学生运动，达到驱蒋目的之后，便看做榨过的柠檬了！学生群众必须及时认识，改组派之于学生运动，现在只能起负的作用，除非在某些地方某些权利和蒋派还有争夺时，尚需要利用一下学生运动。

国家主义派，更无所谓对外对内政策，他们曾在《民声周报》上向国民党表示：“为当前的国民党打算，在这种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国事公诸国人，亦是减轻责任，使人民共赴国难的一个办法”，“我们希望马上有个集中全国人才，代表全国各派政见的国防政府产生”，“我们在内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很明显的，他们唯一目的就是哀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容他们到所谓“国防政府”里尝一点官味。如果国民党需要减轻卖国的责任，只要国民党带他们玩，他们愿意牺牲一切政治主张，为国民党分谤。所以殴打陈蔡事件的“一二一七”血案一发生，他们认为学生运动不但超过了他们的目的，而且根本违反他们的目的，得罪了国民党；马上国家主义派所领导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一面致电慰问蔡元培，一面致电赴京示威学生，宣告“北平学生

对外交部捣毁文件，又赴中央党部殴击蔡陈两先生，本会……对于此类不辨是非利害之举动，认为不当”。国家主义派所组织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国会，也发出劝告学生复课书说：“目前形势渐见发展，锦州中立，天津共管，直接交涉等问题，暂时或不至实现，而蒋介石氏亦知国是难巨，来日大难，而急流勇退，通电辞职矣。我青年学子，处此时机，当决然躍出漩涡，归洁其身体，约束其思想，潜修其德业……国民恬静（恬静与镇静有别乎？）精神乃可以集中……诸君今日宜勒马峻坂，返动为静（又来一个‘静’！）……”这就是国家主义派对于“一二一七”血案的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暴行，正在有加无已；国民党政府无论是蒋介石真下野，或是他马上就会复辟，[1]他们的“不抵抗”、“极端避免与日本冲突”的“常轨”，他们自己是不会“逾越”的，全中国民众能够“恬静”的跟着他们当亡国奴吗？“一二一七”血案，只是民众反日运动暂时的挫败。历史是不会长久开倒车的，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之开倒车，并不能阻止爱国学生之再起而且更加猛进，只是他们自己在全国学生群众面前宣告破产！

经过了“一二一七”血案，学生运动，当然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只有这一新方向之转换，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躍出漩涡”，这样的转换方向，只有埋葬学生运动，埋葬反日运动！

十二月二十三日

1931 年 12 月 29 日 《热潮》第四期 署名：三户

---

① 1932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返回南京，经帝国主义撮合，与汪精卫共同掌握国民党政府的大权，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蒋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军事委员，3 月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

谈谈“越轨行动”

在目前阶段的反日反国民党运动，声势似乎是很浩大，而在行动上还是学生孤军独战，大多数民众虽有奋起之可能，实际还并没有起来；即学生运动虽已开始左倾，而到处仍不免表现出懦弱与妥协。国民党及一班准国民党的上层社会分子对于这一小小左倾运动，却已一致大喊“越轨行动”了！究竟已经有了“越轨行动”没有呢？应该不应该有“越轨行动”呢？我们认为必须讨论一下。

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被压迫民族看来，是束缚它的锁链，在帝国主义看来，是它的合法权利，被压迫民族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已经是“越轨行动”了，若采革命的手段，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那更是大“越轨”而特“越轨”，这便是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叛逆的行动。中国民族要求的国家独立与自由发展其国民经济，首先必须取“越轨行动”，以脱去此锁链。五卅运动一起来，梁启超和胡适，首倡以“友谊的谈判”、“合法的外交手段”修改条约(后有二十四个字模糊，无法辨认——编者)了三四年。其结果是日本用武力占据满洲来厉行不平等条约，一切帝国主义都站在拥护不平等条约的利益上左袒日本，这是证明不平等条约决不是谈判与外交手段可以取消的，只有诉诸“越轨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来厉行不平等条约，占据了东北三省，炮击了天津，现时还正在向锦州进兵，向天津、北平增兵，这分明是敌兵深入国境，国家危急存亡的问题，本应用所有的武装力量，救祖国于危亡。乃国民党政府视为外交问题，用交涉来解决。虽然暂时拒绝和日本直接交涉，而视间接交涉即所谓“请求国联主张公道”和“静候国联公平处决”为不二法门，直到国联第三次行政会闭幕之后，它一切不公道的主张和不公平的处决已成为公开之秘密，国民党政府已经到了无可“请求”无可“静候”之时，其一贯的“不抵抗”、“逆来顺受”、“极端避免与日

本冲突”的“镇静”政策，仍然丝毫不变，视违反其“镇静”政策者为“反动分子”，为“越轨行动”。其实，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于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

国民党政府对外政策，只知有党不知有国；其对内政策，只知有党不知有民；其已自绝于国民，自最激烈的共产党到最和平的江苏耆老团，一致认为事实；即彼党所称为国母的宋庆龄亦宣言“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党不能救国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顾惜”；即彼党青年亦自认“假党治之名，行专制之实，致令国民党为人所不齿”（二十七日上海日报）。然而汪精卫蒸电仍旧主张“组织政府之权属于中国国民党”，民众代表只可“为人民与政府间意志构〔沟〕通之机关”；陈铭枢则主张学生只能“在轨道内向政府贡献意见”；最客气的邹鲁，也只主张“国民救国会议”“得选代表参加中央政治”；国民党政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要“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便是“不良分子”，便“不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所以，学生群众一侵犯国民党党部，一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国民党便指为“越轨行动”，加以刺刀的制裁。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而言，“打倒国民党政府”，自然是“越轨行动”；然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国民党认为党权应高于一切，党的利益亦高于一切，举凡国家危亡人民戮辱，概不足以使其党内权位之争减轻毫末，汪胡只知反蒋不知反日，蒋只知反汪胡冯阎不知反日，汪胡与冯阎亦只知互反而不知反日，蒋介石一面宣布下野，一面指挥“督军团”跳梁于长江流域，锦州平津之警报置之不理，一中全会一提及用武力收回失地，即来了吴稚晖、商震、刘峙等一片反对声，而党内兵争却又已箭在弦上。在这样的政权之下，“国民救国会议”除充它的装饰品外，还能够做什么？国家政权即宣战议和调兵筹饷的大权操诸这班人手里，屠杀民众的快枪刺刀及一切杀人捕人的命令与机关都握在这班人手里，怎能够容有认真的反日救国运动发生？如果有人认为在反日救国运动中，在“国民救国会议”运动中，一侵犯到国民党政权问题便是“越轨行动”；那么，只接受陈铭枢的训令“在轨道内向政府贡献意见”，名为政府的反对派，实是国民

党资产阶级的尾巴；或者接受邹鲁的意见，为了“参加中央政治”去坐在国家主义派所提议的“国防政府”中与国民党共同卖国；此外还有什么“非越轨”的道路呢？

蔡元培在国府纪念周说：“学生爱国最所欢迎，但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重大，其害几与丧失领土相等，欧战时德国财政非常竭蹶，然并不停办学校，因为学生是国家的命脉……当青年时便牺牲很多光阴与事业，真是可怜可惜。”在国民党内部连年战争中，不知道破坏了若干教育经费，牺牲了若干学生的光阴与学业，蔡元培何以独对于爱国运动中的牺牲发出了可怜可惜的叹声？为爱国运动而牺牲到青年的光阴与学业，这种“越轨行动”，当然是可怜可惜，不过这一“越轨行动”也是必需的。一班老成人和老成持重的中年人，对于国难（政府卖国也包含在内）都袖手旁观，青年学生若不挺身出头干一下“越轨行动”，国民党政府卖国自然卖的更顺利些（例如：锦州撤兵，中立区，天津共管诸问题），其如祖国危亡何！犹太，印度不少大学问家，何救于他们的衰亡！青年学生在“越轨行动”中虽然牺牲不少的光阴与学业，而获得活的经验与磨练，未必不胜过读死书，这更是新旧翰林如蔡元培辈所不能懂得的。

因封存日货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发生了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的问题，因此有人想出一面查货一面受法律处罚以两全的妙计，可谓滑稽之至，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看来，没收奸商的日货以至封存日货，自然都算是侵犯了财产私有权，都算是“越轨行动”；但欲贯彻排货目的，这一“越轨行动”，自然也是必需的了。所以反日而欲避免“越轨行动”，简直是寸步难行！如果真要对日战争，一切没收日商财产，没收奸商亲日派的财产，没收卖国官僚的财产，以充军费，更需要大干其“越轨行动”！

我再老实告诉大家吧！“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自从我们的始祖，直立起来，以前两足为两手而劳动，一直到近代以大批机器停止了无数万万手工业农业劳动之呼吸，都是大大的“越轨行动”，英国法国一班“越轨行动”的不良分子，都曾把皇帝送上了断头台，中国的

不良分子也曾推翻了清朝大皇帝，这也算得是“越轨行动”。不良分子汪精卫，也曾企图亲掷炸弹狙击清朝摄政王，这不也是“越轨行动”吗？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

或者有人以为“越轨行动”固然产生过不少的文明，也带了许多罪恶。这是懦夫的声音！莲花是经污泥里生长出来的，文明也是从罪恶之火焰里生长出来的呵！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热潮》第五期　署名：顽石

